

大转型

目录

罗伯特·M·麦克伊弗的《序》

第一部分 国际体系

第一章 百年和平.....5
第二章 保守的 20 年代 革命的 30 年代.....23

第二部分 市场经济的兴衰

一、血汗工厂

第三章 “生活环境与经济进步”36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体系.....47
第五章 市场模式的演变.....61
第六章 自我调节的市场与传统商品：劳动力、土地和资金...73
第七章 1795 年的斯品汉姆兰.....82
第八章 前因与后果92
第九章 贫穷与乌托邦.....110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发现.....119

二、社会的自我保护

第十一章 人、大自然和生产组织.....140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145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接前一章）：阶级利益和社会改
变162
第十四章 市场和人175

第十五章	市场和自然.....	191
第十六章	市场和生产组织.....	205
第十七章	自我调节的功能受到削弱	214
第十八章	具有破坏力的紧张关系.....	222

第三部分 前进中的变革

第十九章	平民政府和市场经济.....	235
第二十章	社会变化调整中的历史.....	250
第二十一章	复杂社会中的自由.....	263

资料来源的注解

1.	力量平衡.....	275
2.	百年和平.....	281
3.	金线的突然折断	283
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钟摆的摆动.....	284
5.	金融与和平.....	285
6.	“社会与经济体系”的精选参考文选	286
7.	“市场模式的演变”的精选参考文选.....	292
8.	斯品汉姆兰制文献.....	298
9.	斯品汉姆兰和维也纳.....	307
10.	为什么不用“惠特布雷德法案”？	309
11.	迪斯累里的“两个国家”和有色人种问题	311
12.	补充说明：《济贫法》与劳工组织.....	315

主题索引.....

作者索引.....

第一部分
国际体系

第一章 百年和平

19 世纪的文明发生了崩溃。本书所论述的就是这件事情的政治和经济起因，以及由这件事情带来的那场巨大变革。

19 世纪的文明是建立在四个制度基础之上的。第一个是力量平衡体系，它在一个世纪之中防止了任何长期的毁灭性的大国战争的出现。第二个是国际金本位制，它象征着世界经济的单一组织形式。第三个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模式，它产生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第四个是自由政体。以一种方式来分类，这四个制度中有两个是经济方面的，两个是政治方面的。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分类，它们有两个是属于国家性质的，两个属于国际性质的。它们共同确定了我们的文明史的特征性轮廓。

在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被证明是关键性的；它的崩溃大概就是那场灾难的起始原因。在它发生崩溃之时，大多数其它那些制度都被牺牲以求挽救它，结果是徒劳无益。

不过，那一国际体系的源头和母体却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正是市场这个创新产生了特殊的文明。金本位制仅仅是旨在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努力而已；力量平衡是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之上并部分通过金本位制进行运作的一个超级组织形式；自由政体本身只是那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产物。19 世纪的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那些管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我们的命题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在不消除社会的人性和自然本质的情况下，从时间上来说，这种制度根本就无法存在；它在物质上会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社会必然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但是社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损害市场的自我调节、破坏工业生活的组织并因此以另一种方式来危害社会。正是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把市场逼进了一套固定的常规之中，并最终破坏了建立在这套常规基础之上的社

会组织。

对人类历史上最深层的危机之一做这样一种解释，肯定看起来太过简单。试图把一种文明及其实质和思潮缩减为一组硬梆梆的数目固定的制度，再试图从这些制度中选择一种作为基本因素来按照其经济组织的某种技术特征论证这一文明的不可避免的自我毁灭，这样的做法似乎是再笨拙不过的了。各种文明，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来自于许多独立因素的相互作用，而这些因素从法则上而言是无法简化为范围有限的制度的。追溯一个文明之衰落的制度机制，很可能表现为一种无望的努力。

但这正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目标调整到这一主题的极端独特性上。因为 19 世纪文明的独特性，正是在于它是以一个固定的制度机制为中心的。

任何解释都无法圆满地说明什么因素不是那场大转变的突发性的原因。仿佛变革的各种力量已经被压抑了一个世纪，各种事件所构成的一股洪流冲着人类劈头盖脸而来。一场遍及全球的社会变革以前所未有的战争形式而达到了高潮，其间，有 20 来个国家灭亡了，而新的帝国的轮廓正在一片血海中现身。但这一恶魔般暴力的事实却被一股急速无声的变革洪流所覆盖，这股洪流吞噬了过去却往往并没有在表面上留下很多涟漪！理性地分析那场巨变，必须既要解释疾风骤雨式的行动，又要解释寂静无声的消解。

我们的努力不是历史性的工作；我们所寻求的，并不是把重大事件作令人信服的排列，而是按照人类的制度来解释这些事件的趋势。我们将自由地详细研究过去的场景，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把当前的事情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将详细分析关键性的时期，并几乎完全忽视时间上的相互搭接；我们将超越好几个学科领域，以便追寻这一独一无二的目标。

首先，我们将研究那一国际体系的崩溃。我们将努力展示，一旦世界经济崩溃了，那么，建立在世界经济基础之上的力量平衡是无法确保和平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那场崩溃会发生得那么突然，又

消解得不可思议的迅速。

不过，如果说我们的文明的那次崩溃在时间上是由世界经济的崩溃所决定的话，它却肯定不是由世界经济的崩溃所引起的。它的起因在于 100 多年前的那场社会和技术巨变，而西欧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模式概念就是从那场巨变中诞生的。这一新鲜事物将在我们的时代终结；它闭上了工业文明历史的一个独特阶段。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研究对我们时代的社会和国家变革起支配作用的那一机制。广义地说，我们相信，当前人类的环境应该按照各种危机的制度起因来进行界定。

19 世纪产生了欧洲文明史上一个前所未闻的现象，也就是 1815~1914 年间的百年和平。除了多少具有殖民性质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外，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和俄罗斯诸国之间进行的战争总共只有 18 个月的时间。相比较地计算一下，此前的两个世纪中平均各发生了 60 至 80 年时间的世界大战。不过，在 19 世纪的大灾难中，就是 1870~1871 年最激烈的那场法兰西对普鲁士的战争也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其中战败国支付了一笔史无前例的赔款，且并没有对相关货币造成影响。

务实的和平主义的这一胜利，肯定不是缺乏重大冲突原因的结果。伴随这一和平主义场面的，几乎是强国和庞大帝国的内外环境的持续转变。在 19 世纪的第一阶段，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的此起彼伏是当时的常态。在西班牙，丹古莱姆公爵（Duc d'Angouleme）手下的十万军队在加的斯（西班牙港口城市）掀起了风暴；在匈牙利，马戈雅（Magyar）革命威胁着要在激战中有打败皇帝本人，只是最终被一支战斗在匈牙利领土上的俄国军队所镇压。在德国各地和在比利时、波兰、瑞士、丹麦和威尼斯的武装介入行动，标志着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无所不在。在 19 世纪的第二阶段，进步的动力得到了释放；奥斯曼帝国、埃及帝国和阿拉伯帝国（Sherifian Empire）发生分裂或被肢解；入侵的军队迫使中国向外国人开放其门户，非洲被一次性瓜分完毕。同时，两个强国即美国和俄罗斯的

崛起，引起了世界的重视。德国和意大利实现了国家统一；比利时、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宣称或重申它们自己是欧洲版图上的主权国家。一系列几乎没有停顿的野战，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步伐，进入了落后文化或未开化的人们的领地。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征服，英国在印度和非洲的不计其数的战争，法国在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剥削行为，都在强国之间引起了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只有武力才能解决。不过，每一个这些冲突都被地方化了，而不计其数的其它武力变革场合，要么是由联合行动加以解决，要么是因强国间的妥协而被平息。不管方法如何变化，结果都是同样的。尽管在 19 世纪第一阶段，立宪主义受到禁止，神圣同盟以和平的名义压制自由，但在其第二阶段，宪法却由那些具有商业头脑的银行家们兜售给了吵吵嚷嚷的暴君们。因此，在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意识形态之下（有时以进步和自由的名义，有时借助君主和圣坛的权威，有时利用股票交易和支票簿，有时通过腐败和贿赂，有时借助道德论调和开明的呼吁，有时依靠旁敲侧击和武力），一个不变的结果得以实现：和平得到了维持。

这一近乎奇迹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力量平衡的作用，而力量平衡在此产生的结果通常是和它自身是不相干的。从性质上来讲，那种平衡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就是所牵涉到的力量个体的生存；事实上，它仅仅做了这样的假定：三个或三个以上有能力运用力量的个体将总会表现为把较弱的各个体的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形式，以便对抗最强大的个体的任何力量增加。在通史范畴之内，关心力量平衡的国家就是力量平衡有助于维护其独立的那些国家。但它达到这一目的只是通过不断变更的伙伴之间所进行的持续战争。古希腊或者意大利北部的城邦（city-states）的做法就是这样一种例子；不断变换的战斗组织之间的战争，维持了那些城邦的长时间的独立。同样原则的行动，确保了 1648 年明斯特西法里埃条约（Munster and West-phalia treaty）之时组成欧洲的各个国家的主权。

75年之后，当各签署国在乌得勒之条约（Utrecht Treaty）中声明它们正式遵守这一原则之时，它们从而就把它并入了一个体系之中，并由此确立了借助战争方式来彼此确保强国和弱国的生存的做法。同样的机制而不是战争产生了19世纪的和平，这一事实是挑战历史学家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全新的因素就是出现了一种对和平的强烈兴趣。从传统上来说，这种兴趣被认为是国家体系范围之外的事情。和平及其手段的必然结果，只与生活中的点缀相当。教会祈祷和平可能就像祈祷好收成一样，不过，在国家行为范畴之内，它依然会赞同武装干预；各国政府把和平置于安全和主权之下，更确切地说，不诉诸终极手段，它们的意图就无法实现。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被认为比一个社会中存在有组织的和平兴趣更有害于这个社会。近至18世纪后半叶，让·雅克·卢梭还指责商人缺乏爱国心，因为商人们被怀疑爱好和平胜于自由。

1815年之后的变化既突然又彻底。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在把和平的商业确立为普遍利益的过程中，增强了工业革命不断上涨的浪潮。梅特涅（Metternich）声明说，欧洲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和平。根茨（Gentz）把爱国者称为新的野蛮人。教会和君主开始着手欧洲的非国有化。他们的论点，在当时刚刚流行的战争形式的暴行中和在新生的经济之下得到巨大提升的价值观念中，都找到了支持。

新的“和平兴趣”的持有者，通常都是那些主要从和平中得益的人，也就是世袭统治者和封建领主组成的集团，他们的世袭地位受到了席卷欧洲大陆的爱国主义革命浪潮的威胁。因此，神圣同盟为积极的和平政策提供强制性的力量，有大约三分之一世纪之久；它的军队在欧洲到处游动，镇压少数，压制多数。从1846年到大约1871年，即“欧洲历史上最为混乱拥挤的一个四分之一世纪”¹，和平在摇摆不定之中被维持了下来，反动力量的衰退遇到了不断增

¹ 松塔（R·J·Sontag），《1871至1932年的欧洲外交史》，1933年。

长的工业主义力量。我们发现，在法兰西对普鲁士战争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和平的兴趣复活了，其代表是一个新的强大的实体，即欧洲协同比（the Concert of Europe）*。

然而，兴趣就像意图一样，必然保持在一种不切实际的状态，除非通过某种社会媒介的手段被转化为政纲。表面上看，这种实现的手段是缺乏的；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同比，最终仅仅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组合而已，而且因此又受到力量平衡及其战争机制的制约。那么，和平是如何维持的呢？

诚然，任何力量平衡体系都将倾向于防止这样的战争，它们因为某个国家没有预见到力量重新结盟而爆发，而这种力量重新结盟将会源自于该国试图改变现状。著名的事例就是俾斯麦*于 1875 年在俄罗斯和英国干预的问题上（奥地利帮助法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取消了针对法国的媒体攻势。这一次，欧洲协同比起而反对德国，致使它发现自己受到孤立。德国在 1877~1878 年没能够防止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战争，但通过支持英国反对俄罗斯对达达尼尔海峡采取的步骤而成功地把它化解为一场局部战争；德国和英国支持土耳其对抗俄罗斯，由此保住了和平。在柏林会议上，一个清算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财产的长期计划被启动；尽管现状随后发生了各种变化，但这导致了强国之间避开战争，因为有关各方预先能够明了自己在战争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力量。这些例子中的和平，是力量平衡体系的副产品，是受到欢迎的。

此外，如果涉及到的仅仅是小国家的命运，通过消除战争的起因，战争有时候就得以避免。以任何可能促进战争的方式，都可以阻止和预防小国家扰乱现状。1831 年荷兰入侵比利时最终导致比利时中立。1855 年挪威被中立。1867 年卢森堡被荷兰卖给法国；德国

* 欧洲协同比（the Concert of Europe）：《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翻译为“欧洲一致原则”。这是拿破仑时代之后的一个术语，表示欧洲各王国在保持领土现状及政治现状上的意见一致。这使大国在有些国家发生内乱时得以有权责进行干涉，并将大国的集体意志强加于这些国家——译者注。

* 俾斯麦：1815~1898 年，普鲁士的“铁血宰相”——译者注。

表示抗议，卢森堡便被中立。1856年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被声明是欧洲平衡所必要的，欧洲协同比便努力维持那个帝国的存在；1878年之后，当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被认为是欧洲平衡所必需之时，其肢解便被以同样堂而皇之的方式加以考虑，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做出决定便意味着几个小人物的生与死。丹麦在1852~1863年间，德国各部分在1851~1856年间，曾经威胁要打乱平衡；小国家每一次都被大国强迫就范。在这些事例中，力量平衡体系提供的行动自由权，被大国用来实现共同的利益，而此利益恰巧就是和平。

但是，与百年和平这一恢宏的实情相比，通过及时梳理力量状况或胁迫小国家而时不时地避开战争，则是一件完全不同之事。国际上的不平衡，可能因无数个原因而出现，这些原因可以从一个王朝的绯闻到河口的淤塞，从一个神学的论战到一项技术发明。财富和人口的纯粹增长或它们的最终减少，必然会推动政治力量；而外部平衡将肯定会反映出内部情况。即便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平衡体系能够确保和平而不出现持久的战争威胁，它也必须有能力直接影响这些内部因素并防止出现不平衡的苗头。一旦不平衡态势积累了动力，只有武力才能对之加以矫正。若要保证和平，战争的根源必须消除，这是一个常识；但没有普遍认识到的是，若想消除战争根源，一切必须从源头加以控制。

神圣同盟打算利用本身特有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欧洲的君主和贵族们形成了一个血族关系国际；罗马教廷自愿在南欧和中欧为他们提供从最低到最高社会档次的民间礼仪服务。血缘和贵族地位的等级制度被融合成了一件具有地方规则效应的工具，为了确保大陆的和平，这一工具仅需要以武力加以补足。

不过，紧随其后的欧洲协同比，却缺乏封建制度和宗教方面的触须；它至多达到了一种松散联盟的地位，其凝聚力无法比得上梅特涅*的杰作。只有在罕见的时机才能召开强国会议，而它们之间的

* 梅特涅：奥地利政治家，组织了反拿破仑的胜利同盟——译者注。

猜忌则为阴谋诡计、反对意见和外交破坏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联合军事行动变成了稀罕事。然而，尽管神圣同盟在思想和目标上的完全统一，它只有在借助频繁的武装干预的条件下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个称之为欧洲协同体的虚飘飘的实体却按照世界规模在借助武力的频度和力度上以低得多的方式就做到了。若要解释这一令人惊异的成就，我们必须寻找在新的背景下起作用的某种不为人知的强大社会媒介，它在老的背景下可以起着王朝和主教制度的作用并使得和平的兴趣行之有效。这一匿名的因素就是金融集团 (haute finance)。

对 19 世纪国际银行业的性质，我们还没有做过全面的探究；这一神秘的行业组织，几乎还没有从政治经济学神话的明暗技巧中浮现出来。²有人说它仅仅是各国政府的工具；有人说各国政府是它那难以满足的利益渴求的工具；有人说它是国际不和谐的传播者；有人说它是具有女人气的世界大同主义的工具，而这种世界大同主义则榨取了具有阳刚之气的国家的元气。这些说法都没有大错。作为一个独特的组织，金融集团是 19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和 20 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内所特有的东西，它在这一时期所起的作用就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纽带。它为国际和平体系提供了手段，它是在强国的帮助下发挥作用的，但强国本身既没能力创建它也没能力维护它。在欧洲协同体仅断断续续地采取行动的同时，金融集团的运行却像一个永久的最具弹性的机构。它独立于任何一个政府甚至是最强大的政府之外，它与所有人都有联系；它独立于各中央银行甚至是英格兰银行之外，但它与它们保持密切的联系。金融与外交之间有亲密的接触；在没有肯定对方的良好意愿的情况下，双方都不会考虑任何长远的和平或者战时计划。然而，成功维持普遍和平的秘诀，无疑潜藏在国际金融业的地位、组织和技巧之中。

这一奇特的组织中的人和动机赋予了它一种地位，这一地位牢

2 费斯 (H. Feis), 《1870 至 1914 年的世界银行家：欧洲》，这是一本我们经常参照其原文的著作。

牢地扎根于严格商业利益的专属领域之中。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Rothschilds）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府；作为一个家族，它们体现了国际主义的抽象原则；它们的忠诚是对一个公司的，而该公司的声誉则变成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世界经济中在政治性政府与工业活动之间的唯一超越国家的纽带。最终，它们的独立来自时间的需要，因为时间要求一个主权代理人既要支配本国政治家的信心，也要支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就是针对这一生死攸关的需要，驻扎在欧洲各国首都的一个犹太银行家们的王朝的超自然的治外法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解决办法。他们决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在为战争提供资金的过程中发了财；他们不受道德问题的影响；他们决不反对任何数目的小型战争、短期战争或者局部战争。但是，如果强国之间的一场普遍战争干扰了国际体系的货币基础，他们的生意就会受到损害。按照事实的逻辑，在全世界人民都置身其中的一场革命性变革的过程中，他们必然会维护普遍和平的必要基础。

从组织上来讲，金融集团是人类历史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机构之一的核心。尽管它只是昙花一现，但从普遍性和形式及手段的多样性来讲，它却可以同人类在工业和贸易上的全部追求相媲美，它在某种贸易中已经变成了典范及其对等物。除了国际中心即金融集团之外，还有六个左右的国家中心围绕着它们的发钞银行和股票交易所而活动。另外，国际银行业并不局限于各国政府的金融业务和它们在战争及和平时期的商业冒险；它包含工业、公用工程和银行中的外国投资，以及向外国政府和私营公司提供的长期贷款。国家财政又一次成了小天地。仅英格兰一地就有 50 来种不同类型的银行；法国和德国的银行业组织也是独特的；在每一个这些国家里，财政准则及其与私营金融界的关系，不仅变化大得惊人，而且往往在细节上无比微妙。货币市场处理着大量的商业票据、海外的承兑汇票、纯粹的金融票据以及活期借款和其它股票经纪人的业务。这一模式因无数种国家组织和人物特征而精彩纷呈，每一个都表现出其特有的威望和地位、权力和忠诚、资财和人脉关系类型以及主顾和社会

氛围类型。

金融集团并不是旨在成为一种和平的手段；就像历史学家会说的那样，它是碰巧承担了这一职能，而社会学家可能更喜欢称之为可用性法则。金融集团的动机是获利；为了实现此动机，它有必要不断讨好各国政府，而政府的目标是权力和征服。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安全地忽略各国政府方面在政治与经济权力、经济与政治目标上的区别；实际上，民族国家在这一阶段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这样的区别仅有一点点现实性。不管各国政府的目标如何，它们都努力通过使用和增强国家实力来实现它们的目标。另一方面，金融集团的组织和全体成员是国际性的，至今因此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组织。作为促进银行家参加辛迪加和银行团、投资集团、外国贷款、金融控制或者其它雄心勃勃的大范围交易的中心，金融集团必然寻求国家银行业、国家资本和国家财政的合作。尽管通常来讲，国家财政不比国家工业那样屈从于政府，但为了使国际金融热衷于同各国政府本身保持接触，国家财政依然充分地屈从于政府。不过，鉴于其地位和人员组成、其专有的大量财富和下属关系网络，从实际上独立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角度来说，金融集团能够为一个新的利益服务，这一利益本身并无任何特有的喉舌，并且也没有任何其它的机构碰巧能够为这一利益服务，尽管如此，这一利益对于社会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它就是和平。它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它甚至不是牺牲有关国家的任何一点独立、主权、或未来目标的和平，但它是和平，如果它可以实现而又没有这种牺牲的话。

否则，就不是和平。权力比利润居先。不管权力和利润如何密切地相互向对方的领地渗透，最终是战争把规则让给商业。例如，自 1870 年起，法国和德国就相互敌对。这并没有排除它们之间的不承担义务的交易。为了暂时的目的，曾经组织过银行业辛迪加；德国投资银行曾私下参加过跨国界的企业，这在资产负债表上并不出现；在短期贷款市场上，法国银行方面对汇票给予打折，并依据担保和商业文件发放短期贷款；在铁和焦炭联姻或者蒂森公司在诺曼

底的工厂一例中曾有过直接投资，不过这种投资被严格限制在法国的固定地域，并且一直受到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激烈批评；直接投资往往更多地是投向殖民地，德国坚持不懈地努力确保阿尔及利亚的高品位矿石就是例子，涉及到在摩洛哥的商业参与的故事也是例子。不过，一个严酷的事实依然是，在 1870 年之后，官方心照不宣地禁止德国有价证券在巴黎交易所进行交易的禁令从未被取消过。法国只是“选择不冒风险，以免得到贷款的国家用他们的力量”³反过来进攻自己。奥地利也是被怀疑对象；在 1905~1906 年的摩洛哥危机之后，那一禁令扩大到了针对匈牙利。巴黎的金融圈子恳求接纳匈牙利的有价值证券，但工业圈子支持政府坚决反对向一个可能的军事敌国做任何让步。政治外交上的竞争力度继续毫不减弱。任何有可能增加假想的敌国之潜力的步骤都受到政府的否决。从表面上看，冲突好像不止一次得到了平息，但内部的圈子都明白，它只不过是转移到了和平的表面之下隐藏得甚至更深的问题上去了。

再来看看德国东部的野心。此处，政治和金融也搞在了一起，但政治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危险争吵之后，德国和英国于 1914 年 6 月在巴格达铁路问题上签署了一项全面协定，但人们常说，这份协定签得太晚了，以致于没法阻止那场大战。相反，也有人说，那一协定的签署，确实实地证明了英德之间的那场战争并不是由经济扩张的冲突引起的。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得到事实的证实。那一协定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德国铁路线依然不得越过巴士拉，而且，那一协定的经济区划必然导致未来的正面冲突。与此同时，各大国继续在为战争之日而准备，这个日子甚至比它们所认为的更近。⁴

国际金融界不得不处理各大小国家的互相冲突的野心和诡计；其计划受到外交伎俩的阻挠，其长期投资受到损害，其建设性的努

³ 费斯，引用著作同前，第 201 页。

⁴ 参考，《资料来源说明》，第 264 页。

力受到政治破坏和暗中使绊行为的阻碍。有所助益的国家银行组织，往往以各自政府的同谋者的身份采取行动，而且，没有什么计划是牢靠的，因为没有任何计划预先确定了每个参与者的利益。不过，实力金融（power finance）却往往并不是牺牲品，是美元外交为金融温柔的外表提供了坚强的内部支撑。因为商业的成功涉及到无情地对弱国使用武力、对落后国家政府的全盘收买和使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所熟知的一切获取利益的秘密手段。但是，由其职能所决定，避免大战的任务依然由金融集团来承担。政府有价证券的绝大多数持有者，以及其它的投资者和贸易商，都必然是这种大战的首当其冲的输家，特别是如果货币受到影响的话。金融集团施加给强国的影响力，一直有益于欧洲的和平。从各国政府本身在不止一个方面依赖于金融集团的合作之角度来说，这种影响力则是有效的。因此，和平兴趣在欧洲协同体的政务会上一直都有所体现。如果我们将此与养成了投资习惯的每个国家的内部不断增加的和平兴趣加在一起，我们将开始明白，为什么十多个实际上已经动员起来的国家的武装和平的可怕新手段，能够从 1871~1914 年一直徘徊在欧洲而没有爆发为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

作为这一和平兴趣的一个影响力渠道，金融业在许多较小的主权国家的政务会和政策之中发挥着一个强有力的缓和剂作用。贷款和贷款转期围绕信用而转动，而信用则依照良好的行为而转动。因为在立宪政府（非立宪政府遭到人们强烈的反对）之下，行为反映在预算之中，货币的外在价值无法脱离预算的评判，负债国政府得到的多数忠告是密切关注它们自己的汇兑并避免那些可能影响预算工作之公正性的政策。一旦一个国家接受了金本位制，这一有用的座右铭就变成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行为规则，因为金本位制把许可的起伏变化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金本位制和宪政主义是两把工具，它们使得那些采纳了新国际秩序的这些象征物的较小的国家听到了伦敦市的声音。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有时候是由凶恶的大船利炮所支配的，但更经常地是由及时调整国际货币网络的关系来控制

的。

金融集团的影响力也是通过其巨大的世界半殖民地的财政的非官方管理来确保的，其中包括近东和北非的冲突高度爆发区的正在衰亡的各伊斯兰帝国。在此，金融家的每日工作，直接涉及到了支撑内部秩序的那些微妙因素，并为这些和平最易受到冲击的麻烦地区提供了一种事实上的管理。在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面前，这就是在这些地区的长期资本投资的众多前提条件是如何能够得以保证的。在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波斯、埃及、摩洛哥和中国建造铁路的年代，是一段耐久力和峰回路转的历史，令人想起北美大陆那段相似的壮举。然而，欧洲资本家所面临的主要潜在危险并不是技术或金融失败，而是战争，但不是小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易于被孤立），也不是一个大国针对一个小国的战争（因为这是常见的事情），而是一场大国本身之间的大战。欧洲不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大陆，而是数以百万计的原住居民和新来者的家园；每一条铁路都不得不穿越具有各种各样坚实度的边界，其中，有的边界可能因铁路的通过而受到致命性的削弱，有的边界则因此得到意义重大的加强。只有紧紧抓住落后地区的臣服的政府之财政，才能避开大祸。当土耳其在 1875 年没有履行其财政义务之时，军事冲突立即爆发了出来，并且从 1876 年一直持续到 1878 年签订柏林条约的时候才结束。在那之后，和平维持了 36 年时间。那次令人惊奇的和平是通过 1881 年墨哈莱姆法令（Decree Muharrem）而实施的，它在君士坦丁堡设立了奥斯曼债务委员会（Dette Ottomane）。金融集团的代表负责管理土耳其财政的艰巨任务。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他们设计出了大国间的妥协方案；在有些情况下，他们防止了土耳其自身制造麻烦；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只是充当了各大国的政治代理人；总之，他们是为债权人的金钱利益服务的，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也是为那些试图在土耳其获利的资本家们的金钱利益服务的。这一任务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极其复杂，那就是，债务委员会不是个体债权人的一个集体代表，而是欧洲公法的一个机构，

而欧洲公法却并不正式代表金融集团。但恰恰就是在这一双重位置上，它得以跨越那个年代的政治与经济组织之间的隔阂。

贸易与和平变得相互关联了。在过去，贸易组织一直是军事性的和好战的；它是海盗、浪人、武装旅行队、猎手、佩剑商人、武装镇民、冒险家和探险者、殖民者和征服者、巡捕和奴隶贩子以及特许公司的殖民地军队的一个附属物。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忘记了。贸易现在依赖于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而这种货币体系在一场大战中是无法运行的。它要求和平，而各大国正在努力维持和平。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力量平衡体系本身是无法确保和平的。维持和平的任务是由国际金融界完成的，它的存在体现了贸易开始依赖于和平的原则。

我们已经很习惯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不利于和平的过程，金融资本是无数殖民地罪行和扩张主义入侵的主要煽动者。金融资本与重工业的密切关联使得列宁声称，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动力，特别是为了争取势力范围、特许权、治外法权和西方强国在落后地区获取控制地位的无数种形式，以便投资于铁路、公用工程、港口和重工业藉以获利的其它永久性设施。实际上，商业和金融是许多殖民地战争的起因，但也是一场大战得以避免的原因。它们与重工业具有关联性，虽然实际上密切关联仅出现在德国，但这种关联既是殖民地战争的根源，也是大战没有发生的原因。金融资本作为重工业的顶层组织，以非常多的形式与各种各样的工业部门相关联，以致于一个集团或组织根本无法确定其自身的政策。在战争促进任何一项利益的时候，就有十来项其它利益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当然，一旦发生战争，国际资本必然是输家；不过，只要殖民地战争是孤立的，即使国家财政能够仅在意外情况下获利，它也常常足以作为几十场殖民地战争的起因。每一场战争几乎都是由金融家组织的；但和平也是由他们组织的。

这一严格务实的体系，一方面极力反对一场大战，另一方面又在一系列没有穷尽的小规模战争中养活了和平的商业。这一体系的

准确特性由其所促成的国际法的变化做了最好的展示。尽管民族主义和工业显然倾向于把战争搞得更加激烈和彻底，但有效的保障手段却被建立起来以维持和平商业活动的继续。据记载，“出于报复”，腓特烈大帝于 1752 年拒绝兑现应给英国臣民的西里西亚贷款⁵。“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企图”，赫尔希如是说。“一旦敌对行动爆发，便没收在交战领土上的敌国臣民的私有财产，对此，法国革命战争为我们提供了最后的重要例子”。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敌国的商人被允许离港，这种做法在随后的 50 年中得到了普鲁士、法兰西、俄罗斯、土耳其、西班牙、日本和美国的遵守。自从那场战争开始后，交战国之间一直能够相当自由地做生意。因此，在美西战争中，装载着美国货而不是战争禁运品的中立国船只，开到了西班牙港口通关。说 18 世纪的战争在所有方面都比 19 世纪的战争较少具有破坏性，是一种偏见。就敌国侨民的地位、敌国公民得到的贷款服务、敌国财产或者敌国商人离港的权利而言，19 世纪在有利于保障战时经济系统的措施方面表现出了决定性的转折。只有 20 世纪逆转了这一趋势。

因此，经济活动的新组织形式为百年和平提供了背景。在第一阶段，新生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股危及和平的革命力量，就像人们在拿破仑一世变革时期所看到的那样；神圣同盟组织其反动的和平就是为了反对国家动乱的这一新因素。在第二阶段，新经济取得了胜利。中产阶级本身此时变成了和平兴趣的持有者，而且，他们的这种和平兴趣，不仅比他们的反动先辈们从前的和平兴趣强烈得多，而且又受到具有国家和国际双重性质的新经济的培育。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中，和平兴趣之所以变得有效，只是因为，它通过为力量平衡体系提供直接与活跃在该地区的内部势力打交道的社会机构，能够使得那一力量平衡体系为其事业服务。在神圣同盟之下，这些社会机构就是得到教会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所支持的封建制度和王

⁵ A·S·赫尔希 (Hershey), 《国际公法和组织的要素》, 第 565~569 页, 1927 年。

权；在欧洲协同体之下，它们则是与这一原则相结盟的国际金融和国家银行业体系。没有必要夸大它们间的区别。在 1816~1846 年的 30 年和平期间，英国已经对和平与商业提出了迫切要求，神圣同盟也没有鄙视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的帮助。也是在欧洲协同体之下，国际金融界往往不得不依靠其王朝和贵族政治的各种联系。但这种事实只是倾向于加强我们的观点，那就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和平，都不是简单地通过大国的大臣们，而是通过为各种总体利益服务的有组织的具体机构来维持的。换句话说，只有在新经济背景之下，力量平衡体系才能够使总体冲突得以避免。不过，欧洲协同体的成就却远远大于神圣同盟；因为后者是在一个不变的欧洲大陆的一个有限的区域里维持和平，而前者是在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时，按照世界规模成功地完成了同样的任务。这一伟大的政治功绩是一个特殊实体即金融集团的出现的结果，它是国际生活中政治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特定纽带。

至此，肯定清楚的是，和平组织是建立在经济组织基础之上的。但这两种组织却具有非常不同的一致性。只有在一个最广泛的意义上，才可能谈及一个世界性的和平组织，因为欧洲协同体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和平体系，而仅仅是一个受战争机制保护的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体系。世界经济组织则与此相反。除非我们尊重一视同仁的惯例，把“组织”这个术语限制在通过自身功能而运作的集中管理的团体范围，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没有什么东西比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组织基础之原则更加明确，也没有什么东西比组织的实际成分更加具体。预算和军备，外贸和原材料供应，国家独立和主权，现在全都取决于货币和信用。到 19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世界商品价格是数百万欧洲大陆农民之生活中的最重要的现实；全世界的商人每天都注意伦敦货币市场的反响；各国政府按照世界资本市场的形势来讨论未来的计划。只有疯子才会怀疑国际经济体系是人类的物质存在之轴心。因为这一体系需要和平来维持其运行，所以，就用力量平衡来为其服务。拿走了这一经济体系，和平的兴趣就会

从政治中消失。就经济体系的存在而言，离开了经济体系，这种和平的兴趣就没有充分的理由，也没有可能去保护经济体系。欧洲协同体的成功来自于新的国际经济组织的需要，并不可避免地随着这一组织的解体而终结。

1861~1890 年的俾斯麦时代，是欧洲协同体的黄金时期。在崛起为强国之后的 20 年当中，德国是和平兴趣的主要受益者。德国以奥地利和法国为代价，坚定地跨入了强国的行列；维持现状、防止战争，是有利于德国的，因为战争只可能是针对其自身的复仇行动。俾斯麦精心地把和平的观念培育为各强国的共同事业，并避免那些可能迫使德国放弃其和平强国之地位的承诺。他反对在巴尔干地区和海外的扩张野心；他对奥地利，甚至对法兰西，一贯采用自由贸易这个武器；他借助力量平衡策略挫败了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巴尔干野心，由此不断讨好潜在的同盟国，并避开可能将德国卷入其中的战争。他从 1863~1870 年的一个诡计多端的侵略者，转变为 1878 年的一个诚实的代理人和殖民地冒险活动的反对者。他有意识地领导着他所认为的那个时代的和平趋势，以便为德国的国家利益效劳。

然而，到了 70 年代末，1846~1879 年的自由贸易时代结束了；德国实际使用金本位制，标志着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和殖民地扩张时代的开始⁶。德国现在正在通过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坚强的联盟来加强它自己的地位；不久之后，俾斯麦就丧失了对德意志政策的控制。从此往后，大不列颠就是欧洲的和平兴趣的领导者，而欧洲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集团，并因此受到力量平衡的制约。在 90 年代，金融集团正处在其巅峰，和平似乎是前所未有地牢靠。英法两国在非洲有利益分歧；英国和俄罗斯人正在亚洲相互竞争；欧洲协同体，勉勉强强地在继续发挥作用；尽管有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存在，但依然有两个以上的独立强国在猜疑地相互对视。不久之后，在 1904 年，英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埃及问题

⁶ F·欧伦伯格 (Eulenburg), “外贸与外贸政治学”, 《社会经济计划》, 第八卷, 第 209 页, 1929 年。

上达成了全面的交易；两、三年之后，英国与俄罗斯在波斯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一个对抗联盟形成了。以独立国家之松散联邦形式存在的欧洲协同比，最终被两个敌对的势力集团所取代；力量平衡作为一个体系，现在已经寿终正寝了。两个敌对的势力集团，令力量平衡的机制停止了运作。不再有第三个势力集团会与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联合起来，挫败试图增加其力量的另一个集团。大约在同一时间，表现为殖民地竞争和国外市场竞争的世界经济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崩溃征兆，变得激烈起来。金融集团避免战争的能力正在迅速减小。和平又拖延了七年，不过，19世纪的经济组织的崩溃为百年和平划上句号，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鉴于这一认识，对历史学家而言，和平赖以存在的高度人为的经济组织的真正性质，就变得极具意义了。

第二章

保守的 20 年代 革命的 30 年代

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是自世纪之交开始解体的世界经济与 30 年代整个文明的大转变之间的一个无形纽带。除非这一因素的重大意义被认识到，否则，人们就不可能正确地看待使欧洲遭受厄运的机制，或者不可能正确地看待造成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的环境，那就是一个文明的形式和内容竟然建立在一个如此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国际体系崩溃之后，我们才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国际体系的真实特性。几乎没有人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功能；因此，可怕的突然转变完全令世界感到惊讶。不过，金本位制是传统世界经济剩下的唯一支柱；当金本位制崩溃之时，其结果必然是一目了然的。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金本位制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制度；他们甚至拒绝将它视为社会机制的一部分。从而，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民主国家是最后认识到这一灾难的本质，并且对这一灾难的后果最慢采取对策的。甚至当大难临头之时，它们的领袖们也没有弄明白，在那场灾难的背后，在最先进的那些国家中有一种长期的事态发展，使得金本位制体系成了时代的错误；换句话说，它们依然没有觉察到市场经济本身的失灵。

转变来得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甚至更要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各种变化仍然成为 19 世纪的要素。1914~1918 年的那场冲突仅仅是加快并无限制地加重了一场并非由它本身所造成的危机。但是，进退两难的根源在当时不可能被察觉到？？？？；在生还者看来，那场大战的恐怖和破坏来得是如此出人意料，所以显然是推行国际组织的障碍之源。由于经济和政治体系会同时突然丧失功能，所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本质所造成的可怕危害，似乎提供了一个解释。事实上，战后的和平与稳定的障碍，同那场大战本身具有相同的根源。从 1900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瓦解，

就是 1914 年爆发的那场政治紧张局面的起因；从表面上看，那场战争的结果和有关条约，通过排除德国的竞争，缓和了紧张局面，但同时却加重了紧张的原因并因此极大地增加了和平的政治与经济障碍。

从政治上看，那些条约中暗藏着致命的矛盾。通过单方面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它们预先排除了力量平衡体系重建的任何可能性，因为力量是这样一个体系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日内瓦徒然地期待着在一个既扩大又改进了的称之为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欧洲协同体下恢复这一体系；国联盟约中所确立的磋商和联合行动机构是毫无作用的，因为现在缺乏的是基本的前提条件，即独立的力量个体。国联实际上永远都无法建立起来；与加强条约有关的第 16 条款和与和平修改条约有关的第 19 条款，也永远不会实施。和平这一极为紧迫的问题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即恢复力量平衡体系，就因此而完全无法实现；情况就是如此，以致于公众甚至不能理解 20 年代最具建设性的政治家们的真正目的何在，他们就这样继续存在于一种几乎无法描述的混乱状态之中。一个国家集团被解除了武装，另一个国家集团保持着武装，这种局面排除了和平组织的任何建设性步骤；面对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一种情绪性的看法开始流行起来，那就是，国联以某种神秘的方式预示着一个和平时代，它只需要经常性的口头鼓励就会变得持久。在美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观念，那就是，只要美国加入了国联，事情就会变得大不相同。没什么东西比这一点更能够证明人们对所谓的战后体系的组织性弱点的缺乏了解；之所以讲所谓，是因为，如果每个字都有意义的话，欧洲现在压根就没有什么政治体系。单单这样的现状，充其量只能维持到各方的物质力量耗尽为止；毫不奇怪，回归到 19 世纪的体系，看起来是唯一的出路。同时，要不是那个全体一致的规则确定了那个任性的小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仲裁者，国联理事会可能会至少起着一种欧洲事务历书的作用，很像欧洲协同体在其鼎盛期所起的那种作用。永久解除战败国武装的那一荒唐策略，排除了任何建设

性的解决办法。对于这一灾难性的事态，唯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国际秩序，授之以超越国家主权的有组织的权力。然而，这样一个路线完全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会服从这样一个体系。

在经济学上，日内瓦方针在努力恢复世界经济作为和平的第二道防线方面，具有强大得多的始终一贯性。因为只有国际货币体系得到了恢复，一个成功重建的力量平衡体系才会为和平效劳。在缺乏稳定的兑换和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各式各样国家的政府会像以往一样把和平视为小利，只有当和平不干扰它们的任何重大利益时，它们才会为和平而努力。在当时的政治家当中，伍德罗·威尔逊似乎是第一个认识到，和平与贸易的相互依赖不仅是贸易的保证，也是和平的保证。毫不奇怪的是，国联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重建国际货币和信贷组织，使之成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唯一可能的预防措施，而世界对金融集团的依赖性之大则是前所未有的。JP摩根财团取代NM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而成了一个返老还童的19世纪的造物主。

依照19世纪的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10年似乎是一个革命性的时代；按照我们自己最近的经验，那恰恰是个相反的时代。那个10年的目标是极其保守的，并表露了一个几乎是普遍的信念，那就是只有重建1914年之前的那个体系，才能恢复和平与繁荣，“这一次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正是这次复古行为的失败，才导致了30年代的那场大转变。尽管战后10年的革命与反革命行动蔚为壮观，但它们所代表的，要么仅仅是对军事胜败的机械式反应，要么至多是重新上演人们所熟悉的中东欧舞台上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戏剧；只有在30年代，全新的元素才进入了西方历史的模式之中。

不管它们的情节如何，中东欧1917~1920年的剧变和反剧变，只不过是拐弯抹角地旨在重新建立那些曾在战场上输掉的政权而已。当反革命的烟雾消散之后，人们发现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的

政治体系与战前并无很大的差异。直到 20 年代中期，这种情况在芬兰、波罗的海各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以及甚至意大利和德国都大致如此。在有些国家里，民族自由和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成就自 1789 年以来在西欧一直是常见的。俄罗斯在这方面也是不例外。时代的趋势就是建立或重新建立大体上与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理想相关联的体系。在这一广泛的意义上，不仅是兴登堡和威尔逊，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遵循西方的传统。

在 30 年代早期，变化突然开始了。变化的标志包括：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俄罗斯的五年计划；新政的启动；德国的国家社会党革命；赞成独裁主义帝国的国联的垮台。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19 世纪的理想是极其重要的，它们的影响力左右了随后的 10 年，但到了 1940 年，国际体系的每一点痕迹全都消失了，除了一些飞地之外，各国全都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之中。

我们认为，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经济体系有着崩溃的预兆。国际经济体系自 20 世纪开始以来只是在蹒跚而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有关条约最终摧毁了它。当欧洲在 20 年代几乎没有一场内部危机因为内部经济问题而达到高潮之时，这一情况就变得清清楚楚。现在，政治方面的学者，不是根据各个大陆，而是根据各大陆对一种稳定的货币的依附程度，来对各式各样的国家进行分组。俄罗斯通过使卢布垮台而令世界震惊，卢布被通过简单的通货膨胀手段而变得一文不值。德国重复了这一铤而走险的手法，以便使条约受阻；紧接着此后，没收食利阶级的财产，给纳粹革命打下了基础。日内瓦的声望来自于它成功地帮助奥地利和匈牙利恢复了各自的货币，而维也纳也由于极其成功地运作奥地利克郎而变成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圣地，但不幸的是，奥地利克郎这个身有疾患的货币没有幸存下来。在保加利亚、希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恢复货币行动为反革命派提供了要求权力的借口。在比利时、法国和英国，人们以稳定货币标准的名义将左派赶出了权力舞台。一系列几乎没有停顿的货币危机，通过国际

信贷体系的弹性组织，将贫穷的巴尔干地区与富裕的美国连在了一起，它把没有完全恢复稳定的货币的固有特征，先从东欧传播到西欧，再从西欧传播到美国。最后，美国自身则被欧洲货币之未成熟的稳定化的后果所吞没。最终的崩溃开始了。

第一波冲击出现在国家范围之内。有些货币，例如俄罗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货币，在一年之内就垮台了。除了各种币值的前所未有的变化速度之外，还存在着这一变化在一个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体中所出现的客观条件。细胞生成的过程被引入了人类社会，其结果则是处在人类的经验范围之外的。不断贬值的货币在国内外都同样意味着混乱。各国发现它们自己与邻国之间好似隔着一条深沟，同时，各阶层的人都受到了完全不同且往往相反的影响。知识型中产阶级确实被贫困化了；金融骗子们积累起了令人憎恶的财富。一个无法计算的联合与分裂势力的因素已经走上了舞台。

“资本外逃”是一个新事物。在 1848 年和 1866 年，甚至在 1871 年都没有这样的事情记录。不过，它在以下三件事情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却是明明白白的：1925 年推翻法国的自由派政府，1938 年再次推翻法国的自由派政府，以及 1930 年德国的法西斯运动的发展。

货币已经变成了国家政治的支点。在现代货币经济制度之下，没人能够不体会到金融准绳的每日变化；人们变得具有货币意识；实际收入的通胀效应预先就被民众打了折扣；各地的男男女女似乎把稳定的货币视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需要。不过，这种意识与这样一个认识是不可分离的，即货币的基础可能依赖于国界之外的政治因素。因此，对货币媒介的一贯稳定性的信心构成冲击的社会骚动，也粉碎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体中金融主权的幼稚观念。从此以后，与货币相关的内部危机就会倾向于引发严重的外部问题。

信任金本位制是那个时代的约定。有些人认为那是天真的，也有些人认为那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人认为那是一个意味着接受肉体拒绝精神的魔鬼信条。不过，信任本身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钞票是有价值的，因为钞票代表黄金。就一次性而言，黄金本身是否有

价值并不造成差别，不管其价值来自于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它包含着劳动，还是来自于正统理论所说的它是有用的和稀有的。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战争不理睬货币问题，这使得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可思议地团结在一起。在李嘉图*和马克思的意见一致之处，19世纪没人提出过怀疑。俾斯麦和拉萨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亨利·乔治，菲利普·斯诺登和加尔文·柯立芝，米泽斯和托洛茨基，都同样接受金本位制的约定。卡尔·马克思花了很大力气来揭露蒲鲁东的乌托邦劳动券（用来代替货币）是以自我欺骗为基础的；《资本论》暗示了货币的李嘉图形式的商品理论。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索科尔尼科夫，是以黄金为基准恢复其国家货币价值的第一个战后政治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由于坚决主张稳定的货币原则而危及了他自己的党；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尔，支持他的顽敌赛佩尔为恢复克郎而提出的基本货币原则；英国社会主义者菲利普·斯诺登，当他自己相信英镑在工党手中会不安全的时候，便转而反对工党；意大利元首把里拉和黄金的比值定为90，并发誓拼死守住这一比价。在这一点上，人们会很难发现胡佛和列宁、邱吉尔和墨索里尼的意见之间有任何分歧。实际上，对当时国际经济体系的运作而言，金本位制的必要性，是所有国家、阶级、宗教信仰和社会观点的人们的一个且是唯一共同的原则。在人类自身努力致力于恢复其衰败的存在之时，金本位制是生活的意志所能够依附的看不见的现实。

那场失败的努力，是全世界曾经见到过的最为广泛的工作。稳定几乎崩溃的货币，不仅是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或希腊这些小国和弱国的一个忠实行动，因为它们确实希望苦尽甘来，而且也使得它们的那些强大而富裕的赞助者即西欧的战胜国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只要战胜国的货币有波动起伏，扭曲现象就不会变得明显；它们继续像战前一样借钱给外国，并由此帮助

*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译者注。

那些战败国维持经济。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回归金本位制的时候，它们稳定的汇兑所承受的负担就开始产生不良效果了。最后，黄金的最大拥有国美国开始默默关心起英镑的安全来了。这一跨越大西洋的当务之急，出乎意料地把美国带进了危险区。此问题似乎是技术性的，但必须得到清楚的理解。美国在 1927 年支持英镑，暗示着纽约的低利率，目的是避免资本从伦敦大量转向纽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因此向英格兰银行承诺将其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但是现在，美国自身需要高利率，因为美国自己的价格体系开始出现了危险的通胀现象（由于存在稳定的物价水平，这一事实显得模糊，但依然存在着，尽管成本有大幅降低）。在经过了七年的繁荣之后，当时间的钟摆带来了 1929 年的那次迟迟不去的大萧条时，秘密通货膨胀状态的存在，便把事情弄得无限制地恶化了。被通货膨胀弄得疲惫不堪的债务人，眼睁睁地看着膨胀的债权人垮下去。它是一个征兆。美国，出于一种本能的脱身姿态，于 1933 年脱离金本位制，传统世界经济的最后一丝残余就此消失了。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了那一事件的最深层的意义，但历史几乎当即逆转了其趋势。

在十年多的时间里，恢复金本位制的行动曾经是世界团结的象征。从布鲁塞尔到斯帕和日内瓦，从伦敦到洛迦诺和洛桑，人们举行了无数次讨论会，以便为稳定的货币设定政治上的先决条件。国联本身已经部分得到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的补充，以便使各国间的竞争条件平等化，这样就有可能在不降低生活标准的情况下使贸易自由化。华尔街发起了克服转帐问题的战役，先对赔款进行商业化，再对赔款进行调动，而货币则处于这场战役的中心地位；日内瓦担当货币恢复过程的发起人角色，其间，来自伦敦市的压力和来自维也纳新古典主义货币纯化论者们的压力被组合起来，为金本位制服务；每一项国际努力最终都需要服从这一目标，通常各国政府都从保护货币的需要出发对各自的政策做出调整，特别是那些与外贸、贷款、银行业及汇兑有关的政策。尽管每个人都同意，稳定的货币最终取决于贸易自由化，但除了固执己见的自

由贸易商们，所有人都知道，必须立即采取那种将不可避免地对外贸和国际支付构成制约的措施。为了应对同样的一系列条件，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进口配额、延期偿付和静止协议、清算系统和双边贸易条约、实物交易安排、禁止资本输出、外贸控制以及汇兑同等化。然而，自给自足的梦魇却时常困扰着为保护货币而采取的措施。尽管目标是贸易自由化，但结果却是贸易受到压制。各国政府，不但没有获得世界市场的入场券，反而由于它们自己的行为，正在割断它们的国家与世界的联系，为了维持哪怕是一点点的贸易流动，各国都需要做出越来越多的牺牲。为了保护作为外贸媒介的货币的外在价值，人们违心所做的疯狂努力，却将他们自己赶进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经济之中。一整套完全背离了传统经济学的贸易限制措施，实际上是保守的自由贸易目标的结果。

这一趋势随着金本位制的最终崩溃而突然逆转了。为了恢复金本位制而所做的牺牲，现在不得不再做一次，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没有金本位制的情况下可以活下去。为了维持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而设计用来限制生活方式和贸易的那些同样的机构，现在被用来调整工业活动，以便人们适应永远没有这种体系的状况。或许这就是现代工业的呆板的技术组织经受住了金本位制崩溃的冲击的原因。因为在奋力保留金本位制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无意识地对某些类型的工作和组织做了必要的准备，以便使自己适应没有金本位制的状况。不过，现在目标是相反的；在那些长期为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遭受最多损失的国家里，各种强大的势力又开始卷土重来。国联和国际金融集团比金本位制垮台得早；随着金本位制的消失，国联的有组织的和平兴趣及其主要实施工具罗斯恰尔兹贴现公司和摩根财团都从政治活动中消失了。金线的突然折断，是一场世界革命的信号。

不过，金本位制的失败，实际上不过就是设定了一个事件的时间，因为那一事件太大了，所以不会是由金本位制的崩溃所引起的。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域之中，伴随那场危机的又岂止是 19 世纪人

类社会的国家制度的彻底崩溃，而这些制度在各地被改变和重整得几乎面目全非。自由政体在许多国家被独裁专制统治所取代，上世纪的首要制度，即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被新的经济形式所代替。有些强国重塑了它们思维的那种模式，假借未曾听到过的人类本性的观念之名，猛然把它们自己推入了奴役世界的战争，与此同时，有些更强大的国家则奋起捍卫自由，而自由在这些更强大的国家手中也获得了同样前所未闻的意义。国际体系的崩溃，尽管引发了那场大转变，但却肯定不可能说明那场变革的深度和内容。即便我们可以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得那么突然，我们却依然不明白它为什么就那么发生了。

伴随那场大转变的，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争，这绝非偶然。历史踩着社会变革的步伐而行；各国的命运与它们在一场制度转变中的作用相关联。这种共生现象在历史中也绝非例外；尽管国家组织和社会制度有着它们自己的起源，但它们在争取生存的过程中却倾向于相互借力。这种共生现象的一个著名事例，把资本主义与大西洋沿海各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非常密切关联的商业革命，变成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走上强国之路的工具，它们每一个国家都从那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运动所提供的机会中获益，而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则利用这些崛起的强国之媒介在向全球传播。

这一规律反过来也适用。若一个国家的制度或某些制度属于那种碰巧是在走下坡路的类型，则它在争取生存的过程中就可能受到阻碍，例如，二战时的金本位制就是这种过时机构的一个例子。在另一方面，那些由于它们自己的原因而反对现状的国家，会迅速发现现存国际秩序的弱点，并希望创建更适合于它们利益的制度。这种国家集团正在排挤衰败的东西，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坚持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于是，看起来好像是它们发起了社会变革的过程，而事实上它们仅仅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并甚至有可能在滥用变革的趋势以便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例如，曾经战败的德国，就认识到了 19 世纪国际秩序中隐藏的弱点，并利用自己的这一发现加速那一秩序的崩溃。在 30 年代，德国的有些政治家逐渐积累起了一种邪恶的智力优越感，他们把脑筋用到破坏秩序的任务上，在他们试图迫使有关事情符合他们自己的政策倾向的过程中，这一任务往往扩大到发展新的金融、贸易、战争和社会组织方法。然而，这些问题本身绝对不是由那些政府所造成的，那些政府只是在利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我们将一直面对着这些问题，不管个别国家的命运如何。还有，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前者依然属于 19 世纪的战争类型，即是强国的一场普通冲突，由力量平衡体系的失效所致；而后者已经是整个世界巨变的一部分。

这应该使我们能够把那一时期的令人心酸的民族历史与处在演进中的那场社会大变革分离开来。然后，我们将易于看到，德国和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作为力量个体，是以怎样的方式通过它们与那场基本的社会变革过程的关系而得益或受阻的。不过，那场社会变革过程本身也同样如此：在各强国崛起的过程中，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现了一个有助于传播它们的信条的工具。德国和俄罗斯整个就分别变成了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代表。无论好坏，只有认识到这些社会运动的典型特征并视之与这些社会运动所服务的国家利益相分离，才能够对这些社会运动的真实范围做出评估。

从这一点上讲，不管是德国或俄罗斯，意大利或日本，英国或美国，它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构成了通史的一部分，却决不是本书所直接关心的事情；不过，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却是那场制度大变革的活生生的力量，本书的书名就叫《大变革》。有一股生命力（*elan vital*）不可思议地促使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在人类历史记录中要求占有更多的份额，我们必须把这一生命力视为我们的故事所赖以展开的条件实际资料，而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新政的主旨就是这个故事本身的一部分。

这把话题引至我们依然有待证明的命题：那场大变革的起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旨在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尝试。这样一个命题似乎授予那一体系以近乎神秘的权力；它无异于间接地指出，诸如力量平衡、金本位制和自由政体这些 19 世纪文明的基本元素，其实全都是由一个共同的母体即自我调节的市场所塑造的。

这一断言似乎在走极端，如果其彻底的唯物主义意味并不算骇人听闻的话。不过，我们目睹了其崩溃的那一文明的特别之处，正在于它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别的社会和别的文明，也受到它们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制约。这是所有人类生活、实际上是所有生活的一个共同特征，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从一个不同且又独特的意义上讲，只有 19 世纪的文明是经济性质的，因为它选择将自己建立于其上的动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极少被承认是有效的，而且肯定从未被提升到作为每日的行动和行为的一个正当理由的高度，这个动机就是利润。自我调节的市场没有别的源头，就是来自于这一原则。

在效率上，利润动机的运行机制，可以同历史上宗教狂热最猛烈的爆发相媲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整个人类世界都受到其日益增强的影响。众所周知，它于 19 世纪上半叶，紧随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趋于成熟。它在 50 年之后到达欧洲大陆和美国。最终，在英国，在欧洲大陆，甚至在美国，相似的事物把每日的问题打造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其主要特征在所有西方文明国家都是一样的。若要了解那场大变革的起源，我们必须要对市场经济的兴衰做一探讨。市场社会诞生于英国，不过，其弱点是在欧洲大陆才造成了最具悲剧性的复杂结果。为了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归李嘉图（所在）的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件英国的事情。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都是英国人的发明创造。这些制度于 20 年代在诸如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等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崩溃，只是这件事情更具政治意义和戏剧性。但是，不管最终的情节有着怎样的背景和冷

热程度,我们应该在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来研究那些导致 19 世纪文明发生崩溃的长期因素。

第二部分

市场经济的兴衰

一、血汗工厂

第三章 “生活环境与经济进步”

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中心，生产工具有了一种近乎奇迹般的改进，与之相伴随的，却是老百姓生活的一种悲惨混乱的状况。

我们将努力澄清，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这一混乱状况的各种形式，因为在大约一个世纪前，这种混乱状况在英格兰达到了不能再糟糕的程度。什么“血汗工厂”把人聚拢在了一起？有多少灾难是由新的物质条件所造成的？有多少灾难是由在新的条件之下运作的经济附属物所造成的？是什么样的机制，既破坏了老的社会组织，又如此不成功地试图把人与自然合而为一？

自由主义哲学在理解变革问题上的失败，比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明显。出于在情绪上相信自发性，自由主义抛弃了对变革采取常识性的态度，赞同以一种神秘的乐意态度接受经济进步的社会后果，不管这些后果可能是什么。政治科学和治国艺术的基本原理先是被怀疑，然后就被抛到了脑后。无需推敲，如果可能的话，一个步伐注定太快的没有目标的变革过程，应该要放慢脚步，以便确保社会的安宁。传统政治才干的这种普遍真理，由于往往仅反映了从古人那里继承来的一种社会哲学的说教，所以被从 19 世纪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思维中抹去了，因为他们受到了粗俗的功利主义的毒害，加之又不加批评地信赖所谓的无意识增长自我治愈功效。

经济自由主义错误理解了工业革命史，因为它坚持从经济观点的角度来评判社会事件。为了对此做一说明，我们将探讨一个乍看可能像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发生在英国早期都铎（Tudor）王朝时代的圈地和化农田为牧场运动；当田地和平民被封建领主用篱笆围住的时候，于是，整个乡村都受到人口减少的威胁。在此提起圈地运动和化农田为牧场给人民带来的不幸，我们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要展示一下，最终是有益的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坏与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破坏是类似的，另一方面是要澄清一下，在没有目标的经济进

步的阵痛中，一个社会所面对的种种选择。

如果没有化农田为牧场的话，圈地运动显然是一个进步。被圈起来的土地，在价值上，是未圈起来的土地的两至三倍。在保持耕种的地方，就业率并没有下降，而且食物供给有显著增加。土地的产量明显增加了，特别是在出租土地的地方。

但是，即便是把可耕地转化成为大牧羊场，其结果也并非全都有害于周围地区，尽管生活环境因此受到了破坏、就业因此受到了制约。家庭手工业在 15 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一个世纪之后便开始成了农村的一个特色行当。牧羊场出产的羊毛，使得小佃户和那些被挤出农耕行业的无土地的农民有了事情可做，于是，新的毛纺业中心确保了许多手工业者有了收入。

但是，在这一点上，只有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这样的补偿效应才能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缺乏这样一个经济体的情况下，养绵羊和卖羊毛这样一个高度有利可图的行业，就可能使农村遭受灭顶之灾。“把沙子变成黄金”的绵羊很可能会把黄金变为沙子，17 世纪富裕的西班牙最终就遭受了这样的灾难，因为西班牙的土地由于过度扩大牧羊业而遭受侵蚀且又无法恢复。

1607 年一份准备给国王使用的官方文件，用一句权威的话，解决了变革的问题：“穷人的目标应该得到满足：生活环境；绅士的期望应该不受阻碍：进步”。这一规则似乎认为纯粹经济进步的本质是理所当然的，而它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来实现进步的。不过，它也暗示了那一悲惨状况的必然性，即穷人必定要守住自己的栖身之地，富人必定期望一种让自己得益的社会进步。

圈地运动一直被恰当地称为富人对穷人的一场革命。封建领主和贵族是在推翻社会秩序、打破古代的法律和习惯，有时是凭借暴力，但经常是借助压力和恐吓。实际上，他们是在掠夺穷人在共同财富中的份额，推倒穷人的房子（依照到目前为止的牢不可破的习惯力量，长久以来，房子就属于穷人自己和他们的继承人的）。社会组织正在遭受破坏；荒凉的村庄和人居的废墟证实了那场革命的凶

猛残酷，它危及到了国家防卫的方方面面、把城镇变为废地、使人口急剧减少、把负荷过重的土地变为尘土、使人民疲惫不堪并把他们从体面的农夫变成了一群乞丐和小偷。尽管这种情况只是一片一片地在进行，但这一连串的恶劣行为大有集合为一场统一的大灾难的征兆¹。国王及其顾问班子、大臣们和主教们都在保卫社会的安宁，实际上是在保卫社会的人性和天然本质不受这场灾祸的摧残。在最迟从 1490 年代起一直到 1640 年代这段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岁月里，他们几乎是在不间断地奋力阻止人口的下降。在凯特造反（Kett's Rebellion，其间，有好几千农民遭屠杀）被镇压之后，护国公萨默塞特公爵（Lord Protector Somerset 1st）在反革命派手中丧失了生命，反革命派将有关圈地的法律从法典中拿走并建立了牧羊封建领主的独裁统治。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萨默塞特被指控通过自己坚定地公开指责圈地运动而鼓励了造反的农民。

当第二次力量考验出现在同样的对手之间时，时间已经过去几乎 100 年了，不过，此时此刻的圈地者往往更多地是富有的乡绅和商人，而远不是什么封建领主和贵族。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会上层政治，现在都涉及到国王特权的使用，一方面，国王特权被故意用来阻止圈地，另一方面国王特权也没少被故意用来利用圈地问题而加强其在法治斗争中的地位以便对付贵族们，它导致斯特拉福德伯爵（Strafford 1st）和劳德（Laud）在议会手中走上断头台。但是，他们的政策不仅是工业上的，也是政治上反动的；进一步说，与从前相比，圈地现在更经常得多地是被用于耕种而非放牧。当前，内战（即 1642~1648 年英国议会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战争）的潮流，长久地吞没了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Stuart）王朝的国家政策。

19 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一致把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政策谴责为蛊惑人心的如果不是完全反动的的话。他们自然同情议会，而议会一直是站在圈地者一边的。尽管吉宾斯（H. de B. Gibbins）

¹ 托尼（R.H. Tawney），《16 世纪的农业和农村问题》，1912 年。

是老百姓的一个热心朋友，但他还是写道：“然而，这种保护性的法规，就像保护性法规通常的情况一样，完全是徒劳无益之举”²。英尼斯（A. D. Innes）说得甚至更加明确：“为解决就业问题而采用的通常的法律补救措施照样失败了，这些补救措施既是为了惩罚流浪行为，也是为了试图把工业逼进不适当的领域和把资本赶到获利较少的投资方面去”³。盖尔德纳毫不犹豫地呼吁把自由贸易概念作为“经济法规”，他写道：“有人就是没有理解经济规律，并试图通过立法来阻止地主拆毁农民的房子，地主们发现把农田变成牧场来增加羊毛的产量是有利可图的事情。经常重复这些法律，只是表明了它们在实践中是多么的无效”⁴。最近，有一位像赫克谢尔（Heckscher, Eli Filip）那样的经济学家强调了自己的观点：重商主义显然是人类需要再花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掌握的学科，所以，对重商主义的解释，大体上应该是在没有充分理解经济现象之复杂性的情况下做出的⁵。实际上，反圈地立法，似乎从来就没有阻断过圈地运动的进程，甚至没有对圈地运动构成严重的阻碍。作为热心于共同体人原则的第一人，约翰·黑尔斯（John Hales）承认，收集证据反对圈地者是不可能的，他们经常让他们的仆人在陪审团宣誓，而这就是“他们的家臣和依附者的数量，没有这些人是没法组织陪审团的”。有时候，简单地采用权宜之计在农田里划出一条犁沟，就会使犯规的地主免遭惩罚。

私人利益如此普遍地超越正义的现象，往往被视作为立法无效性的某种象征；没有被制止住的圈地潮流的胜利，后来被引用为结论性证据，用以证明“反动的干预主义”的所谓徒劳无益。为什么一种潮流的最终胜利，应该被当作说明阻碍这一潮流前进步伐的努力的无效性的证据？为什么不应该完全从这些法律措施放慢了变革

² 吉宾斯（H. de B. Gibbins），《英格兰工业史》，1895年。

³ 英尼斯（A. D. Innes），《都铎王朝治下的英格兰》，1932年。

⁴ 盖尔德纳（J. Gairdner），“亨利八世”，《剑桥现代史》，第2卷，1918年。

⁵ 赫克谢尔（E. F. Heckscher），《重商主义》，第104页，1935年。

的速度上来看待它们的目标？没有完全有效地阻止一种发展势头的措施，并不就因此是彻底无效的。变革速度的重要性常常并不小于变革方向本身的意义；不过，尽管变革的方向往往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而我们所允许的变革速度却很可能依赖于我们。

相信自发的进步，肯定会使我们看不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政府的这一作用，往往包括调整变革的速度，即根据事情的可能情况而进行加速或减速；如果我们认为那一速度是无法改变的或甚至更糟，如果我们认为对速度加以干预是大逆不道之举，那么当然就没有干预的余地了。圈地运动就是一例。回过头去看，没有什么东西比西欧经济进步的潮流更加一清二楚，它旨在消除那种在农业技术、土地条块分割和平民的原始制度方面的人为保持的统一性。就英格兰而言，毛纺业的发展肯定是国家的一项优势，它导致了作为工业革命之媒介的棉纺业的建立。进一步讲，明白无误的是，国内纺织业的增长依赖于国内羊毛供应量的增加。这些事实足以确认农田向牧场的转变和那场并发的圈地运动作为经济进步的趋势。不过，若不是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政治家们的政策一直得到维持的话，那次经济进步的速度则可能就具有毁灭性并把那次进步本身转变为一件变质的而不是有益的事情。因为以下这几个问题都取决于这一速度：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人们，能否在不严重损害他们自己的人性和经济、物质和道德本质的情况下，使他们自己适应已经改变了的生活环境；在与那场变革间接相关的机会领域，他们是否会找到新的工作；由出口增长所带来的进口增长的效应，是否能使那些在变革中失去工作的人们找到新的生计来源。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变革的相对速度和调整措施。经济理论的一般“长期”考虑事项是无法接受的；它们会通过假定事件发生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而对问题预先做出判别。不管在我们看来做这样的假定可能有多么自然，但它并未被证明是正确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性组织，我们都太易于忘记，除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之外，这种组织并非是一直存在的，即便是在当时它也

只是部分存在的。不过，离开了这一假定，“长期”考虑事项就毫无意义可言。如果一场变革的当前效果是有害的，那么，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其最终结果也是有害的。如果化农田为牧场牵涉到拆毁一定数量的房子、使人们失去了一定数量的工作和减少了当地原有的食物供应，那么，这些结果肯定要被当作最终结果看待，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产生。这并不排除以下这样一种考虑：出口增加可能影响到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当地羊毛供应量的最终增加有可能带来就业机会；或者，土地所有者可能会使用他们自己的新增收入，不管是用于进一步投资，还是用于奢侈支出。与调整的速度相比，变革的速度将决定什么被视为变革的净效益。不过，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假定市场规律在发挥作用，除非我们看到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存在。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中，市场规律才具有相关性；不是都铎王朝的英格兰政治家们偏离了事实，而是现代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责难，暗示着从前存在一个市场体系。

英格兰之所以经受住了圈地运动的灾难而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只是因为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国王的权力减慢了经济进步的进程，直至它变得能够为社会所承受：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为变革的受害者提供帮助，疏导变革的过程以使其发展较少具有破坏性。那两个王朝的大臣们和特权宫廷在观点上一点都不保守；他们代表着新的治国艺术的科学精神，赞成外国工匠的移居入境，热心移植新的技术，采用统计方法和精确的报告习惯，轻视习惯和传统，反对时效权利，减少教会特权，并且轻视不成文法（Common Law）*。如果说创新运动产生革命者的话，他们则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他们致力于大众的幸福安宁，不辱君王的权力和威严；但是，未来属于立宪政体和议会。国王的政府让位于在工业和商业进步中处于领导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政府。立宪政体与剥夺国王权力的那场政治革命结合在了一起，它到当时为止已经发出了其几乎所有的创

* 不成文法常被译成习惯法——译者注。

造性光芒，而其保护性的职能对一个经受住了那场转型风暴的国家来说已经不再生死攸关。国王的财政政策现在过分制约着国家的权力，并开始抑制其贸易；为了维持其特权，国王一再滥用那些特权，并由此损害了国家资源。出色地管理劳动者和工业，周到地控制圈地运动，依然是它最后的功绩。但人们更易于忘记的是，资本主义者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雇主们是它的保护性措施的受害者。在时光又过了两个世纪之后，英格兰才又一次享有被英吉利共和国所毁坏掉的那一有效而又非常有秩序的社会管理方式。诚然，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方式现在不那么为人们所需要。但这种管理方式的中断在一个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那就是它帮助抹去了这个国家记忆中的圈地运动时期的恐怖和政府克服人口下降方面的功绩。或许这有助益解释为什么在 150 年之后，当一场以工业革命形式出现的相似的灾难对国家的生活和安宁构成威胁之时，人们却没有认识到那场危机的真实性质。

这一回，这一工业革命事件又是英格兰所特有的；这一回，海上贸易又一次成为一场波及整个国家的运动之源；也是这一回，一次规模最为宏伟的进步却给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在工业革命的进程还没有非常深入之前，打工的人们已经一起拥挤在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新地方，即所谓的英格兰工业城；乡下人已经被变成了贫民窟的居民；家族在走向解体；大块的乡村地区正在迅速地成为“血汗工厂”吐出来的煤渣和废料的堆场。各种观点和派别的作家、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把工业革命之下的社会环境称为人类堕落的真正深渊。

至今为止，还没人对此做出令人相当满意的解释。同时代人猜想他们已经发现了诅咒那些支配财富和贫困之铁的规则的关键，他们称那些规则为工资法则和人口规律；但他们已经被证明错了。剥削被提出来，作为对财富和贫困的另一个解释；但这没有能够解释以下的事实：工业贫民窟里的工资，比其它任何地方的工资都高，并又继续上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更常见的是，有一连串的原因被

用来进行证明，但结果还是难以令人满意。

我们自己的答案决不简单；它实际上在本书的多数部分都有出现。我们认为：在规模上远超过圈地时期那场社会变革的一场社会混乱的雪崩，使得英格兰遭受了苦难；这场灾难是一次巨大的经济进步运动的陪伴物；一个全新的制度机制开始作用于西方社会；其危险，在初出现的时候，触及到了社会的要害之处，但却从未被克服；19世纪的文明史大体上是人们在做各种努力，以保护社会免遭这样一个机制的蹂躏。工业革命仅仅是一场革命的开端，它以前所未有的极端而又彻底的方式点燃了宗派主义者的思维之火，但新的信条是彻底唯物主义的，并相信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一定量的物质利益来加以解决。

这个故事已经被人们讲了无数遍了：市场的拓展、煤和铁的存在以及有利于棉纺业的湿润气候、众多被新的18世纪圈地运动剥夺了土地财产的人们、自由制度的存在、机器的发明和其它因素，是如何以某种方式进行相互作用以致于引发了工业革命的。已经有结论表明，在这一连串的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脱离其它那些因素而单独成为那场突然而又出乎意料的革命的原因。

但那场革命本身将如何定义呢？其基本特征是什么？它是工厂城镇的兴起，是贫民窟的出现，是童工的超长工作时间，是某些类别的工人的低工资，是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还是各种产业的集中？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一个基本变化的陪伴物，这个基本变化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除非机器对一个商业社会的影响被认识到了，否则这一市场经济制度的性质就无法完全被掌握。我们无意声称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机器引起的，但我们坚持认为，一旦好的机器和工厂被用于商品社会的生产，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就必然要形成。

在一个农业商品社会里，使用专门化的机器肯定会产生典型的效果。这样一个社会由农业工作者和商人所组成，他们从事农产品买卖。以专门化的、制作精良的、昂贵的工具和工厂为辅助手段的

生产方式，能够适合于这样的社会，人们只要把这种生产方式变成买卖行为的附属物就行了。商人是唯一可用来做这件事的人，而且只要这件事将不会让商人遭受损失，商人就适于去做此事。不管情况如何，商人将以同样的方式把商品卖给需要它们的人。但商人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购买商品，也就是，不是通过购买现成的商品，而是通过购买必要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按照商人的职业规则，把这买卖两种方式合在一起，再加上他可能需要等待的一段时间，最后就会产生出新产品。这不仅是对家庭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描述，而且是对包括我们时代的在内的任何种类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描述。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系统所受到的重要影响。

因为精良的机器是昂贵的，所以除非进行大量的商品生产，否则，它们就不值得买⁶。只要商品的销路得到合理保证，生产又无需因为缺乏机器所需要的主要进料而中断，用机器生产就不可能带来损失。对商人而言，这意味着所有涉及到的产生要素都必须处在待售状态，也就是说，对准备为它们而付钱的人来说，它们必须随时保持付钱者所需要的数量。除非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以专门化机器为辅助手段的生产方式对商人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太过危险的事情，因为商人投资的是钱，而社会则从收入、就业和商品供应的角度而依赖于连续的生产。

现在，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样的条件不会自然存在；它们可能会需要人们去创造。它们无论如何不会被逐步创造出来，这就倾向于使相关的变化具有令人吃惊的性质。**转变就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动机的变化：因为生存动机必须被利润动机所替代。**所有的交换都转变为金钱交易，这些交易反过则来要求把一个交易的媒介引入到工业活动的每一个联接点上。所有收入都必须来自于这样或那样的东西的销售，而不管一个人的实际收入来源为何，它都必须视为销售的结果。我们以“市场体系”命名所描述的制度模式，而市

⁶ 克拉珀姆 (Clapham, J. H.)，《现代英国经济史》，第 3 卷。

场体系这个简单术语的含意则岂止于此。但市场体系最令人吃惊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来，人们就必须允许它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运行。利润不再有任何保证，商人必须在市场上赚取利润。人们必须允许价格本身做自我调节。这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

从先前的经济模式向这一体系的转化是如此彻底，以致于它更像毛毛虫的变形，而不像可以体现为持续的增长和发展的任何演变。例如，把商人生产者的销售活动和他的购买活动做一对比；他的销售只关心人造物品；不管他是否成功地找到了买主，社会组织并不必然受到影响。但他所买的却是原材料和劳动，原材料来自于大自然，劳动来自于人。商品社会的机器生产实际涉及到的变化，不亚于社会的自然和人性本质转化为商品。结论尽管怪异，却是无法避免的；一切都为目标服务：**显然，由这些因素引起的混乱，肯定要分裂人类的关系，并有摧毁人类自然生活环境的危险。**

实际上，这种危险正在逼进。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那些支配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法则，我们将会觉察到它的真实特性。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体系

在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讨论那些支配像 19 世纪所试图建立的那种市场经济体系的法则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牢牢地掌握这种体系所赖以建立的那些非同寻常的假定。

市场经济模式意指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从稍微更具技术性的角度来看，它是在市场价格支配下的一种经济模式，而且它只受市场价格的支配。这种能够在没有外界帮助或干预的条件下而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市场体系，肯定有资格被称为是自我调节的。这些粗略的解释应该足以显示出人类历史上这一市场体系创新的完全前所未有的性质。

让我们把我们的意思表达得再准确一些。从时间上讲，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自然地存在下去，除非它拥有某种经济组织；但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即便从原则上讲，也从未存在过受市场所控制的经济组织。尽管 19 世纪学术口头禅的异口同声一直不绝于耳，但交换中的获益与利润在人类经济中从来就未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虽然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市场制度是相当常见的，但其作用都不过是经济生活的附带之物。

我们很有理由强调我们坚持这一点。正是亚当·斯密这样的思想家提出，社会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存在，或者，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社会劳动分工依赖于人类“以此物换彼物的倾向”。这句话后来产生了经济人的概念。回过头去看看，我们可以说，不误解过去，便被证明更好预言了未来。因为尽管时至亚当·斯密的时代，人类的那种倾向在任何被观察到的社会里几乎还没有大规模地表现出来，并且一直维持着至多是经济生活的附属特征而已，但是 100 年之后，一个工业体系在地球上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正在蓬勃发展，它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意味着人类在其所有经济活动中都受到那个特殊倾向的左右，如果说人类在其政治、知识和精神追求上并未同

时受到那一特殊倾向左右的话。在 19 世纪下半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对经济学做了粗略的研究之后，能够把劳动分工原则与以物易物和交换相等价，又过 50 年之后，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能够重复这一同样的谬论。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争论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史学、政治哲学和普通社会学领域的许多著作者都踏着亚当·斯密的脚步，把他的以物易物的原始人范式确立为他们各自学科领域的公理。实际上，亚当·斯密关于早期人类之经济心理的见解，与卢梭关于原始人之政治心理的观点一样，都是错误的。劳动分工，作为一个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的现象，源自于性别、地理和个人禀赋这些事实上的固有差异；而所谓的人类天生倾向于交换（以物易物、实物互换和对换）的说法，几乎完全是虚假之言。尽管历史和人种史学记录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模式，其中大多数包括有市场制度，但在我们之前，它们从未记录过任何哪怕大概是由市场所支配和调节的经济模式。纵观独立成文的经济制度史和市场史，这将变得一清二楚。我们将看到，直到近代，市场在各国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曾经并不重要，所以，向由市场形态所支配的经济模式转化将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开始起，我们必须抛弃 19 世纪的某些成见，它们曾经是亚当·斯密关于所谓的原始人爱好获利职业的假设的基础。因为他的公理非常相关于眼前的未来而不是模糊的过去，所以他的公理致使他的追随者们对人类的早期历史采取一种奇怪的态度。在他的公理的表面，证据似乎表明，原始人类非但不具有资本主义心理，实际上却有着一种共产主义心理（后来这也被证明是弄错了）。因此，经济史学家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的兴趣限制在相对较近的历史时期，其间实物交换和兑换已被发现具有较大的规模，而原始经济学则被归入史前史。在无意识之中，这导致了一个有益于买卖心理的规模评

* 约翰·查尔斯·斯潘塞伯爵（第三）（John Charles Spencer, 3rd Earl: 1782~1845 年，英国政治家，下院领袖，1830~1834 年任财政大臣——译者注。

价，因为在由过去几个世纪所组成的相对较短的一段时期内，每样东西都可能被认为有助于最终被建立起来的那一市场体系的建立，不管其它暂时潜藏的趋势会如何。这样一个“短期”观点的补救手法，显然是经济史与社会人类学的一个会合，而这一直是人们所避免的一条路线。

我们今天不能继续沿着这些路线行走。有人习惯于把前一万年以及早期社会的系列形态仅仅视作为大约从 1776 年《国富论》出版时开始的我们的文明的真实历史前奏。至少可以说，这一习惯过时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段经历已经结束了，为了努力评估未来的各种选择，我们应该克服我们身上的这样一种自然倾向，它使我们易于追随我们的先辈们的成见。但是，使亚当·斯密那一代人认为原始人有以物易物和实物交换倾向的同样成见，致使他们的继承者们放弃了对早期人类的所有兴趣，而人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不曾沉湎于这些值得称道的情。经典经济学家们曾努力把市场法则建立在所谓的原始人的天然倾向性的基础之上，他们的这一传统因为与理解我们时代的问题无关而被一种新的做法所取代，这一做法就是放弃对“未开化的”人类的一切兴趣。

对早期文明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应该说是悖科学精神的。文明人和“未开化的”人之间的差异一直被过分夸大了，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据历史学家说，直到最近，农业欧洲的产业活动形式与几千年前的相比并无太大差别。自从引进犁、主要是用牲畜拉的大犁以来，农业方法在西欧和中欧基本上没有变化过，一直到现代为止。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文明进步主要是政治、知识和精神上的；至于物质条件，公元 1100 年的西欧几乎还赶不上一千年前的罗马世界。即便在后来，治国艺术、文学和艺术渠道的变革，特别是宗教和学术领域的变革，依然比产业领域的变革更加易于实施。在经济方面，中世纪的欧洲大体上与古代波斯、印度或中国处在同一水平上；在财富和文化上，中世纪的欧洲肯定无法同两千年前的新埃及王国相比。对于以原始经济学与文明社会的动机和机制问题不相干为理由

而将之搁置一边的做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欧洲现代经济历史学家中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社会人类学领域后来的工作，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正确性。因为如果说近来对早期社会的研究得出了任何特别突出的结论的话，这一结论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人是不变的。人的天赋，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社会里，具有非常稳定的再现特性；人类社会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看来是永远相同的。

近来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发现是，人类的经济关系通常是包含在人类的社会关系之内的。人类的行为不是为了保护其在占有物质财富上的个人利害关系，而是为了保护其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资产。只在物质财富有利于这一目的的时候，人类才会重视物质财富。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与物质占有相关的具体经济利益是不相关的，但此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与许多社会利益集团密切相关，因为这些利益集团最终需要确保必要的措施得以实施。一个小的狩猎或捕鱼社会中的社会利益集团与一个巨大的专制社会里的社会利益集团是非常不同的，但在这两个社会里，经济体系都将在非经济动机基础上进行运行。

从生存的角度，易于对此做出来解释。以部落社会为例，个人的经济利益极少是至高无上的，因为这种社会不会让它的所有成员挨饿，除非它本身被灾难所击倒，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威胁的也还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利益。另一方面，保持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如果一个人忽视公认的礼貌或慷慨规范，他就割断了自己与社会的联系、变成了社会的弃儿；其次，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社会义务都是相互作用的，履行这些义务也是最好地实现了个人的平等交换。这样一种情况肯定给个人施加以持续的压力，使得个人从意识中消除了经济上的自私自利，以致于从这种利益的角度来看，个人在许多情况下（但决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甚至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错综复杂性。这一态度被经常性的部落社会行动所加强，例如，参与分享共同捕捉到的食物，或者分享某次遥远而危险的部

落远征的成果。当从社会威望的角度来权衡的时候，为慷慨行为所设定的奖赏是非常之高的，因此任何有别于彻底忘我的行为都是不值得为之的。个人性格与此事几乎没有关系。人可以好也可以坏，可以合群也可以不合群，可以忌妒成性也可以慷慨大方，这就看是怎样一套价值观念。不允许任何人有忌妒的动机，实际上是正式分配的一项公认原则，就像公开的赞扬是勤劳、灵巧或以别的方式获得成功的园丁应得的奖赏一样（除非他太成功了，以致于因此可能活该在巫术的牺牲品的错觉下慢慢消失）。人的激情，不管好坏，都仅仅是被指向非经济目标。正式的炫耀有利于把好胜心激励到最佳状态，社会劳动的习惯倾向于把数量和质量标准提升至最高水平。作为慷慨的赠予，所有指望报答的交换行为本身就应该表明，除了由传统上提高社会威望的实物所构成的收获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获利或甚至财富的概念；而对报答的指望，尽管并不必然来自同样的个人，但却是这样一个程序：它被做了细致周密的表述，得到了精心安排的公开方法、魔法仪式以及建立“二元关系”方式的完美保证，在这种二元关系中，人群之间以相互间的义务而相关联。

在对一个西美拉尼西亚（Western Melanesian）社会特有的一般特征所做的这一简单描述之中，我们没有考虑其性别和地域组织，也没有考虑关于何种风俗、法律、巫术和宗教在施加影响力，因为我们只打算说明一下，所谓的经济动机是以怎样的方式从社会生活的背景中表现出来的。因为正是在这个黑白颠倒的问题上，现在人种学者同意：不存在获利动机；不存在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不存在最省力原则；特别是，不存在任何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独立和独特的制度。既然如此，那么，生产和分配的秩序是如何保证的呢？

答案大体上是由两个基本与经济学无关的行为原则所提供的：互惠性和再分配¹（reciprocity and redistribution）。就拿西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岛民作为这一经济类型的例子，互惠

¹ 参考，《资料来源说明》，第 269 页。本章广泛使用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图恩瓦尔德的著作。

性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性别组织即家庭和血族关系来发挥作用的；再分配，则主要对那些在同一个首领管辖下的人们才是有效的，因此是具有地盘性质的。让我们分别来考虑一下这些原则。

家庭的生计，也就是女人和孩子的生计，是他们的母系亲戚们的义务。男人拿出自己收获的最好的食物来供养他的姐妹及她们的家庭，所以他将主要通过自己的良好行为获得荣誉，但将几乎不会立即获得物质利益上的回报；如果他懒散懈怠，他的声誉将最先受到损害。互惠性原则将为其妻子和她的子女的利益而发挥作用，并因此在经济上由于他的公民道德行为而对他做了补偿。在他自己的园子里、在食品接受者的库房前正式展示食物，将会确保他的园艺的高质量为所有人所知。显然，此处的园艺和家庭经济，形成了同良好的家政和杰出的公民身份相关联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广泛的互惠性原则有助于既保证生产，又保证家庭生计。

再分配原则至少同样有效。该岛上的所有产品，有很大一部分由村长送交部族首领储存。但是，当岛民们在自娱自乐和有外岛的邻居来访时，储存制度的绝对重要性，在以节庆、舞会和其它场合为中心的所有社会活动中就清楚显示了出来（在这些场合，长途贸易的果实就会拿出来分发，按照礼仪互赠礼品，首领给大家分发习惯性的礼物）。从经济上讲，它是现有劳动分工制度、外贸、公共税收和防卫储备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固有经济体系的这些功能完全被极其生动的体验所接纳，这些体验在整个社会体系的框架内为每一种行为都提供了极丰富的非经济性动机。

然而，除非现存制度模式有利于这些行为原则的运用，否则它们就无法变得有效。互惠性和再分配之所以能够在没有书面记录和巧妙管理的帮助的条件下确保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只是因为正在讨论之中的社会组织在诸如 对称性 和 中心性（symmetry and centrality）这样的模式的帮助下满足了这种解决办法的要求。

对称的制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互惠性，这种模式是没有文字的人们的社会组织的常见特征。我们在部落的分支组织中所发现的那

种引人注目的“二元性”，有助于个人关系的配对，并因此有助于人们在缺乏永久记录的情况下进行物品和服务的平等交换。在原始社会中，有些部族往往为每个分支组织配设一个“姐妹”组织，这些部族正是发源于原始社会制度赖以建立的互惠行为并有助于施展互惠行为。关于“二元性”的起源，我们知之甚少；不过，特罗布里恩德诸岛上的每个沿海村庄似乎都有一个内地姐妹村庄，这样它们就能够平稳地组织起很有意义的面包果和鱼的交换，尽管表面上是作为相互赠送礼品，但实际在时间上是完全分开的。在库拉（Kula）贸易中也是这样，每个人在另外一个岛上都有一个对等伙伴，由此把互惠关系个人化到了非同寻常的程度。若不是这种对称模式频繁出现在部落的分支组织、居住区以及部落之间的关系之中，以独立的平等交换行为的长期运行为基础的广泛互惠性就会不切合实际。

此外，制度的中心性模式为实物和服务的收集、储存和再分配提供了一个途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中心性模式存在于所有人类组织之中。一个狩猎部落的成员通常把捕获的猎物交给首领供再分配。狩猎活动包括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捕获的猎物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另一则是捕获猎物的数目是不固定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该部落在每次捕猎行动之后不进行分配，就没有其它切实可行的分配方法。此外，在所有类型的经济中，都存在相似的需要，不管其组织中的人口是怎样众多。领土越大，产品的变化越多，再分配方式将产生愈加有效的劳动分工，因为它有助于把身处不同地域的人们联系在一起。

对称性和中心性将差不多满足互惠性和再分配的需要；制度模式和行为原则是相互调节的。只要社会组织按照惯例运行，就决不需要个人经济动机开始发挥作用；不用担心个人逃避工作；劳动分工将自动得到确保；经济义务将适时得到履行；而最重要的是，在所有公共节庆场合，人们将提供充分展示富裕状况的物质手段。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利润的想法是受到禁止的；临机应变和讨价还价行为是受谴责的；慷慨的赠予，被称赞为一种美德；所谓的以物易

物、实物交换和对换的自然倾向是不会出现的。经济制度实际上仅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职能而已。

人们决不应该就此推断：这种社会经济原则是局限于原始的传统惯例或者小型社会的；无利润、无市场的经济肯定必然是简单的。建立在互惠性原则基础之上的西美拉尼西亚的库拉圈贸易组织（Kula ring）是许多人所知道的一个最巧妙的贸易处理方式之一，再分配方式在文明的累积过程中曾极其普遍地存在着。

特罗布里恩德诸岛属于一个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环状的群岛，这个群岛上有很大一部分居民在库拉贸易活动中花去了他们自己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我们把它形容为贸易，尽管它丝毫不涉及到以货币或以货代币形式出现的利润；他们决不储藏货物，甚至决不长久占有货物；他们高兴地把收到的货物分给大家；决不存在临机应变和讨价还价，决不存在以物易物、实物交换或者对换中心；整个活动完全是由礼仪和魔法仪式在控制。但它依然是贸易，而且，这个近似环状的群岛上的土著人定期组织大规模考察，以便把一种贵重物品送给居住在那些位于顺时针方向的远处的岛上的居民；而他们也组织另外一些考察，目的是把另外一种贵重物品送到该半岛上位于逆时针方向的诸岛屿上去。最后，两组物品（按照传统方法制作的白贝壳臂章和红贝壳项链）将沿着群岛转圈子，一个圈子转下来要花去他们长达 10 年的时间。此外，在库拉贸易中，通常有这样一些个人对等伙伴，他们以同样贵重且最好是从前属于名人的臂章和项链来酬答对方的库拉礼品。现在，一个系统的有组织的经过长途运输的贵重物品的对等交换，被公正地描述为贸易。但整个这一复杂的过程，是专门依照互惠性途径进行运作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覆盖数百里之地、越过数十年时光、以数以千计的严格属于个人的物品把成百上千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时间—空间—人”系统，就是这样在没有任何记录或管理、也没有任何获利或实物交换动机的情况下进行运行的。不是以物易物的自然倾向，而是社会行为的互惠性在起支配作用。尽管如此，这个结果却是经济领域里的一项巨大

的组织性成就。实际上，考虑一下这样的问题会是蛮有意思的：如果一个哪怕是最先进的以严格的会计学为基础的现代市场体制能够接手这一任务，但问题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恐怕那些不幸的经销商，在面对无数从事单个物品买卖的专卖者与每项交易所涉及到的大量限制条件时，可能会没法确定一个标准的利润指标并可能情愿不做这样的生意。

再分配方式也有其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几乎直至现代为止。人们希望打猎归来的伯格大玛（非洲一个地方的土著人群）和寻找植物根茎、果实和叶子而归的妇女，把他们自己的战利品多多贡献给集体。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所获，是和那些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共同分享的。至此为止，互惠性的概念奏效了：今天的给予将由明天的收获做出补偿。不过，在有些部落当中，人们让部落首领或其他有名望的人担当中间人；他负责接收和分配供应品，尤其是如果供应品需要储存的话。这是正常的再分配方式。显然，这种分配方式的社会影响可能是意义深远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像原始狩猎者那样民主。不管负责物品分配的是一个有势力的家族、一位名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或是一群官僚，他们都将试图通过他们对物品再分配所采取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力。在夸丘特尔人（Kwakiutl）的冬季赠礼节上，首领把炫耀自己所隐藏的财富并把财富分发给大家，当作是一种荣誉；但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使礼品接收者欠他一份人情、使他们成为他的债务人并最终成为他的仆从。

所有以实物支付为基础的大规模经济模式，都是在再分配原则的协助下进行运作的。巴比伦王朝的汉穆拉比王国以及特别是新埃及王国，就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家长制家庭的持家之道，在此被做了巨大规模的复制，而其“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则不仅被分成了等级，而且配给量的差异非常大。大量的仓库被准备好用来接收农夫的劳动产品，不管他是牲畜饲养者、猎人、面包师、酿酒师、制陶工、编织工或是其它职业

者。每一样产品被做了非常详细的登记，只要不是在当地消费的，就被从小仓库转送至大仓库，一直送到法老宫廷内的中央政府。那里有独立的贵重物品仓库，供存放布料、艺术品、装饰品、化妆品、银器、宫廷服饰；有要大型粮食仓库、军火库和酒窖。

但是，由金字塔的建造者们所实行的那种大规模的再分配方式，并不局限于那些不识货币的经济体中。实际上，所有古老的王国都使用金属货币来支付税收和工资，但在其余方面则依赖来自于各粮食产地和各式各样的仓库中的以货代款的支付，它们由此把各种各样的实物主要分配给像官员、军人和有闲阶层那样的非生产性人员，供他们使用和消费。这是古代中国、印加帝国、印度的各王国和巴比伦王朝所实行的分配制度。在这些以及许多其它具有巨大经济成就的文明中，细致周密的劳动分工就是由再分配机制所促成的。

在封建制度条件下，这个法则也合适。在非洲的种族等级化社会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由牧人所组成的上层社会，居住在依然使用掘地的木棍和锄头的农民中间。牧民收集来的赠品主要是像谷物和啤酒这样的农产品，而由牧民分发出去的赠品可能就是牲畜，特别是绵羊或山羊。在这些情况下，存在着劳动分工，尽管通常是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不平等分工：分配可能常常掩盖了部分剥削现象，但与此同时，这种共生现象却有益于两个阶层的生活标准，因为劳动分工的水平由此获得了改进。从政治上讲，这种社会处在一种封建制度之下，不管牧业还是农业享有特权地位。“东部非洲存在着固定的牧业封地”。我们在再分配问题上所紧密追随的图恩瓦尔德，可能因此会说封建制度意味着到处都有一个再分配体系。只有在非常先进的条件和非同一般的环境之下，这一体系才会变成极具政治意义，西欧所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因为诸侯需要保护，所以出现了变革，而赠品则被转变为封建贡品。

这些例子表明，再分配也易于使正常的经济制度陷入社会关系的困境之中。我们发现，再分配过程通常形成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不管它是部落制度、城邦制度、专制制度，还是牧

业或农业封建制度。物资的生产和分配大体上是通过收集、存储和再分配而组织起来的，这种模式基本上是由首领、教会、专制君主或国王所采用的。因为根据政治权力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所以，再分配的原则将涉及到非常不同的个人动机，正像有的猎手自愿与别人分享猎物，而古代阿拉伯的农民却因害怕惩罚而以实物来缴税。

我们在此故意忽略了均质社会和等级制社会间的重大区分，均质社会是指那些大体上具有社会统一性的社会，而等级制社会是指那些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虽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相对地位与某些狩猎部落的自由而平等的成员之间的相对地位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并因此将造成这两个社会中的人们具有非常不同的动机，但经济制度的组织可能依然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之上，尽管根据经济制度所赖以编织的非常不同的人际关系基础来讲，经济制度将由非常不同的文化特征所伴随。

第三个原则是为自己的用途而生产，此原则注定要在历史上发挥一个重大作用，我们将称之为家庭经济（householding）原则。希腊人曾称之为oeconomia，它是“经济”这个词的词根。从人种学记录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假设，出于个人和团体自身的原因而组织的生产比互惠性和再分配更加古老。相反，有关这一主题的正统观念以及某些较新近的理论已经遭到了有力的驳斥。个人为自己或其家庭而野蛮采集食物和狩猎的行为，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实际上，只有在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水平上，满足个人家庭食物需要的行为才会变成经济活动的一个特征；不过，即便在此时，它与获利动机或市场制度也毫无任何共同之处。它的模式是一个封闭的组织。不管家庭、小社区或领地这些非常不同的实体是否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个体，此项原则是永远相同的，也就是说，生产和储存的原则是为了满足团体成员的需要。从运用上来讲，此项原则与互惠性和再分配具有同样的广泛性。其组织核心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它可能是父权制家族的性别、村落的地点或者是诸侯领地的政治权力。该团

体的内部组织也无关紧要。它可能与罗曼家族一样专制，也可能与南斯拉夫的扎德鲁迦一样民主；它可能与查里曼王朝的富豪们的巨大领地一样大，也可能像西欧一般农民家庭那样小。它与互惠性或再分配一样，都不需要贸易和市场。

这样一种情况正是亚里斯多德在两千多年前所试图创建的形式。从一个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正在迅速衰落的高度回顾既往，我们必须承认，在其《政治学》一书的引论部分，他关于一般家庭经济 and 赚钱的区分的著名论断，或许是社会科学领域里曾经出现过的最具预言性的见解；它肯定依然是我们所拥有的对这一主题的最佳分析。亚里斯多德坚持认为，正常家庭经济的本质是为效用而生产，而不是为获利而生产；不过，他说，为市场而进行的附带生产并不必然破坏家庭的自给自足，只要用于换钱的产品（例如家养牲畜和谷物）也可以另外种植或饲养在菜园里用于生计；销售剩余产品并不一定会破坏家庭经济的基础。只有像他那样一个判断力天才才能断言，利润是商品生产所特有的动机，货币因素在此引入了一个新的要素，不过尽管如此，只要货币和市场仅仅是一个别样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的附带之物，生产为效用的原则就能够行之有效。毫无疑问，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尽管他没能看出来，在希腊经济已经使得它自身依赖于批发贸易和借贷资本之时，忽视市场的存在是多么的不合实际。因为就是在这个世纪里，提洛（Delos）和罗得岛正在发展成为货物保险、海上贷款和转账银行业的商业中心，对比之下，一千多年后的西欧就是那样一幅原始图景。但是，巴利奥尔学院院长周伊特（Jowett）依然犯了严重错误，因为他确信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比亚里斯多德更清楚地掌握了家庭经济与赚钱之间的差异的性质。他承认“与人类相关的知识问题是相互交错的，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不易于区分它们”，由此而为亚里士多德申辩。不错，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劳动分工的含意及其与市场 and 货币的联系；他也没有认识到货币的信用和资本效用。迄今为止周伊特的批评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正是这位巴利奥尔学院的

院长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吃透赚钱的人性含意。他没有看到，效用原则与利润原则的区别是那一完全不同的文明的关键所在；在那一文明从市场经济赤裸裸的基本法则中诞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还没看到过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就准确地预测了它的轮廓，而周伊特在面对完全发育成熟的范例之际，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在公开否定生产为利润的原则毫无制约地“不属于人类自然特征”之时，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在瞄准一个关键点，也就是独立的经济动机与这些制约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间的分离。

从广义上讲，此命题的意思在于，到西欧封建制度结束时为止的所有经济制度，要么是依照互惠性原则或再分配原则或家庭经济原则而组织的，要么是依照这三个原则的某种组合而组织的。人们在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对这些原则进行了制度化，而社会组织首先利用了对称性、中心性和独裁制度模式。在这一框架之内，人们通过受到一般行为准则约束的多种多样的个人动机来确保物资的有秩序生产和分配。在这些动机中，利润动机并不显眼。风俗习惯和法规，与魔法和宗教一起合作，促使个人遵守行为准则，而行为准则最终确保了个人在经济制度中发挥作用。

希腊—罗马（Greco-Roman）时代，尽管有着高度发达的贸易，却在这方面没有出现过中断；它的特征是由罗马政府以一种别样的家庭经济方式所施行的粮食再分配的巨大规模，它没有超越直到中世纪结束时为止的那一法则，即市场在经济制度中没有重要作用；其它制度模式却正在流行。

从 16 世纪往后，市场不但数量多，且又重要。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市场实际上变成了政府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但还不曾有迹象表示市场即将控制人类社会。相反，规则和制度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自我调节的市场之概念还没有出现。若想理解经济制度为什么在 19 世纪突然转变为一种全新的类型，我们现在必须要考察一下我们在回顾以往各种经济制度时所几乎忽略掉的一个制度史，即市场史。

第五章

市场模式的演变

若要抛弃 19 世纪的经济迷信¹，我们就需要通过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加上这一经济中的交换原则的基本意义，对市场的性质和起源加以细心探询。

交换是一个经济行为原则，其有效性取决于市场模式。一个市场就是以买卖为目标的聚会场所。除非这种市场模式是存在的，至少是部分存在的，否则，交换的自然倾向将肯定找不到足够的空间：它无法产生价格²。因为就像互惠性得到了对称的组织模式的协助、再分配由于某种程度的权力集中而变得较为容易、家庭经济管理必须建立在专制基础上一样，交换原则的有效性必然取决于市场模式。但是，互惠性、再分配或者家庭经济管理，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于却并不盛行于一个社会中，交换原则也可能在一个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而其它原则却在其中占据上风。

然而，在某些其它方面，交换原则却并不严格与另外三个原则处在同样的位置。与交换原则相关联的市场模式，比对称性、中心性或专制制度更加具体明确；与市场模式相比，它们仅仅是“特征”而已，而且并不产生哪怕是只有一项功能的制度。对称性只是一种社会安排，它决不产生独立的制度，而仅产生外在的模式（一个部落或村庄是否具有对称性模式，绝不涉及到特别的制度）。中心性，尽管往往产生独特的制度，却绝对不包含任何独自产生一个具有独特功能的动机（例如，一村之长或另一位中央官员，可能随便担任多种多样的政治、军事、宗教或经济方面的职务）。最后，经济专制制度仅仅是一个现存的封闭团体的附属特征而已。

¹ 参考，《资料来源说明》，第 274 页。

² 霍特里（Hawtrey, G. R.），《经济问题》，第 13 页，1925 年。“个人主义原则的实际应用，完全依赖于交换的习惯。”但是，霍特里的错误之处在于假设，市场的存在只是来自于交换的习惯。

在另一方面，市场模式，因为与其自身特有的交换动机相关联，所以能够产生一个具体的制度，也就是市场。最终，那就是为什么市场对经济体系的控制作用，对于整个社会组织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社会的运行就像市场的一个附属物。不是经济被包含在社会关系之内，而是社会关系被包含在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在的至关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它结果。因为一旦人们以单独的制度组织起经济体系，把经济体系置于具体动机的基础之上，并赋予经济体系以特殊地位，于是社会就肯定被塑造得允许经济体系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运行。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那句断言：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里才能运行。

确实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步骤，它把孤立的市場变为市场经济、把被调节的市場变成自我调节的市場。不管 19 世纪是被欢呼为文明的巅峰，还是被悲叹为毒瘤一般的增長，人们当时曾天真地想象，这样的发展是市場扩张的自然结果。人们不曾认识到，市場逐渐转变为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的体系，并不是市場天生倾向于助长赘生物的结果，而是高度人为的刺激因素的作用，这些刺激因素被人们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以便适合于由同样人为的市場现象所产生的一个环境。人们不曾认识到这种市場模式的有限性和非扩张性，但现代研究却令人信服地澄清了这一事实。

“市場并非到处都有；市場的不存在，尽管表明了一种孤立状态和一种孤立倾向，但却与市場存在的可能推论之外的任何特殊发展状况无关。”来自于图恩瓦尔德的《原始社会经济学》一书中的这句乏味的话，概括了有关该问题的现代研究的重要成果。另一位著作者从货币的角度复述了图恩瓦尔德关于市場的说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单单一个部落使用货币这一事实，并不使它非常有别于与其它那些处于相同文化水平上的不使用货币的部落。”我们几乎无需做更多论述，只要指出这些话语中的更加惊人的含意就行了。

市場或货币的存在或不存在，并不必然影响一个原始社会的经济体系。这驳斥了 19 世纪的那个神话，即货币是一项发明，它在表

面上通过创建市场、推动劳动分工的步伐和释放人类做交易的天然倾向而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社会。实际上，正统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市场重要性的无限夸大的观念基础上的。“某种孤立状态”，或者也许是某种“孤立倾向”，才是可以从市场的不存在中正确地推断出的唯一经济特征。至于从经济的内部组织来看，市场的存在或不存在并不必然造成什么差别。

理由很简单。市场不是主要在经济之内而是在其外运行的制度。市场是长途贸易的聚会之地。普通的地方市场是没有重要性的。此外，长途贸易和地方市场在本质上都不是竞争性的，因此，这两种市场，对于创建区域贸易，即所谓的内部市场或国家市场（internal or national market），都只存在很小的压力。每一句这些断言都对经典经济学家的那种有着某种公理味道的假定构成打击，但他们依然严格地按照现代研究中所呈现出的事实进行推断。

实际上，此处的逻辑几乎与经典学说的基础逻辑相反。正统学说从个人做交易的天然倾向开始，再从这一倾向中推断出地方市场以及劳动分工的必要性，然后再推断出贸易的必要性，最后推断出国外甚至也包括长途贸易的必要性。按照我们现有的知识，我们应该几乎颠倒该论点的次序：真正的起点是长途贸易，这是商品的地理位置的结果，也是由地理位置造成的劳动分工的结果。长途贸易往往产生市场，而市场是一种制度，它涉及到交易行为，如果使用货币的话，它就也就涉及到买卖行为，因此，它最终为某些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沉溺于他们所谓的讨价还价的自然倾向，当然尽管并不必然如此。

这一学说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贸易起源于一个与经济的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环境中：“把狩猎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应用于物资的获取，使人们从外部发现了狩猎区域的局限性，由此导致了某些形式的交换，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贸易。”³在寻找贸易起源的过程

³ 图恩瓦尔德（Thurnwald, R. C.），《原始社会经济学》，第 147 页，1932 年。

中，我们的起始点应该是从一定距离之外获取物资，就像在一次打猎旅行中一样。“澳大利亚中部的迪埃利人（Dieri）每年七、八月份都要到南方做一次旅行，目的是获取用于涂绘他们身体的红色赭石……他们的邻居杨特鲁湾塔人（Yantruwunta）也组织相似的旅行，从 800 公里外的福林德斯山采集赭石和沙岩板，供碾压草籽之用。在这两个例子中，如果当地人抵制他们的采石行动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为所需的物资而战斗。”与我们用来视作贸易的行为相比，这种强行采石或寻宝行动明显非常类似于抢夺和海盗行径；基本上来说，它是一种单方面的事情。往往只有通过下面这些行为或安排，也就是“某种形式的交换”，它才会变成两方面的事情：当地的地头蛇实施勒索；借助互惠性安排，就像在库拉组织贸易中西部非洲的朋威（Pengwe）访问团那样，或者像开普乐人（Kpelle）那样，酋长通过坚持招待所有客人而对外贸实施垄断。确实，这种访问不是偶然行为（以我们而不是以他们的眼光来看），而是真正的贸易旅行；不过，物资的交换总是在互赠礼品的姿态下、并且通常是通过回访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尽管人类社会似乎从来就没有完全忘记过外部贸易，但这种贸易不曾必然涉及到市场。最初，外部贸易更多具有冒险、探险、狩猎、海盗和战争而不是以物易物的性质。它可能极少意味着和平，也极少意味着两方面性，而且即使当它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两方面性之时，它通常也是按照互惠而不是以物易物的原则进行组织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即以物易物与和平这两个方向，来追溯人们是如何过渡到和平贸易的。如上所述，一个部落探险队可能不得不遵守由地头蛇所设定的条件，他们可能会从陌生人那里强行索取某种对等之物；这种关系，尽管不完全是和平的，但可能导致了以物易物：单方面的运输将转变为两方面的运输。另一种发展情况是“弹性贸易”，就像非洲丛林里的那种情况，在那里，人们通过组织休战来避免战斗，和平的要素，即信任和信用关系被人们细心周

到地引入到贸易之中。

正如我们所知，在后来一个阶段，市场变成了外部贸易组织中的支配因素。但是，从经济学观点来看，外部市场完全不同于地方市场或内部市场。它们不仅在规模上不同；作为制度，它们在功能和起源上也不同。外部贸易是运输；问题在于某地区缺少某些类型的物资；英格兰的羊毛换葡萄牙的酒就是一例。地方贸易局限于当地的物资，它不具有运输性质，因为当地的货物太重、太多或易于损耗。因此，外部贸易和地方贸易都与地理距离相关；内部贸易局限于那些无法克服地理距离的物资，外部贸易则限制在那些能够克服地理距离的货物。这种贸易被正确地描述为补充性贸易。城乡之间的地方贸易和不同气候区域之间的对外贸易就是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的。这种贸易无需意味着竞争，而如果竞争可能倾向于扰乱贸易，则大家对于消除竞争不会存在争议。与外部贸易和地方贸易相比，内部贸易则在本质上具有竞争性；除了补充性交易之外，它包括在数量上多得多的来自不同源头的相似物资的交易，这些相似物资彼此竞争。因此，只有在内部贸易或国家贸易出现之后，竞争才趋向于被接受为一项通常的贸易原则。

这三种类型的贸易，不仅在经济功能上非常不同，而且在起源上也有分别。我们已经讨论过外部贸易的起源。市场自然地发源于运输人需要歇脚的浅滩、海港、河源或两支探险队相遇之处。“港口”在货物转运之地发展形成。⁴欧洲著名集市的短暂昌盛，是长途贸易产生某种类型市场的又一种例子；英格兰的贸易中心城镇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尽管集市和贸易中心城镇的再次突然消失令教条主义进化论者惊惶失措，但港口却注定与城镇一起在西欧殖民过程中起着巨大作用。不过，即使城镇建立在外部市场的所在之处，地方市场也往往在功能和组织两方面都保持独立。港口、集市和贸易中心城镇都不是内部或国家市场的发源地。那么，我们从何处寻找

⁴ 皮雷纳 (Pirenne, H.), 《中世纪的城市》, 第 148 页, 1925 年 (注脚 12)。亨利·皮雷纳 (Henry Pirenne): 比利时历史学家——译者注。

它们的起源呢？

人们似乎可能自然地做这样的假设：只要有个人交换行为存在，这些行为到一定时间就会导致地方市场的发展形成，这样的市场一经存在，也会同样自然地导致内部市场的建立。然而，这两点假设都不是实情。通常来说，在其它经济原则盛行的社会里，个人交换行为这一纯粹的事实并不导致市场的建立。这种行为在几乎所有原始社会里都是常见的，但它们被认为是非主要的，因为它们并不供给生活必需品。在巨大的古代再分配制度中，交换行为以及地方市场是常见之事，但至多是作为一个附属特征。互惠性原则也同样如此：交换行为，在此一般包含在长期关系之中，意味着信任和信誉，这种情形倾向于消除交易的双边特征。限制因素来自于社会学指南针上的所有各点：风俗习惯和法规制度、宗教和魔法都同样对结果有所贡献，它就是要从人、物、时间和场合上限制交换行为。通常，做交换的人只进行那种现成的交换，其中，交换物和它们的对等物都是给定的。作为互惠性交换的一部分，提柯皮亚（Tikopia）语中的乌塔（Uta）⁵就代表着一种传统的对等物。那种表现为 18 世纪观念中作为交换的基本特征的东西，交换的唯意志因素，以及非常明确地展示了所谓的交换动机的讨价还价行为，在实际交换中仅占很小一点空间；从这一动机作为交换程序的基础而言，人们很少允许它明确地表现出来。

相反，习惯的表现方式是展示出一种相反的动机。送礼者可能简单地把赠品丢在地上，而收礼者会假装偶然捡起了它，或甚至让他的一个跟班去替他捡。就大家公认的行为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仔细瞧瞧所收到的回赠品更加矛盾的了。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微妙的态度不是人们对交换的物质方面真正缺乏兴趣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种交换的礼节描述为一个旨在限制交换特征之范围的抵消性行动。

⁵ 弗思（Firth, R.），《原始的波利尼西亚经济学》，第 347 页，1939 年。

实际上，从已有的证据来看，断言地方市场曾经是从个人交换行为发展而来，可能是轻率之举。由于地方市场的由来模糊不清，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从开始起，地方市场这一制度就受到许多安全措施的包围，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保护社会的主流经济组织不受市场行为的干扰。人们用各种礼节和仪式来确保市场的安宁，这些礼节礼仪在限制市场范围的同时，也确保市场有能力在给定的狭窄空间内运行。市场的最重要的结果，即城镇和都市文明的诞生，实际上是一种矛盾发展状况的结果。因为作为市场之产物的城镇，不仅是市场的保护者，也是阻碍市场向乡村扩张并因此侵扰社会的主流经济组织的工具。从城镇既包含市场又阻碍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contain^{*}”这个单词的两个意思或许最好地表达了城镇的这一双重功能。

如果交换行为被各种禁忌所包围，以免这种人际关系滥用正常经济组织的功能，那么市场的纪律则是更加严厉。这里是一个取自于查加^{*}乡村的例子：“在市场开放的日子，人们必须按时去市场。如果任何事情使得市场有一天或数天不能开放，那么，在市场得到净化之前，生意就不能恢复……市场上的每一件造成流血的伤害事件，都使得人们必须立即赎罪。从那一刻起，任何妇女不得离开市场，人们不能触摸任何货物；在货物被带走用作食物之前，它们必须得到清洗。至少必须立即用一只山羊来献祭。如果一个女人在市场上生了孩子或发生流产，则必须采用更加昂贵而严肃的赎罪方式。除此之外，首领的家宅必须用一头乳牛的祭血进行净化。该地的所有妇女都必须按照区域逐个这样用乳牛的祭血进行喷洒。”⁶这样的规则不会使市场的扩张更加容易。

家庭主妇购买日常必需品、种粮食或种菜的农民以及当地手艺人出售各自产品的那些典型的地方市场，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令人吃

* contain的一个意思是包含，另一个意思是遏制——译者注。

* 查加（Chaga）是非洲的一个操班图语的民族——译者注。

⁶ 图恩瓦尔德，引用著作同前，第162~164页。

惊的与时间和地点的不相干。这种集市不仅在原始社会是相当普遍，而且直到 18 世纪中叶为止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几乎保持不变。它们是地方生活的一个附属物，不管它们是中非部落生活的一部分，还是法国梅罗文加王朝的一个城市，或者是亚当·斯密时代的一个苏格兰村庄，它们都是大同小异。但对城市是正确的东西，对乡村也如此。地方市场基本上就是邻里街坊市场，尽管对社会的生活具有重要性，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显示出弱化它们自身模式所属的主流经济体系的丝毫迹象。它们并不是内部或国家贸易的起始点。

西欧的内部贸易实际上是由国家的干预所促成的。一直到商业革命时代为止的那种可能在我们眼里看似国内贸易的东西，并不是国家性质的，而是地方性的。汉萨同盟（Hanse）并不是德国商人组成的，而是一个由来自于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许多城镇的贸易寡头组成的联合会。汉萨同盟非但没有对德国经济生活进行“国有化”，而是故意切断了穷乡僻壤的贸易。安特卫普、汉堡、威尼斯或里昂的贸易决不是荷兰的、德国的、意大利的或者法国的。伦敦也不例外：它的“英国”色彩之少就如同卢卑克之于“德国”一样。欧洲这一时期的贸易地图应该正好只显示出城镇，而在乡村留下的都是空白：从有组织贸易的角度来看，乡村贸易很可能还未曾存在过。所谓的国家仅仅是政治单位，而且是非常松散的政治单位，是由乡村里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自给自足的家族和不起眼的地方市场从经济上组成的。贸易被限制在有组织的镇区内部，而这些镇区在进行贸易的时候，要么是把它当作地方性的邻里贸易来做，要么是当作长途贸易来做：这两种形式的贸易是被严格分开的，而且两者都不允许随便地渗透到乡村去。

城镇组织内部的这种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之间的长久分离，对于进化论者来说肯定是又一个打击，因为对他们而言事情似乎总是易于彼此渗透的。而就是这一特殊事实，变成了打开西欧都市生活社会史的钥匙。它非常倾向于支持我们关于市场起源的断言，那是我们根据原始经济的条件而推断出来的。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之间

的显著分别可能看起来太过刻板，尤其是当它导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有些令人惊异的结论之时，即长途贸易和地方贸易都不是现代内部贸易的发源之地，所以，我们显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考察一下政府干预这一解围之物的解释。我们马上将会看到，关于这一点，近来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我们的结论。不过，让我们先简略概括一下都市文明史，因为它是由中世纪城镇范围内的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之间的特别分离状态所塑造成型的。

这一分离状态市场，实际上正处在中世纪都市中心制度的心脏。⁷城镇是英国的自由民或公民（burgess）组织。他们单独拥有公民身份，而城镇体系就是建立在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之间的区别基础上的。乡下的农民和来自其它城镇的商人都不自然就是自由民。但是，尽管城镇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使得城镇自由民可以同附近的农民做生意，但在涉及到外国商人时，这种做生意的权力就不能行使了。因此，自由民发现他们自己在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中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上。

关于食品供应，规章制度中包含强制实行公开交易并禁止中间人的办法，目的是控制贸易和预防高物价。但这种规章制度只对城镇之间及其紧邻地区的贸易才有效。香料、咸鱼或酒类都必须经过长途运输，因此是属于外国商人及其资本主义批发贸易方法范围内的事情。这种贸易不受地方规章的限制，所以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尽可能把它排除在地方市场之外。完全禁止外国商人从事零售业就是旨在达到这一目的。从进口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批发贸易量增长越快，强行把它排除在地方市场之外的措施就越是严格。

在工业品方面，地方贸易与长途贸易之间的裂痕则更深，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生产的整个组织都受到影响。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同业公会的性质，因为工业生产是在同业公会中组织起来的。在地方市场上，生产是根据生产者的需要而进行调节的，这样就把生

⁷ 我们的陈述是以皮雷纳（H. Pirenne）的名著为依据的。

产规模限制在一个有利可图的水平上。这一原则自然不会适合于出口，因为在出口方面，生产者的利害关系没有给生产设定限制。因此，在地方贸易受到严格管制的同时，出口生产却只受到同业公会社团的正式控制。布匹的贸易，作为那个时代的主导出口产业，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劳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地方贸易与出口贸易之间越来越厉害的分离，是都市生活对灵活的资本瓦解城镇制度的威胁做出的反应。典型的中世纪城镇，不是努力通过化解可控制的地方市场与变化多端的不可控制的长途贸易之间的矛盾来避免威胁，相反，而是通过最严厉地实行作为其生存之道的排斥和保护政策来直面危险。

实际上，这意味着，城镇给资本主义批发商所迫切要求的国内市场或内部市场的形成设置了每一道可能的障碍。通过维持非竞争性的地方贸易原则和城镇之间同样非竞争性的长途贸易，自由民们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既阻止乡村进入贸易领域，也阻止放开城乡之间的一视同仁的贸易。正是这一发展结果迫使领土所属国出面充当市场“国有化”的工具和内部贸易的缔造者。

15 和 16 世纪时，国家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把商业体系强行施加给贸易保护主义极为严重的城镇和公国。重商主义摧毁了地方贸易和自治区之间贸易的那种过时的独立发展原则（particularism），因为它清除了存在于这两种非竞争性商贸活动之间的屏障并由此为国家市场扫清了道路，而国家市场则越来越不考虑城乡之间和不同城镇及省份之间的区别。

商业体系实际上是人们对许多问题做出的一个反应。从政治上讲，中央集权国家是人们在商业革命的召唤下所做的一个创新，因为商业革命已经把西方世界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地带并因此促使广大农业国家的落后的人们进行商业和贸易组织。在外部政治中，主权的确立是时代的需要；因此，商业主义的治国之道包括为外交事务上的力量目标而调集整个国家领土上的资源。在内部政治中，把被封建主义和自治区独立发展原则所分裂的国家统

一起来，则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必要的副产品。从经济上讲，国家统一的工具是资本，即以可资利用的金钱囤积形式存在并因此适合于商业发展的私人财富。最后，把传统的自治体系扩大到整个国家的领土上，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管理技能。在同业公会曾有变成国家机构倾向的法国，同业公会制度被扩大到了整个国家的领土上；在身处城墙之内的城镇的衰落已经致命地削弱了同业公会制度的英国，乡村在没有受到同业公会的监督管理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工业化；与此同时，在英法两国，贸易和商业扩大到了全国各地，并变成了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商业主义的内部贸易政策的起源就潜藏在这一情势之中。

已经把贸易从特权城镇的约束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干预行动，现在需要解决城镇曾经成功地对付了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威胁，即垄断和竞争。竞争最终肯定导致垄断，这是当时大家相当理解的一个事实，而后来垄断则更加令人畏惧，因为垄断往往影响到生活必需品并因此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这一次，特定的解决办法是，在国家范围而不再是在自治区的范围内，对经济活动实施全面的管制。以现代眼光看来可能易于被认为是目光短浅的排除竞争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保护市场运行的手段。因为买方或卖方的任何暂时侵扰市场的行为，都肯定会打破市场平衡，并使正常的买主或卖主受到挫伤，由此导致市场将停止运行。从前的承办商将停止供货，因为他们无法肯定他们自己的货物将卖得出价钱，而供给不足的市场将变成垄断商家的猎物。尽管程度较小一些，但需求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危险，因为在快速跌落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需求垄断。为了使市场摆脱独立发展原则的限制和各种收费及禁令，国家每采取一个步骤，都危害到有组织的生产和分配体系，而这一体系现在正受到无节制的竞争和无执照商人的侵扰的威胁，这些无执照商人只从市场上“捞取好处”却决不保证有长久性。因此，最后的结果是，尽管新的国家市场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竞争性，

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管制特征，而不是新的竞争元素。⁸农民为生计而劳动，这种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模式依然是经济体系的广泛基础，而家庭经济模式正在通过内部市场的形成而被集成进入巨大的国家组织之中。这一国家市场现在不仅与地方市场和外国市场并驾齐驱，而且还与它们有部分重叠。内部商业作为一个相对孤立的体系，现在正在补充农业的不足之处，因为它与在农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经济原则完全并行不悖。

我们对到工业革命时代为止的市场史所做的这一概述，到此结束。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历史的下一阶段带给我们的是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西方民族国家的特有政策，商业主义中没有任何东西预示了这种独特的发展结果。商业主义“解放”贸易，仅仅是把贸易从独立发展原则中解放出来，但同时却扩大了管制的范围。经济体系被淹没在广泛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一个制度环境的附属特征而已，而这一制度环境受社会权力的控制和管制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多。

⁸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英国人约束商人，但这种做法却有利于商业”。

第六章

自我调节的市场与传统商品： 劳动力、土地和资金

独自粗略地考察一下经济体系和市场，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从来都不过是经济活动的附属之物。通常，经济体系被归入社会体系之内，而不管什么样的行为原则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市场模式的存在被发现总是与之相容。这一市场模式赖以存在的交易原则，不曾表现出牺牲其它原则以自肥的倾向。在市场制度发展得最好的地方，例如在重商主义体系之下，市场是在中央集权政府的控制下而繁荣兴旺的，而中央集权政府在农业家庭经济和国家生活两方面都培育起了专制制度。规章制度和市场实际上是一起成长起来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曾是不为人知的；实际上，自我调节的概念的出现，完全是一个背离发展潮流的现象。正是根据这些事实，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那些非同寻常的假定才能够独自得到完全的理解。

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在市场独自控制、调节和指导下的经济体系；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托付给这一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经济制度来自于这样的期望，即人类的行为方式是以实现最大的金钱收益为导向的。它假定，只要市场上有现成的价格固定的商品供给（包括服务），市场就将以那一价格与需求相等。它假定货币的存在，货币行使其拥有者手中的购买力的职能。于是，生产将由价格所控制，因为那些指导生产的人的利润将依赖于价格；商品的分配也将依赖于价格，因为价格形成收入，就是在这些收入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才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在这些假定之下，商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则由价格独自确保。

自我调节意味着，所有产品都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所有收入都来自这种销售。因此，市场是为所有产业要素而存在的，不仅为商品（总是包括服务）而存在，也为劳动力、土地和资金而存在，

它们的价格分别称为商品价格、工资、租金和利息。就是这些术语表明了，价格形成收入：利息是使用资金的价格，所以形成了那些有能力提供资金的人的收入；租金是使用土地的价格，所以形成了那些提供土地的人的收入；工资是使用劳动力的价格，所以形成了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的收入；最后，商品的价格形成了那些出卖他们自己的企业管理服务的人的收入的一部分，此处的收入被称为利润，而利润实际上是两组价格之差，即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与它们的成本之差，而成本是指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须的另一组商品的价格。如果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所有收入将来自于市场上的销售，而收入将正好足够购买所有生产出来的商品。

从国家及其政策而言，随之而来的则是另一组假定。国家必须不准任何东西抑制市场的形成，也必须不准收入通过有别于销售的其它渠道形成。国家还必须不准对价格随市场条件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做任何干预，不管这些价格是商品价格、劳动价格、土地价格还是资金的价格。因此，不仅必须有为所有产业要素而存在的市场¹，而且任何影响这些市场之运行的措施或政策都必须不受支持。价格、供给和需求都必须不被固定或不被管制；发生效力的只有这样一些政策或措施，它们通过创造条件使得市场成为经济领域里唯一的组织力量，从而有助于确保市场的自我调节。

为了全面理解此处的意思，让我们暂时回顾一下重商主义制度和它曾经花了不少力气发展起来的国家市场。在封建制度和同业公会制度之下，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社会组织本身的一部分（资金几乎还没有发展成为产业的一个主要要素）。作为封建秩序下的关键要素，土地曾是军事、司法、行政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其地位和职能由法律和习惯的规则确定。土地所有权是否可以转移，如果可以，那么可以转移给谁，且要受到什么限制；土地财产的限定继承权为何；某些类型的土地可以派什么用途；所有这些问题都曾被置于买

¹ 亨德森（Henderson H. D.），《供给与需求》，1922年。市场的运行具有两重性：不同用途之间的要素分配，组织那些影响要素总供给的各种力量。

卖的组织之外，并受制于一组完全不同的制度规则。

劳动力的组织也同样如此。在同业公会制度下，如同在以往历史上每一个其它经济制度下一样，生产活动的动机和条件都曾被包含在总体社会组织之中。师傅、学徒满师者和学徒工之间的关系，行会的规矩，徒弟的数目，以及工人的工资，都受到同业公会和城镇的习惯和章程的管制。重商主义制度所做的，仅仅是通过像英国的政令或法国的“国有化”这两个途径来对这些条件加以统一。至于说土地，其封建地位仅仅在其与地区特权相关联之处才被废除了；在其余的方面，土地在英国和在法国一样，都仍然不属于私有权范畴（extra commercium）。直到 1789 年的大革命时代，地产（landed estate）依然是社会特权之源，甚至在那之后，英格兰关于土地的不成文法基本上还是中世纪的。重商主义，尽管偏向于商业化，但却从未攻击过那些防止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变成商品的措施。在英格兰，通过 1563 年《技工法》（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和 1601 年《济贫法》而施行的劳动力立法“国有化”，把劳动力从危险地带迁移了出去；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圈地政策，则是对为获利而使用地产的原则的一贯反对。

重商主义，不管其如何坚持把商业化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却正是以违反市场经济法则的方式考虑市场的，它在产业领域里的广泛干预行为就是最好的佐证。单在这一点上，重商主义者与封建主义者之间，头戴王冠的谋划者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们与保守的独立发展主义者之间，是不存在任何差别的。他们仅仅是在管制的方法上存在分歧：同业公会、城镇和各地区诉诸风俗习惯和传统理念的力量，而新的国家权力机构则偏爱政令和法规。但他们所有人都一致反对劳动力和土地的商业化概念，而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却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法国在 1790 年才废除了同业公会和封建特权；英格兰在 1813~1814 年间才废止《技工法》，在 1834 年才废止《伊丽莎白济贫法典》。在 18 世纪最后 10 年以前，这两个国家甚至都不曾讨论过建立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而自我调节的经济生活的概念，完全就不存在于那个时代。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两点：第一是通过贸易和商业而进行的国家资源开发，其中包括充分就业，第二是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在这一方面，重商主义者与现代观念的差距之大就如同其在政治领域里一样，因为其在政治领域里对开明君主的绝对权力的信仰绝没有受到民主思潮的调和。正如向民主制度和议会政治的过渡涉及到时代潮流的彻底逆转，18世纪末的那场从被管制的市场向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也代表着社会结构的一次彻底变革。

自我调节的市场，无非就是要求从制度上把社会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这一两分法，实际上仅仅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重申了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存在。可以推断说，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在所有时代的任何类型的社会里都受到欢迎。不过，这样的推论可能是以一个谬误为基础的。诚然，没有某种制度来确保物质生产和分配的秩序，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但那并不意味着独立的经济制度的存在；一般来说，经济秩序仅仅是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一个职能而已。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无论在部落、封建或是重商主义条件下，社会中都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制度。19世纪实际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偏离常规的时代，因为在此期间，经济活动处于独立状态，并归因于一个独特的经济动机。

除非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顺从它的要求，否则这样的制度模式是无法运行的。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之中。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是以我们对市场模式所做的总体分析为依据的。市场经济必须由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在内的所有产业要素组成。（我们将看到，在市场经济中，作为最后一个同时也是产业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资金以及资金成为市场机制的内在因素，是具有深远的制度意义的。）但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别的，它们与人自身一样是每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把它们包含在市场机制当中，则意味着使社会自身的本质服从于市场的法则。

我们现在可以按照一个更具体的形式探讨一下市场经济的制度

特征和市场经济所涉及到的风险。首先，我们将描述一下市场机制何以能够控制和指导产业活动；其次，我们将努力评估这样一个机制将如何影响社会，因为社会是受制于市场机制的作用的。

正是在商品概念的协助下，市场机制逐步适应了产业活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主要基于经验，商品在此被定义为生产出来供在市场上销售的物品；还是基于经验，市场在此被定义为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实际接触。因此，在生产的时候，产业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认为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于是它将只受到按照价格进行互动的市场供求机制的支配。实际上，这意味着：产业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有市场；在市场上，每一个这些要素都被组织进入一个供应群和需求群；每一个要素都有一个与需求一起互动的价格。所有这些不计其数的市场是相互关联的，并共同形成了一个大市场²（One Big Market）。

关键之处在于：劳动、土地和资金是产业的基本要素；它们也必须被组织进入市场；实际上，这些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绝对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是，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显然不是商品；就它们而言，肯定错误的是假定任何买卖的东西都必须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换句话说，根据商品的经验性定义，它们不是商品。劳动只是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名称，人类活动与生活本身同在，劳动力反过来说并不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原因，人类活动也不能与生活的其余部分相分离、不能储存或移动；土地是大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不是人所生产的；最后，实际的资金，仅仅是购买力的一个象征，通常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借助银行业或国家财政的机制产生的。它们没有一个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对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所做的商品描述完全是假想的。

话虽这样讲，但正是在这一假定的帮助下，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³；它们正在市场上被进行实际买卖；它们的

² 霍特里（Hawtrey, G. R.），引用著作同前。它使“所有商品的相对市场价值彼此相容”，霍特里由此看到了它的作用。

³ 马克思所声称的商品价值的偶像特征，是指真实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与本

需求和供给是实实在在可度量的东西；任何可能抑制这种市场形成的措施或政策都会因此而危及市场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因此，商品假定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原则，因为整个社会以最变化多端的方式几乎对其所有制度都有影响，所以，根据此组织原则，任何可能阻碍市场机制依照商品假定概念进行实际运作的安排或行为都不该被允许存在。

现在，就劳动力、土地和资金而言，这样一个假定是无法站住脚跟的。若是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和人类的自然环境的唯一指导者，实际上甚至是购买力总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者，那么，社会则会因此而毁灭。因为在不影响恰好就是这一特殊商品之载体的个人的同时，所谓的“劳动力”商品，是不能被推来揉去、不能被随随便便地使用的，或甚至不能被丢在边上不用。在安排一个人的劳动力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系可能会顺便处理一下与劳动力标签连在一起的那一肉体、心理和道德存在之“人”。剥去人类文化制度的保护性外壳，人类可能会从社会为所欲为的作用中消亡；人类可能会作为剧烈的社会混乱的牺牲品而灭亡，而这种混乱则是由邪恶、颠倒黑白、犯罪和饥饿所引起的。大自然可能会被还原，周围环境会遭受破坏，河流会被污染，军事安全会岌岌可危，食品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会万劫不复。最后，购买力的市场管理会周期性地杀死商业企业，因为对商业而言，资金的短缺和泛滥，就像原始社会的洪水和旱灾一样，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但是，哪怕是在一段极短的时间之内，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承受得了这样一个未经琢磨的假想体系的作用，除非社会的人性和自然本质以及其商业组织得到保护而没有遭受这一血汗工厂的蹂躏。

市场经济的这一极端人为的性质之根源在于，此处的生产过程本身是以购买和销售的形式组织起来的⁴。在一个商业社会里，不可

文中提到的假定商品毫无共同之处。

⁴ 坎宁安 (Cunningham, W.), “经济变革”, 《剑桥现代史》, 第一卷。

能有别的组织生产的途径。在中世纪后期，出口工业生产是由富裕的自由民组织的，并在他们的直接监督之下在家乡的城镇里付诸实施。后来，在商业社会里，生产则由商人进行组织，而且不再局限于城镇内部；这就是“走出去”的时代，其时，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的，是把生产过程作为纯粹的工业企业来控制的商业资本家。正是在那个时候，工业生产才被明确而普遍地置于商人的组织领导之下。商人了解市场，也了解需求的规模和质量；商人也能够保证原料供应，顺便提一句，原料供应仅包括羊毛、靛青染料，有时还包括家庭手工业所使用的织布机或编织架。如果供应方面出了问题，手工业业主是受害最深的，因为他暂时失去了工作；但是，这决不涉及到规格高档的工厂，而肩负生产责任的商人也决不招致严重的风险。在几个世纪里这一体系的力量在成长、范围在扩大，直到各国的主导产业毛纺业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里覆盖了大片的地域为止，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生产是由服装商所组织的。做买卖的人，偶然也考虑生产，但却无需另外的动机。商品的创造与互助的互惠性态度无关，与户主对那些需要他自己照顾的人的关心无关，与手艺人施展技艺时的自豪感无关，与对公众夸奖的满足感无关，而只与买卖人最熟悉的利润动机相关。在 18 世纪末以前，西欧的工业生产仅仅是商业的一个附属物。

在机器还是一种便宜的、非专用的工具时，这一情况就不曾改变过。单单手工业业主在同样的时间里能够比从前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这一事实，就可能促使他使用机器以增加收入，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必然影响生产的组织。便宜的机器是由工人所有还是由商人所有，这在双方的社会地位方面曾造成过差异，而且几乎肯定在工人的收入上造成过差异，只要工人有自己的工具，其经济状况就要好一些；但这未曾迫使商人变成工业资本家，或未曾迫使商人限制自己不把钱借给那些自己拥有工具的工人。商品的出路极少出问题；较大的困难继续出在原材料供应方面，因为原材料供应有时不可避免地被打断。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机器的商人所受的

损失也不是非常大。不是这里所说的机器，而是配置精良的并因此是专用的机器和工厂的发明，才彻底改变了商人与生产的关系。尽管新的生产组织是由商人引进的，这是一个决定整个转变历程的事实，但是，使用配置精良的机器和工厂却不仅涉及到工厂体系的发展，而且还由此涉及到相对重要性从商业向工业的决定性转移。工业生产不再是那个由商人组织起来作为买卖程式的工商业的附属物；它现在涉及到带有风险的长期投资。除非连续生产可以得到合理保证，否则这样的风险就难以承受。

不过，工业生产变得愈是复杂，需要保证供应的生产要素的品种就越多。当然，在这些要素中，有三个尤其重要：劳动力，土地，以及资金。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它们的供应只能有一个组织途径：让它们能够被买到。因此，它们可能会需要被组织起来放到市场上去卖，也就是把它们当作商品卖。市场机制扩大到作为产业要素的劳动力、土地和资金上来，是商业社会里引进工厂体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生产要素必须处于待售状态。

这与对市场体系的需求是同义的。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制度下，只有借助相互依存的市场确保自我调节，利润才得到保证。鉴于工厂体系已经被组织起来作为买卖的一部分，因此，为了维持生产的进行，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必须转变为商品。当然，它们实际上不可能被转变为商品，因为它们实际上不是生产出来供放在市场销售的。不过，假定它们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却变成了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三个要素之中，有一个比较显眼：从人不是作为雇主而是被雇用的角度来说，劳动力是用于表示人的技术术语；由此看来，劳动力的组织会与市场体系的组织一同变化。但是，由于劳动力的组织只是老百姓的生活形式的另一种叫法，所以这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发展会由社会自身组织的变化相伴随。**完全依照这一思路，人类社会已经变成了经济体系的一个附属物。**

我们记得，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的灾祸与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社会转型是相类似的。我们曾说过，**社会进步的取得通常是以牺牲**

社会秩序为代价的。如果社会转型的速度太快，社会肯定会在转型的过程中遭受劫难。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通过调节社会变革的进程，使它变得能够被社会承受，使它的结果能够被疏导为破坏性较少的措施，从而解救了英格兰免遭西班牙那样的命运。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曾经解救英格兰老百姓免受工业革命的冲击。盲目相信自发的进步，已经深入人心，最开通的那些人士带着宗派主义者的狂热极力推行无节制的和无章法的社会变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可怕得难以言表。实际上，若不是保护性的抵制行动消除了这一自我毁灭机制的行动锋芒，人类社会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

因此，19世纪的社会史，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一方面，与真实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在扩张，另一方面，与传统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却在受到制约。尽管市场一方面在全球到处延伸扩张，所涉及到的商品之数量增长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措施和政策网络却被集合成为各种强有力的制度，以便阻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相关的市场行动。尽管在金本位制保护之下的世界商品、资本和货币市场给市场机制注入了无比强大的动力，但同时却出现了一个旨在对抗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有害作用的深层次运动。社会保护自身以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危险，是这一时代历史的最具包容性的特征。

第七章

1795 年的斯品汉姆兰

18 世纪的社会无意识地抵制任何旨在将它变成仅仅是市场的一个附属之物的努力。一个不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是无法想象的；但若要建立这样一个市场，特别是在英格兰的农业文明条件下，无异于是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组织。在 1795~1834 年间工业革命最活跃的时期，英格兰通过《斯品汉姆兰法》*阻止了劳动力市场的创建。

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人们在新的产业制度下需要组织的最后一种市场，采取这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启动，其时，甚至对于老百姓自己而言，劳动力市场的缺乏也正在被证明比伴随其引进的灾难更加邪恶。最后，自由劳动力市场被证明是有益于所有相关之人，尽管创建它时采用了残忍无情的方法。

但就是在此时，那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经济优点无法弥补它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不得不引进的新型规章制度，再次保护了劳动力，只是这一次保护是来自于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尽管诸如工会和《工厂法》这样的新型保护制度被做了尽可能的调整以适应经济机制的要求，但是它们依然干扰经济机制的自我调节，并最终摧毁了这一保护制度。

从这一发展结果的广义逻辑上讲，《斯品汉姆兰法》占据了一个战略位置。

在英格兰，土地和资金的调动都发生在劳动力的之前。法律对劳动力实际流动所实施的严格限制，阻碍了劳动力国家市场的形成，因为劳动力事实上被限制在其自己的教区之内。曾制定了所谓的教区农奴规章的 1662 年《居住权法》，到 1795 年才被放宽。如果不是在同一年即 1795 年施行了《斯品汉姆兰法》或“补贴制度”的话，

* Speenhamland Law，也称斯品汉姆兰制度或标准——译者注。

这一步骤可能会使得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成为可能。《斯品汉姆兰法》的意图是相反的，即它倾向于有效地加强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继承来的那一劳动力组织的家长式制度。在一个巨大的灾难时期，1795年5月6日在纽伯里附近的斯品汉姆兰的佩里坎旅馆开会的伯克郡法官，决定根据一个依赖于面包价格的标准对工资实施补贴，这样的话，不管穷人的收入是多少，他们的最低收入都可以得到保证。地方官员的著名建议是这样说的：当某种质量的标准面包“价格为1先令时，每一名贫穷但勤劳的人将获得每周3先令的补贴，由他本人或他家的劳动者来领取，或从平民救济税中获得津贴，他的妻子和他家的每一名其他成员将得到1先令6便士的补贴；当面包价格为1/6英镑时，每周补贴4先令外加1/10英镑；当面包价格在1先令的价位上每上涨1便士，他本人将得到3便士补贴，他家其他成员将得到1便士补贴。”这些数字因县的不同而有些变化，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斯品汉姆兰标准都被采用了。这在当时是作为一个紧急措施，而且是非正式施行的。尽管通常被称为法律，但斯品汉姆兰标准本身从未作为法律来颁布。不过，它很快就变成了英国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土地法，后来甚至变成了许多工业区的土地法；实际上，它引进了一场不亚于“生存权利”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创新，而且直到在1834年被废除为止，它曾经有效地阻止了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在两年之前的1832年，中产阶级夺取了权力，部分就是为了消除新资本主义经济遭遇的这一障碍。当然，最显然不过的是，工资制度命令式地要求撤销《斯品汉姆兰法》中所声明的“生存权利”：在新的经济人（economic man）制度下，如果一个人不需要做任何事就能谋生，没人会为工资而去工作。

对19世纪的大多数著作者来说，撤销《斯品汉姆兰法》的另一个特征也同样显而易见，也就是，为了也符合挣工资者自身的利益，工资制度必须普遍推广，即使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合法的生存要求。“生存权利”已经被证明是死亡陷阱。

这一似非而是的矛盾说法基本是明确可见的。据说，《斯品汉姆

兰法》意味着《济贫法》是要进行自由管理的，但是，实际上它却被变到其初始意图的反面去了。按照《伊丽莎白济贫法典》，不管能够拿到的工资有多少，穷人都得工作，只有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才资格得到救济；工资形式的救济既没被考虑过，也没被实施过。按照《斯品汉姆兰法》，一个人即便有工作，也可得到救济，只要他的工资总额低于斯品汉姆兰标准所规定的家庭收入数额。因此，没有一个劳动者有具体的兴趣去满足雇主的要求，不管他挣的工资是多少，他的收入都是一样的；只有当标准工资即实际支付的工资超过了斯品汉姆兰标准，结果才有区别，不过工资超标准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雇主几乎以任何数额的工资都能够雇得到人；不管雇主支付的工资有多少，济贫税中给予的补贴都会使工人的工资达到规定的标准。不出几年，劳动生产率就开始跌至贫困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因此，雇主更有理由不把工资提升到规定的标准之上。因为一旦劳动强度，即劳动力的管理和劳动力使用的效率，跌至一定的水平之下，它就无异于“做琐碎而无价值的事情”，或者为了面子上的原因而假装在维持工作。尽管强制性工作依然存在着，但在实际上，济贫院外救济已经变得普遍了，而且，甚至在济贫院内管理救济工作的时候，强制院内穷人所做的工作现在也几乎算不上是工作。这总合在一起导致了都铎王朝的法律被废止，原因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在于家长制统治。济贫院外的救济和工资补贴措施的实施，通过独立的津贴，补足了家庭主妇和孩子们的生活费用；从劳动者方面来说，随面包价格而升降的每项补贴意味着，随整个工业活动的兴起而正在迅速被消除的那个相同的调节原则又戏剧性的复位了。

以前从不曾有过什么措施都到如此广泛的欢迎¹。父母们不用为孩子们衣食而费心，孩子们不再依赖于衣食父母；雇主可以随意降低工资，劳动者不管忙碌还是懒散都不会挨饿；人道主义者欢呼

¹ 梅雷迪斯 (Meredith, H. O.)，《英格兰经济史大纲》，1908 年。

说该措施是一种仁慈行动，尽管它不那么公正，而自私自利者却高兴地安慰自己说，它是仁慈行为，但它至少不是慷慨行为；不管一个人是否挣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在一个用法令维持“生存权利”的制度下，甚至纳税人也没有很快地认识到那些不动产税收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最后，结果是可怕的。尽管过了一段时间当民众的自尊降到最低点之时，民众情愿领取救济而是不挣工资，但是从公共基金中获得补贴的民众工资，最终必定变得不着边际，并迫使民众依赖于来自不动产税收的补贴。渐渐地，农村人都被贫困化了；有句顺口溜说得好：“一日靠补贴，日日靠补贴”，此话确实不假。若不是补贴制度的长期效果，就不会有可能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的人性和社会的堕落程度。

斯品汉姆兰制度的插曲，向那个世纪里领先于世界的英国人民揭示了他们自己正在从事的社会冒险行动的真正性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傻瓜的伊甸园的教训；如果 1832 年《改革法案》和 1843 年的《济贫法修正案》通常被人们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之起点的话，那是因为它们结束了慈善的地主阶级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试图创建一个没有劳动力市场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努力，就那样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支配这样一个秩序的那些法则已经被人们所知晓，而且那些法则与家长式统治原则是绝对对立的。那些法则的严厉苛刻已经变得显而易见，而且那些违背它们的人已经受到了无情的报复。

在斯品汉姆兰制度下，社会被两股对立的势力所分裂；其中，一股势力来自于家长式统治，保护着劳动者免遭市场制度的威胁；另一股势力正在市场制度下组织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并因此剥夺了老百姓从前的地位，迫使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而且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劳动的市场价值。一个新的雇主阶层正被创造出来，但却没有相应的雇员阶层能够进行自我创建。一场新的巨大的圈地浪潮正在调动土地并产生出一个乡村无产阶级，而“济贫法的

错误施行”却妨碍了他们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取生计。毫不奇怪，**同时代人对那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感到惊骇，因为伴随着近乎奇迹般生产增长的，是一个老百姓近乎忍饥挨饿的状态。**到了 1834 年，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普遍的认识，而且对许多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充满情感的认识：随便什么东西都比继续施行“斯品汉姆兰制度”更可取。要么就必须消除那两股势力，就像卢德派（Luddite）成员所试图做的那样，要么就必须创建一个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由此，人类被迫走上了乌托邦实验的各种道路。

此处不是详细论述斯品汉姆兰制度经济学的地方，以后将有机会做这样的论述。从它的表面来看，“生存权利”措施应该完全终止工资劳动力。标准工资应该逐渐下降至零，由此把实际工资单完全交由教区处理，这样的话，那一补贴制度的荒谬性就会被展示得一览无遗。但这基本上只是资本主义的预备时代，其时，普通民众依然保持传统的思想，他们的行为远不是仅仅受到金钱动机的支配。绝大多数乡下人曾经都是土地占用者兼所有者，或是家庭经济业主，除了贫困状态之外，他们愿意选择任何生存方式，即便在面对令人厌恶的人为负担而无能为力时也如此，就像随后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劳动人民曾能够为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自由结社的话，补贴制度当然可能对标准工资构成相反的作用：因为对失业者的救济可能会极大地帮助工会行动，这意味着《济贫法》会得到非常自由的运用。那可能就是 1799~1800 年的那一不公正的《结社条例》出台的一个原因，否则就不太可能之做出解释，因为伯克郡的地方官员和议会成员在总体上都担心穷人的经济条件，况且在 1797 年之后政治动乱已经平息下去了。实际上，可以说，是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家长式干预，引起了《结社条例》的进一步干预。若不是《结社条例》，斯品汉姆兰制度可能具有提高工资的作用，而不是它实际上所起的压低工资的作用。斯品汉姆兰制度与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结社条例》共同导致了那一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那就是，在财政上所施行的“生存权利”措施最终却糟蹋了它公开去救助的那些人。

对后代人来说，最清楚不过的是像工资制度和“生存权利”措施之间的这种制度上的互不相容，换句话说，只要用公共基金对工资加以补贴，资本主义秩序的运作就绝无可能性。但是同时代人却未曾理解那些制度为之铺路的那一秩序。只有在老百姓的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削弱的时候，社会才意识到有必要取消穷人无条件获得救济的权利，因为老百姓丧失生产能力是阻碍机器文明进步的一场真正的民族灾祸。哪怕是当时最具专业水准的观察家，也不曾理解复杂的斯品汉姆兰制度经济学；但结论却更加令人信服，即工资补贴肯定天生具有邪恶性，因为它不可思议地损害了那些接受补贴的人。

市场制度的陷阱还不是显而易见。为了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辨别自机器问世以来，英国的劳动人民所经历过的各种沧桑巨变：首先，1795~1834年的斯品汉姆兰制度时期；其次，1834年之后的10年里，由《新济贫法》造成的艰难困苦；最后，1834年之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有害影响，直到1870年代，得到承认的工会才提供了充分的保护。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斯品汉姆兰制度排在市场经济之前；《新济贫法》的10年是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与前一时期相交迭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时期。

这三个时期彼此差异悬殊。斯品汉姆兰制度旨在防止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或者至少是为了放慢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的速度。结果却是老百姓被贫困化了，他们在那一过程中几乎失去了他们自己的人形。

1834年的《新济贫法》取消了劳动力市场的这一障碍：“生存权利”措施被废除。那一法令的技术残忍性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对公众情绪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以致于当时的激烈抗议行动模糊了后代人眼睛中的图像。确实，随着济贫院外的救济被取消，许多最贫苦的人被迫听天由命，在那些受苦最多的人当中，就有所谓“活该受穷”的人，他们的自尊心太强，所以不愿进入那些已经变成了耻辱之象征的救济院。或许在全部现代历史上，还未曾实施过比它更加冷酷无情的社会改革行动；就是在把以救济院的考验作为

真正贫困的检验标准的同时，它压垮了众多的生命。温和的慈善家们冷静地提倡并平稳地施行了心理拷问，以此作为给劳动力工厂的轮子加油的手段。不过，大量的冤苦却真正归咎于旧的制度被突然废止和一个激进的变革陡然生效。迪斯雷里*公开指责人们生活中的这一“不可思议的革命”。然而，如果只考虑金钱收入的话，人们的条件则会很快就被认为得到了改善。

第三阶段的问题则要深奥得多。与所有现代制度中最有能量的劳动力市场的广泛效应相比，1834年之后那十年中官僚政治通过中央集权控制的《新济贫法》机构对穷人犯下的暴行仅仅属于零星事件，而且根本不算什么事情。它造成的威胁在规模上与斯品汉姆兰制度的相似，而两者间的重要差异在于，不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缺乏而是其存在才是眼前的危险之源。如果斯品汉姆兰制度曾经阻止了一个劳动阶层的出现，那么现在的劳动人民就正在一个冷酷无情的机制压力下形成这样一个阶层。如果在斯品汉姆兰制度之下，穷人曾经被当作一点都不宝贵的畜牲那样来对待，那么现在，面对所有不利条件，他们只会被指望自己照应自己了。如果斯品汉姆兰制度意谓可怜兮兮的堕落，那么现在，劳动人民就是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斯品汉姆兰制度滥用了邻里、家庭和乡村周边的价值观念，那么现在，人就与家和亲情一分为二，人就离开了他的根和全部有意义的环境。简言之，如果斯品汉姆兰制度意谓死守原地，那么现在的危险就是拼死往外跑。

直到1834年英格兰才建立起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在那一年之前，还不能说就已经存在了作为一个社会体系的工业资本主义。不过，几乎紧随其后，社会的自我保护行动就开始了：工厂法和社会立法，以及一个政治和产业工人阶级运动，蓦然出现了。正是在阻拦市场机制的全新危险的这一努力之中，保护性行动与市场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发生了致命性的冲突。毫不夸张地说，在1834

* 迪斯雷利（Disraeli）：1804~1888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和小说家。——译者注。

年的《新济贫法》为正常的市场体系打开通道之后，这一市场体系的逻辑就决定了 19 世纪的社会史。这一动态进程的起点就是《斯品汉姆兰法》。

如果我们说研究斯品汉姆兰制度就是研究 19 世纪文明的诞生，那么，我们唯独记住的不是其经济和社会结果，甚至不是这些结果对现代政治史的决定性影响，而是同时代人大体上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社会意识被铸入了其模子之中。几乎已被遗忘的从前的赤贫人口数字，曾经是人们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这场讨论的影响力可以同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的影响力相媲美。如果法国大革命可以归功于伏尔泰、狄德罗、魁奈和卢梭的思想，那么，对《济贫法》的讨论则形成了边沁*、伯克*、戈德温、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罗伯特·欧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达尔文和斯潘塞的思想，他们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了 19 世纪文明的精神源头的滋养。正是在斯品汉姆兰制度和《新济贫法》之后的数 10 年间，人类的思维带着一种新的忧虑之痛楚转向了其自身的社会：伯克郡的法官们徒劳地试图阻止的并被《新济贫法》所释放的那场革命，把人们的视野转到了他们自身的集体存在上去了，就好像他们从前曾经忽视了集体的存在。一个世界被揭开了，人们不曾怀疑过它的存在，也不曾怀疑过它的支配一个复杂社会的规律。尽管这一新的独特意义上的社会的出现碰巧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涵义却是普遍适应的。

进入我们意识中的新生的现实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它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和同样令人惊叹的矛盾性必须适合哲学和神学的体

*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年，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译者注。

* 埃得蒙·伯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年，英国政治家——译者注。

*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年，英国经济学家、近代人口问题研究的先驱——译者注。

* 罗伯特·欧文 (Robert Owen): 1771~1858 年，19 世纪初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系，以便被同化进人类的意义之中。似乎剥夺了我们自由的顽固事实和冷酷无情的法则，必须以某种方式向自由做出让步。这是秘密支撑实证论者和功利论者的那些形而上学势力的主要动力。对那些未被探索过的人类的各种可能性领域，人们既有无限的希望也有无边的失望，这是人们在思想上对这些可怕的局限性的矛盾反应。希望，即完美性幻想，是从人口和工资法则的梦魇中精炼出来的，并体现在一个如此鼓舞人心的进步理念之中，以致于它似乎证明即将来临的巨大而令人痛苦的社会转型是正当的。失望将要被证明是社会转型的一个更为强大的代理人。

人类被迫使自己屈从于世俗的毁灭：人类要么停止自身种族的繁衍，要么通过战争和瘟疫、饥饿和罪恶存心地判处自己死刑。贫困是社会的自然残存；正当我们突然有希望让财富无限增加之际，食物的有限性和人口的无限性却成了问题，这使得讽刺意味更加浓重。

这就是社会发现与人类精神世界相结合的结果；但是，这一新的现实和社会如何以生活的术语加以解释？作为行为指南，**和谐与冲突的道德准则被歪曲到了极点，并被逼进了一个几乎是完全矛盾的模式。**据说，**和谐是经济所固有的特征，个人与社会的利益最终是一致的，但这种和谐自我调节要求个人尊重经济规律，即便经济规律碰巧毁灭了个人。冲突似乎也是经济所固有的特征，不管冲突的形式是个人的竞争还是阶级斗争，但这种冲突也可能最终只会变成当前或未来社会所固有的高度和谐的媒介。**

贫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现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贫困把人们的目光固定在一个无法理解的事实上，即贫困与富裕似乎是结伴而行的。但这只是工业社会带给现代人的诸多令人困惑的悖论中的第一个。人类已经通过经济学之门进入其新的住所，而这一意外的环境给那个时代套上了其唯物主义的光环。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来说，没什么东西看上去比有形之物更真实。市场规律对他们而言就意味着人类可能性的界限。戈德温（Godwin）信仰无限的可能性，

因此就不得不否认市场规律。不是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自身的规律决定了人类可能性的有限性，这一认识是为欧文而保留的，他独自察觉到了市场经济的面纱背后那突然浮现的现实：社会。然而，他的先见之明又被丢失了一个世纪之久。

同时，正是在联系到贫困问题时，人们才开始探询复杂社会中的生命意义。政治经济学从两个对立的角度进入全人类的视野，一个角度是进步和完美性，另一角度是决定论和毁灭；将其付诸实施，也是以两个对立的方式进行的，一是和谐与自我调节的原则，另一是竞争与冲突的原则。在这些矛盾之中，预先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和阶级概念。随着一个重大事件的定局，一组全新的观念进入了我们的意识。

第八章 前因与后果

斯品汉姆兰制度起初只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过，极少有什么东西，比这一在新时代能够开始之际不得被抛弃的制度，对整个文明的形成起过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它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典型产物，而且值得当今任何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给予关注。

在重商主义制度下，英格兰的劳动力组织是建立在《济贫法》和《技工法》基础之上的。无可否认，与 1536~1601 年间的诸多法律相适应的《济贫法》，是一个误称；实际上，这些法律与后来的修订部分，形成了英格兰劳动力法规的半数之多；另一半是由 1563 年的《技工法》所组成的。后者是针对被雇用者的；《济贫法》是针对我们可以称之为没被雇用和不可能被雇用的人的（老人和孩子除外）。后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措施中又补充了 1662 年关于人民合法住所的《居住权法》，它对人民的定居做了极其严格的限制。（当然，被雇用、未被雇用和不可能被雇用之间的严格区分，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说法，因为它意谓一个现代工资制度，而现代工资制度是在那之后大约 250 年才问世的；我们使用这些术语，不过是为了简单地完成这一非常广泛的阐述。）

根据《技工法》，劳动力组织是以三个法律支柱为基础的：强制劳动，七年学徒期，政府官员每年对工资进行一次评定。应该强调指出，该法对农业劳动者和手艺人同样适用，并在乡村和城镇一同执行。该法被严格执行了 80 年；后来，关于学徒期的条款部分被废止，并被严格限制在传统手艺方面；对像棉纺这样的新产业，它们确实不适用；在 1660 年王政复辟之后，按照生活费用所做的每年一度的工资评定，也在全国很多地方中止了。从正式的角度来看，该法的工资评定条款是在 1813 年才被废止，其工资条款是在 1814 年被废止的。然而，在许多方面，学徒规则比该法本身存在的时间更长，并曾经依然是英格兰手艺行当的通例。强制劳动的做法在乡

村渐渐停止了。但我们依然可以说，在我们所讨论的那两个半世纪中，《技工法》在规章和家长式统治原则的基础上为全国的劳动力组织奠定了基础。

因此，《技工法》得到了《济贫法》的补足。这是令现代人困惑的一个词语，在他们听来，“poor”和“pauper”似乎差不多的。实际上，在英国绅士看来，所有那些他们的工资不足以让他们过安逸日子的人都属于穷人（即 poor）。所以，“poor”实际上是“普通人”的同义词，而普通人则是由那些没有不动产的阶级所组成的（几乎任何成功的商人都会不买地产）。因此，“poor”这个词是指所有贫穷的人和所有那些一旦变穷的人。当然，这包括贫民（即 pauper：赤贫或一贫如洗的人），但不仅仅是指他们。对于一个自称在自己的界限之内总会有每个基督徒容身之地的社会，年老体弱的人和孤儿肯定必须得到照料。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体格健全的人，我们可以称他们是没得到雇用的人，可以设想，一旦他们能够找到活干，他们可以通过体力劳动谋生。乞讨是严重受罚的；流浪一旦重犯就属砍头之罪。1601年《济贫法》规定，对有能力干活的人，教区应该给他们活干，以便让他们挣口饭吃；救济的负担完全由教区承担，教区被授权通过地方税或者不动产税筹措必要的救济金。这些税金是根据所有房主和房客的土地租金或所住的房子进行征收的，不管他们的穷富状况如何。

《技工法》和《济贫法》共同构成了可以称之为“劳动力法规”的制度。然而，《济贫法》是由地方管理的。作为一个很小的管理单位，每个教区都有其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规定：如何安置有劳动能力的人去工作；如何维持济贫院；如何安排孤儿和贫穷的孩子当学徒；如何照顾老弱病残者；如何埋葬无家可归者。每个教区也都有其自己的税收标准。所有这一切听起来似乎比其往常的实情要来得更加庄严；许多教区曾经根本没有济贫院；有更多的教区对如何利用有劳动能力的人根本就不曾有过合理的规定；当地纳税人的拖沓偷懒，穷人监管者的漠不关心，利益集团在贫困问题上的铁石心肠，都以

多种多样的方式危害法律的运行。但是，全国大约 16000 个济贫机构，依然基本上成功地维持了农村生活的社会组织的完整和安然无恙。

不过，在国家劳动力制度下，失业人员和救济穷人的地方组织是个明显的异常之物。有利于穷人的地方规定，越是花样繁多，专门行乞的人一窝蜂般地跑到管理良好的教区的危险就越大。在王政复辟之后，为了保护“较好的”教区免遭贫民大量涌入之苦，《定居与迁移法》被通过。一个多世纪之后，亚当·斯密猛烈抨击这一法律，说它令人民无法动弹，因此阻碍了人民找到有用的工作，还因为它使得资本家无法找到雇员。只有当地方官员和教区机构有善良的意愿之时，一个人才能在他本教区之外的任何地方待下去，否则，即使他有很好的地位和工作，在所到之处他都很可能受到驱逐。因此，人民的合法地位，在性质上属于那种受到苛刻限制的自由和平等。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他们的人身是自由的。但是，他们没有为自己或为他们的孩子选择职业的自由；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居住地的自由；他们是被迫劳动的。两部伟大的《伊丽莎白法令》和《居住权法》一起构成了平民的自由宪章，同时也构成了束缚他们手脚的封条。

1795 年，在产业需要的压力之下，当 1662 年的那一法令被部分废除、教区农奴制被废止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定居自由权得到恢复之时，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现在，国家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建立起来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就在那同一年，济贫法的管理方法被引了进来，这意味着强制劳动的伊丽莎白原则被颠倒过来。斯品汉姆兰制度保证了“生存权利”；普遍实行工资补贴制度；家庭补贴是外加的；所有这一切补贴都将以济贫院外救济形式发放，也就是，无需让接受救济的人为济贫院干活。尽管救济的标准是极低的，但却足以维持基本的生计。正当蒸气机在呼唤自由、机器在迫切需要人手之时，这看起来似乎是管制主义和家长式统治的猛烈回潮。但是，《斯品汉姆兰法》的出台与《居住权法》的撤销，在时间

上是同时发生的。此处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居住权法》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国家提供为工资而工作的劳动者，而《斯品汉姆兰法》则声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担心挨饿，不管他挣的钱是多么少，教区都会赡养他和他的家庭。这两项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着赤裸裸的矛盾；同时继续推行这两项政策，除了一场社会暴行，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别的结果呢？

但是，斯品汉姆兰制度时期的那一代人不曾意识到它的前方正在酝酿什么。在历史上那场最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前夜，人们不曾见到过任何关于它即将来临的迹象和征兆。资本主义悄然而至。没人曾预言过发展的结果是机器生产；它的到来完全是一场意外。在一段时间内，当保护政策之坝发生破裂、旧的世界被朝向全球经济的那股一往无前的洪流席卷而去之时，人们预计英格兰实际上会永远地退出外贸领域。

然而，在 1850 年代之前，还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这样的话。理解斯品汉姆兰地方官员之建议的关键在于，这些官员忽视了他们自己所面对的发展结果的更广泛的含意。回头去看，似乎可以认为，他们好像不仅在尝试不可能之事，而且好像是以其内部矛盾在当时就应该显而易见的手段来这样为之。实际上，他们成功地保护了他们的乡村免遭混乱之苦，然而，在其它未曾预料到的方向上，他们的政策后果却具有更大的灾难性。斯品汉姆兰政策是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的结果，人们应该从依照当时的情况而制定政策的人的角度去理解它。从这个角度来看，补贴制度将表现为地主阶级在面对再也无法反对劳动力的实际迁移时而设计的一个手段，同时地主阶级又希望解决包括提高工资在内的地方条件问题，因为接受一个自由的国家劳动力市场就必然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因此，斯品汉姆兰政策的动力是根植于其渊源的环境之中的。农村贫困状况的出现是即将来临的那场剧变的第一征兆。不过，当时似乎没人这样想。农村的贫困与世界贸易的冲击之间的联系，绝不是显而易见。那个时代的人完全没有理由把农村穷人的数量与七

大洋上的商业发展联系在一块。穷人数量的无法解释的增加，通常几乎都归因于《济贫法》的管理，而且并不是没有某种好的理由这样说。实际上，在表面之下，农村贫困的不吉利的增加，是与经济通史的趋势直接相关的。不过，这一联系依然几乎难以觉察。有数十位著作者曾经探究过穷人流入乡村的渠道，而引证为这些渠道出现的原因的数目和种类多得令人吃惊。不过，只有很少一些著作者指出了那些我们通常将之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混乱的征兆。直到 1785 年，除了断断续续的贸易增长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之外，英国民众还没有意识到经济生活中的任何重大变化。

穷人来自何方？这是随着世纪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增加其厚度的那几本小册子里所提出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只要贫困的最明显的邪恶之处得到充分的缓解，贫困就会完全停止存在；如果一本著作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那就几乎不可能指望它把贫困的原因与战胜贫困的手段相分离。人们在一个问题上几乎具有普遍的意见一致性，那就是，引起贫困实际增加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原因包括：谷物短缺；农业工资太高，引起食品价格高昂；农业工资太低；城镇工资太高；城镇就业不正常；自耕农的消失；城镇工人不会干农活；农场主不愿支付较高的工资；地主担心，如果支付较高工资，租金就会减少；济贫院工厂竞争不过机器；家庭经济的缺乏；居住环境不宽余；饮食习惯太固定；吸毒成瘾。有些著作者责怪新品种大绵羊；也有人责备说，应该以牛代马；甚至还有些人敦促少养一些狗。有些著作者认为，穷人应该少吃或不吃面包，别的人则认为“即使穷人以最好的面包为主食，也不应该怪罪穷人。”有人认为，是茶损害了许多穷人的健康；而“家酿的啤酒”可以恢复健康；最坚信这一点的人强调说，茶几乎与最便宜的酒差不多。40 年之后，马蒂诺（Martineau）依然相信，宣传戒除饮茶习惯，有利于减轻贫困¹。诚然，有许多著作者抱怨圈地运动造成的混乱后果；

¹ 马蒂诺（Martineau, H.），《小村庄》，1833 年。

另有许多人坚决主张，是工厂主的潮起潮落损害了农村的就业。不过，在总体上，流行的是这样一种印象：贫困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现象，是一种社会疾病，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只是由于《济贫法》没有能够运用正确的补救方法，大多数这些原因才变得活跃起来。

正确的答案几乎肯定是：由于我们今天所称的那种隐性失业（invisible unemployment）的增加，才导致了当时贫困状况的加重和不动产税的提高。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时候甚至就业通常也是隐性的，这是家庭手工业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不过，以下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如何解释失业和半失业人数的增加？为什么连同时代那些善于观察的人士也没有注意到产业领域中正在逼进的那些变化迹象呢？

主要原因在于，早期贸易的过度变化起伏，易于掩盖贸易量的绝对增加。尽管后者促进了就业率的上升，但是，贸易的变化起伏却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幅度更加大得多。不过，虽然总体就业水平上升缓慢，但失业和半失业人数的增加却趋于加快。因此，组建恩格斯所说的产业后备军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创建产业正规军的意义。

这具有重要的逻辑意义，那就是，失业率与贸易总量上升的关系可能易于被忽视。虽然有人常说，失业的上升归咎于贸易量的巨大波动起伏，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波动起伏形成了一个变化幅度更大的潜在进程的一部分，它就是商业的总体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加工制造业。对同时代的人而言，以城镇为主的加工厂与乡村贫困人口的大量增加，似乎没有什么联系。

贸易总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就业人口总数的增加，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地域分割与贸易量的剧烈波动组合在一起，导致了城乡职业的严重混乱，由此进一步导致失业人口的增加。远处的高工资的谣传，使得本地穷人对农业领域能够支付得起的工资感到不满，它造成穷人对报酬很低的农业劳动的厌恶。那个时代的工业区就像一个

新的国家，像另一个美国那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外来移民。移民往往伴随着大量的再移民。人们向农村回流是必定发生的事情，这似乎也支持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不曾记录过农村人口的绝对减少。因此，由于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期被吸引进入商业和加工业领域，过后再返回他们在农村的原来居住地，所以，人口的累积不稳定状况一直保持不变。

英格兰乡村所遭受的大部分破坏，首先都归咎于贸易对农村本身所造成的破坏作用。农业革命肯定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与农耕方法新的巨大进步相伴随的普遍的圈地运动和地产合并运动，都具有强大的导致混乱的作用。撤除农民的房舍、并吞菜园和庭园、没收老百姓的权利等行动，共同剥夺了家庭手工业的两大支柱：家庭收入和农业背景。只要手工业生产有菜园子、一小块土地或放牧权利这样的便利条件的补充，劳动者对金钱收入的依赖性就不是绝对的；老百姓家里的一块土豆田、几台除草机、一头母牛或甚至一头毛驴，都会令境况完全不同；家庭收入担当的是一种失业保险的角色。农业合理化措施不可避免地要把劳动者赶出他们的家园，并危害到他们的社会安全。

在都市生活中，波动性就业的新的灾祸的影响当然是清晰可见的。工业通常被视为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写道“今天完全有工作做的工人，明天可能会在街上讨饭吃……”，他还写道：“当一个在工厂工作的镇民被剥夺了工作，镇民就好似一下子陷入瘫痪，并立即变成了教区的负担；但这一恶作剧并未随那一代人而逝去……”。因为同时，劳动分工在发泄仇恨：失去工作的工匠徒然回到他的村庄，因为“织布工的手没办法派上别的用处”。都市化的这种致命的不可逆性是以亚当·斯密所预见到的一个简单事实为基础的，当时他曾把工人描述为在智力上连最穷的农夫都不如，因为后者通常能够让自己适应于任何工作。尽管如此，直到亚当·斯密出版其《国富论》的时候，贫困人口还没有剧烈地增加。

在随后的 20 年里，景象发生了突变。在其于 1795 年呈交给皮特（Pitt, William, the younger）的那份《关于供应不足的想法和详情》报告中，伯克承认，尽管总体上取得了进步，但“最后 20 年恶性循环”依然存在。实际上，紧随“七年战争”（1763 年）之后的那 10 年里，失业人口有明显增加，济贫院外的救济工作量的上升就显示了这一点。据说，它碰巧是贸易繁荣第一次与穷人的灾难不断增长的迹象相伴随。对西方人的下一代来说，这一明显的矛盾注定要变成社会生活中所有周期性循环现象中最令人费解的。人口泛滥的幽灵开始困扰人们的思想。威廉·汤森（Townsend, William）在其《论济贫法》的论文中警告说：“撇开推测，事实是，在英格兰，我们的人口多于我们能够供养的数目，而且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我们有更加多得更多的人无法有利可图地加以雇用。”1776 年亚当·斯密就曾经在思考悄然进步的倾向问题。在其论文写完后的 10 年，汤森就已经意识到了一场风潮的来临。

不过，只有在许多事情发生之后（仅过了 5 年时间），一个被赶出政治领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实际上像苏格兰造桥专家特尔福德（Telford, Thomas）那样的人，才能够苦苦地发出抱怨说，别指望政府的常规方针会有什么变化，革命才是唯一的希望。特尔福德邮寄到自己家乡的一本佩因（Paine, R. T.）的《人权》，就在那里引发了一场暴动。巴黎正在催化欧洲的人心骚动。

在坎宁^{*}看来，是《济贫法》解救英国未受革命之苦。他主要是考虑到 1790 年代的事情和法国战争。新的圈地运动的爆发进一步压低了农村穷人的生活标准。作为这些圈地运动的辩护者，克拉彭（Clapham, J.H.）承认说，“引人注目的是，以最具系统性的方式动用不动产税收增加工资的地区，正好就是近来圈地最多的地区。”换句话说，若不是工资补贴，在英格兰广大的农村地区，穷人可能已经跌到饥饿水平线之下去了。到处都在烧干草堆。玩具枪阴谋获

^{*} 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 年，英国政治家，1827 年一度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得了广泛的证实。经常出现暴动；关于暴动的谣传则更加多得去了。在不止汉普郡一个地方，法院威胁要严禁“在市场或马路上强行压低商品价格”的任何企图；不过，与此同时，汉普郡的地方官员也迫切要求对工资给予普遍的补贴。显然，采取预防性行动的时机已到。

但是，在所有行动路线中，为什么会选择那个后来看起来是最不切实际的一条路线？让我们考虑一下当时的情况和所涉及到的各种利害关系。地主阶级和教区牧师统治着农村。汤森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概括：乡绅们与制造业保持着“进退有余的距离”，因为他们认为制造业不稳定；他们从制造业中获得的利益，将抵不上这种利益给他们的财产带来的重负……”这种负担主要由制造业的两个看似矛盾的结果所组成，即贫困人口的增加和工资的上涨。不过，只有在假定存在一个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那两个结果才是矛盾的，因为这样的市场自然倾向于通过减少雇员的工资来减少就业人口。在缺乏这样的市场而《居住权法》却依然有效的情况下，贫困人口数目和工资可能会同时上升。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失业的“社会成本”就主要由失业的人会经常回去的家乡村庄承担。城镇的高工资，对农村经济而言，则是一个更大的负担。农业工资，尽管低于劳动者能够赖以维持生计的水平，却又高于农场主能够承受的标准。似乎显而易见，农业无法同城镇工资竞争。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居住权法》应该被废除，或至少应该被放松，以便有助于劳动者找到工作和雇主找到劳动力。大家觉得，这会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顺带也会减小实际的工资负担。不过，由于允许工资“找到自身的价位”，城乡工资差异这一直接的问题，则显然会给农村带来更大的压力。产业劳动者在城乡之间的来回流动与一阵一阵的失业潮流相互交替，可能会给农村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人们不得不建设一座防护大坝来保护农村免遭不断上涨的工资洪水的侵害。为了保护农村社会不陷入混乱，为了加强传统的权威，为了防止农村劳动力流失，为了在不过分增加农场主负担的情况下提

高农业工资，人们需要找到办法。《斯品汉姆兰法》（即斯品汉姆兰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办法。它一头扎进工业革命的汹涌洪流之中，必定要产生一个经济旋涡。然而，在处于统治地位的农村利益集团即乡绅阶层看来，它的社会含意正好符合当时的形势。

从《济贫法》管理的角度来看，斯品汉姆兰制度是一个可悲的倒退措施。250年时间的经验显示，教区是一个太小的管理单位，以致于完全没能力管理《济贫法》，因为教区绝无能力找到一个既能够辨别有体格健全的失业者又能够辨别老弱病残者和儿童的适当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就好似今天的一个镇区单枪匹马地试图处理失业保险问题，或者好似这样的保险问题被与照顾老年人的问题混合在了一起。因此，只有在那种很短的时期内，当《济贫法》的管理既具有国家性质又能够区别对待的时候，它才能够或多或少地让人满意。塞西尔（Cecil, William）和劳德（Laud, William）当政时的1590~1640年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其时，国王通过治安法官管理《济贫法》，并发起了建立济贫院和实行强制劳动的艰巨计划。但1642~1660年的英吉利共和国（Commonwealth）再次摧毁了现在被斥之为国王私人统治的那一政权，王政复辟以具有充分讽刺性的方式完成了英吉利共和国的工作。1662年的《居住权法》把《济贫法》限制在教区的基础上，而在18世纪第三个十年来到之前，立法方面对贫困的关注是很不够的。最后在1722年，区分贫困的工作开始了；教区联盟将要建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以有别于本地的济贫院（poorhouse）；偶尔也允许实施济贫院外的救济活动，因为现时的济贫院可能是对贫困的一种考验。1782年，依照《吉尔伯特法》（Gilbert's Act），通过鼓励设立教区联盟，采取长远策略扩大《济贫法》管理单位；当时，政府敦促教区在附近地区为那些体格健全者寻找工作。院外救济以及甚至工资补贴措施都将会对这种政策提供补充，以便减少对体格健全者的救济额度。尽管建立教区联盟是许可而非强制性的，但它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步，即采取较大的救济管理单位和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被救济穷人。尽管救济制

度有诸多缺陷，但是《吉尔伯特法》代表着正确方向上的一个努力，只要济贫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措施仅仅是积极的社会立法的辅助手段，它们就不会必然对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造成致命危害。斯品汉姆兰制度，使改革陷于终止。由于它普遍推行济贫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措施，所以（就像有人错误断言的那样），它没有彻底遵循《吉尔伯特法》的路线，而是彻底逆转了《吉尔伯特法》的走向并实际摧毁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典》的整个体系。费精劳神地区分贫民习艺所与济贫院的行动，就这样变得毫无意义了；各种类型的贫民和体格健全的失业者，现在倾向于融合为一个乱哄哄的具有依赖性的贫困群体。一个与区分不同贫困人群的做法相反的过程开始了：贫民习艺所并入了济贫院，而济贫院本身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消失；教区再一次被变成了这一制度退化的真正杰作的唯一和最后的单位。

如果这样一件事情是完全可能的话，那么，乡绅和教区牧师的崇高地位还能得到提升。穷人的督导者们所抱怨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权力善行”，至多就是扮演了“托里的社会主义”的角色。依照托里的社会主义，地方治安官员行使仁慈的权力，而税收的重负则由农村中产阶级承担。庞大的自耕农阶层（yeomanry）在农业革命的潮起潮落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农村有权势阶层看来，余下的中农阶层（有部分田地和房产者），倾向于同佃农和雇农阶层合并形成一个社会阶层。农村有权势阶层并没有详细区分穷人和偶然受穷的人；因为居高临下，农村有权势阶层只看到农村艰苦挣扎的生活，却似乎看不到普通穷人与赤贫的严格分界线，而且可能并不过分吃惊地获悉，在一个不好的年头，一个小农场主由于收成太差而将要“吃救济”。这种事例肯定不会常见，但它们的可能性却突显了这样的事实，即许多纳税人自己也是穷人。总体而言，那时的纳税人和贫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我们时代的处在各种保险计划之下的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关系，这些保险计划让就业者承担暂时供养失业者的义务。尽管如此，典型的纳税人通常是没有资格享受贫困救济的，而典型的农业劳动者却无需纳税。从政治上讲，斯品汉姆

兰制度加强了乡绅阶层在穷人中的影响力，但却削弱了他们对农村中产阶级中的吸引力。

斯品汉姆兰制度的最怪诞之处是其经济学方面。“谁为斯品汉姆兰制度掏腰包？”是一个实际上无法回答的问题。说得直接一点，主要负担当然由纳税人承担。但是，农场主因为支付给他们所雇用的劳动者的工资很低而得到了部分补偿，这是斯品汉姆兰制度的一个直接结果。另外，如果农场主愿意雇用一名否则就要依靠救济的村民，他就因此而经常被减免部分税款。由此导致的农场主的厨房和院子里的多余人手（其中还有些干活不买力的），就必须应该归在借方一边。这些人的劳动应该更加便宜，他们实际上是在吃救济。他们必须经常换地方打“短工”，所得的报酬就是一顿饭，或者被推荐到村“劳动力市场”等着干一天只有几个便士的活。这种断断续续的劳动到底价值几何，则是另一个问题。最后，穷人偶尔会得到一些租金补贴，而村舍的房主却通过高价出租那些脏兮兮的住房而赚钱；村庄的管理机关很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那些简陋的房舍的税金继续缴纳上来就行。显而易见，这种利害关系的纠缠不清，可能会损害任何的财务责任感，并鼓励各种各样卑劣的腐败行为。

虽然如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斯品汉姆兰制度付出了代价。它是从工资补贴开始的，表面上雇员是受益者，但实际上是使用公共财产对雇主实施补贴。因为补贴制度的主要结果，是把工资压低到了维持生计的水平之下。在那些完全贫困化的地区，农场主根本就不想雇用那些依然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劳动者，“因为所有拥有地产的人都没资格获得教区救济，而标准工资又是如此之低，以致于没有某种救济，一个已婚男子根本没法养家。”因此，在某些地区，只有那些吃救济的人才有机会找到工作做；那些试图不要救济而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计的人，则几乎无法保证有一份工作可做。但是，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后面这种人占了绝大多数，雇主阶层因为得益于低工资而从他们身上获取了额外的利润，同时却无需用税

金对此做出补偿。最后，像这种非经济性质的制度，必定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压低标准工资水平，最终甚至压低地方官员为了穷人的利益而设定的“标准”。到了1820年代，面包标准在许多郡县都在被不断削减，而穷人的可怜收入降低得更加厉害。在全国各地具有相当均等性的斯品汉姆兰制度标准，在1815~1830年的十多年间，下降了几近三分之一（实际上这一降低也具有普遍性）。克拉彭（Clapham）怀疑，不动产税的总负担是否会像那些非常陡然而发的抱怨使人们相信的那样严重。是也。因为尽管不动产税额的上漲是引人注目的，而且在有些地方肯定被认为是一个灾难，但似乎最有可能的是，与其说是税额上漲本身，不如说是工资补贴对劳动生产率的经济影响，才是麻烦的根源所在。受冲击最严重的英格兰南部地区，支付的贫民救济税还不到其收入的3.3%，克拉彭认为这是非常可以承受的税额，因为这笔税款中的大部分“应该是以工资形式支付给穷人的”。实际上，在1830年代，总的不动产税收一直在稳定下降，而从不断增长的国民财富来看，它们的相对负担肯定下降得更快。1818年实际用于救济穷人的费用总额大约是八百万英镑；这一费用总额一直在持续下降，直到1826年跌至六百万英镑水平之下，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却在快速增加。尽管如此，对斯品汉姆兰制度的批评却越来越激烈，原因似乎在于，大众的非人性化倾向，开始导致国家生活的瘫痪，特别是开始限制产业本身的能量。

斯品汉姆兰制度加快了一场社会大灾难的速度。我们已经变得习惯于把早期资本主义的可怕表现轻视为“伤感的材料”。对此，不存在任何正当理由。由《新济贫法》的非常热心的传道者哈丽雅特·马蒂诺（Martineau, Harriet）所描绘的画面，与带头极力反对《新济贫法》的宪章派宣传员所描绘的画面，恰巧相同。1834年主张立即废除《斯品汉姆兰法》的《济贫法》委员会的著名报告中摆出的事实，可能已经充当了狄更斯反对该委员会政策的运动的材料。查尔斯·金斯利、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布莱克和卡莱尔相信人类的形象曾经被某种可怕的灾祸败坏了，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错。比诗人

和慈善家们所发出的痛苦而又愤怒的声音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漠视他们的世俗毁灭哲学诞生于其中的那些场面时所带的那种冰一般的静默。

毋庸置疑，由机器和人类现在必定要为机器服务的环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曾经具有许多无法避免的结果。稍后的欧洲大陆工业城镇成长于其中的都市环境中，就缺乏英格兰的乡村文明形态²。在新的城镇里，不存在固定的城市中产阶级，也不存在工匠和手艺人这样的核心，他们这样的人群是由受人尊敬的小资产阶级和城里人所组成的，可以充当同化原始劳动者的媒介。原始劳动者，因为受到高工资的吸引，或者被诡计多端的圈地者赶出了农村，所以来到了早期的工厂里干苦活。中部地区和西北部的工业城镇，是一个文化荒地；其贫民窟就反映了它缺乏传统和市民的自尊。移居来的农民，或者甚至是从前的自耕农或官册规定的拥有土地者，在跌入这种荒凉的悲惨境地之后，很快就被转变为泥沼之中一种难以形容的动物。尽管报酬太低或劳动时间太长的情况经常发生，但并不是报酬太低或劳动时间太长，而是原始劳动者现在所处的物质环境，使人失去了生命的人形。发现他们自己被关在笼子里、关在奴隶贩子的船舱里渴望空气的非洲森林中的黑人，可能与这些原始劳动者有同样的感受。虽然如此，所有这一切并不是无法挽回的。只要一个人有一种立场可以坚持，即有一种由他的家族或同道所确立的榜样，他就可能为之而战斗，并重新召回自己的灵魂。但是，就一名原始劳动者而言，这种情况的出现只可能有一个途径：把他自己打造为一个新阶级的成员。除非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谋生，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贫民。人为地把他还原到这样的环境，是斯品汉姆兰制度所最为痛恨的事情。这一含糊不清的人道主义行动，阻碍了劳动者把他们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经济阶层，并因此剥夺了他们避开自己注定要在经济工厂做苦力的命运的唯一途径。

² 艾希尔（Usher）教授认为，普遍都市化的起始年份是 1795 年。

斯品汉姆兰制度是使大众走向道德沦丧的可靠工具。如果一个社会是一部自动机器，能够维持自身赖以建立于其上的标准，那么，斯品汉姆兰制度就是一个机器人，能够摧毁任何种类的社会赖以建立于其上的标准。它不仅对逃避工作和假装不能工作的行为给予奖赏，而且恰好在一个个人尽力逃避一贫如洗的命运的节骨眼上增加了贫困对他的吸引力。一旦一个人进了济贫院（如果他和他的家庭已经吃救济有一段时间了，他通常会在那儿落脚），他就陷进去了，而且极少有可能离开那里。在济贫院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里，数世纪的安定生活所形成的体面和自尊很快就消耗殆尽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需要注意不要被认为比其邻居过得好，以免被赶出去到处找工作，而不是在熟悉的同伴中“做没有多少价值的事情”。“贫民救济金已经变成了公共猎物……为了取得他们自己的份额，凶残的人对税金管理者进行威胁，懒惰的人抱着双臂一直等到拿到救济金为止；无知的男女靠救济金结婚；窃贼、小偷和妓女以恐吓的手段进行勒索；地方治安官为了讨民众欢心而慷慨发放救济金，济贫委员会官员为了便利而慷慨发放救济金。公共基金就是这样花掉的……”“农场主不是花钱雇用正常数目的劳动力来耕种他自己的田地，而是被迫雇用两倍于正常数目的劳动力，他们的工资部分是从不动产税中支付的；因为农场主是被迫雇用这些人的，所以农场主控制不了他们：他们自己可以选择干活或者不干活，使得农场主的耕种质量遭到损害，而且农场主还被弄得没法雇用较好的人来独自把活干好。这些较好的人跟着那些最坏的人一起沉沦下去；纳税的农户，在经过一阵徒劳的挣扎之后，硬着头皮跑到税务所去寻求救济……”，哈里特·马蒂诺如是说³。羞怯的后代自由主义者们，忘恩负义地忘却了他们自己的信条的这位直言不讳的传道者。不过，甚至就是他们现在所害怕的她的这些夸张的说法，也说对了应该强调的地方。她本人就属于挣扎的中产阶级之列，这一阶层的优雅的

³ 马蒂诺 (Martineau, H.), 《1816~1846 年的 30 年和平时期的英国史》，1849 年。

贫困状况使得他们对《济贫法》的道德复杂性只会更加敏感。她理解并清楚地表达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劳动者”阶层的社会需要。他们是她梦中的英雄，而且，她让他们中间的一位长期失业但却拒绝依靠救济的劳动者骄傲地对另一名决定去吃救济的劳动者说：“我站立在这里，向任何鄙视我的人挑战。我可以把我的孩子们送去教堂过道的中间，看看谁敢嘲弄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可能有些人比较聪明；可能有些人比较富有；但人的尊严不分高下。”统治阶层的大人物们依然远远没有理解这一新阶层的需要。马蒂诺小姐指责“贵族统治的庸俗过失，指责贵族统治假想在那个富有的阶层之下只存在一个社会阶层，劳动者们自己的事务迫使他们与富有的统治阶层打交道。”她悲叹道，埃尔登伯爵（Eldon, J.S.）与其他人一样，肯定更加了解“最富有的银行家们之下的处于同一档次（即社会下层）的每一种人：工厂主，贸易商，手艺人，劳动者和贫民……”⁴但是，她坚持认为，社会的未来取决于区分最后两种人，即劳动者和贫民。她写道：“不计那些完全独立的和完全依赖他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英国，决不存在比劳动者和贫民之间的更大的社会差异；把劳动者和贫民混淆在一起，是同样无知、不道德和不明智的。”当然，这几乎不是在陈述事实，因为在斯品汉姆兰制度下，这两个阶层之间已经不存在差异了。更准确地说，它是在陈述以预言性的期望为基础的政策。此政策就是《新济贫法》专员们的政策；预言的对象，就是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产业工人阶级。废除斯品汉姆兰制度之日就是现代工人阶级的真正诞生之时，他们直接的自身利益注定使他们成为反对机器文明之固有危险的社会保卫者。但是，不管未来给他们预备好了什么，工人阶级和市场经济是携手出现在历史中的。憎恨公共救济、不信任政府行为、恪守尊严和自食其力，一直是英国工人阶级数代人的特征。

⁴ 马蒂诺，《教区》，1833年。

废除斯品汉姆兰制度，是一个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新阶级即英国中产阶层的任务。地主阶级无法完成这些中产阶级注定要来完成的任务：把社会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这场转变开始之前，有十多部法律被废止，也有数部法律生效实施。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剥夺了腐朽的自治市镇的特权，并在议会下院把权力永远授予了平民。他们的第一个伟大的改革行动就是废除斯品汉姆兰制度。现在我们认识到了它的家长主义方法与农村生活融合的程度，我们将会理解为什么连改革的最激进的支持者也颇不情愿地建议一个不超过10年或15年的过渡期。实际上，它的突然出现，使得后来人们在寻求反对激进改革的论据时所养成的英国式渐进主义传奇变成了废话。那场改革的残酷冲击，困扰着英国工人阶级的幻想长达数代之久。虽然如此，这一伤人感情的行动的成功，还是应该归因于这样一些根深蒂固观念：包括劳动者在内的英国人口构成，具有多阶层的特点，所以，斯品汉姆兰制度在表面的各个方面都是支持他们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在掠夺他们，而“生存的权利”措施则是将病人往死里推。

《新济贫法》规定，未来不应该实施济贫院外救济。它的管理是国家性质的，也是因地制宜的。在这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彻底的改革。工资补贴当然不再继续下去了。贫民习艺所的考验再次被采用，但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采用的。现在是由申请者自己决定他是否一无所有，以致于他情愿去一个被故意弄成恐怖之地的收容所。贫民习艺所被赋予了一个恶名；住在习艺所被变成了一种心理和道德上的折磨，同时还要遵守卫生和体面上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巧妙地利用他们作为进一步剥夺的借口。不是地方治安官，也不是当地督导员，而是分布更加广泛的管理人员即贫民救济委员，将在独裁的中央政府监督之下管理新的济贫法。埋葬一个贫民被弄成了这样一种活动，以致于和他在一起的穷人们要借此机会宣布即使在死的时候也要断绝与他的关联。

1834年，工业资本主义的航船马上就要起航了，《新济贫法》

也开始执行了。曾经保护英国农村并因此保护普通劳动人们不受市场机制全面冲击的《斯品汉姆兰法》，正在吸食社会的骨髓。到它被废止的时候，大批大批的劳动人民已经变得更像恶梦中的妖魔鬼怪而不是人。但是，如果说工人在物质上被非人化了，那么富裕的阶层则在道德上走了下坡路。基督教社会传统的团结正在让位于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富裕的人拒绝为他们贫穷的同类的生活环境承担责任。“两个民族”正在形成。令思想家困惑的是，前所未闻的财富最终竟然与前所未闻的贫困无法分离。学者们一致宣称已经发现了一门新科学，它清清楚楚地展示了支配人类世界的规律。这些规律要求人们抛弃同情心，以获得了世俗信仰尊严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名义，坦然决定放弃人类的团结。

市场机制以先声夺人之势走向成熟：人类的劳动力必须变成一种商品。反动的家长式制度徒劳无益地试图抵制这一必然性。一离开斯品汉姆兰制度的恐怖，人们就盲目地冲向了一个乌托邦式市场经济的避难所。

第九章

贫穷与乌托邦

贫困问题是以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为中心的：贫穷和政治经济学。虽然我们将分别探讨它们对现代意识的影响，但它们却曾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社会发现。

直到斯品汉姆兰制度时期，对于穷人来自何处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法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18 世纪的思想家们大体上同意，贫穷和进步是不可分离的。约翰·穆法雷恩 (M'Farlane, J.) 在 1782 年曾写道，穷人最多的地方，并不是那些贫瘠的国家或者野蛮的民族，而是那些最富饶和最文明的国度。意大利经济学家齐亚马里亚·奥泰斯 (Giammaria Ortes) 在 1774 年提出过一个公理：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其人口相对应，其不幸却与其财富相对应。甚至亚当·斯密也以其慎重的口吻宣称，在最富裕的国家里，劳动力工资并不是最高的。所以，约翰·穆法雷恩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之时并没有在冒危言耸听之险：英国现在已经接近了其真正的全盛时期，“穷人的数量将继续增加”¹。

再则，一个英国人预言商业停滞，不过只是随声附和人们广泛持有的一种意见而已。在 1782 年之前的那半个世纪里，如果出口增长是显著的话，那么贸易的上下波动则更是如此。贸易正开始从一场衰退中恢复过来，那场衰退把出口数字降低到了几乎半个世纪前的水平。对同时代的人而言，在“七年战争”之后，贸易的巨大扩张和国家繁荣程度的明显增加，意味着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后英国也有她自己的机会。现在英国的快速上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且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会持续进步，因为持续进步仅仅是一场幸运的战争的结果。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人们几乎一致认为

¹ 约翰·穆法雷恩 (M'Farlane, J.)，《有关穷人问题的提问》，1782 年。另参考 1757 年《通用大辞典》中论及 1531 年 10 月 7 日《荷兰济贫法》之处，鲍斯特尔思维特 (Postlethway't) 所做的编辑评论。

贸易将要衰退。

事实上，繁荣就在不远之处，一场巨大的繁荣注定要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不仅对一个国家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如此。但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丝毫暗示过繁荣的即将到来。就政治家而言，这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随后的两代人而言，急剧上升的贸易数字只突显了大众的不幸。但就经济学家而言，它是令人无法理解的不幸之事，因为他们整个的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一“不正常”的贸易洪水爆发期间建立起来的，其间，贸易和生产的巨大增加碰巧由人类苦难的巨大增加相伴随：实际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基本原理所依据的明显事实，仅仅反映了在一个明确的过渡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矛盾（似非而是的）倾向。

那种情形确实令人莫名其妙。英国第一次出现穷人是在 16 世纪上半叶；随着个人脱离封建领主的庄园或者“任何封建主子”，穷人变得引人注目了；他们逐渐转变为一个自由劳动者阶层，则是以下两种情况的组合结果：政府对流浪行为的残暴惩罚，对外贸易的持续扩大非常有利于培育家庭手工业。在 17 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人们较少提到贫穷问题，甚至《居住权法》的苛刻措施在没有得到公共讨论的情况下就被通过了。当时间的脚步走到世纪末人们再开始讨论的时候，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早期的济贫法已经有 150 多岁了，而解散修道院和镇压凯特造反（Kett' Rebellion）的事已被人忘记很久了。有些圈地和“霸占”行动一直在进行，例如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但作为一个总体的新的阶层已经成形了。此外，尽管 16 世纪中期的穷人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危险，因为他们就像敌人的军队突然降临到面前，但到了 17 世纪末，穷人仅仅是依赖救济的社会负担。在另一方面，半封建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半商业社会；半商业社会的代表们因为这种社会本身的原因而喜欢工作，并且既不可能接受中世纪的观点，即贫困不是问题，也不可能接受成功的圈地者的看法，即失去工作的人仅仅是有劳动能力的懒汉。从此以后，关于贫穷的各种观点开始反映出哲学态度，非常

像神学问题从前的情况。对穷人的看法越来越多地反映出人们对人类总体存在的见解，因此，不仅反映出这些观点的多样性和看似混乱不清，也反映出它们对我们文明历史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作为探索现代生活可能性的先驱者，贵格会教徒们（quakers）最先认识到非自愿性失业肯定是劳动力组织中存在某种缺陷的结果。由于他们坚决相信有条不紊的办事方法，所以他们把集体自助的原则应用到穷人中间去；当他们希望通过支付关押穷人的费用而避免支持当权机构时，他们偶尔就以有良心的反对者的身份来运用这一原则。作为一个热心的贵格会教徒，劳森（Lawson）发表了一篇“呼吁议会关注穷人问题，英国决不存在乞丐”的文章，他将此文作为一个“讲坛”，并在其中建议设立像公共就业机构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力交易所”。这是在1660年；而亨利·罗鲁宾逊在10年前就已经建议了一个“工作联络与面谈事务处”。但是，王政复辟政府喜爱比较通俗的方法；1662年《居住权法》的倾向，就在于直接反对任何合理的劳动力交易制度，而合理的劳动力交易制度可能会创建一个更广大的劳动力市场；在该法案中第一次使用的“居住权”这个词语，把劳动力限制在教区之内。

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贵格会教徒的哲学体系，把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变成了遥远未来的社会思想倾向的真正预言者。正是在这些贫苦人救济会议（Meetings of Sufferings）气氛中，由于当时经常使用统计数据展示宗教救济政策的科学准确性，所以在1696年有人提出了建立“产业协会”（Colleges of Industry）的建议，按照此建议，穷人的非自愿性的空闲时间可以被转化为有价值的东西。潜藏在这一计划之下的，不是劳动力交易原则，而是非常不同的劳动交换原则。前者与为失业者寻找雇主的传统概念相关；后者的意味不亚于说，劳动者不需要雇主，只要他们能够直接交换他们的产品就行了。贝勒斯曾说过，“穷人的劳动是富人的宝库”，为什么穷人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通过剥削那些富人来赡养他们自己并甚至还有富余呢？所需的一切就是以“协会”或集体的形

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在这种集体组织中，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努力集合在一起。这就是后来所有关于贫困问题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不管它采取的形式是以下的哪一种：欧文的统一的村庄（Villages of Union），傅立叶的社会基层组织（Phalansteres），蒲鲁东的交易银行（Banks of Exchange），路易·勃朗的社会工厂（Ateliers Nationaux），拉萨尔的国民工作站（Nationale Werkstätten），或者为了同样目标的斯大林的五年计划（Five-Year Plans）。简言之，贝勒斯的书中包含了自从机器在现代社会里产生的这些巨大混乱开始出现以来的大多数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建议。“这一协会伙伴关系将使得劳动而不是金钱，成为大家评判所有必需品的标准……”。所设想的方案是，“一个由所有有用的行业所组成的协会将相互帮助，而无需救济……”。把劳动券、自助和合作联系在一起，是重要的。以三百人为一组的劳动者，将自己养活自己，仅为纯粹的生存而一起工作，“任何超过这一起码标准的工作，将给予报酬”。因此，根据劳动结果，将对起码生活配给与报酬进行组合。对于某些小型的自助实验，财政盈余则交给贫苦人救济会议，并用于本信仰团体的其他成员的福利。这一盈余必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利润的新概念是那个时代的万能药。贝勒斯的失业救济国家计划，实际上就是将由资本家用来进行营利的途径。在同一年，即 1696 年，约翰·卡里（Cary J.）为穷人办起了布里斯托尔企业（Bristol Corporation），它在取得了一点初始成功之后，就像其它同类的企业一样，最后再也没有产生利润。此外，贝勒斯的建议与约翰·洛克（Locke, J.）的劳动等级制是以同样的假定为基础的；洛克的劳动等级制也是在 1696 年提出来的，依照他的这一制度，应该按照当地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额，将农村穷人送到这些纳税人家里去工作。这就是按照《吉尔伯特法》所施行的那一不幸的巡视员制度的起源。可以让贫穷付出代价的概念，已经牢牢地抓住了人心。

正好在一个世纪之后，作为最多产的一位社会设计师，杰里米·边沁（Bentham, J.）构思出大规模使用贫民操作由他的更具创

造性的兄弟萨缪尔·边沁设计的机械进行木材和金属加工的计划。莱斯利·斯蒂芬（Stephen, L.）爵士说，“边沁和他兄弟一起期待着蒸气机的出现。现在他们有机会使用囚犯而不是蒸汽。”这是在1794年；借助于杰里米·边沁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计划，监狱可以被设计得便于以便宜而有效的方式进行管理，他的这个计划已经存在两三年时间了，他现在决定把它运用于他的囚犯作业工厂；而囚犯所待的地方将被穷人占据。现在，边沁兄弟俩的私人企业，并入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总体计划之中。斯品汉姆兰的地方官们的决定，惠特布莱德的最低工资建议，特别是皮特的那份私下传阅的济贫法改革总体议案草案，使得贫困变成了政治家们的一个话题。边沁对皮特的议案的批评可能使得那份议案被撤回，所以边沁现在便在亚瑟·扬的《农业编年史》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精心准备的建议（1797年）。按照全景监狱计划，他的分布在十二个区的用于开发被帮助的穷人的五层楼高的工业大楼（Industry-Houses），将由设在首都的一个中央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并在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上作为一个样板，所有拥有价值五英镑或十英镑股份的成员都有一份表决权。几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1）整个英国南部有关穷人的企业管理都将归属于一个机构，相应的开支将从一个基金中支出；（2）这一管理机构，作为一个股份公司，将采用‘国家慈善公司’这样的名称”²。将要建设不少于250幢工业大楼，有大约50万穷人入住其中。与这一计划相伴随的，是一份对各种类型的失业者的详细分析报告，边沁在该报告中预测到了一个世纪以后的其他研究者的结果。他擅长分类的脑袋充分展示了其现实主义能力。最近刚刚丢掉工作的“失业者”，不同于那些可能因为“暂时性停滞”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周期性停滞”的随季节而变动的人，不同于“被人替代掉的失业者”，例如“因机械的引进而失去工作的那些人”，

* 全景监狱（Panopticon）：亦可译为“圆形监狱”或者“环形监狱”——译者注。

² 边沁（Bentham, J.），《贫民的管理》，第一次出版于1797年。

或者以更现代的预言来说，属于技术性失业的那些人；最后一个失业人群是由“被遣散人员”所组成的，这是边沁的时代由法国战争所造成的另一类引人注目的失业者。然而，最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暂时性停滞”的那类失业人员，他们不仅包括其执业性质“依赖于时尚”的手艺人和艺术家，还包括更加重要得多的那些“在加工业发生普遍停滞时”的失业者。边沁的计划的综合结果，无异于是通过失业人口的大规模商业化而对商业循环进行平衡。

1819年罗伯特·欧文重新发表了贝勒斯在120年前提出的设立“产业协会”的计划。零星的贫困现象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股苦难的急流。他自己的“统一的村庄”与贝勒斯的不同，因为他的村庄的规模要大得多，由1200人和相应多的亩数的土地所组成。包括戴维·李嘉图这样的权威在内的委员会，呼吁支持解决失业问题的这一高度试验性的计划。过些日子之后，法国人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因为日复一日地指望那位隐名合伙人最终会变成他的“社会基层组织”计划的投资者而受到嘲笑，他的社会基层组织计划的奠基概念非常类似于受到同时代的一位最伟大的金融家赞助的那些人的想法。罗伯特·欧文在新拉纳克的公司（以杰里米·边沁为隐名合伙人）是否通过其慈善计划的财政成功而变得举世闻名了呢？世上还没有出现关于贫困的标准观点，也不存在任何从穷人身上牟利的常规方法。

1832年欧文从贝勒斯那里拿来了劳动券的概念，并将它应用于他的“国民公平劳动交易所”，结果此概念失效了。劳动阶层经济自给自足的那个密切相关的原则（也是贝勒斯的一个想法），就是随后两年里著名的英国工会运动的背后动力。工会（Trades Union）是所有行业的一个联合会，其中也不排除小的雇主，其大概的目标就是以一种和平的表现方式把它们构建为社会的主体。谁曾想到这就是100年之后的大联盟的所有暴力活动的胚胎？工会组织主义（工团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它们各自为穷人制定的计划上实际上几乎是没有分别的。1848年的蒲鲁东“交易

银行”，作为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个实际的业绩，基本上是欧文实验的一个派生物。作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严厉抨击了蒲鲁东的想法，从此以后，人们就要求国家为这种类型的集体主义计划提供资本，路易·勃朗和拉萨尔的这种计划则变成了历史。

为什么从贫民身上赚不到钱，此问题的经济原因应该不是难解之谜。从丹尼尔·笛福（Defoe, Daniel）在 1704 年出版其小册子，到贝勒斯和洛克两人发起的那场讨论被他所终止，时间几乎过了 150 年。笛福坚持认为，如果穷人得到了救济，他们就不会为工资而工作；如果他们被放到公共的工厂里去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只会给私营加工业造成更多的失业。他的那本小册子有着一个魔鬼般的名字叫做《发放救济决不是慈善，利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后面还跟着曼德维尔医生（Doctor Mandeville）所作那首关于蜜蜂的更加著名的打油诗：聪明的蜜蜂啊，你们的社会是繁荣的，之所以如此，只因为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虚荣和忌妒、邪恶和浪费受到了怂恿。但是，尽管那位古怪的医生沉湎于一种肤浅的道德悖论，那本小册子的作者却击中了新政治经济学的要害。在 18 世纪，随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问题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笛福的那篇短文很快就被遗忘在“低级政治学”的圈子外边，而曼德维尔的那个不值钱的悖论，却使得具有贝克莱、休谟和斯密那样智慧头脑的人颇受考验。显然，在 18 世纪上半叶，变化无常的财富还依然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贫困却还没有成为道德问题。清教徒阶层对封建形式的明显浪费感到震惊，他们的良心将这种浪费斥之为奢侈和罪恶，但他们却不愿赞同曼德维尔关于蜜蜂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若不是那些罪恶，商业和贸易很快就会衰退。后来，这些富有的商人打算保证商业道德：新的棉纺厂不再迎合毫无价值的摆阔行为，而是满足朴素的日常需要，不过暗中的浪费形式还在发展，尽管假装不那么明显，却比老的浪费形式更要厉害。笛福对救济穷人之危险的嘲笑，还没有足以穿透那些全神关注财富的道德危险性的良心；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不过，从工业革命酝酿的程度来说，笛福的悖论是对将要来临的种

种困惑的一个预测：“发放救济决不是慈善”，因为消除了饥饿的锋芒，生产活动就受到了阻碍，结果只会造成饥荒；“利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因为创造政府就业机会，只会增加市场上的物资过剩，由此加速了私营贸易商的破产。在约翰·贝勒斯、贵格会教徒和那位识时务的记者丹尼尔·笛福之间，在圣徒和愤世嫉俗者之间，大约在17世纪的转折点上，这些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了花力气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将要经历两个多世纪的工作和思考、希望与磨难。

但是，在斯品汉姆兰制度时期，贫困的真正性质依然躲藏在人类智慧所达不到的地方。人们一致同意需要尽可能多的人口，因为国家的力量在于人。人们也欣然同意廉价劳动力的好处，因为只有劳动力便宜，加工业才能兴旺发达。另外，若没有穷人，谁会去开船和打仗？还有，也有人怀疑，贫困是否完全就是一件坏事。无论如何，为什么穷人就不能被有利可图地用来为政府创造利润，就像他们显然可以被用来为私人创造利润那样？对这些问题，人们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对于笛福所偶然发现的真理，70年之后的亚当·斯密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市场体系的未开发状态，隐藏着其固有的弱点。对人类来说，新的财富和新的贫困都还相当难以理解。

尽管贵格会教徒贝勒斯、无神论者欧文和功利论者边沁有着不同的思想，但他们的计划却有着令人惊奇的一致性，这说明上面的问题还处在准备期。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欧文热忱地相信，人是平等的，人的天生权利也是平等的；而边沁则鄙视平均主义，嘲笑人权，并且非常倾向于*自由放任*。但是，欧文的“平行四边形”与边沁的“产业大楼”是如此的相似，以致于在人们记起他受到贝勒斯的影响之前，可能会想象他是完全受了“产业大楼”的启发。这三个人全都相信，适当组织失业者的劳动肯定会产生盈余：人道主义者贝勒斯希望利用这种劳动主要为了救济其他的受苦受难者；功利论者加自由主义者边沁希望把这种劳动交由股东去处理；社会主义者欧文希望把选择权交还给失业者他们自己。不过，尽管他们的

差异仅仅显露了未来裂痕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征兆，但他们共同的错觉却揭示了他们彻底误解了初生的市场经济中的贫困的性质。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其间，穷人的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1696 年当贝勒斯在写书的时候，总的救济款额大约是 40 万英镑；1796 年当边沁强烈反对皮特的议案时，总的救济款额超过了 200 万英镑；到 1818 年当罗伯特·欧文开始行动之时，总的救济款额接近 800 万英镑。从贝勒斯到欧文的 120 年间，人口可能增加了三倍，而救济金却增加了 20 倍。贫困已经变成了一个险恶的征兆。但它的含意却依然是任何人都猜不透的。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发现

当贫困的意义被认识到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为 19 世纪做准备工作了。分水岭大约是在 1780 年。在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里，减轻贫困还不是个问题；仅过了 10 年之后，在汤森的《论济贫法》一文中，减轻贫困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提出来了，并且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再也没有停止过占据人们的思想。

从亚当·斯密到汤森的气氛变化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前者标志着与政体的创造者们一同起航的时代结束，他们是托马斯·莫尔 (More, Thomas)，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路德 (Luther, Martin) 和加尔文 (Calvin, John)；后者属于李嘉图和黑格尔从相反的角度发现了社会存在的那个 19 世纪，他们发现，社会存在并不服从于国家的法律，相反，社会存在使得国家服从于社会存在自身的规律。实际上亚当·斯密把物质财富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就因为他以伟大的现实主义感而如此为之，所以，他成为了一门新的科学即经济学的奠基人。虽然如此，财富对他而言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其用途是从属性的；财富是历史上各个国家在争取生存过程中的一个附属之物，所以不能与各个国家相分离。依照他的观点，对一个国家的财富起支配作用的有几组条件，其中，一组条件来源于整个国家的进步、静止或衰退的状态；另一组条件来源于国家安全稳定的至高无上以及力量平衡的需要；还有一组条件是由政府偏袒城市或乡村、工业或农业的政策所决定的。因此，他相信，只有在一个给定的政治框架之内，才有可能阐述财富的问题，例如，就财富而言，他意指“广大的人们群众”的物质财富。他在著作中既没有正式宣告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为社会制定了法则，也没有宣告这些利益是支配独立的经济世界的上帝的世俗发言人。对他而言，经济范畴还依然不隶属于其自身为我们提供了善恶评判标准的法则。

亚当·斯密希望把各国的财富视为它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一个功能；那就是为什么他的海军政策与克伦威尔（Cromwell）的《航海条例》是那样的契合，他的人类社会观念与约翰·洛克的天然权利是如此的和谐一致。在他看来，有可能成为道德法则和政治责任之源的任何东西，都不说明经济范畴在社会中的存在。自利行为（self-interest）只会促使我们去做那种在本质上也将会有利于他人的事情，就像屠夫的自利行为最终将为我们提供一桌菜肴那样。斯密的思维中充满着广泛的乐观，因为支配世界经济部分的法则，就像那些支配其余事物的法则一样，是与人类的命运相共鸣的。决不存在看不见之手，试图以自利的名义把自相残杀的习俗强加给我们。人类的尊严是那种道德存在的尊严，因此，人是家庭、国家和“伟大的人类社会”的公民秩序的一个成员。理性和人性为计件工作设定了界限；竞争和获利必须让位于理性和人性。与人类精神上的内在原则相一致的东西就是自然的；与这些原则相一致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物质意义上的自然，被亚当·斯密有意识地排除在财富问题之外。“不管一个特定国家的土地、气候或领土范围如何，其每年供给的丰富或不足，在那一特定情况下，肯定取决于两个条件”，也就是，劳动力的技能与社会上有用成员和闲散人员的比例。产生作用的不是自然的因素，而是人的因素。他故意在书的一开始就把生物和地理因素排除在外。重农主义者的谬论对他起了一个警示作用；他们对农业的偏好，诱使他们混淆了物质自然与人的本性，并促使他们说土地才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东西。对物质的颂扬，是离亚当·斯密的思想最远的事情。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应该研究人的而不是自然的天然属性。

10年之后的汤森的论文，集中论述了山羊和狗的法则。场景是在智利海岸之外的太平洋上的鲁宾逊漂流记岛上。在该岛上，胡安·费尔南德斯放养了一些山羊，以便以后再来时有肉可吃。山羊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并变成了以英国人为主的那些骚扰西班牙贸易的武装民船的便利的食品储备。为了消灭山羊，西班牙当局在那里

放养了一只公狗和一只母狗，这两只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大量繁殖起来，并减少了它们以之为食的山羊的数量。“然后，一种新的平衡得到了恢复”，汤森写道。“两种动物中的最弱者，最先成为自然罪过的牺牲品；最活跃和最健壮的，则保存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对此，他补充说：“是食物的数量，在控制人类的人口规模。”

我们发现，在对资料来源进行一番搜寻之后¹，没有找到可以证明上面故事的证据。胡安·费南德斯确实在某个时候放养了些山羊；但是，传说中的狗被威廉·芬内尔（Funnell, W.）描述为美丽的猫，而且，据说狗或猫并没有繁殖过；还有，山羊栖息在难以接近的岩石上，而沙滩上（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报告是一致的）充满了肥胖的海豹，这些胖家伙成为野狗之猎物的可能性则会大得多。不过，范例并不依赖于实证的支持。缺乏古文物研究方面的真实性，丝毫也无法影响马尔萨斯和达尔文受到这一故事来源的启发：马尔萨斯是从孔多塞（Condorcet）那里知道它的，而达尔文又是从马尔萨斯那里知道它的。但是，若不是汤森从其山羊和狗推导出来的如下这些箴言并希望把它们应用到《济贫法》改革上的话，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都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汤森的箴言是：“饥饿将会驯服最凶猛的动物，饥饿将以最有悖常理的方式教授体面和礼貌、顺从和臣服。通常，只有饥饿能够驱使和刺激他们（穷人）去劳动；但是，我们的法律说过，他们将决不会挨饿。必须承认，我们的法律也同样说过，他们将被迫去工作。不过，然后，法律制约就将伴随有许多麻烦、暴力和喧闹声；法律制约将造成恶意，决不能够产生好的为人所接受的服务；而饥饿不仅是平和的、无声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作为生产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机，饥饿会让人使出全部的力气；一旦有人慷慨解囊消除别人的饥饿，这就给善意和感恩打下了持久而可靠的基础。奴隶肯

¹ 比较安东尼奥·德·厄楼阿（Antonio de Ulloa）、威廉·芬内尔（William Funnell）、（其中也包含伍德·罗杰斯船长解说亚历山大·塞尔扣克）以及爱德华·库克的观察报告。

定是被强迫去工作。但是，对于自由人，则应该让他自己做出考虑和判断，应该保护他完全乐于做判断，不管他有多么乐意，当他侵犯其邻居的财产时就应该受到惩罚。”

此处是政治学的新起点。通过从动物的一面走近人类社会，汤森绕过了那个所谓无法避免的政府的基础问题，这样他就把一个新的法律概念即自然法概念引进了人类事务。霍布斯（Hobbes）的几何学偏见，以及休谟（Hume）、哈特利（Hartley）、魁奈（Quesnay）和爱尔维修（Helvetius）在牛顿原理之后所做的社会追求都仅仅是比喻性的：他们全都欣喜若狂地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规律，就如同万有引力之于大自然那样，但他们认为那是人类的规律，例如心理力量，就像霍布斯所说的害怕、哈特利的心理学、魁奈所说的自利主义或者爱尔维修对功利的探询。对这样的规律，决不存在什么神经过敏：魁奈像柏拉图一样偶尔采取人类起源的观点，亚当·斯密肯定不忽视实际工资与劳动力长期供给之间的联系。然而，**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曾教导说，只有上帝或野兽能够生活在社会之外，而人类却不能。**同样，对基督教思想而言，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也是本质上的，生理现实领域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混淆关于整个人类精神根源的神学（宗教信仰制度）。如果对霍布斯而言，人对人就像人与狼，那是因为人在社会之外表现得像狼，而不是因为人与狼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生物学因子。最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有设想出任何不具有相同法律和政府的人类社会。但是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的岛上，既不存在政府，也不存在法律，山羊和狗之间却依然保持了平衡。那种平衡之所以得以维持，一方面是因为狗发现自己难以去吃那些逃往岛上满是岩石的险峻地带的山羊，另一方面是因为山羊克服了路途的种种不便躲避了狗的捕食。那种平衡无需政府去维持；是一阵阵的饥饿和食物的不足，把平衡恢复了过来。霍布斯曾经主张需要一个暴君，因为人就像畜牲；汤森坚持认为，人实际上就是畜牲，而正因为如此，所以就需要一个最小限度的政府。依照这种崭新的观点，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被认为是由两类人组成：

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数量受到食物量的限制；只要财产是安全的，饥饿就会驱使他们去工作。无需地方官员，因为饥饿是比地方官更好的维持纪律者。汤森尖锐地指出，诉诸于饥饿，可能就是“强者求助于弱者”。

新的基础与正在出现的社会密切吻合。自从 18 世纪中叶以来，国家市场一直在发展；谷物的价格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地区性的；这预示着几乎是普遍使用货币，也预示着商品具有广泛的市场可能性。市场价格和收入，包括租金和工资，表现出相当大的稳定性。重农主义者首先注意到了这些规律，但是，在封建收入依然流行于法国、劳动力经常是半奴隶性质之时，以至于租金和工资通常都不是由市场所决定，所以他们甚至无法从理论上完整地解释这些规律。但是，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乡村已经成为了商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主的租金和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都明显地依赖于物价。例外的是那些由政府机构所固定的工资或价格。不过，就是在这一奇怪的新秩序之下，旧的社会阶层却继续或多或少地按照他们先前的等级存在着，尽管它们的合法特权和限制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尽管没有法律强迫劳动者为农场主干活，也没有法律迫使农场主让地主过好日子，但劳动者和农场主好像是在这种压力之下行事。是什么规则命令劳动者服从一位自己在法律上并不受之约束的雇主？是什么样的力量把社会各阶层分开，好像他们是不同种类之人？在这一既不要求也不容忍政治性政府的干预的人类集体中，是什么维持着平衡和秩序？

山羊和狗的范式似乎做出了回答。人类的生物特性似乎是一个没有政治秩序的社会特定基础。因此，当前的经济学家就放弃了亚当·斯密的人道主义基础，转而采纳了汤森的论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李嘉图的收益递减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使得人口繁衍和土地变成了新发现的社会存在范畴的组成要素。经济社会已经成长为一个不同于政体的现实存在。

就 19 世纪思想史来说，这一人类集体存在（一个复杂的社会）

的环境显然变得极其重要。因为正在出现的社会就是市场体系，人类社会正处在一种危险之中，那就是它正在被转向迄今为止政体已经构成了其一部分的那个道德世界所完全陌生的基础上去。显然难以解决的贫困问题，正迫使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同意汤森滑入自然主义之中。

伯克直接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探讨贫困问题。西印度群岛的社会环境令他确信，在不为白人雇主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培育大量奴隶人口是危险的，尤其是在黑人经常被允许带有武器之时。他认为，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国内失业人口的增加，因为政府根本没有警察力量可以使用。尽管他是家长制传统的一个彻底拥护者，但他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热情信徒，因为他在经济自由主义中看到了令人焦急的贫困之管理问题的答案。地方管理机构高兴地利用棉纺厂对贫困儿童的意外需求，而那些儿童的学徒问题却留给教区处理。成百上千的往往来自偏远乡村的人都与工厂主订立了契约。总而言之，新的城镇已经形成了一种对贫民的良性的需求，而工厂甚至准备好为使用穷人而付出代价。成年人被分配到任何可以养活他们的雇主那里去，就像他们可能会被以某种轮流上岗的方式依次安排到教区的农场主家里去一样。把穷人安排出去干活，比运作“无罪的监狱”更便宜，因为贫民习艺所有时候就被人叫做无罪的监狱。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越来越连贯而又细致的雇主职权”²，取代了政府和教区的强制管理工作。

显然，涉及到的是一个治国之道问题。如果教区最终通过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安排到资本主义企业家那里去干活而摆脱教区自己肩上的负担，而那些企业家又非常渴望把那些劳动者安排去自己的工厂干活，甚至会花钱买他们的服务，那么为什么应该把穷人变成公共的负担、把养活穷人的责任放在教区的肩上？这是否清楚地表明，除了教区方式之外，还有更加便宜的途径促使穷人去挣钱养活他们

² 韦布夫妇（Webb, Sidney and Beatrice），《英国地方政府》第7~9卷，《济贫法史》。

自己？答案在于废除伊丽莎白立法（即《伊丽莎白济贫法典》），而又无需用其它法律代之。无需对工资进行评估，无需对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进行救济，但也无需最低工资标准，无需对生存权利给予保证。劳动力必须被作为要在市场上寻找其自身价格的商品来对待。商业规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也是上帝的法律。如果这不算是软弱的地方官员和治安法官向全能的阵阵饥饿求助，还会是什么别的呢？对政治家和管理者而言，自由放任就是保证法律和秩序的原则，而且所需的成本和努力都是最少的。把养活穷人的责任交给市场，事情将会水到渠成。正是在这一点上，理性主义者边沁与传统主义者伯克是意见一致的。对痛苦和快乐做一下计算就会知道，不应该造成任何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饥饿可以解决问题，就无需施加任何别的痛苦。“法律能为生计做些什么呢？”，边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法直接做什么”³。贫困是社会永远具有的特征，其有形约束就是饥饿。“如果有形约束力足够大，就业的政治约束可能就是多余的。”⁴所需的一切就是“科学而又经济”地对待穷人。⁵边沁强烈反对皮特的《济贫法议案》，鉴于这份议案既允许济贫院外救济也允许工资补贴，所以它有可能把斯品汉姆兰制度变成法律。不过，边沁与他的学生不同，他当时既不是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按照科学管理的标准，他的“工业大楼”计划是所实行的那种细致的实用主义管理的一场恶梦。他认为他的那些计划总会有用的，因为社会在面对穷人的命运时不可能非常地无动于衷。边沁相信，贫困是繁荣的组成部分。他说：“在繁荣的最高阶段，除了日常劳动之外，许多公民很有可能将拥有极少的其它财富，因此他们将总是接近于贫困状态……”所以，他建议，“应该经常对穷人的需要给予捐助”，尽管因此“从理论上讲，贫困减少了，并由此损害了生产”，他不无遗憾地补充说，因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政

³ 边沁（Bentham, J.），《民法典原则》，第4章。（鲍令，第1卷，第333页）

⁴ 边沁，同上。

⁵ 边沁，《对济贫议案的看法》，1797年。

府的工作就是增加贫困，以便使得饥饿的有形约束产生效力。⁶

把大量的公民接近贫困状态作为达到繁荣的最高阶段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对于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人们有着非常不同的态度。汤森通过纵情于偏见和情感主义而扶正了他的情感平衡。人穷志短是一个自然规律，因为否则那些卑屈的、肮脏的和不得体的工作就没有人去干了。而且，如果我们不依赖穷人，我们的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因为若没有苦难和贫穷，什么才能迫使下层穷苦人去迎接暴风骤雨般的海洋和战场上等待他们的所有艰难险阻呢？”但是，这一粗鲁的爱国主义表演依然为更为细腻的情感留下了余地。济贫措施当然应该彻底取消。《济贫法》“所基于的那些原则近乎荒谬透顶，因为它们声称要完成那种按照世界的性质和构成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一旦把穷人置于富人的怜悯之下，谁能够怀疑“唯一的困难”就是限制后者的仁爱之心的冲动？慈善的情感不是远比那些来源于严格的法律责任的情感更加高贵吗？“从性质上讲，能有任何东西比仁慈的温和满足感更美吗？”，他高声抱怨说，因为他把仁慈与“教区税务所”冰冷的铁石心肠相对比，而教区税务所并不了解那些“因为意外的恩惠而直接表达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感激场景……”“当穷人不得不培育富人的友谊的时候，富人将决不会希望倾向于减轻穷人的苦难……”在读过“两个民族”的亲密生活的这一动人的描写之后，没人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怀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从山羊和狗的岛上获得其情感教育的。

埃德蒙·伯克是一个有着不同境界的人。在像汤森这样的人发生小失误的地方，他发生了大失误。他的天赋把残忍的事实提升为悲剧，给多愁善感罩上了神秘的光环。“当我们假装可怜那些必须劳动否则世界就无法存在的穷人之时，我们就是在取笑人类的环境。”这无疑要好过那些粗俗的漠不关心、空洞的悲叹或同情心高涨的伪善之言。但是，这一现实主义态度的雄浑气度，却因为他在强调贵

⁶ 边沁，《民法典原则》，第314页。

族统治地位时所带的那种微妙的满足感而打了折扣。结果是要比希律王*还要希律王，而不是低估及时改革的机会。基本上可以这样猜想，如果伯克活着的话，1832年那一结束了古代统治的议会改革议案可能已经获得通过，只是要付出一场不可避免的流血革命的代价。不过，一旦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注定要使得人民群众在不幸中挣扎，伯克可能会反击说，平等的概念还能是什么，不就是残酷地引诱人类走向自我毁灭吗？

边沁既不具有汤森那种圆滑的自满，也不具有伯克那种太过突如其来历史相对论（*historicism*）。相反，对这位相信理智和改革的人来说，新发现的社会规律领域似乎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功利主义实验的无人之境。像伯克一样，他拒绝顺从动物决定论，他也拒绝接受经济学优于正当政治学的论调。尽管他是《论高利贷》和《政治经济学手册》的作者，但他在经济学上却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他甚至没有对经济学做出功利主义有可能做出的那一巨大贡献，即发现价值来自于效用。相反，在联想心理学的促动之下，他却变成了一名具有无穷想象力的社会设计师。*自由放任*对边沁而言，只意味着社会技法的另一个工具。社会而非技术创新，才是工业革命的智力上的主要动力。在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当工业革命早已结束之后，自然科学才对工程学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机械学和化学方面的新的应用科学没有发展形成之前，对桥梁或运河的实际建造者而言，机器或发动机设计师以及一般自然规律领域的知识是完全无用的。作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创始人和终身主席，特尔福德拒绝接纳学习物理学的申请者为会员，而且据戴维·布儒斯特爵士（*Brewster, David*）说，特尔福德从来就没有弄懂过几何学原理。自然科学的胜利在真正意义上是属于理论上的，而且没法同当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胜利的实际意义相比。尽管对我们这代人而言，自然科学似乎可能是通过其与人文科学的联系而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但是，

*希律王（*Herod*）：以残暴著称的犹太国王——译者注。

科学相对常规和传统而取得的声望却归因于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胜利。经济学的发现是一项惊人的意外成就，它大大加速了社会的变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而实实在在的机器却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匠的发明，这些工匠中甚至有人不会读书写字。因此，可以公正而又恰当地说，把自然力量置于人类控制之下的机械革命，应该不是来源于自然科学，而是来源于社会科学。

边沁本人认为他自己发现了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即道德伦理和立法。它将需要建立在效用原则基础上，此原则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联想心理学而进行精确的计算。正是由于科学在人类事务的范畴之内变得有效，所以它在 18 世纪的英国意味着一门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永恒不变的实用技术。这样一种务实态度的需要，实际上是势不可挡的。由于缺乏统计资料，所以往往不可能说出人口是在增加还是在下降、外贸平衡的趋势如何、人口中的那个阶层正在取得对其它阶层的优势。国家的财富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穷人来自何方，信贷、银行业或利润的情况如何，对这样一些问题人们往往只是猜猜而已。科学最初就是人们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一种经验方法，而不是纯粹猜测性的或古文物研究的方法；而由于实际的利益自然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对于如何控制和组织新事物的巨大领域，责任就落在了科学的肩上。我们已经看到过下面这一系列的现象：近代的圣徒们对贫困的性质是感到多么的困惑，他们又是多么贤明地对各种贫民自助形式进行了实验；利润的概念是如何被欢呼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对于贫困是好的征兆还是坏的征兆，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当科学的贫民习艺所的管理层发现他们自己无法利用穷人来创造财富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多么的困惑；欧文是如何按照有意识的慈善事业的路线通过运作他的工厂而致富的；还有许多其它的社会计划实验，似乎运用了同样的启蒙性自助的原则，但却令人惋惜地失败了，由此把这些计划的发起人置于灾难性的困惑之中。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界从贫困问题扩展到信贷、铸币、垄断、储蓄、保险、投资、政府财政以及监狱、教育和彩票业等方面去的话，我

们可能易于引出许多种与每一个这些行当相关的新式风险事业。

这一时期大约是在边沁去世的时候结束的⁷。自 1840 年代起，从商的社会计划者就是特定风险事业的推进者，而不再是所谓的互惠、信用、风险以及人类事业的其它要素之通用原则的新型应用方式的发现者。从此以后，商人们想象他们自己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业务活动形式；他们在成立银行之前极少探询资金的性质。现在通常只在稀奇古怪的人或骗子当中才会发现社会设计师，然后他们经常就会被投入监狱。工业和银行业系统的洪水现在已经变成了仅仅是一条细流，因为在这一洪水泛滥期间，从帕特森（Paterson）和约翰·劳（Law, John）到佩雷利斯（Pereires）都曾经以宗教、社会和学术宗派主义计划使得股票交易所遭受洪灾之殃。让这样一些人负责日常事务，再细致周到的主意也得打折扣。至少有人认为，社会探索已经到底了，人类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空白点了。一个世纪之内不可能再出现边沁那样的人。一旦工业活动的市场体制变成主导力量，所有其它的体制领域都会成为这一模式的附属物，人造社会计划的天才们也就失去了归宿。

边沁的全景监狱，不仅是一个“把无赖磨练成诚实的人、把懒汉磨练成勤劳的人的工厂”，⁸而且也会支付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的股息。他提出的建议种类之多，就像改进的专利制度那样花样百出：有限责任公司；10 年一次人口普查；建立卫生部；促进储蓄普遍化的保息票据；蔬菜和水果的低温储藏室；按照新的技术原则建立军工厂，最终让罪犯劳动力或者受到救助的穷人在里面干活；设立名家名文选读日学校，向社会中上阶层教授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建立公共会计制度；公共教育改革；统一注册登记制度；消除高利贷；放弃殖民地；采取避孕措施降低穷人比率；通过股份公司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以及其它等等。这些建议中的某些计划确实为某些小的进步提供了方便，例如，关于“工业大楼”的那一计划就

⁷ 1832 年。

⁸ 斯蒂芬（Stephen, Sir Leslie），《英国的功利论者》，1900 年。

是建立在联想心理学成就基础之上为改造和利用人类而所做的种种创新的集合体。虽然汤森和伯克把 *自由放任* 与立法无为主义 (quietism) 联系在一起, 但边沁并没有从中看到任何阻碍改革浪潮的东西。

在我们继续往前讨论马尔萨斯在 1798 年告诉戈德温的那个作为古典经济学之正式起点的答案之前, 让我们回忆一下时间问题。戈德温的《政治公平》是为反击伯克的《对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而写的。它正好出现在镇压风潮之前, 而那场镇压风潮是从吊销人身保护状 (1794 年) 和迫害民主通讯委员会开始的。这个时候, 英国正和法国交战, 战争的恐怖使得“民主”这个单词成了社会革命的同义词。但是, 英国的民主运动被局限在政治领域, 它从 1789 年普赖斯博士 (Dr. Price) 的“老犹太人”说教开始, 到 1791 年佩因的《人权》而达到其文学高度; 贫苦的劳动人民的不满在其中是没有影响的; 济贫法问题只是在小册子中才被提及, 而这些小册子却是为民众投票和一年一次的议会会议而发出呼喊的。不过, 实际上, 地主阶级的决定性对抗手段, 即斯品汉姆兰制度, 就是在《济贫法》的范围内诞生的。教区引退到一个人为的陷阱之背后, 斯品汉姆兰制度以这个陷阱为幌子, 一直存在到滑铁卢战役过后 20 年。如果 1790 年代的那场惊惶失措的政治镇压行动的有害后果是独立的, 那么它们有可能很快就被克服, 但是由斯品汉姆兰制度所引起的那一堕落过程, 却在英国留下了其抹不去的污点。斯品汉姆兰制度把地主阶级统治延长了 40 年时间, 由此造成的代价是牺牲了普通百姓的阳刚之气。“当有产阶级抱怨济贫税变得越来越重的时候”, 曼托克斯 (Mantoux) 说道, “他们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济贫税实际上等于是保证了不发生革命, 而对劳动阶级来说, 当他们接受了发放给他们自己的少量补贴时, 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之所以获得补贴, 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合法收入减少了。因为补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把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 甚至压低到工薪阶层的最低生活需要的水平之下。农场主或工厂主依靠教区来补足自己所

支付的工资总额与工薪阶层最低生活需要之间的差距。因为他们为什么应该支出一笔能够非常容易地偷偷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去的费用呢？另一方面，那些接收教区救济的人愿意为低工资而工作，由此使得那些不接收教区救助的人在很大程度是失去了竞争力。由此产生的自相矛盾的结果是，所谓的‘济贫税’对雇主而言意味着一种节约，而对不指望公共救济的勤劳的劳动者而言则意味着一种损失。因此，利害关系的无情的相互作用将一部慈善仁爱的法律变成了一种铁枷锁。”⁹

我们以为，新的工资和人口规律就是以这一枷锁为基础的。像伯克和边沁一样，马尔萨斯本人也强烈反对斯品汉姆兰制度，并主张完全废除《济贫法》。他们都没有料到斯品汉姆兰制度会将工资打压到最低生活需要水平和这一水平之下；相反，他们预计它会使得工资上涨，或者至少人为地维持工资的原状，若不是《反结社法》，这样的预计倒是有可能成立的。这一错误的预料有助于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把农村的低工资水平追溯到作为其实际原因的斯品汉姆兰制度，而是将其视为所谓的铁的工资法则之不可逆转的作用机理的证明。

汤森的自然主义无疑并不是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在价格的规律性之中，在收入依赖于那些价格的稳定性之中，明显存在着一个经济社会；因此，经济规律很有可能就是直接以价格为基础的。促使正统经济学在自然主义中寻找其基础的，是大量生产者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无法解释的贫困状况，就我们今天所知，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源自于旧的市场的规律。但是，同时代人所看到的大概是这样一些事实：在以往的时代，劳动人民一直习惯性地处在贫穷的边缘（至少说，如果考虑到习惯标准之不断变化的水平的话）；自从机器出现以来，他们肯定从未上升至维持生计的水平之上；既然经济社会最终正在形成之中，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以 10

⁹ 曼托克斯（Mantoux, P.L.），《18 世纪的工业革命》，1928 年。

年为计算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劳苦大众的物质存在水平如果实际上没有降低的话，却丝毫没有得到提高。

如果曾经存在过充分的事实证据似乎指向了一个方向，那么，它因此就是铁的工资法则。这些事实表明，劳动人民实际所处的最低生计水平就是工资个法则的结果，因为它倾向于把劳动人民的工资压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不可能获得别的工资标准。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严密的价格和收入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表象当然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实际上意味着一个谬论。不过，归根到底，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外表，工资法则才无法以人类行为的任何理性规则为基础，而是必须来自于关于人类繁衍和土地的自然主义事实，因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收益递减律的结合已经将这些事实呈现给了世界。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中的自然主义要素，是主要由斯品汉姆兰制度所造成的环境的结果。

另外，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作机理。直到《国富论》出版了一个世纪之后，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制度之下，生产要素是产品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的增加，生产要素的绝对份额必定会上升¹⁰。尽管亚当·斯密在劳动的价值起源问题上曾经跟随着洛克的错误起点，但他的现实主义感挽救了他，使他没有一直错下去。因此，他曾经混淆了关于价格组成的观点，同时他却又正确地坚持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繁荣兴旺，如果它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穷苦人的话。然而，对我们来说是公理的东西，在他的时代却是一个悖论。**亚当·斯密本人的观点是：普遍的繁荣必然惠及所有人；如果社会变得越来越富，人不可能变得越来越穷。不幸的是，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事实却没有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由于理论家需要对事实做出解释，所以，李嘉图进而提出：社会进步越大，获取食物的难度就会越大，地主就会变得越富，资本家和工人都遭受剥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是彼此誓

¹⁰ 坎南 (Cannan, E.), 《经济理论述评》，1930 年。

不两立的，但是这种对立最终将会失效，因为工人的工资可能永远都不会超越生计线水平，而利润无论如何都必定逐渐减少。从某种遥远的感觉上来说，所有这些断言都含有正确的因素，但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不可能有比这些断言更加不真实而又艰深难懂的说法了。然而，事实本身是在矛盾的模式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我们今天依然发现它们难以澄清。毫不奇怪，科学体系必须求助于动植物繁殖的解围之神，而科学体系的创造者们却声称要从人而不是动植物的行为中演绎出生产和分配的规律。

事实上，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在斯品汉姆兰制度时期奠定的，让我们简单考察一下此处的因果关系，因为它们使得那一实际上缺少劳动力市场的资本主义看起来像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系。

首先，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混乱不清的。财富与价值的等同，导致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出现了最令人困惑的假问题。作为亚当·斯密的一件遗产，工资基金理论（wage-fund theory）是各种误解的一个丰富源泉。除了人们洞察得较为透彻的某些像租金、税收和外贸方面的特殊理论之外，经济理论完全是由一种无望的努力所组成：试图对那些定义不严格的旨在解释价格的表现、收入的形成、生产过程、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利润水平、工资以及利息等术语做出绝对的结论，而大多数这些术语现在依然像从前一样模糊。

其次，由于问题自身所呈现出的条件，决不存在其它可能的结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能够解释那些事实，因为它们没有形成任何体系的一部分，而实际上却是两个彼此排斥的体系对社会产生同时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是初生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个则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范畴内的家长制管理体系。

再者，古典经济学家偶然发现的答案对于理解经济社会的性质具有最深远的意义。随着人们逐渐领会了那些支配市场经济的规律，人们便将它们归类为大自然本身的法则。收益递减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是植物生理学上的一个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

论反映了人口出生率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例子中，发挥作用的因素都是自然之力，即动物性交的本能和植物在给定土地上的生长。此处涉及到的法则是与汤森的那个山羊和狗的例子中的原理一样的：人类的繁衍是不可能超越由食物的供给量所确定的自然界限的。像汤森一样，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是：多出来的人会被杀死；在山羊被狗吃掉的同时，狗肯定也因为食物不足而挨饿。在马尔萨斯看来，强制性的阻碍物在于，多余的人被残忍的自然力所消灭。除了饥饿之外，像战争、瘟疫和堕落这样的因素也是致人死亡的原因，所以这些因素也被视为具有毁灭性的自然力。然而，有人批评说，严格讲起来，这涉及到一个前后矛盾之处，即大自然让社会力量去实现其自己需要的平衡，但马尔萨斯对此可能会作这样的回答，那就是，在缺乏战争和堕落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一个讲道德的社会里，随着人们受到和平的美德的约束，则会有更多的人忍饥挨饿。从本质上讲，经济社会是建立在无情的自然本体基础之上的；如果人类违背了社会赖以存在的规律，凶恶的刽子手就会扼杀那些缺乏远见之人的子孙后代。竞争性社会的法则具有弱肉强食的性质。

现在，令人倍受折磨的贫困问题的真正意义已经清清楚楚了：支配经济社会的法则不是人类的法律。亚当·斯密与汤森之间的裂隙已经扩大为一道深谷，标志着 19 世纪意识之诞生的一个两分法出现了。从今往后，自然主义便经常出现在人类学周围，社会与人类世界的重新结合，变成了社会思想演化所不断孜孜以求的目标。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实现此目标而做的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失败的原因在于马克思太过恪守李嘉图和自由经济学的传统。

古典经济学家们远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需要。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对穷人的命运绝不是漠不关心，但是他们的人道主义关怀却只把一个错误理论逼上了甚至更加曲折的道路。铁的工资法则携带着一个著名的保留条款，依据此条款，劳动阶层的习惯性要求越高，

生计线水平就越高，即使是铁的法则也无法把工资压低到此水平之下。马尔萨斯就是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这一“可怜的标准”之上的¹¹，而且也希望利用一切手段来提高这一“可怜的标准”，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那些依照他的定律将注定要变得可怜的人们才能获得拯救而不至于跌落到最可怜的境地。出于同样的理由，李嘉图也希望，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都应该爱好舒适和享乐，“并且应该借助一切合法的手段激励他们去争取舒适和享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规避自然法则，此处竟然责成人们去提高自己的饥饿线水平。可是，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些毋庸置疑的真诚努力，却是要搭救穷人免遭那种他们自己的理论帮着为之准备的悲惨命运。

就拿李嘉图来说，他的理论本身包含了一个抗衡僵硬的自然主义的要素。这一贯穿于其整个理论体系并牢固地根植于其价值论的要素，就是劳动力原则（principle of labor）。他完成了洛克和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价值人性化的工作；他把重农主义者归于自然的东西收归为人类所有。在一个拥有巨大范围的错误定理中，他认为劳动力是唯一有能力创造价值的东西，因此把经济社会里所有可以设想的交易都还原为一个自由人社会里的等价交换原则。

在李嘉图的理论体系之内，在经济社会里争夺主导地位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因素是相互共存的。这种情形具有势不可挡的强大动力。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竞争性市场的发展获得了自然过程的那种不可抵挡的动力。因为人们现在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遵从无情的自然法则，把市场解放出来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必须。创建劳动力市场是在社会躯体上所做的一个活体解剖手术，而只有科学才能保证自然法则完成这一手术的决心。作为这一确定性事件的一部分，《济贫法》必定要被废除。“就像地心引力原理那样万古不变，这些法则把财富和活力变成贫困和虚弱的趋势也是不变的……直到最后，所有阶级都将受到普遍贫困的困扰”，李嘉图这样写道¹²。事实

¹¹ 哈兹里特（Hazlitt, William），答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系列信件。1803年。

¹² 李嘉图（Richardo, D.），《政治经济学及税收原理》（高纳编辑，1929年，

上，他可能会是一个道德懦夫，尽管知道上面这一点，但却没有找到力量源泉通过残忍地废除济贫而把人类从那一趋势从解救出来。在这一点上，汤森、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边沁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在方法和观点上非常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原则和反对斯品汉姆兰制度方面，是一致的。使得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的，是完全不同的各种观点在此达成的意见一致；因为激进的改革者边沁和激进的传统主义者伯克所一致同意的东西，自动地呈现出了不言而喻的特征。

有一个人察觉到了这一严酷考验的意义，或许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先锋人物中，只有他拥有本质上的实际工业知识，并且也善于内省。没有一个思想家比罗伯特·欧文对工业社会范畴做过更加深入的探询。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区别。尽管他像戈德温一样对政府不存偏见，但他之所以重视政府，也仅仅因为政府能够履行义务、政府有益的干预旨在避免损害社会，而决不是因为政府能够对社会进行组织。同样，他对机器也决不抱敌意，因为他认识到了机器没有偏向任何人。政府的政治机制和机器的技术功能，都没有挡住他对社会的发现。他拒绝对社会采取一种兽性说的方法，反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说的社会的局限性。但是，他思想的支点是脱离基督教，因为他指责基督教犯了“个体化”的错误，或者说犯了把个性的责任放在了个人身上的错误，因此，他从思想上否定社会现实及其全能的塑造力对个性的影响。他攻击“个体化”的真正意义在于，他坚持人类动机的社会起源：“个体化的人，以及基督教里所真正珍视的一切，彼此之间是如此的不相干，以至于所有的一切永远都绝对无法统一起来。”正是欧文自己的社会发现使得他本人超越了基督教，并在基督教之外达到了一个高度。他抓住了真理，因为社会是真实的，人类最终必须服从社会。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通过认识社会现实而达到改造人类意识的基础之上

的。他写道：“如果人类即将获得的新能力不能消除人类自身堕落的任何原因，那么人类将会知道，那些罪恶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人类也将停止发出幼稚而又无效的抱怨。”

欧文对那些新的能力可能抱有夸大的想法，否则他几乎就不可能向拉纳克县的地方官们建议说，应该按照他从自己的农村公社里发现的“社会核心”，立即对社会进行重新发动。这种想象力的洪流是这位天才的特权，若不是他，人类就可能因为对本身缺乏了解而无法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他所指向的那一拿不走的自由疆界，那是为了消除社会的邪恶而设定的必要界限。但是，欧文觉得，只有在人类借助其获得的新能力对社会进行变革之后，那一自由的疆界才会变得显而易见。然后，人类就会以一种不带幼稚抱怨的成熟的精神面貌接受这一疆界。

1817年罗伯特·欧文描述了西方人已经踏上的那条道路，他的话概括了那一大有希望的世纪的问题。他指向了制造业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任由制造业自然前进的话”。“制造业在整个国家的普及，使得其居民具有一种新的特征；随着这一特征在非常不利于个人或大家幸福的基础上形成的时候，它将产生最可悲而又持久的罪恶，除非它的走向能够受到立法干预和监督的阻击。”以获利原则组织整个社会，肯定会产生意义深远的结果。他从人性的角度阐述了这些结果。因为新的制度体系的最明显的结果是，原定居人口的传统特征遭到破坏，他们转变为某种新型的人，例如，变成定居性的或者游牧性的人，缺少自尊和纪律，变得野蛮而无情：劳动者和资本家就是典型的新人类。他进一步概括说，所凭借的那一法则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幸福。这种模式会产生严重的罪恶，除非市场制度的固有倾向可以通过合法的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加以控制。不错，他所悲叹的劳动者的生存条件，部分是由“补贴制度”造成的。但是，从本质上说，他的观察结果对城镇和农村劳动者而言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比引进那些工厂之前更加堕落而悲惨，他们的起码生计现在就依赖于那些工厂的成功。”他在此再一次

把话讲到底了，他强调的不是收入，而是堕落和悲惨。他再一次正确地指出了这一堕落的主要原因，是把起码的生计寄托在工厂身上。他抓住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看起来主要表现为经济问题的东西，在本质上却是社会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工人肯定是被剥削者：因为工人没有参与自己有权进行的交换。不过，这一点尽管重要，但它却远不是全部。虽然一个工人受到剥削，但他在经济上可能比从前宽裕了。但是，有一个相当不利于个人和大家幸福的法则，正在破坏他的社会环境、他的居住环境、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手艺，总之，他从前的经济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关系环境都在受到破坏。工业革命正在引发一场范围巨大的社会秩序变动，而贫困问题仅仅是这场革命的经济方面的事情。欧文的断言是正确的，即如果不对这些破坏性力量采取立法干预和控制方面的对抗措施，巨大而持久的灾祸就会接踵而至。

他当时没有预见到，他所呼吁的社会自我保护会被证明与经济体系自身的运行不相协调。

二、社会的自我保护

第十一章

人、大自然和生产组织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动力受到双重趋势的支配：市场在不断地扩大，然而这种扩大的趋势受到有明确方向的相反趋势的抑制。尽管那种相反趋势对社会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最近的分析显示它与市场的自我调节是不相容的，因此它也与市场体制本身相抵触。

那种体制以跳跃式的方式发展。它吞噬空间和时间，通过创造银行货币，它带来了一股迄今未知的动力。大概在 1914 年，当那种体制达到它的最大程度时，它把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所有的居住者以及那时尚未出生的后代、自然人以及被称为公司的巨大的虚拟实体都包括在内。一种号称自基督教开始传播的那个年代以来，并以空前绝后的广泛性在这个行星上传遍一种生活新方式，只不过这一次这种趋势处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

不过，同时有一种相反的趋势在发展。这种趋势已经不仅仅是社会面对变革时一种通常的防御行为；这种趋势是对抗混乱的一种反应，这种混乱已经攻击了社会结构，而且可能会破坏正是由市场创造出来的生产组织。

罗伯特·欧文的洞察是正确的：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就会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

生产是人和大自然的互动。如果人们通过自我调节的易货贸易和交换机制来组织这个过程，那么必定会将人和大自然带到市场体制的轨道上。人和大自然必定受制于供求关系，换句话说，都会被作为商品、作为生产出来供出售的货物来对待。

这种情形恰恰是根据市场机制来安排的。人以劳动力的名义、自然以土地的名义供出售；人们可以用一种被称为工资的价格来到处购买和出售对劳动力的使用，人们也可以通过协商来达成一种被称为租金的价格来对土地的使用。既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也有土

地市场的存在，两种市场的供求关系分别受到各自市场的工资和租金高度的调节；劳动力和土地有待出售的假定一直受到支持。因此，出于不同部门之间自动平衡收入的要求，投资在不同的劳动力和土地组合的资本能够从一个生产部门流向另一个生产部门。

但是，尽管在理论上人们能够这样组织生产，但是**这种商品假设漠视将土地和人的命运留给市场的事实，在效果上无异于摧毁土地和人**。因此，那种相反的趋势存在于抑制与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有关的市场的行动之中。这就是干预主义的主要作用。

生产组织也受到相同领域的威胁。就生产组织受价格水平变化影响而言，这种危险是针对整个行业的，无论其是工业、农业或商业行业。因为在市场体制下，如果价格下跌，那么业务量就会削减；除非成本的所有要素同比例下降，否则“运作的公司”被迫倒闭，尽管价格的下跌很可能并不是由于成本的全面下跌，而只不过是出于货币体制的组织方式。事实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就是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之下发生的情况。

理论上，这里的购买力是由市场行为自身提供的并受其调节；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说货币是一种商品的时候，它的数量取决于这种商品碰巧作为货币发挥作用时的供求关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货币的古典理论。根据这种学说，货币只是相比其它商品更经常地被用于交易的一种商品的另一个名字，所以人们占有货币的主要目的是方便交易。是否使用兽皮、牛、贝壳还是黄金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重要。作为货币发挥作用的物体的价值取决于这种情况，即好像人们寻求它们只是因为它们的用途与营养、衣着、装饰或是其它目的有关。如果黄金恰好被用作货币的话，那么它的价值、数量以及运动是受到完全相同的法则支配的，而这种相同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其它商品。所有其它的交易手段都会涉及到在市场之外货币的发行，无论由银行还是由政府发行货币，都会对市场自我调节构成一种干预。这个关键点是：（1）作为货币的商品与其它商品没有什么不同；（2）它们的供求如同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样受到市场的调

节；（3）因此，除了作为间接交易的手段外，所有赋予货币其它特征的观念在本质上是错误的。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如果黄金用作货币，假如存在纸币的话，纸币必定会代替黄金。李嘉图学派正是根据这种学说期望英格兰银行统筹货币的供应。确实，再也想不到其它的方法能够阻止政府“干预”货币体制，从而保证市场的自我调节。

因此，就商业来说，存在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就社会的自然和人力财富而言的情况。出于基本上相似的理由，自我调节的市场对它们全体都是威胁。如果就劳动力来说，人们需要工厂立法和社会法律来保护产业工人不受商品假设的影响；如果人们需要创造土地法和农业关税来保护自然资源和农村文化免受与它们有关的传统商品的影响；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人们需要中央银行和对货币体制的管理来保护制造业和其它生产型企业免受包含在传统商品内的应用于货币的危害。相当荒谬的是，不单是人类和自然资源、而且就连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组织都有必要寻求保护，免受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毁灭性影响。

让我们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双重趋势。它可以体现为社会的两种组织原则的行为，其中每一种趋势为自己规定了具体的制度上的目标，拥有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并且使用它自己的独特方法。其中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旨在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依赖的是贸易阶层的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它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保护的原则，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

对阶级的强调是重要的。地主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塑造了 19 世纪的整个社会的历史。因为它们有能力承担源自社会总体状况的不同功能的职责，所以它们各自发挥作用。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承受者，总的来说，它们的商业利益跟生

产与就业有关的一般利益并行；如果生意兴荣，那么所有人都有就业的机会，土地所有者有机会收到租金；如果市场扩大，人们就能够自由和容易地投资；如果贸易界成功地与外国竞争的话，那么本国货币就是安全的。在另一方面，贸易阶层缺乏能够察觉危险的机构；那些危险涉及榨取工人的体力、破坏家庭生活、破坏邻里关系、滥伐林木、污染河流、工艺标准的退化、社会习俗瓦解以及生存总体水平的下降，这种生存包括房屋和艺术、还有无数并不影响利润的私人和公共的生活方式。通过发展一种几乎是神圣的信念，即认为利润是普遍的善行，中产阶级以此履行它们的职责，即使这种信念剥夺了它们成为对于幸福生活的重要性一如对于促进生产的重要性的其它利益的保护者的资格。这里的机会就留给了那些从事的活动并不需要应用昂贵、复杂和特殊的生产机械的阶级。粗略地说，确保国家的军事能力的目标落在了地主贵族和农民身上，这种能力仍然主要依靠人和土地；同时，在或小或大的程度上，已经是无家可归的劳动人民变成为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这一或那一时间，即使它们没有意识到，每一个社会阶级代表着比它本身更广大的利益。

在 19 世纪来临之际——此刻普选权变得相当普遍——工人阶级在本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另一方面，倒向立法机构一边的贸易阶层不再不受挑战，变得特别注意与它们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有关的政治权力。只要市场体系继续在没有大的压力和张力的情况下运作，这种奇特的影响力和权力的定位就不会造成麻烦；但是，当出于内在的原因情况不再是这样、并且当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发展的时候，因为斗争的各方使得政府和企业、国家和行业分别成为它们的大本营，所以社会本身处于危险状态。人们使用和滥用政治和经济这两种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派别利益的斗争武器。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危险的僵局导致在 20 世纪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危机。

因此，我们打算从这两个角度来概述形成 19 世纪社会史的趋势。一种是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保护之间的冲突角度

来提出的，而这种社会保护导致根深蒂固的体制上的紧张关系。另一种是从各阶层之间的冲突的角度提出的，它与第一个角度相互影响，从而把那种危机转化为灾难。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

经济自由主义是社会的参与创建市场体制时的组织原则。经济自由主义在产生之初只不过是对于非官僚主义方法的一种偏好，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它发展成为对人类进行世俗救赎的真正信仰。这样一种盲信是它发现自己所承担的任务突然加重：无辜的人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以及大范围的连锁变化包括了新秩序的建立。自由主义信条认为它的传道热情只不过是对于得到全面配置的市场经济需求所做出的反应。

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人们把实施自由放任政策的日期提前到18世纪中叶在法国第一次使用这个流行语的时候，而这样做完全缺乏历史依据。有把握的说法是：直到再经过两代人的时间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才不再是时有时无的倾向。只有在19世纪20年代它才代表了三条古典原则：劳动力应该在市场上找到其价格，货币的发行应该受到自动调节机制的约束，货物应该在不受阻碍或是优惠关税影响的情况下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简而言之，它象征着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

将对这种情况的设想归因于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绝不奇怪。为了保证农民、佃农和地主得到更好的收入，重农主义者在重商主义的世界里所要求的只是谷物的自由出口。至于其它，他们的“自然法则”(ordre naturel)只不过是被认为是全能和无所不知的政府对工业与农业实施管理的指导性原则。魁奈的著作《格言》(Maximes)打算为这样的政府提供需要转化为实用政策的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依据的是“经济表”(Tableau)中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以由他定期提供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的概念差不多从来没有进入他的脑海。

英国人也狭义地解释自由放任；自由放任意味着在生产中免受规章制度的制约，贸易并不包括在内。那个时代的奇迹即棉织品制

造业已经从无足轻重的地位发展成为英国重要的出口产业，然而仍有明确的法规禁止进口印花棉布。尽管对国内市场的传统垄断，但是对于白洋布或细棉布还是给予出口津贴。尽管曼彻斯特的棉布工厂主认识到禁止纺线出口意味着他们会生意上带来损失，但是由于保护主义太根深蒂固了，所以他们还是在 1800 年要求禁止纺线出口。在 1791 年通过的一条法令把原本用于惩罚出口制造棉布货物的设备扩大到出口模型或技术规范。棉布行业的自由贸易的起源是一个神话。在生产领域里摆脱管制是整个行业所期望的，而在交易领域内人们仍然认为不受管制是一种危险。

人们也许认为，生产的自由会从纯粹技术领域自然地伸展到劳动就业的自由。然而，曼彻斯特在相对较晚的时期才提出劳工自由的要求。棉布行业从来没有受到《技工法》的影响，因此每年一度的工资评估或学徒规则没有妨碍这个行业。另一方面，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很猛烈地反对《旧济贫法》(Old Poor Law)，对工厂主来说是一种帮助：它不仅向工厂主提供依赖教区救济的学徒，而且允许他们免除自己对被他们开除的雇员的责任，从而将大部分失业雇员的负担扔给公共资金。起先棉布工厂主并不欢迎斯品汉姆兰制度：只要津贴的道义效果没有减少劳工的生产能力，该行业就会有充分的理由把家庭资助 (family endowment) 看作是一种帮助，这种帮助可维持对巨大的贸易波动所急需的劳动力储备。在农业就业方面仍然以年为期限的时代，提供这样的流动劳工的储备对在扩展时期的产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工厂主对《居住权法》进行了抨击，指责该法妨碍了劳工的实际流动。然而，在 1795 年之前，该法并没有被废止，就《济贫法》而言，只是被更多而不是较少的家长式作风所代替。贫困依然只是乡绅和乡下居民的关注对象。即便像伯克、边沁和马尔萨斯一样对斯品汉姆兰制度激烈批评的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农业管理合理原则的倡导者，而不是工业进步的代表。

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才迸发为改革运动的激情，

而*自由放任*成为战斗的信条。工厂主阶层迫切需要修改《济贫法》，因为《济贫法》阻碍了产业工人阶级工资的上升，产业工人阶级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工作成就。在创建自由劳动力市场时所包含的风险大小现在变得显而易见，不动产的牺牲者所遭受的痛苦程度也显而易见。因此，到19世纪30年代初期，情绪的急剧变化是明显的。1817年再版的汤森的《论文》（Dissertation）中包含了一篇赞美作者远见的绪言，称赞作者给《济贫法》所造成的压力以及彻底废止该法的要求；但是，编辑提出警告，认为作者提议政府应该在10年以内的短时间内废除对穷人的救济院外救济是“卤莽的和贸然轻率的”。李嘉图的《原理》于同年发表，该书坚持废除津贴制度的必要性，但是强烈主张只应该逐步废除它们。亚当·史密斯的信徒皮特则认为废除津贴会造成无辜的人的苦难，他反对这样的做法。一直到1829年，皮尔（Peel）“不相信除了渐进之外还有其它方法能够安全地废除津贴制度。”¹然而，中产阶级在1832年取得政治胜利后，《济贫法修正案》以最为极端的形式出台并且没有任何宽限期就仓促实施。*自由放任*被催化为一种不妥协的暴行的动力。

类似的能够把经济自由主义从学术兴趣催化为无限活动的情况发生在产业组织的两个其它领域：货币领域和贸易领域。在除了极端的解决方案之外，其它解决方案都无效的情况变得明显的时候，与这两种*自由放任*有关的思想成为人们热诚拥护的信条。

英国是以生活费用普遍上升的形式第一次认识到货币问题。在1790年到1815年之间物价翻了一番。实际工资下跌，而且商业受到汇率暴跌的打击。可是，直至1825年的经济恐慌，健全的货币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当李嘉图的原则已经深深印在政治家和商人的脑海时，“标准”才得以维持，而不管财政上的损失数字如何巨大。这就是金本位制的自动导航机制成为人们坚定不移的信念的开始，如果没有金本位制，市场体系就无法启动。

¹ 韦布夫妇（Webb, S and B），在上面所引的著作中。

国际自由贸易涉及到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任的行为。它的含义极为丰富。它意味着英国的食品供应将依靠海外的来源；它意味着如果有必要，将牺牲英国的农业，并且呈现出生活的新形式，在这种新形式中英国将成为不那么清晰的想象中的未来世界整体的主要部分；它意味着这样的全球社会将肯定是和平的社会，如果不是的话，必须使用大英帝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来保证这个世界的安全；它意味着英国将以对自己出众的创造和生产能力的坚定信念来面对持续的产业混乱（industrial dislocation）的这种可能性。然而，人们认为只有全世界的谷物能够自由地流入英国，那么英国的工厂才能够低于全世界的竞争者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此外，如何衡量所需的决心取决于任务的重要性和完全能够接受风险的范围。然而，做不到完全接受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毁灭。

只要它们被分别看待，*自由放任*信仰的乌托邦根源就不被人们完全理解。它的三条原则——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和国际自由贸易——形成一个整体。只有确保其它两个原则同时能够成功，否则满足三个原则中的任何一个原则的牺牲都是无价值的，如果不是令情况更差的话。那是要么全胜，要么彻底失败的局面。

例如，任何人能够理解金本位制意味着致命的通货紧缩的危险，而且，也许金本位制意味着当经济恐慌时的货币的致命短缺。因此，只有当工厂主得到以有利可图的代价扩大生产规模的保证（换句话说，只有在工资至少按价格总体下降的比例而下降，使得他们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他们才能够期望自己支撑下去。因此，1846年的“反谷物法案”是1844年皮尔的“银行法”的必然结果，并且这两部法都假定，自1834年的《济贫法修改法》以来，劳动阶级在饥饿的威胁下被迫最大限度地付出，因此依据谷物的价格调整工资。这三种重要手段形成连贯的整体。

人们现在看一眼就能够理解经济自由主义席卷全世界。正是世界规模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能够保证这种巨大机制的运行。除非劳动

力的价格取决于所提供的价格最便宜的谷物，否则就不存在那些无防护的产业不会屈服于人们自愿接受的监工（即黄金）支配的任何保证。在 19 世纪，市场机制的扩大是同时也意味着扩展国际自由贸易、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金本位制；它们同属一类。难怪一旦这种冒险行动的巨大危险变得明显时，经济自由主义变成了世俗的信仰。

*自由放任*并不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如果仅仅是让其自然发展，自由市场决不会形成。正如最主要的自由贸易行业，即棉布制造业是通过保护性关税、出口津贴以及间接的工资津贴的帮助之下成气候的，*自由放任*本身是由国家强迫推行的。30 年代和 40 年代不但经历了撤销限制性规章制度的立法活动的激增，而且也经历了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得到巨大的增强，这些职能现在被赋予能够履行自由主义信徒所设定任务的中央级的官僚机构。对典型的功利主义者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一项应该为最大数量的人谋取最大幸福的社会项目；*自由放任*并不是实现某个目标的方法，而是需要实现的目标。确实是这样，除了撤销有害的限制以外，立法机构不能直接做任何事。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做任何事情，尤其是间接地做。恰恰相反，实用论的自由主义者把政府视为实现幸福的最大机构。边沁认为，就物质福利而言，与“警务部部长”的无意识贡献相比，立法机构的影响力“几乎为零”。经济取得成功需要三件东西：嗜好、知识以及权力，而普通人只拥有嗜好。边沁使人们认识到，让政府管理知识和权力比让普通市民来做便宜得多。收集统计数据和信息、促进科学和实验以及提供无数的最终实现的手段是在政府职责范围内执行的任务。边沁式的自由主义意味着通过行政管理机关的行动代替国会的行动。

这方面范围很广。正如发生在法国的一样，英国的极端保守主义并没有通过行政管理手段，而只是运用国会立法实施政治压制来管理的。“1785 年的革命运动与 1815 年至 1820 年之间的革命运动并不是由行政部门行动引起的战斗，而是国会立法引起的战斗。《人

身保护令》的暂时废除、《诽谤法》的通过以及 1819 年的《六法规》（Six Acts）的通过都是极其严重的强制手段；但是它们并没有企图赋予行政管理机关以任何欧洲大陆特点的迹象。就破坏个人自由的范围而言，《国会法》和《国会法》的实施破坏了个人自由。”² 经济自由主义者在 1832 年刚赢得对政府的影响，就改变立场，完全赞同行政管理手段。“在立法活动的最终结果赋予其特色的自 1832 年开始的那个阶段里，虽然强度各有不同，但是非常复杂的行政机构一直在逐步地得到加强，而作为现代制造业工厂的这样的机构始终处于需要修理、重新构建和适应新要求的情形之中。”³ 行政机构的这类增长反映了功利主义的精神。边沁的寓言般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是最具其个人色彩的乌托邦，它是一所星状的建筑物，在全景监狱的中心，监狱狱警能够以最小的公共成本将最大数量的囚犯置于最有效的监视之下。同样，在功利主义的国家里，他所喜爱的“检查”原则保证高高在上的部长能够有效地控制所有地方上的行政机构。

通向自由市场的路已经打开，并且由中央的组织 and 控制的持续干预的巨幅增加来保持这条道路的开放。要使得亚当·史密斯的“简单而自然的自由”符合人类社会的需要是最复杂的事务。经历了在无数圈地法中的条款的复杂性；官僚机构的控制数量包括了《新济贫法》的管理，自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中央机构第一次有效地监管了《新济贫法》；政府行政管理的增加需要很好地完成地方自治的改革。然而为了组织一些简单的自由，例如，土地的自由、劳动力的自由或地方自治的行政管理的自由，所有这些政府干预的据点被建立了起来。与人们的预期刚好相反，正如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发明没有减少、反而实际上增加了人类劳动力的使用，自由市场的引入

² 雷德利克（Redlich）和赫斯特（Hirst, J.），《英国的地方政府》第 2 卷，240 页，引用在 A·V·德西的《英国的法律和评价》，第 305 页。

³ 伊尔伯特（Ilbert），《立法的方法》，第 212~213 页，引自 A·V·德西，如前所引之书。

远没有摆脱对控制、管理以及干预的需要，它们的需要反而大大地增加了。行政官员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以确保该体制的自由运作。因此，即使是那些最热烈地希望免除国家所有不必要责任的人们以及那些所有指导思想在于要求限制国家行动的人们不得不把建立*自由放任*所需的新的权力、新的机构以及新的手段委托给自同的国家（self-same state）。

另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超过了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尽管*自由放任*的经济（Laissez-faire economy）是国家有意作为的产物，但是随后的对*自由放任*的限制以自发的方式开始的。*自由放任*被列入计划，但是计划的过程没有被列入计划。上面提到的这个断言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如果说曾经存在过有意识地利用执行仔细考虑过的政府管理政策的政府部门，那么对边沁主义者而言，这是*自由放任*的全盛时期。后半部分最初由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德西（Dicey）提出以供探讨，他把探究“反*自由放任*”的起源作为他的工作，换句话说，正如他称之为英国公众舆论中的“集体主义”的潮流的起源作为他的工作。19世纪60年代的后期这种潮流的存在变得明显了。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对发现除了*立法机构本身的行为以外*无法追踪到任何证明这种潮流存在的证据。更确切地说，在那些似乎代表了这种潮流的法律之前，没有发现“集体主义的潮流”存在于公众舆论之中的证据。至于后期的“集体主义”的意见，德西推断“集体主义”的立法本身可能就是它的主要来源。德西明察秋毫的调查结果表明，就那些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直接负责制定限制性法律的人而言，他们绝对缺乏任何故意扩大国家的职能或约束个人自由的意图。正如在186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所发展的情形那样，对自我调节市场对抗行动的立法先锋证明是自发产生的，没有受到舆论的引导，而是受到纯粹的实用主义精神的驱使。

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对这个观点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的全部社会哲学取决于*自由放任*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概念，而随后的反*自由放任*的立法是自由主义原则的反对者有意而为的结果。在这两种

互斥的完全相反的解释中，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影响到今天是不是事实就没有必要多说什么了。

像斯宾塞和萨姆纳（Sumner）以及米泽斯和李普曼这样的自由主义的作家对这种双重趋势所做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自己所做的解释相同，但是他们对此提出的解释却完全不同。按照我们的观点，自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不切实际的，而现实的社会自我保护阻止了它的进程。而按照他们的观点，所有的保护主义都是错误的，是由急躁、贪欲和眼光短浅引起的；如果没有保护主义，市场就会解决它的困难。这两种观点究竟哪一种正确，也许是近代社会史的最重要的问题。它所涉及到的其实就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所声称的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决定。在我们转向以事实说话之前，有必要更确切地表述这个问题。

回头看的话，人们将会认为在我们的时代看到了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人们看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声望达到顶点。通货膨胀的灾祸折磨着数亿人。这种灾祸剥夺了所有社会阶级、所有国家的财产。稳定货币成为人民与政府的政治思想的焦点。恢复金本位制成为经济领域里全部有组织的努力的最高目的。人们认为偿还外债以及回到稳定的货币就是政治理性的标准，而且人们认为没有个人的困苦、没有对主权的侵犯比牺牲货币的安全来得更大。人们甚至认为，为满足健全的预算和健全的货币的要求，因通货紧缩而失去工作的失业者的穷困、解职时连微薄的补偿也没有的公务员的贫穷、甚至放弃国家的权利和损失宪法的自由都是合理的代价；这些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验推论。

30 年代活着的人们看到了 20 年代的绝对性被置于怀疑之下。在经过实际上货币复原和预算平衡的若干年后，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即英国和美国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抛弃了金本位制并且着手管理它们的货币。国际债务被大规模地拒绝清偿，而最富有和最受尊敬的人漠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在 30 年代中期，依然坚持金本位制的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实际上受英国和美国的财政部的逼迫而放弃金

本位制，而英美这两个国家先前是自由主义信条的不容违背的的捍卫者。

在 40 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甚至遭受了更为不幸的失败。虽然英国和美国背离货币的正统学说，但是它们在工业和商业、它们经济生活的一般组织中保留着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手段。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创造和培养了独裁政治必定带来经济大灾难的错觉，所以这就被证实为促使战争突然发生以及赢得战争的障碍的一种因素。由于这样的信条，即使当民主政府本身碰巧为环境所逼而实行这些办法时，它们也是最后才理解管理货币和指导贸易的含义；同时，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平衡预算和自由企业的名义挡住了及时重振军备的道路，而重振军备被认为是处于战争状态时提供经济力量的唯一可靠基础。在英国，预算和货币的正统学说导致对传统的战略原则的忠诚，即使国家事实上面对全面的战争，这原则也只做出有限度的奉献；在美国，既得利益集团——例如，从事石油和铝行业的集团——使自己躲在自由企业的禁忌后面以及成功地抵抗为工业的紧急情况作好准备。要不是建立在他们谬论上的固执和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的热情，民族的领袖和大多数自由人就可以为这个时代的严酷考验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他们也许甚至有完全避开这个时代的严酷考验。

拥抱整个文明世界的社会组织世俗原则并没有被 10 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所改变。同时在英国和美国，数以百万计的独立企业单位的存在是从*自由放任*原则中衍生出来的。*自由放任*原则在某一领域的惊人失灵并不破坏它在所有领域中的权威。确实，*自由放任*原则的部分衰落可能加强了它影响力，因为它使它的拥护者认为，不完善地使用*自由放任*原则是部分衰落的原因，并把所有困难都归咎于此。

实际上，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现在留下的最后的辩论。它的辩护者在无尽的变奏曲中重复着，即要不是批评家鼓吹那些政策，自由主义就已经履行诺言；那并不是竞争性的体制和自动调节的市场，

而是干涉那体制和干预那市场是造成我们灾难的原因。这一辩论不仅没有发现支持最近无数次侵犯经济自由，而且也没有发现支持这样一个明确的事实：自动调节市场体制的扩展运动在 19 世纪后半叶遭遇了一股持久性的逆向运动，并阻碍了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自由运转。

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能够阐明一种情况，即把现和过去连接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试问有谁能够否认政府干预企业可能会破坏信心？试问有谁能够否认如果没有根据法律提供失业救济金这回事，失业有时反而会再少些呢？试问有谁能够否认市政工程的竞争损害到私人企业？试问有谁能够否认财政赤字可能会影响到私人投资？试问有谁能够否认家长式的作风往往会抑止企业的主动性？当今就是这样，当然，过去也是这样。在大概 19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一股全面的保护主义运动——社会的和国家的——在欧洲兴起，谁可以怀疑保护主义运动妨碍和限制贸易呢？谁可以怀疑工厂法、社会保险、市政商业（municipal trading）、公共医疗服务、公用事业、关税、津贴与补助金、卡特尔*与托拉斯、对移民、资本转移和进口的限制——更不用说那些较少公开的对人、物、支付款流动的限制——必定对竞争性体制发挥作用起了很多阻碍作用，从而延长了经济萧条的时间，恶化了失业状况，加深了金融低潮，减少了贸易量，严重地破坏了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自由主义者坚持，所有不幸的根源就是这种对就业、贸易和货币自由的干预，这种干预是自 1875 年以来社会的、民族的和垄断性的保护主义的不同派别实施的；要不是由垄断性的工厂主和土地利益集团组成的工会和工党的非神圣同盟（unholy alliance），要不是由于他们目光短浅的贪婪，从而把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自由经济，这个世界就会在今天享受这种成果：建立物质福利的一种几乎自动的体制。自由主义的倡导人从不厌倦于唠叨：19 世纪的悲剧来自于人类没能力对早期的自由

* 卡特尔（cartels）：亦可译为“垄断集团”——译者注。

主义者们的启示保持信心；我们先辈的许许多多进取心受到民族主义、阶级冲突（class war）、既得利益者、垄断者以及以上提到的所有因素的阻挠，同时也受到工人阶级对无限制的自由经济对全人类利益，包括工人阶级利益在内的最终恩惠的不了解的阻挠。自由主义的倡导人声称，人民群众在智慧和精神上的弱点阻挠了很大部分智慧和精神的提高；自私自利的影响力使已经取得的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化为乌有。简言之，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辩护词。如果这种辩护词不被驳倒，它将在这个辩论赛中继续做令人厌烦的长篇发言。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旨在推广市场体制的自由主义运动遭遇到了保护性的逆向运动，这种逆向运动趋向于对市场体制的约束；事实上，这样一种假设解释了我们自己的双重趋势的论点。但是，尽管我们断言自动调节的市场体制思想的内在的谬论性最终会破坏社会，但是自由主义者谴责那些最富于变化的异议分子破坏了伟大的进取心。未能够举出证据，证明所有那样的协同效果阻碍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者不得不求助于秘密行动的几乎不能反驳的假设。这就是反自由主义阴谋的荒诞说法，所有自由主义者相同地以某种形式采取这阴谋论来解释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发生的事件。民族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的崛起通常被认为是改变环境的主要因素；工厂主协会和垄断者、土地利益既得者和工会被认为是反面角色。因此，在它最高精神化形式，自由主义学说假设在现代社会一些辩证法定律的使用使文明理性的努力显得愚蠢，而在它最直言不讳的形式，自由主义学说使自己攻击政治民主主义，例如，所谓的干涉主义的主要动机。

各种事实的证据明确地驳斥了自由主义者的论点。反自由主义者的阴谋纯粹是阴谋。“集体主义者”逆向运动出现的不同形式并不是由协同的利益集团的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任何偏爱引起，而是独有地由市场机制膨胀影响到重要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利益引起。这说明那几乎是全体杰出人物的反应，这种反应是那机制的膨胀引

起的。知识分子的特性在这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此，偏见没有余地，自由主义者把偏见认作为藏在反自由主义发展后面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尽管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经历了正统自由主义的结束是事实，尽管当今所有关键问题可以追溯到那些年代是事实，但是如果说社会保护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变化，是由其它任何原因而不是由人们认识到自动调节的市场体制内在的弱点和危险引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况能够以不止一种方式来表示。

第一，人们处理问题的行动存在惊人的差异。单单这种情况将会排除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让我们引用干预的一张列表，该列表由赫伯特·斯宾塞在 1884 年编纂，当时人们指责自由主义者为了“限制性的立法”而放弃他们的原则。⁴ 研究对象的多样性难以再多。在 1860 年，政府被赋予权力“从地方税中支出，向分析员提供食物和饮料”；接着出台规定“检查煤气工程”的法令；并对原有的《开矿法》做了补充，规定“雇佣不上学低于 12 岁的文盲男孩要受到惩罚”。在 1861 年，“《济贫法》的监护人被赋予权力，好让他们执行接种疫苗”；地方管理委员会被授权“制定租用交通工具的费率”；一些地方成立的团体被授权“在他们自己所属于的地区对农村排污和灌溉工程以及饲养牲畜供水征税”。在 1862 年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只有单一的通风管道的煤矿”为违法；于同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赋予医学教育委员会独有的权力“供应一套药典，它的价格由财政部制定”。惊恐的斯宾塞写满了数页纸，列举了这些或类似的法案。在 1863 年，出现了“强制性的接种疫苗延伸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情况。另有一项法案，委任检查官员负责检查“卫生食物和不卫生食物”；有一个《烟囱清洁工法》，目的是防止派儿童去清扫太狭窄的烟囱通道而导致受到折磨以及最终导致死亡；《传染病法》；《公共图书馆法》赋予地方政府权力，即“为了他们的图书，多数人可

⁴ 赫伯特·斯宾塞，《人与国家》，1884 年。

对少数人征税”。斯宾塞举出了那么多的证据，它们都是反自由主义者阴谋的不可反驳的证据。可是，这些法案中任何一个法案都是用以处理某些由于现代工业环境引起的问题，这些法案旨在维护某些公共利益，避免现代工业环境的危害，或是避免依凭市场手段处理这些问题必然带来的危害。对没有偏见的人们，它们证明了“集体主义的”的逆向运动拥有完全实际的和注重实效的特点。大多数执行这些法案的人们深信*自由放任*的支持者，他们肯定不希望他们同意在伦敦成立消防队来暗示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表示不满。正好相反，这些立法机关创制的法的支持者通常对社会主义反对者不妥协，或者对集体主义的任何其它形式不妥协。

第二，从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法到“集体主义的”解决办法的转变有时是发生在一夜之间，那些参与立法酝酿过程的人们就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快的转变。德西举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工人伤残赔偿法》处理工人在他们的受雇期间因工受伤时雇主的责任。自从1880年以来，包含这种思想的许多不同法案的历史说明对个人主义的原则的一贯拥护，这原则要求雇主对他的雇员的责任必须受到管制，管制的程度是严格地无异于法律规定雇主对其它人，例如，对陌生人的责任。在观念上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1897年，雇主突然间成为他雇员的承保人，即在雇员的受雇工作期间提供因工受伤保险，正如德西公正地评论，这是“彻底地集体主义的立法”。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可以列举，这种转变没有导致反自由主义原则取代自由主义原则，这种转变不管是涉及利益种类的，或者是这事件所带来的观念的倾向，唯一除外的是环境的演变，在此之下问题的发生以及解决办法的找到。

第三，通过比较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方面普遍存在差异的不同国家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间接的，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和俾斯麦的普鲁士相差很远，它们两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或是哈布斯堡帝国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它们两国都经历了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时期，接着在公共卫生、工厂环

境条件、市政商业、社会保险、海运津贴、公用事业、企业协会等方面经历了反自由主义立法时期。很容易制作一张定期的罗列了各年事件的一览表，在这张表中类似的变化发生在不同的国家。英国在 1880 年和 1897 年，德国在 1879 年，奥地利在 1887 年，法国在 1899 年制定和颁布了工人伤残赔偿法；英国在 1833 年，普鲁士在 1853 年，奥地利在 1883 年，法国在 1874 年和 1883 年推行工厂检查法；19 世纪 70 年代不信奉国教者和资本家约瑟夫·张伯伦在英国伯明翰市引入了包括经营公用事业的市政商业；19 世纪 90 年代信奉天主教的“社会主义者”和迫害犹太人的卡尔·路易克（Karl Lueger）在维也纳帝国引入了市政商业；许多地方联盟在德国和法国的自治市引入了市政商业。如在维也纳，支持力量在一些情况下显得极端保守和反社会主义，如在伯明翰市，支持力量在另一些场合中则显得“极端的帝国主义”，或是，好像法国里昂市长爱多艾德·赫里欧（Edouard Herriot）纯粹地对自由主义的呼唤。在新教徒的英国，保守党内阁和自由党的内阁断续的努力争取工厂立法的完成。在德国，罗马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党员参与完成工厂立法；在奥地利，教会和它最好战的支持者参与完成工厂立法；在法国，教会的敌人和激烈反对教权的人们负责制定几乎相同的法律。因此，在一系列的国家中，多数的政党和各阶层尽管站在最不同的标语下，抱着非常不一样的动机，但是面对一大堆复杂的问题时实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法案。从表面来判断，没有什么比推断他们是秘密地被相同的思想观念和目光短浅的利益团体所驱使的更加荒谬，像传说中这些利益团体是反自由主义的共谋者。与此相反，所有的事件往往会支持这个假设，即具有说服力的客观原因强迫立法者表态。

第四，重要的事实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非常重要的明确案例中，经济自由主义者自己在不同的时期提倡对契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和自由放任加以一定的限制。反自由主义的偏见自然不可能是他们的动机。我们在一方面重视劳工协会的原则，而在另一方

面关注工商业公司的法律。前者涉及在企业中工人的权益，争取他们工资的提高；后者涉及托拉斯、卡特尔的权益，或是资本主义联合企业的其它形式权益，目的是提高价格。对于契约自由或者*自由放任*曾被使用在抑制交易中的这两种指责都是公正的。是劳工协会争取工资的提高，还是企业协会争取价格的提高正被讨论中，利益方很明显地利用*自由放任*原则来缩小劳动力市场的供应量或其它商品市场的供应量。从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和西奥多·罗斯福到瑟曼·阿诺德（Thurman Arnold）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两个其中之一的案例中，这些自由主义者长期拥护的*自由放任*屈服于人们对自由竞争市场的需求是有极大意义的；他们迫切要求规章制度和限制，迫切要求刑事的法律和强制，他们的辩论是任何一个“集体主义者”都会做出的辩论，指出无论工会或是企业正在“滥用”契约自由。理论上，*自由放任*或是契约自由意味工人，如果他们这样决定，他们个别地或是联合一起地有保留他们的劳动力的自由，它同时意味企业家不用管消费者的愿望有相互协同售价的自由。但是，实践上，这样的自由与自动调节市场的机制相互抵触，并且，在这样的抵触下，*自动调节的市场总是退让它的优先权*。换句话说，如果对自动调节市场的需求被证实与对*自由放任*的需求互相矛盾，那么经济自由主义者背弃*自由放任*以及宁愿——正如任何一个反自由主义者都会这么做——号称集体主义的手段，例如，规章制度和限制。不仅“反托拉法”而且“工会法”都是从此一态度中产生出来。没有任何无可置疑的证据能够提供，除了一个事实，即甚至经济自由主义者自己也有规律地在绝对重要的工业组织的领域中使用“集体主义”的手段，能够说明在现代的工业社会的情况下，使用反自由主义的或使用“集体主义”的手段的必然性。

顺便提一下，它有助于阐明“干预主义”这一术语的真正含意，凭借这术语，经济自由主义者有意于表示他们自己政策的反面，但只是露出了他们思想混乱的迹象。干预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由放任*，

我们刚刚注意到不能把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等同起来看待（虽然一般的用法中，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也是无妨的）。严格地讲，经济自由主义是社会的组织原则，在这个社会组织原则中，工业建立在自动调节市场的机制之上。确实是这样，一旦差不多这样的机制完成时，需要某一类的干预更少。总之，绝不能说市场机制和干预是相互排斥关系。因为，只要这一机制还没有建立，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以及会毫不犹豫地要求国家的干预以便建立这一机制，并且一旦这一机制建立时，以便维护它。所以，没有任何犹豫，经济自由主义者要求国家运用法律的力量；他甚至能够呼吁内战的强暴力量来为自动调节的市场提供它的先决条件。在美国，南部邦联诉诸自由放任的论点来证明奴隶制度是有道理；北部邦联则求助于干预的威力以便成立自由劳动力市场。因此，自由主义的起草人对干预主义的谴责是空洞的口号，这意味着对完全是同一样的行动的谴责，根据他们是否恰巧同意他们。经济自由主义者没有前后不一地坚持的唯一原则是自动调节的市场，不管这一原则是否拖他们进入干预的争论。

总结。针对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的逆向运动拥有自发性反应的所有明显特征。在许许多多分开的要点上，逆向运动开始了，而且它们与直接被影响的利益团体或任何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之间没有任何可追溯的关系。甚至在处理同一问题上，正如工人伤残赔偿的例子中，尽管在经济利益、思想影响力，或在产生影响的政治势力方面没有任何转变，但是解决方法从个人主义的转变为“集体主义的”，从自由主义的转变为反自由主义的，从“自由放任”转变为干预主义的形式，这仅仅是由于更多地认识到了该问题的本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类似的改变，即从自由放任转变为“集体主义”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并显示出经济自由主义者肤浅地把这一过程根本原因的深度和独立性归因于改变中的意愿或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最后，分析家揭示出，即使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拥护者也不能避开这一惯例，而这一惯例会使自由

放任不适用于现代工业环境；对于在“工会法”和“反托拉斯规则”的重要案例中，极端自由主义者自己要求国家多方面的干预，以免遭垄断性的协定，确保自动调节市场运作的先决条件。甚至自由贸易和竞争也需要干预来使之运作。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集体主义者”阴谋的自由主义的神话与与所有的事实恰恰相反。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这双重趋势的解释可以用证据来说明。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如果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的人和自然成分构成威胁，除了形形色色的人们迫切要求某种形式的保护外，你还有别的期望？这就是我们的发现。同样，如果他们没有任何理论的或理性的偏见，你就会期望发生这种情况，不管他们对市场经济原则的态度如何。再说一遍，情况就是这样。此外，我们提出，如果能够说明特定利益团体与出现在许多不同国家的特有的意识形态无关，那么政府的比较史也许对我们的论点提供半实验性的支持。对此我们也能够举出明显的证据。最后，自由主义者他们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在维护贸易自由——用我们的术语说是自动调节的市场——非但不是排斥干预，实际上是要求这样的干预，同时自由主义者的行为也证明了他们自己经常要求国家采取强制性的行动，例如，在“工会法”和“反托拉斯法”的例子中就是这样。因此，至于双重趋势的两个对立的解释中，哪一种解释正确，历史证据是最具决定性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解释是他们坚持他们的政策从未有过机会，他们的政策却被目光短浅的工会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贪婪的工厂主以及保守的地主所扼杀；而经济自由主义的批评家的解释是，他们能够指出，“集体主义者”普遍反对19世纪后半叶的市场经济的扩展，并以此作为结论性的证据，即在自动调节市场的乌托邦原则中这是对社会所固有的一种危险。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接前一章）： 阶级利益和社会改变

在 19 世纪政策的真正基本原则揭示之前，集体主义阴谋的“自由主义者的神话”必定完全会烟消云散。这个现代神话表明保护主义仅仅是造成灾难的土地、工厂主和工会会员的利益集团的结果，这些利益集团自私地破坏市场这一自动化机器。当然，另外一种形式具有相反的政治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各政党使用相同的用语争辩。（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社会和人类非经济的特性上那一马克思的基本哲学思想与与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不相关的。¹）马克思自己追随李嘉图，用经济学术语来定义各阶级，因此，毫无疑问，经济剥削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特点。

在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产生了社会发展的赤裸裸的阶级论。对市场和势力范围的迫切要求只是一小部分资本家谋利动机下的产物。帝国主义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的阴谋，促使政府为了大企业的利益而发动战争。人们认为是这些利益集团和军火商的结合导致了战争，他们奇迹般地取得能力来驱使整个国家陷入与他们重要利益相反的致命政策之中。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从派系利益集团的力量中推断保护主义的运动；解释农业关税是由保守的地主的政治影响力引起的；工业巨头渴望取得利润解释了企业垄断形式的发展；由于商业蔓延引发战争。

因此，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刻板的阶级理论上找到了有力的支持。支持对立阶级、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意味着完全一致的主张。他们建立了一个滴水不漏的例子来支持这一主张：19 世纪的保护主义是阶级行动（class action）的结果，这样一种阶

¹ 卡尔·马克思，“国家经济学和哲学”，出自于《历史唯物主义》，1932 年。

级行动主要满足有关阶级成员的经济利益。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中，他们几乎不能够完完全全地全面看待市场社会和在这样的社会中保护主义所发挥的作用。

事实上，阶级利益只提供了社会内长期趋势的有限解释。与社会的命运由阶级的需求所决定相比，阶级的命运更经常地由社会的需求所决定。假如社会结构不变，阶级理论起作用；但是，假如社会结构本身经历变化，那又将如何？一个变得不起作用的阶级可能会瓦解，并且会在一夜之间被一个或多个阶级所取代。同时，各阶级在斗争中的机会取决于它们有能力赢得它们自己以外成员的支持，这能力又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够履行相比它们的利益更大的任务。因此，除了社会整体形势以外，我们能够理解的既不是阶级的生，也不是阶级的亡，既不是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它们达到目的的程度；既不是它们的合作性，也不是它们的对抗性。

目前，这一整体形势通常由外在的因素产生的，例如气候的变化，农作物的产量，宿敌使用的新武器，新出现的社会责任，或就此而言的达到传统目标的新方法的发现。对于这样一个整体形势，如果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变得明显，派系利益必定最终相关。

在社会的变化中，阶级利益所起的基本作用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任何大范围的变化必定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的不同部分，如果正是因为大范围变化而不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以及经济和文化供给的不同。因此，派系利益是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自然媒介。不管变化的来源是战争还是贸易，是令人吃惊的发明还是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中的不同派系将代表不同的调整方法（包括强制性的方法），以及将以不同的方法调整它们的利益，即从其它团体的方法到它们寻找给其它团体做出榜样的方法；因此，只有当你能够指出招致改变的一个或多个团体时，才可以解释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然而，最终目标由外部力量设定，不过，仅仅对变化的机制而言，社会依赖的是内部力量。“挑战”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反应”则来自团体、派系和阶级。

因此，**仅仅是阶级利益不能够对任何长期的社会进程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第一，因为该进程可能决定阶级本身的存在；其次，因为既定阶级利益确定的目标只是那些阶级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而不管这种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阶级利益不是魔法，不可能从其它阶级获得的支持遗赠给其中的阶级的成员。然而，那些支持是每天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保护主义只是个例子。土地均分论者、工厂主或工会会员为什么希望通过保护主义的行动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取得了成功是问题的关键；商人和工人为什么希望为他们的商品建立垄断权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他们为什么到达了他们的目的是问题的关键；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中的一些团体为什么希望使用类似的方法来行动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这样的团体为什么存在于这些别的不同国家以及同样达到它们的目标是问题的关键；那些种植谷物的人为什么试图以更高价格出售谷物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他们为什么经常能够成功地说服那些购买谷物的人，以便帮助提高谷物的售价是问题的关键。

第二，**对阶级利益的基本经济本性同样地存在错误的理论。**虽然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地以经济因素为条件，但是人类个体动机却异乎寻常地由物质满足欲的需求所决定。人们组织 19 世纪的社会基于这一假设：即物质满足欲的需求变得普遍是当代的特色。因此，当分析社会时，分配相对较大的范围让经济动机得到发展的做法是适当的。但是，我们必须预防臆断这问题，即这样一种的不同寻常的动机能够起作用的确切程度。

与社会承认问题相比，诸如影响到“满足欲”的纯经济问题和阶级行为相对较少地相关。当然，“满足欲”也许是这种社会承认的结果，特别是作为社会公开的告示或奖赏。但是，**阶级利益最直接地涉及到身份和等级、地位和保障，换句话说，它们主要不是经济上的承认而是社会的承认。**

那些断续地参与 1870 年之后的保护主义运动的阶级和团体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才做那样的事。在关键的年代制定的

“集体主义的”法案揭示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牵涉到某一阶级的利益，即使关联到那阶级，那利益也很少被记述为与经济有关。确实地，没有一条法令是为“目光短浅的经济利益”效劳，城镇当局被赋予权力接收被忽略的、装饰用的空地；法规要求至少每半年用热水和肥皂清洗面包烤房；或一条法令强制对缆索和锚检查。这样一些法案只是对工业文明的需要做出反应，而市场方法不能解决工业文明的需要。大部分的这些干预没有直接地影响到收入，而只不过是间接地影响到收入。这几乎适用于所有与卫生和家宅、公众生活福利设施和图书馆、工厂条件，以及社会保险有关的法律。这对公用事业、教育、运输，以及无数的其它问题仍然适用。但是，即使牵涉到金钱的价值，相比其它的利益，它是次要的。专业地位、安全设备和保安措施、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他生命存在的活力、他周围环境的稳定几乎总是被讨论到。一些典型的干预，例如海关关税或工人伤残赔偿金，对人们收入的重要性决不能被低估。但是，即使这些案例中，非金钱利益是不能从金钱利益分割出来的。包含着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的海关税，最终意味着免遭失业的危险，地区环境的稳定性最终意味着企业家们不会遭受破产的危险，也许最重要的是，最终意味着能够避开痛苦地丧失地位，即被迫转到一份他相比原来工作在技能和经验方面都较差的工作。

一旦我们摆脱这一困扰，即决不是全部的，只是局部的利益变得有作用，以及两个相似的、限制着人类团体对他们的金钱收入的关注的偏见，那么保护主义运动的广度和广泛性便失去它们的神秘。当只是与金钱利益相干的人们必要地表达对金钱的关注，其它的利益便享有更广泛的支持者。这影响无数的个人，他们的身份包括邻居、专业人士、消费者、行人、乘车的人、运动员、徒步旅行者、园林工人、病人、母亲、或情人，以及他们能够以任何种类的地方的或功能的协会来表示，例如教会、镇区、兄弟会、俱乐部、工会、或最普遍的基于遵守忠诚原则的政治团体。那实在太狭窄的利益观念事实上必定导致一个社会历史的和政治历史的歪曲景象，并且，

利益的定义纯粹是金钱的话，它不可能腾出空间给社会提供的保护这样的重要需求，提供这些保护的任务经常落在那些主管社会总体利益的人们身上——在今天的状况下，就是当代的政府。严格地讲，市场威胁到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市民各种各样的社会利益，属于不同经济阶层的人们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来面对这一危险。

因此，阶级大军的行动既促进又妨碍市场的扩展。如果建立市场体制需要机器生产的情况下，单单贸易阶级在变革之初就处于带头地位。来自较旧阶级的幸存者形成新的企业家阶级，以便负责一个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发展。但是，如果工业家、企业家，以及资本家的崛起是在扩张主义运动中贸易阶级处于带头地位的结果，那么防卫就落在传统的地主阶级以及新生的工人阶级的肩上。如果贸易界之间资本家的命运象征市场体制的结构性原则的话，那么社会结构的顽固防卫者的角色，在一方面是封建制度贵族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是产业界无产阶级的崛起。但是，地主阶级自然地寻求方法，解决在维护过去中的所有的恶势力，而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市场社会的界限并能够站在未来的角度借用解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在可能的行动方法中，恢复封建制度或宣布社会主义；但是，这确实显示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土地均分论者和城市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在紧急关头寻求救济。如果市场经济崩溃，正如在每一次主要危机中地主阶级都威胁这样做，他们可能尝试恢复家长式作风的军事政体或封建政体，而工厂中的工人则理解到成立劳工合作性公共福利的需要。在危机中，“反应”也许瞄准互斥的解决方法。本来可以以其它方法取得妥协的阶级利益冲突具有的重要性的决定性的。

所有这一切会告诫我们在历史的解释中避免太依赖既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样一种方法会按惯例地包含那些阶级的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必然性只能发生在个不可被破坏的社会。当一个文明社会崩溃或经历变革时，并且有时在最短暂的时间间隔，由于较旧的阶级的崩溃，甚至由于像外国的冒险家或被驱逐者一样的外在

因素，通常当新的阶级诞生时，它脱离那些历史的关键性阶段的范围。通常而言，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仅仅是由于当时的需求，就形成了新阶级。因此，最终来说，这是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它制订了它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它的成功除了取决于它自己能够为社会效劳的能力，还要取决于利益团体的活力和多样性。确实，狭窄的阶级利益政策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那利益——几乎没有容许例外的惯例。如果社会组织的选择不是突然陷入完全的毁灭，赤裸裸自私的阶级就不能够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

为了确实把过失归咎于所谓的集体主义者的阴谋，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最终否认已经出现了任何社会保护的需求。最近，他们称赞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曾经否定工业革命的传统学说，依照这学说，大概在 18 世纪 90 年代，一个大灾难闯入不幸的英国工人阶级。依据这些作家的观点，生活标准突然恶化的事情就根本没有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一般而言，在引进工厂制度之后，不是之前，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有了很好的改善，至于具体数字，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快速增长的工资。按照公认的经济福利标准衡量即实际工资和人口数字，他们所维持的地狱般的早期资本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工人阶级非不再被剥削，而且成为经济的得益者，以及说服需要社会的保护，证明让所有人都受益的体制明显地是不可能的。

爱挑剔自由资本主义的人受到挫折。差不多 70 年，学者和“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谴责工业革命的恐怖，一群显赫的诗人、思想家和作家都给工业革命打上了残忍的记号。被认为是公认的事实有：无情的剥削者利用民众的孤立无助，迫使他们拼命干活而且还让他们挨饿；圈地运动剥夺乡村居民的住宅和土地，并把他们抛入由《济贫法修正案》建立起来的劳动力市场；另外，不时在矿井和工厂因工致死的孩子们的活生生的悲剧有力地提供了民众穷困的证据。事实上，对工业革命类似的解释取决于 18 世纪圈地运动造成剥削的可能程度；取决于向无家可归的工人所提供的低工资，因为这解释了棉制品行业的高额利润，以及早期工厂主手中迅速累积的资本。

对他们的指责就是剥削，对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市民无限的剥削，如此悲惨和堕落的根源正是这些剥削。所有这些内容现在明显受到反驳。经济史学家宣告了这一信息：几十年来笼罩在工厂制度上的阴影已经被驱散。怎么会在经济确实得到好转的地方发生社会大灾难呢？

当然，**实际上社会灾难主要是文化现象，不是可以依照收入数字或人口统计量度量的经济现象。**包含了更多普通民众阶层的文化灾难自然不可能经常发生；但也不会像工业革命那样的洪水般的事件——一次经济地震在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把大量的英国农村居民从定居的人口改变为走投无路的流动人口。但是，即使这样的破坏性的山崩在阶级历史记录中是稀有的，但在不同种族的人民的文化交往领域内，它们只是通常发生的事件。本质上，环境是相同的。主要的差别是这样，即当文化交往通常发生在定居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社会之间，而居住在同一地理区域的一个社会阶级成为一个社会的要素。在这两个情况中，这种交往也许会对比较弱的一方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不是人们经常认为的经济剥削，而是那些牺牲者的文化环境的崩溃才是当时恶化的原因。经济过程也许自然地提供毁灭的媒介，同时，几乎总是经济的次等性将造成比较弱的回报率，但是他的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经济的；它存在于对制度的致命伤害，这制度包含其社会存在。这一结果是丧失自尊和标准，不管单位是人或是阶级，不管这过程源自所谓“文化冲突”或是源自在社会范围内的一个阶级的地位的改变。

对于资本主义早期的研究者而言，对比是极其重要的。今天在非洲的一些土著部落的环境非常类似于英国工人阶级处于 19 世纪开始数年时的环境。待在南非当地居民有栅栏防护的原始村庄的卡菲尔人（Kaffir）感觉最有社会完全感，南非的卡菲尔人，贵族的原始人，已经转变为穿着“即使是最堕落的白种人也不穿、说不出口

的、污秽的、难看的破旧衣服，”²的半被驯养的人类品种，无可名状的生命，没有自尊或标准、真正的人类废物。这个描述令人记起罗伯特·欧文如何描写他本国的工人，当时他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向工人演讲，当着他们的面，正如社会研究员记录事实一样的冷静地和客观地告诉工人们，为什么他们已经变成为他们那样堕落的乌合之众；并且他们的堕落的真正原因没有什么比形容他们的生存是在“文化真空”更加适当；一位人类学家³使用“文化真空”这术语来描述在与白人文化接触受到影响后，一些非洲勇敢的黑人部族文化退化的原因。他们工艺的衰退，他们生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受到破坏，正如里弗斯（Rivers）出名的措词所描述的，他们正在厌倦中消亡，或是，他们在浪费生命和挥霍物质。当他们自己文化提供给他们，不再有值得他们付出努力或做出牺牲的目标时，种族的势利和偏见挡了他们的路，使他们不能充分地参与和分享白人入侵者的文化⁴。用社会的障碍代替肤色的障碍，19世纪40年代形成两个部落，金斯利（Kingsley）小说中描述的呆滞贫民区的居民适当地取代了卡菲尔人。

然而，轻易赞同文化真空的生活根本就没有生活的一些人似乎期望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内，经济的需求会自动地填补这一真空以及使生活显现出有生活价值。人类学的研究结果与这个假设明显地存在矛盾。米德博士（Dr. Mead）说“对个人起作用的目标都是取决于文化上的，而不是他的器官对外在不明确的耕作情形的反应，例如纯粹是食物的缺乏”。“人们看到一批原始人被转变为采金矿工，或船员，或仅仅是被剥夺他们对努力的激励性，并且被遗弃在依然是充满鱼的河流旁边，直至他们没有痛苦地毁灭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看来是那么的奇异，或那么的与社会的本性和它正常的、习以

² S·G·米林夫人（Millin），《南非人》，1926年。

³ 戈登威泽（Goldenweiser），A.，人类学家，1937年。

⁴ 戈登威泽（Goldenweiser），A.，如上。

为常的机能背道而驰，”然而，她补充说，“通常精确地讲，在强行从外部引入的时候，或至少是外部引起的变化的时候，这过程确实发生在一个民族的身上...”。她做出这样的结论：“使一个天真民族完全丧失社会传统习惯的这种猛烈的接触由于发生的太过频繁，所以使部分社会史学家不得不予以认真地关注。”

然而，社会史学家未能领会。他依然拒绝认为，现在引起殖民地世界彻底变革的文化交往的自然力量是相同的，它在一个世纪之前造成了资本主义初期可怕的场景。一位人类学家⁵做了这样总的推断：“尽管有许多分歧，但是当今外来民族的困境与我们数十年前的或数个世纪前的困境基本上是一样的。新技术的设备，新的知识，财富和权力的新形式提高社会的流动性，也就是，个人的流动，家庭的兴衰，团体的划分，领导地位的新形式，生活的新模式，不同的价值观。”特恩沃德（Thurnwald）明察秋毫的看法承认当今黑人社会的文化大灾难几乎类似于大部分的白人社会在资本主义初始时期的灾难。只有社会史学家仍然没有觉察到这相似点。

没有任何东西像经济主义的偏见那么有效地遮挡我们对社会的预见。人们一直把剥削放到殖民地问题的最前线，而且这个问题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同时，从人类明显的意义来说，剥削是如此经常、持久地发生，由白人如此无情地施加到世界上落后的人身上，这似乎在所有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是不用根据它首要的地位，完全无知觉地辩论。然而，精确地讲，这一强调突出了往往会使我们看不到文化衰退这一更大问题的剥削。如果剥削严格地按照经济学的角度被定义为交易比例的永久不适当，那么，实际上人们怀疑剥削是否存在。土著社会的大灾难是牺牲者的基本制度被迅速地和激烈地破坏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否使用武力似乎完全不相关）。正是强加于完全不同的组织社会的市场经济破坏了这些制度；市场经济把工人和土地变成为商品，再次，它仅是一条简短的公式把全

⁵ 特恩沃德，R·C（Thurnwald, R. C.）的《在东非的黑人和白人》；《一个新的文明社会的结构》，1935年。

部的文化制度了结为朴真的整体的社会。收入和人口数字的变化与这样的过程明显不成比例。例如，虽然相比他们居住本国未开垦的土地，在一个他们被贩卖后居住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准在某些人为的意义上来说已经改进多了，但是谁会希望否认一个从前自由的人被硬改变为奴隶身分就是剥削？如果我们假定人们释放被征服的土著人，甚至没有强迫他们多付强加于他们的不值钱的棉产品，以及他们的饥饿“仅仅”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被破坏的话，然而，没有什么我们能够改变。

这里举著名的印度事件为例。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印度平民的饥饿死亡并不是由于兰开夏（Lanchshire）的剥削所致；他们大量的死亡是由于印度的农村公社遭遇到破坏。农村公社的破坏是经济竞争的力量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机器制造的布匹以低于手工编织的布匹（Chaddar）的价格出售，这是确实的事实；不过，它证明是经济剥削的对立面，因为倾销意味从过高收费倒转为过低收费。在过去的 50 多年中，饥荒的真正原因是谷物的自由买卖，加上当地人没有收入。当然，农作物的歉收只是饥荒的一部分原因，因为可以通过铁路发送谷物，从而使救济品运到受威胁的地区成为可能；问题是那些人没有能力购买价格急剧上升的谷物，在一个自由但组织不完善市场上出现供应不足必然导致价格上升的反应。从前，人们把粮食的歉收归咎于本地的小店铺，但是，现在人们没有这么认为，而轻易地归咎于大的市场。因为这个原因，防止饥荒经常采取公共工程（public works）的形式，好让所有的人能够承担价格的提高。自从在英国统治下的大叛乱以来，给印度带来大灾难的 3 次或 4 次的大饥荒像因此既不是自然因素所致，也不是剥削所致，而仅是由劳动力和土地组成的新市场所致，因为它瓦解了旧乡村但没有解决它的问题。在封建主义和农村公社的政治制度下，地位高则责任重、党派团结，以及谷物市场规则阻止饥荒，在市场的规则中，依照这游戏规则人们还是不能避免挨饿。“剥削”这术语恶言地形容一个情况，即当东印度公司无情的垄断权被废除，以及自由贸易引入到印

度之后，情况真正地变得严重。正当在自由和平等交易过程中平民大众毁坏长期在印度居住的英国人的时候，得到乡下地方陈旧的组织的帮忙，包括谷物的自由分发，垄断者还算控制得住这情况。从经济角度看，印度也许已经受益，从长期来说肯定受益，但是从社会角度看，印度被瓦解，因此印度人民深受穷困和恶化所害。

至少在一些案例中，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剥削的对立面开始瓦解文化交往。在 1887 年，政府不得已地把土地分配给北美洲印第安人，依照我们的财政计算的尺度，他们都人人受益。可是，这措施差一点消灭这种族的肉体的生存——有记录以来，文化退化的一个突出的案例。道德学天才人物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在差不多半个世纪后通过坚持保留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来改正这一立场：今天北美洲印第安人至少在一些地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社会——不是经济上的改良，而是创造社会的恢复奇迹。美国土著波尼人手工游戏的变体是著名的“鬼舞”，在大概 1890 年，它可怜的诞生记录了破坏性的文化交往的冲突，那时候刚好是改善中的经济环境使这些印第安人变得不合时代。此外，人类学的研究公平地证实一个事实，那就是甚至增长中的人口——另一个经济指标——也不需要排斥文化大灾难。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许实际上是文化活力指标，或者是文化退化指标。把人口出生率和乞讨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这字的最初含义明显地表达了这一矛盾心理。

经济主义的偏见既是资本主义初期赤裸裸的剥削理论的来源，也是虽然稍有学者气质，但不少于赤裸裸的误解的来源，这误解随后更否认社会的大灾难的存在。这后者和最近对历史的解释的重要意义在于自由放任的复兴。因为如果自由经济学没有造成灾难的话，那么剥夺这个世界自由市场利益的保护主义便是不受控制的罪行。现在，人们对“工业革命”这术语蹙眉而露出不悦之色，来传达一个言过其实的想法，即工业革命基本上是一个变化缓慢的过程。这些学者坚持，逐渐开展的科技进步的力量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毋庸置疑，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很多人忍受痛苦，但是总体上讲事件的

发展是持续进步的。这恰当的后果几乎是经济力量的自发性运转的结果，这些力量虽然受到那些夸大当时不可避免的困难的、无耐心的人们的干预，但是依然完成他们有益的任务。这干预不亚于对新的经济体系的危险正在威胁着社会的否认。如果工业革命的历史正确地反映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保护主义者运动就会缺乏所有客观的、正当的理由，*自由放任*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因此，关于社会的和文化的大灾难的性质，唯物主义的谬论助长了这一传说：我们背离经济自由主义导致了当代的所有邪恶。

简而言之，虽然有关的阶级利益决定性地影响这一结果，但是没有单一的团体或阶级是这所谓集体主义运动的起源。最终，虽然他们的防御主要是针对先于其他人的某一部分的人们，**但是推动事务发展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我们没有把保护主义运动的陈述围绕在阶级利益周围，而是围绕在被市场危害到的社会实质周围，这么做似乎是明智的。**

抨击的主要方向是指出各危险点。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冲击劳动力的载体，即“人”。国际自由贸易基本上是对依赖于大自然的^{最大}行业即农业的威胁。因为生产组织的运作依赖于价格的相对波动，所以金本位制使生产组织处于危险中。每一个领域的市场被发展了起来，在社会存在的某些重要方面，这意味着对社会的一种潜在威胁。

人们容易区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但是，人们并不是如此容易区分那些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核心分别由人类、他们的大自然环境以及生产组织组成。在文化领域中，人和大自然几乎是一个整体；生产型企业的货币情况反而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利益，也就是，国家的统一和凝聚力。因此，尽管劳动力、土地以及货币的传统商品市场是容易区别和容易识别的，但是当它们包含了对社会的威胁时，人们并不是总是能够准确地区别它们。

尽管这样，对西方社会在那重要的 80 年（1834~1914 年）期间制度发展的概述可能会用相似的术语提及这每一个危险点。**无论**

就人、大自然、或生产组织而言，市场体制已经发展为一个威胁，所以一定数量的团体或阶级迫切要求保护。在所有的案例中，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发展存在着相当长的时间间隔，这一点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世纪之交，保护主义的逆向运动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创造了一个相似的形势。

因此，我们将分别阐述人、大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防御——自我保护运动，由于这一自我保护运动，出现了一个组织更紧密的社会，然而它处于全面破坏的危险之中。

第十四章 市场和人

把劳动从其它生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劳动受制于市场定律，这将会使所有朴实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这也将会用不同类型的组织，即往往是完全不同的元素组成的和个人主义的组织取代所有朴实的生活方式。

运用契约自由的原则可以很好地实现这样一个毁灭性的计划。实际上，**这意谓着血族关系、邻里、同行、宗教这些非契约组织将会被摧毁，因为它们要求个人的效忠，从而限制个人的自由。**正如经济自由主义者习惯这么做，把这一原则描述为一种非干预只是表达了在赞成明确的干预方面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也就是说，这种干预会摧毁个体之间的非契约关系，并且防止他们自发地进行重组。

成立劳动力市场的效果在今天的殖民地地区是非常显著的。土著人被迫通过出售他们的劳动来谋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传统的制度必须被摧毁，并且防止重新组成他们本来的传统制度，因为在原始社会的个人通常不会受饥饿的威胁，除非整个社会遭遇类似的困境的时候。例如，在南非卡菲尔人的**栅栏围土地**（kraal-land）的制度下，“缺乏食物是不可能的：无论谁需要帮忙，谁就绝对地得到帮忙。”¹ 北美洲的夸丘特尔人“一直是在冒最低程度挨饿的风险。”² “生活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社会不存在饥饿。”³ 印第安人的农村社会同样地普遍承认摆脱贫困的原则，我们可以补充说，大约一直到16世纪初的欧洲，当时人们在索邦神学院辩论人道主义者维维斯（Vives）提出对穷人的现代观念，几乎所有类型的社会也承认这一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个人不受饥饿威胁使得原始社会比市场经济更加有人性，同时原始社会的经济性较差。**具有讽刺

¹ 梅尔，L·P（Mair, L. P.），《20 世纪的一个非洲民族》，1934 年。

² 洛布，E·M，“在早期社会中的货币作用和分配”。《人类学论文》，1936 年。

³ 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 M. J.），《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1940 年。

的是，白人对黑人的世界最初的贡献主要是包括引进如何利用饥饿的灾难。因此，为了人为造成食物短缺，殖民者可能决定削减面包果树，或者为了迫使土著人贱卖自己的劳动力，可能向土著人征收棚屋税。这两种情况中的无论哪一种情况，其结果都类似于都铎（Tudor）时代的圈地运动，它伴随着漂泊的游牧部落的消失。国际联盟的报告非常恐怖地说到，最近出现在 16 世纪欧洲场景中的一个不吉利的人物，即在非洲的矮树丛的“无主孤魂”。⁴ 在中世纪后期，人们发现他仅是在社会的“裂缝”中⁵。然而，他是 19 世纪游牧劳工的祖先。⁶

现在，白人可能仍然在偏远地区偶尔这么做，即为了从社会结构中取出劳动这一要素，瓦解了社会的结构，这与白人为了类似的目的在 18 世纪曾经对白种人口所做的一样。李嘉图创立的劳动力市场使霍布斯（Hobbes）对国家的奇异幻想——“人类的利维坦”^{*}，利维坦巨大身体由无数的人类身体组成——相形见绌：川流不息的人类生命的供应受到食品数量的调节，而食品数量是随意的。虽然人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惯例标准，劳动工资不能低于这一标准，但是人们同时认为这底线只有符合这一条件时它才变得有效，即劳动者的选择被减少到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们便没有食物，或是当他们在市场提出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时他们的劳动力能够使别人卖得起。顺便提一下，这解释了另外一个无法说明的古典经济学的疏忽，即为为什么人们认为只有饥饿这个惩罚而不是高工资的魅力才有能力建立一个能运作的劳动力市场。同时殖民地的经历证实了他们的想法。因为工资越高，施加在土著人身上的诱因便越低，土著人不同于白人，不会受到自己文化标准的驱使来尽他的最大能力赚最多的金钱。相似之处更加明显，早期的劳工也非常痛恨工厂，在哪里早期的劳工

⁴ 特恩沃德，R·C，（Thurnwald, R. C.），前面引用的书。

⁵ 布林克曼,C，“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社会经济学概论》，1924 年。

⁶ 汤因比，A，《工业革命的演讲》，1887 年，第 98 页。

^{*} 《利维坦》（Leviathan）：英国 17 世纪著作家霍布斯论国家组织的著作；指极权主义的国家。

感觉到受屈辱和受折磨，像土著人一样当早期的劳工受到肉体威胁时，他会经常用我们的方式辞职，如果不是身体残缺。18世纪里昂的工厂主主要出于社会原因迫切地主张低工资。⁷这些工厂主认为只有过度工作和被压制的劳工才放弃与他的伙伴交往和放弃逃避身体奴役的环境，在这环境内，他的主人无论要求他做什么，他必须做。正如在英国，法律的强制性和教区的农奴制，正如在欧洲大陆专制的劳工警察的严厉，正如在美洲早期的契约劳工，它们都是“积极肯干的工人”的先决条件。但是，达到最后的阶段会运用“大自然的惩罚”即饥饿。为了利用饥饿，有必要摧毁不容许个人挨饿的朴实社会。

保护社会的责任首先落到了能够直接执行他们意向的统治者身上。然而，经济自由主义者过于肯定地假设政治统治者往往不是受益者，而经济统治者才是受益者。亚当·史密斯似乎不会这么认为，因为当时他极力主张英国直接统治应该取代通过一个在印度的特许公司来管理。他认为由于被统治者财富的增加会造成税收的增大，所以政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具有相同的利益，而商人的利益自然地与他们顾客的利益存在对立。

由于利益和倾向，使平民百姓的生命避开工业革命洪流的冲击便落在英国地主的身上。在变化所导致的动乱席卷乡村，并且容易导致农业为不稳定的行业的时候，斯品汉姆兰制度是保卫传统农村组织的一条护城河。他们自然不情愿接受工业城镇的各种要求，乡绅们首先起来全力对抗那证明是一个世纪的必败之仗。可是，他们的反抗并不是徒劳的；它避开了几代人的堕落并留出了几乎是全面调整的时间。在关键的40年时间里，它妨碍了经济发展，并在1834年“议会改革派”（Reform Parliament）废除斯品汉姆兰制度的时候，地主们把他们的对抗转移到工厂法上。教会和贵族唤醒人民对抗面粉厂厂主，他们的优势使得廉价食物的要求极为诱人，因此间接

⁷ 赫克谢尔，E·F，（Heckscher, E. F.），前面引用的书。第2卷168页。

地威胁到削弱租金和什一税。举例来说，奥斯特勒（Oastler）“是一个牧师、一个托利党党员以及一个保护主义者”；⁸而且，他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其它混杂了这些保守社会主义（Tory socialism）不同成份的伟大战士：萨德勒（Sadler）、索西（Southey），沙夫茨伯里勋爵（Shaftesbury）也参与工厂运动。但是，引起大量信徒的、威胁到金钱上的损失的预感证实有极其充足的根据：曼彻斯特的出口商马上就坚持要求更低的工资，其中包括更便宜的谷物——废除斯品汉姆兰制度和工厂的发展事实上为 1846 年宣传鼓动《反谷物法法案》的成功铺平道路。然而，由于外来的原因，农业的崩溃在英国整整推迟了一代人。其间，迪斯雷利（Disraeli）为保守社会主义抗议《济贫法修正法》打下良好的基础，英国保守的土地主以激进的方式强行对工业社会施加生活的新方法。被卡尔·马克思赞扬为社会主义第一次胜利的 1847 年的《10 小时法案》是有知识的保守分子的成果。

劳动人民自己在这伟大运动中几乎不是一个要素，形象地说，这一运动的结果是允许劳动人民在中央航路（the Middle Passage）中幸存。劳动人民在决定他们自己命运时如同霍金斯（Hawkins'）号船所装运黑奴一样几乎没有发言权。然而，就英国工人阶级在决定自己的命运方面，正是这种缺乏主动参与决定了英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并且取得成功，不管是好是坏，它与欧洲大陆的进程有很大的不同。

特别谈及了无目的的刺激，也就是说，新兴阶级的摸索和失误，其历史的真实特点很久以前就已经揭示。在政治上，1832 年的《议会修正案》清楚地规定英国工人阶级不得投票；在经济上，1834 年的《济贫法修正案》使英国的工人阶级有别于贫民，并且使工人阶级得不到救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产业界的“未来的工人阶级”不能确定在回复到农村生活和手工艺环境中他们的救世主是否真的存

⁸ 德西（Dicey, A. V.），前面引用的书，第 226 页。

在。二十年中遵循着斯品汉姆兰制度，其努力是通过执行《技工法》的学徒条款或如同卢德派的劳工运动一般直接捣毁机器的行动来实现的，其目的是阻止自由使用机器。从欧文主义运动一直到 40 年代末的整段时间里，这一保守的态度正如一股潜流一样徘徊在人们的头脑中，而象征着宪章运动*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开始的《10 小时法案》使人们忘记过去的情况。直到那时，*新诞生的*(*statu nascendi*) 英国工人阶级不了解自己；只有在他密切注意并且理解其一半是无意识的动机 (*stirrings*) 之后，才有可能评估出巨大损失的程度，这一巨大损失是英国把工人阶级从国家生活的相同份额中排除出来而引起的。当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把他们自己烧尽时，因为这个原因英国变得更贫穷，否则的话，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社会的理想就会在未来的世纪中逐步实现。

即使欧文主义运动只引发了规模不大的地方性活动，但是欧文主义运动在人性的创造性想象方面还是形成了一块纪念碑，即使宪章运动没有穿透这一核心的界限即构思出“国定假日”的思想来赢得人民的权利，但是宪章运动显示了一些人仍然有能力梦想他们自己的梦，并正在采取已经忘记人类生活方式的社会措施。然而，欧文主义运动和宪章运动都不是这种情况。欧文主义不是微小学派的启示，宪章运动也不是政治精英专有的；这两个运动的参与者包含成千上万的工匠和艺术家、劳工和工人阶级以及很多列为现代历史最大运动的追随者。不过，尽管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以及它们唯一相同之处是它们失败的程度，但是它们足以证明保护人类免受市场威胁的必要性从一开始就多么的不可避免。

欧文主义运动本来既不是政治运动也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它代表被即将到来的工厂折磨的普通民众的渴望，来找到一种人控制机器的生存方式。本质上，欧文主义运动的目的使我们看起来它在回避资本主义。当然，因为资本的组织角色和自我调节市场的性质

* 宪章运动是在 1837 至 1838 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产生的第一次工人阶级性质的英国全国规模的运动——译者注。

仍然没有被人们了解，所以这样的构思必定引起相当程度的误解。可是，然而，这一构思也许最佳表达了欧文的精神，强调的是欧文不是机器的敌人。欧文认为，尽管有了机器，人类应该仍然保留他们自己的雇主；合作的原则或“联合”会解决机器的问题，而不用牺牲个人自由或社会团结，不用牺牲人的尊严或他对同事的同情心。

欧文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启示非常实用，然而它的方法是建立在对整个人类的正确评价基础上。尽管各种问题本质上是日常生活问题，诸如食物的质量、住房、教育、工资水平、防止失业、生病时的援助等等，但是所涉及到的各种问题像他们要求的道德力一样广泛。真希望找到正确的方法，人类生活可以被恢复的信念就能够使运动的根源穿透人格就在其中形成的更深层次。几乎不存在类似范围的缺乏理智的社会运动；即使他们的活动表面上看似乎非常琐细，但是那些参与者的信念充满着意义，所以不需要任何僵硬的信条。事实上，由于他们坚持超越市场经济的重建方法，所以他们的信念是预言性的。

欧文主义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它的支持者是工人阶级。⁹欧文主义丰富的形式和首创精神是无与伦比的。实际上，欧文主义是现代工会运动的始祖。合作社被成立，主要从事对会员的零售。当然，这些合作社并不是常规的消费合作社（consumers' co-operatives），而是由热心者支持的商店，这些热心者决定把利润用于促进欧文主义的计划，特别是为了促进建立“乡村合作社”（Villages of Co-operation）。“他们活动的教育性和宣传性达到了商业性的程度；他们的目的是通过他们的联合努力来创造“新社会”（New Society）。”工会成员成立的“工会商店”（Union Shops）更具有“生产者合作社”（Producers' co-operatives）的性质，失业的工匠能够在那里找到工作，或是，如果发生罢工，除了工会给的罢工津贴外，他们可以赚一点点钱。在欧文主义的“劳工交易所”（Labor Exchange）

⁹ 科尔，G·D·H，《罗伯特·欧文》，1925，我们已经大量引用该作品。

内，合作社商店的思想发展为自成一格的制度。深入“交易所”或“集市”的本质，那里存在对同行互补的性质的信任；通过满足彼此之间的需要，人们认为工匠会从市场的兴衰中解放他们自己；随后，伴随着使用流通量很大的劳动券。这样的手段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好；但是在欧文的时代，人们还没有研究到劳动券不但具有劳动工资的特点而且还具有钞票的特点。本质上，社会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运动中大量出现的计划和发明不存在什么差异。不但难以对付的反对派而且数量相当的中产阶级依然处于探索状态。杰里米·边沁本人投资于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欧文未来教育计划，并且得到了分红。欧文式的社会完全是协会或社区，那些协会或社区被设计用来支持我们所描述的与救济穷人有关的“乡村合作社”；这是农业生产者合作社（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的起源，这是一个长期而卓越成就的思想。第一个全国性的生产者合作社是“作业建筑商协会”（Operative Builders' Union），它拥有工团主义者的目标，试图直接通过创造“范围最广泛的多种建筑物”来管理建筑业，它推行它自己的货币，并展示实现“一个旨在解放生产阶级的伟大协会”的手段。19世纪的工业生产者合作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个创新。更雄心勃勃、更牢固的工会正是起源于建筑工人工会（Builders' Union）或建筑工匠协会（Builders' Guild）以及它的“议会”，这个工会一度在它的松散联盟工会和合作社中包括了差不多一百万工人和工匠。工会的思想是和平手段式的工业起义，一旦我们记得他们的运动以救世主形式出现，人们期望他们使命唯一的意识是造成劳动人民的抱负是不能被压制的，那些手段看来并没有矛盾。托尔普德尔蒙难者*属于农业工人联谊会的一个分会。“社会重建组织”（Regeneration Societies）继续开展工厂立法的宣传；而在稍后，世俗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建立了道德社会。非暴力抵抗在它们中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正如法国的圣西蒙主义和英国的欧文主义表现出

* 托尔普德尔蒙难者：指英国的6名农业工人，他们由于在多赛特郡的托尔普德村组织工会而于1834年3月被处以流放澳大利亚殖民地7年的苦役刑。

精神启发的所有特点；但是，圣西蒙致力于基督教的复兴，而欧文在现代工人阶级的领袖中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反对者。在世界各地都发现有模仿者的英国消费合作社当然是欧文主义最突出和实用的支派。消费合作社的推动力丧失，或更精确地说，消费合作社的存在只能在消费者运动的外围，这种情况是英国工业历史中精神力量最大的一次挫折。诚然，在斯品汉姆兰制度时期道德退化之后，一个仍然拥有适应力的民族必定用去了差不多无限的智力和情感活力，而这种适应力需要富于想象的和持久的创造力。

就欧文主义对整个人类要求而言，仍然墨守着某些中世纪遗传下来的那些共同生活的习惯，这种情况在“建筑工匠协会”和农村情景的社会理想中即“乡村合作社”中有所表现。虽然它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源头，但是，它的建议并没有建立在财产问题上，它只是资本主义的法律方面。在偶然发现工业界新现象时，正如圣西蒙所做的，它认识到机器的挑战。但是，欧文主义的性格特征在于它对社会主义方法的坚持；它拒绝接受把社会分割成为经济和政治领域，实际上，由于那个原因它拒绝政治行动。接受一个分割出来的经济领域就会意味着承认利益和利润原则是社会的组织力量。欧文拒绝这么做。他的天赋让他认识到只有一个新的社会才能够包容机器。对他来说，有关工业方面的事情决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这就意味着他所拒绝的社会市场学的观点）。新拉纳克（纱厂）让他明白，在工人的生命里，工资只是许多因素之中的一个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自然与住宅环境，商品的质量与价格，就业的稳定以及任期的安全性。（新拉纳克的工厂如同它们以前的某些工厂一样，即使在没有工作让它们的工人做的时候，仍然给那些工人发放工资。）但是，在调整中包含更多的东西。儿童和成年人的教育，娱乐、舞蹈和音乐的提供，人人呈现高尚的道德标准和品格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整个工业人口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来自于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数千参观了新拉纳克，新拉纳克好像是一块未来的保留地，在这块保留地中完成一个不可能的壮举，即在拥有全人类的企业中

成功运作一个工厂。然而，与附近一些城镇的那些公司所支付的工资相比，欧文公司所支付的工资是比较低的。新拉纳克（工厂）的利润主要来自于高生产率，这是因为卓越的组织以及充分得到休息的工人，工人的工作时间也变得更短，这些优势胜过了增加实际工资，其中包括慷慨地提供体面生活。但是，仅仅实际工资的增加就解释了几乎所有的奉承情绪，他的工人在这种情绪支配下支持欧文。正如这些来自于各种经历，他引用比经济方法更广泛的社会方法来解决工业问题。

尽管这有这一全面的观点，但是他仍抓住了支配工人生活的具体实在因素的尖锐特性，这是他的洞察力的另外一个明证。他的宗教意识厌恶汉娜·莫尔（Hannah More）的实用的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以及她的“廉价的受人信赖的宗教小册子”。其中一本小册子赞扬一位在兰开夏煤矿工作的女孩。在9岁时，该女孩与小她2年的弟弟便要下矿井采矿。¹⁰“她乐意地跟随他（她父亲）进入煤矿，埋头于地下深处，没有借用她的性别而作为托词，在她幼年时，她与其它矿工做同样的工作，真的这是男人的旅程，但是对社会是非常有益的。”在他子女看来，这位女孩的父亲死于煤矿的一次事故中。随后，她申请做一名佣人的工作，但是，由于她当过矿工，所以她受到歧视，她的申请没有成功。幸运的是，由于那令人鼓舞的天意，她的痛苦变为神的恩赐，她所忍受的一切和耐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她工作过的煤矿展开了调查，她收到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她因此找到了工作。那本小册子的最后结论是，“这个故事可以让穷人明白，只要他们选择努力工作，他们几乎不可能再会遇到如此糟糕的生存条件，阻止他们的工资上涨以及某种程度的独立，并且也绝不会有如此悲惨的境遇，禁止许多高尚美德的做法。”莫尔姐妹更宁愿与挨饿的劳工一起工作，但是没有对他们身体受苦同样感兴趣。由于工人们充分的宽宏大量，所以她们倾向

¹⁰ 汉娜·莫尔的《兰开夏的煤矿女孩》，1795年5月；比较哈蒙德的《城镇工人》，1917年，第230页。

于向工人们完全授予社会地位和职责来解决工业制度的物质困难。汉娜·莫尔坚持她女主人公的父亲是社会非常有用的人；那女孩雇主的致谢承认他女儿的社会地位。汉娜·莫尔认为这正是是一个运作的社会所需要的。¹¹欧文厌恶基督教式的做法，因为这么做放弃支配人类世界的目标，以及倾向于赞美汉娜·莫尔所描述的可怜女主人公的虚幻的社会地位和职责，而不是面对超越《新约圣经》的可怕的揭露，而不是在复杂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环境。没有人可以怀疑真诚启发了汉娜·莫尔的信念，即穷人越是心甘情愿地默认他们环境的降格，他们越是会容易求助于天国的安慰，为了他们的得救以及她坚定相信的市场社会的顺利运作，她只相信天国的安慰。这些基督教空洞的外壳与工业目标所具有创造性的信念相比相差甚远，最高贵的上层阶级的精神生活依托在这些基督教空洞的外壳上，而具有这种创造性信念的英国普通民众在尽力拯救社会。无论如何，资本主义仍然有一个必将发生的未来。

宪章运动诉诸于一组那样不同的推动力，所以欧文主义在实践上失败之后，人们几乎可能会预言它的出现以及它不成熟的倡议。这纯粹是试图通过宪法的途径获得对政府的影响力的政治上的结果；它对政府施加压力的企图在于推行“改革运动”的传统路线，其保证得到中产阶级的选票。《人民宪章的六项要求》要求有效的男子普选权。由于不妥协和僵硬的态度，三分之一世纪以来“议会改革派”一直拒绝这样一个男子普选权，由于群众明显对《人民宪章》的广泛支持使用了暴力，对19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者所持平民政府的想法的憎恶，证明了民主政治的概念对于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是陌生的。只有当工人阶级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工会促使制造业的顺利运作，即他们的主要公司，中产阶级才会把选票让与那些处于更好条件的工人；换句话说，宪章运动平息很久以后，工人不

¹¹ 参见P·F·德鲁克（Drucker, P. F.）的《经济人的终结》，1939年，第93页，关于英国的福音派信徒；《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第21和194页，关于社会地位和作用。

会试图使用选举权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想法才变得肯定。从扩展所存在的市场形式的角度来看，因为它有助于克服各种障碍，即保留劳动人民之间的朴实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各种障碍，这证明工人不会试图使用选举权来实现他们自己的想法是正当的。至于恢复平民生活方式的完全不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平民的生活方式在工业革命中完全改变了以及使平民加入国家共同文化的教会。当每次他们分享领导权的资格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时，他们所授予的投票权也不能恢复那一领导地位。统治阶级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把强硬的阶级统治原则给予某一类型的文明社会，万一这文明社会免受退步的影响，它就会要求国家的文化与教育统一。

宪章运动是政治性的，因此相对欧文主义来说，人们更容易领会它。然而，如果没有提及富有想象力的一些年代，人们是否能够理解感情强度或者甚至是宪章运动的程度值得怀疑。1789年和1830年把欧洲的革命变成了定期的制度；1848年，巴黎起义的日期实际上是柏林和伦敦（起义）的预报，精确地讲，至于集市的开张与爆发的社会动乱相比要更平常些，“随后”的革命迅速地在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镇爆发。在伦敦同样也存在极度紧张的关系，包括宪章运动者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期望采用暴力行动来迫使议会同意人民的普选权。（有普选权的成年男子低于15%。）1848年4月12日这一天在整个英国历史上是力量最集中的一天，市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来保卫法律和秩序；几十万市民在那一天以特别警察的身份武装起来对付宪章运动者。“巴黎革命”来得太迟，没有能够把英国的一个平民运动带向胜利。直到那时，《济贫法修正案》和“饥饿的40年代”的苦难所激起的反叛精神正在逐渐减弱；贸易上升的浪潮促进就业率的增加，同时资本主义也开始履行诺言。宪章运动者以和平的方式散去。直到稍后的日子议会才考虑他们的问题，当时宪章运动者的请求在议会下议院以5比1的多数票被击败。所征集的数百万签名没有起作用。宪章运动者的行为也没有能够表现得像守法市民一样。胜利者取笑他们的运动已经烟消云散。

这样就结束了英国人民建立平民政治国家的最大政治努力。一、二年之后，人们几乎忘记了宪章运动。

半个世纪后，工业革命抵达欧洲大陆。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没有受圈地运动影响被迫放弃土地；更确切地讲，高工资的诱惑和城市生活使半奴隶性的农业工人放弃他们的庄园移居到城镇，在那里，他与传统的中产阶级的下层交往，从而有机会习得城市语调。在新的环境中，他非但没有感到社会地位降低，反而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一直到 20 世纪初，在低层次的城镇工人之中，居住条件毫无疑问是恶劣的，酗酒和卖淫是猖獗的。然而，英国的佃农或有着体面祖先的佃册农的道德灾难和文化灾难之间无法相比，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助地沉落到一些工厂附近地区的贫民窟的社会和物质困境中，在这方面，斯洛伐克人或波美拉尼亚人的农业工人几乎在一夜之间从拥有稳定住所的雇农变为现代大都市的工业工人。当爱尔兰或威尔士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或是西部苏格兰高地人懒洋洋走过早期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路线时，他们也许有相似的经历；但是英国自耕农的儿辈或被收回租地的佃农肯定会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提高。然而，不仅最近得到解放的农民即欧洲大陆的蠢人有很好的机会带着他们古代文化传统上升为工匠和商人的中产阶级的下层，而且连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都遇有相同的处境，和他自己一样几乎被除去实际统治阶层的地位。为了反对封建贵族制度和罗马主教制度，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势力与工人阶级势力紧密地结成同盟。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们，在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攻击专制主义和特权阶级的时候，大大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在英国的中产阶级，不管是 17 世纪的乡绅和商人还是 19 世纪的农场主和零售商，他们各自有足够的力量维护他们的权利，甚至 1832 年近似革命的努力也没有指望劳工阶层的支持。此外，英国贵族一直在吸收最富裕的新移民，并且扩大社会阶层中最高阶层的范围，而欧洲大陆依然处于半封建的贵族没有与中产阶级的子女通婚，以及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的制度从而使贵族与其它阶级隔

离开。因此，迈向同等权力与自由的每一步成功步伐使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受益。工人阶级帮助中产阶级与封建制度做斗争是欧洲大陆传统的一部分，如果它不是始于 1789 年，就是始于 1830 年，常言道，真希望中产阶级的成果是用智谋取胜的。但是，**不管工人阶级胜利还是失败，工人阶级的经验得到了丰富，工人阶级的目标提升到政治层面。这就是具有阶级意识的含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明确了城市工人的前景，环境使城市工人明白使用其工业和政治力量作为重要策略的武器。英国工人在工会主义的私人和社会问题中有了个无与伦比的经历，其中包括工业行动的战术和战略，他们把国家的政治策略留给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来处理，而中欧的工人变成为政治社会主义者，惯于处理各种问题并表现出治国艺术，事实上是这样，他们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诸如工厂法和社会立法。

如果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化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间隔，那么建立统一的国家则存在着更大的时间间隔。意大利和德国也只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期间才达到统一的阶段，而英国在数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实现统一，东欧的一些小国实现统一则更晚一些。在这一建国过程中，工人阶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在工业时代，这一建国过程一定包含了社会手段。俾斯麦企图通过采用社会立法这种新纪元的形式来取得第二帝国的统一。意大利通过铁路的国有化加快了统一。融合有各种族和民族的奥匈（Austro-Hungarian）君主国中，国王一再呼吁劳动阶级支持中央集权化和帝国统一这个进程。通过他们对立法的影响，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在这个较大的领域内也发现很多满足产业工人利益的机会。

唯物主义的偏见把工人阶级的轮廓弄得模糊不清。英国作家感到很难理解这个极坏的印象，即欧洲大陆观察员对兰开夏早期资本主义环境留下的印象。他们指出，在中欧纺织业中，许多工人的生活条件很差，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也许经常和他们英国同行们的工

作条件一样的差劲。然而，这种比较掩盖了一个显著点，确切地讲，那个显著点是欧洲大陆的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在上升，相比之下，英国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在下降。欧洲大陆的工人没有经历过斯品汉姆兰制度那样可耻的赤贫化，也没有任何类似《新济贫法》灼热大火般的经历。欧洲大陆的工人的社会地位从佃农改变为，或者更精确地讲是上升为工厂工人，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上升为有选举权和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因此，欧洲大陆的工人避开了紧随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发生的文化大灾难。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原因，由于效法英国对社会保护的方法，欧洲大陆所进行的工业化发生这么一个时候即当时适应新的生产技术已经变得可行。¹²

由于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欧洲大陆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工业革命，所以欧洲大陆的工人所需要的保护不是像针对工厂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环境正常行动一样针对工业革命的影响。欧洲大陆的工人主要借助于立法来实现保护，而英国工人更多于依赖于自愿性的协会——工会——以及他们控制工人的能力。相对来说，欧洲大陆的社会保险比英国的社会保险来得早。这种差异很容易从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以及欧洲大陆相对比较早地扩大工人群众的投票权中得到解释。尽管从经济角度讲，强制性保护方法和自愿性保护方法即立法与工会主义的差异很容易被高估，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它的重要性非常巨大。在欧洲大陆，工会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创作物；而在英国，政党是工会的创作物。欧洲大陆的工会主义或多或少地变为社会主义者，而在英国，甚至是政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工团主义。因此，在英国往往会增加国家统一的普选权有时会对欧洲大陆起相反的影响。在欧洲大陆而不是在英国，皮特和皮尔，托克维尔（Tocqueville's）和麦考利的担忧即平民政府对经济制度构成一种危险成为了事实。

从经济角度讲，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保护的方法导致了几乎

¹² 诺尔斯，L（Knowles, L.），《19世纪期间，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1926年。

一样的结果。他们实现了他们的打算：破坏被称为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市场。只有当工资和物价同时下降的时候，这样一种市场才能实现其目的。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假定意味着工人的收入极其不稳定，专业标准绝对缺乏，可怜地准备让人随意摆布，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反复无常。米泽斯公正地指出，如果工人“并没有充当工团主义者，而是按照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条件来降低他们的要求，改变他们的定位和职业，那么他们最终可以找到工作。”这总结了一种制度下的立场，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劳动具有商品特点的假设基础上。商品在什么地方出售，使用商品的目的是什么，商品以怎样的价格转手，商品以什么形式被消耗或消灭，这些都不是由商品本身决定的。这位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者写道，“没有人曾想到，工资不足与就业不充分相比将是一个更好的用语，因为失业者错过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的报酬。”尽管米泽斯不应该声称这是他的创见，但是他的说法无疑是对的；比米泽斯早 150 年，惠特利（Whately）主教曾经说过：“当一个人乞求工作的时候，他所要求的不是工作，而是工资。”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是由于政府和工会的政策旨在维持与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不相协调的工资水平”，这从技术上讲是正确的。米泽斯问道，要不是工人们“不情愿在这个工资水平工作，他们就会进入劳动力市场来寻找他们能够做和愿意做的工作”，那怎么可能还存在失业呢？这解释了雇主们要求劳动力流动和弹性工资的真正含义：确切地讲，正如我们在上文所下的定义，人类劳动力在市场中就是一种商品。

所有社会保护的正常目的无非就是消灭那样的制度并使之无法生存。事实上，只有在工资和工作环境，标准和规章制度能够维护所谓商品即劳工这一人类特性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才会被允许保持它的主要作用。正如有时所做的那样，指出社会立法、工厂法律、失业保险，特别是工会没有干预工人的流动性和弹性工资，就意味着那些制度完全没有达到它们原来的目的，确切地讲，那目的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求定律以及把它从市场轨道中清除出去。

第十五章 市场和自然

我们所称的“土地”是自然界的一种基本要素，它与人类的制度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把土地独立出来并形成土地市场，或许是我们祖先所有事业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传统意义上讲，土地和劳动是不可分离的；劳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活和自然形成了明确的整体。因此，土地跟家族组织、邻里组织、行业组织和宗教信仰（与部落和教会有关）组织、乡村组织、协会组织和教会组织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一个大市场”（One Big Market）是经济生活的一种安排，它包括了生产要素市场。因为这些要素恰巧不能与人类制度的要素以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市场经济包括了社会，而社会制度则服从于市场机制的需要。**

有关土地的命题，就像劳动力的命题一样，是乌托邦式的。经济功能只是土地许多重要功能之一。土地赋予人类生活以稳定性；土地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土地是人身安全的一个条件；土地是风景和四季。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人出生时没有手和脚就如同继续他的生活没有土地一样。然而，把人类和土地分离开来并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社会以满足房地产市场的需要，却是市场经济中的乌托邦思想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正是在现代殖民化领域中这样一种冒险的真正意义变得显而易见。因为不管怎样，当地人生活的社会和文化体制一定首先遭到破坏，所以，殖民者是否为了埋藏在土地中的财富需要土地作为一个场所，或者殖民者是否只是希望强迫当地人生产过剩的食物和原材料，往往并不相关；当地人是否在殖民者的直接监督下工作，或者当地人是否只是在间接强迫的某些形式下工作，也并不产生很大差异。

今天的殖民形势和西欧一、两个世纪之前的殖民形势有非常大

的相似性。但是，在外国地区实现土地流通可能被压缩成若干年或者数十年，而在西欧实现土地流通可能花去数个世纪。

挑战来自于增长而不是来自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商业形式。起始于英国都铎王朝的农业资本主义，需要对土地进行特殊化的处理，包括强占和圈地。自18世纪起，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它在法国就如同英国一样，主要出现在农村地区，而且需要场地用于建造工厂和工人的住宅区。最具影响力的挑战是19世纪工业城镇的兴起，它们对食物和原材料供应的需要实际上是无限量的，尽管这更多地影响到土地的使用而不是所有权。

表面上看，对这些挑战所做的各种反应没有什么相似性，然而，它们却代表着工业社会对这个行星的土地需求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的商业化，调动封建时代的土地收入。第二阶段是强迫增加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生产来满足国家范围的快速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阶段是把这样一种盈余生产的体制延伸到海外和殖民领地。随着最后这一阶段的来临，土地及其产品最终适应了一个自我调节的世界市场的系统。

土地商业化是对封建主义进行清算的另一个名称。土地商业化开始于14世纪的西方城市中心和英国并在大约1500年之后结束于欧洲革命过程中，当时隶农制的残余被消灭了。把人类和土地分离开来，意味着把经济体分解为各个要素，以便于每一个要素在经济体制中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挥作用的地方。通过确保对与资本主义准备阶段依然具有紧密关联的土地的控制权，新的体制首先被建立在它所试图同化和吸收的旧体制旁边。封建时代的没收土地的做法被取消。“目的在于消除邻里组织和家族组织的所有对土地的要求，特别是男性贵族血统和教会对土地的那些要求，因为他们的要求是使土地免于商业性的买卖和抵押。¹”实现这一目的途径包括：个体力量和暴力，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革命，战争和征服，立法手段，

¹布林克曼，C.，“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社会经济学演进》，1924年。

行政压力，以及私人自发的小规模长期努力。混乱是否很快结束，或者它是否对社会肌体造成显著的创伤，主要取决于调节这个进程的各项措施。政府自身引入了各种强有力的变革因素调节措施。例如，一直到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1815~1870年），教会土地回归社会是现代国家基础之一，顺便提一下，这也是把土地有序转让到私人手中的主要手段之一。

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30和40年代的功利主义改革都采取了最大的完整步骤。边沁写道，“当没有限定继承权、没有不可转让的捐赠财产、没有公共土地、没有赎回的权利、没有什一税时……，对农业繁荣最有利的条件出现了。”在处理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上的这种自由，构成了边沁的个人自由主义概念的基本部分。立法的目标和结果是以种种方法扩大这种自由，这些立法包括《诉讼时效法》（the Prescriptions Acts）、《遗产法》、《地租和恢复法》（the Fines and Recoveries）、《不动产法》、1801年的普通《圈地法》及其后续法律²，还有从1841年一直到1926年的《登册保有权法》*。在法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中，《拿破仑法典》确立了中产阶级的财产形式，使土地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使抵押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民间约定。

第二个步骤是使土地从属于城市人口快速增的需要，它与第一个步骤有所重叠。尽管土地在物理上不能流动，但是如果运输条件和法律允许的话，土地上的产品是可能流动的。“因此，商品的流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地区间要素流通的不足；或者说（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贸易缓减了生产条件在地理上的不适当分布所带来的劣势。”³这样一种观念与传统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按时买卖日用品，既不是古代人的做法，也不是中世纪早期的习惯。”⁴剩余的谷物可以用来满足附近地区特别是本地城镇的粮食需要；一

²戴斯（Dicey），A·V.，前面引用的书，第226页。

* 该法的大意是“按照庄园的习惯，依据领主的意志保有土地”——译者注。

³奥林（Ohlin），B，《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1935年，第42页。

⁴布赫，K，《国民经济的发生史》，1904年，参见彭罗斯，E·F，《人口理论和他们的运用》，1934年，引用朗菲尔德（Longfield），1834年，第一次提及了

直到 15 世纪，谷物市场有一个完全本地化的组织。但是，在英国，城镇的发展吸引地主主要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进行生产，大都会的发展迫使当局放松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并允许谷物在地区之间流通，尽管从未被允许在全国流通。

18 世纪下半叶工业城镇的人口聚结，最终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全国范围的，随后是世界范围的。

从效果上讲，这次变化体现了自由贸易的真正意义。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的流通，从附近的农村地区延伸到了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工农业的劳动分工在全球得到了应用。因此，遥远地区的人们被吸引进这个变化的中心，这个变化的起源对他们而言却是模糊的，而欧洲国家的日常工作，则变得依赖于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实保证的人类生活一体化。有了自由贸易，由全球相互依赖性所带来的新的巨大危险便应运而生了。

社会对全面混乱的防御范围，就像进攻前沿阵地一样宽广。尽管不成文法和立法时不时地加快了变革节奏，但是在其它情况下，不成文法和立法则减缓变革步伐。然而，不成文法和成文法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未必起相同的作用。

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方面，不成文法主要起了积极的作用——劳动的商品论首先不是由经济学家而是由法学家强调提出的。在有关劳动组合和《协作法》问题上，不成文法也赞成自由劳动力市场，尽管这意味着限制有组织的工会的自由。

但是，在土地问题上，不成文法所起的作用，却从鼓励变革转变到反对变革。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期间，不成文法更经常地是主张地主有权以有利可图的方式提高土地的盈利性，即便这意味着居住环境和就业状况的严重混乱。就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这个流通过程包括了对《罗马法》的接受，而在英国，不成文法坚持自己的法律，并成功地消除了在有限制的中世纪财产权与现代个人财产

这个观点，即商品流通可能被认为是生产要素流通的替代品。

之间的差距而没有牺牲对宪法自由至关重要的由法官制定法律的原则。另一方面，自 18 世纪以来，有关土地的不成文法在面对现代化的立法时起了保护过去的作用。但是，最终功利主义起了作用，在 19 世纪 30 年代和 60 年代之间，契约自由被扩大到了土地上。这个强有力的趋势只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当立法彻底改变其方向时才发生了 180 度的逆转。“集体主义”时代已经开始。

不成文法的惯性被明确通过的各种成文法有意地强化了，以便保护农村各阶层的居住环境和地产占有权免受契约自由的影响。为了确保穷人的住处符合一定程度的健康和卫生标准，人们发起了一项综合计划，给穷人提供划成小块出租的副业生产地，使穷人有机会脱离贫民窟，也有机会呼吸大自然即“绅士公园”的新鲜空气。旨在保护穷人的居住环境免遭经济进步浪潮的破坏的立法行动，把不幸的爱尔兰租户和伦敦贫民窟居民从市场法则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在欧洲大陆，主要是成文法和行政行为保护了租户、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免受城市化的最强烈的影响。普鲁士保守党人与英国的托利民主党人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例如普鲁士保守党人罗德贝尔图斯*，他的容克*社会主义影响了马克思。

现在，保护的问题出现了，它是关于所有国家和各大陆的农业人口的。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国际自由贸易必然会消除农业生产者的更大契约体。⁵这个不可避免的破坏过程，由于现代运输手段发展过程中的固有不连续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现代运输手段价格太昂贵而无法推广到新的地区，除非获利非常之多。一旦建造蒸汽船和铁路的巨大投资结出硕果，各个大陆整个地就被打开，大量的谷

* 罗德贝尔图斯 (Rodbertus)：普鲁士经济学家，对社会的改革做了保守的解释，有助于普罗斯议会通过社会立法。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不同——译者注。

* 容克 (Junker)：音译；意为地主之子，原为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19 世纪后开始资本主义化，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译者注。

⁵ 伯克瑙 (Borkenau)，F，《极权主义的敌人》，1939 年，“走向集体主义”一章。

物雪崩似地压向不幸的欧洲。这与经典预言相反。李嘉图把它发展成为公理，即人们首先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当铁路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现更肥沃的土地时，这变成了莫大的嘲弄。面临着农业社会全面遭到破坏的中欧，被迫通过引入谷物法来保护农民。

但是，如果说欧洲有组织的国家可以保护他们自己免遭国际自由贸易逆流的影响，那么，政治上无组织的殖民地人民就无能为力了。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异域人的一种努力，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必需的政治地位，以使他们自己躲开由欧洲贸易政策导致的社会混乱。白人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社会的主权地位而轻易就建立起来的自我保护屏障，是殖民地有色人种所无法企及的，因为有色人种缺乏政治政府这种先决条件。

商贸阶层提出了土地流通的要求。科布登*发现，农牧业就是“商业”，失败的人肯定要被淘汰出局。他的这一发现让英国的地主们吃惊不小。只要自由贸易明显使食品价格变得更加便宜，工人阶级就被争取到赞同自由贸易的一边。工会变成反对田地均分法（土地改革）的堡垒，革命的社会主义把世界农民统统打上保守分子的标记。国际劳动分工无疑是一个进步的信条；它的反对者经常是从这样一些人当中吸收而来的，他们的判断力要么是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坏，要么他们天生就是缺乏智慧的人。发现了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之谬论的是寥寥无几的几个思想独立和无偏见的人，他们人数太少了而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印象。

不过，他们的结果虽然没有被有意识地承认但是仍然是真实的。实际上，阻碍土地流通的那些力量所起的重要的保护作用轻易地解释了西欧土地利益集团以及 19 世纪期间中欧和东欧封建生活形式的幸存者施加的巨大影响力。人们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一旦封建贵族失去他们的权势之源的军事、司法和行政职权，什么东西能够使欧洲大陆的封建贵族在中产阶级这一阶层中维持影响力？“幸

* 科布登：理查德·科布登是英国政治家（1804~1865年），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与支持者，保护贸易主义的反对者——译者注。

存者”的理论有时被引证为一种解释，根据其理论失去职权的机构或者特征由于其惯性作用可能继续存在。当一个机构似乎一直能够保持其职权时，然而这么说可能更真实些：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一直保持其职权，这是因为它在其它一些职权中发挥作用，它不需要包括原来的那个职权。因此，只要他们达到一个目标，即该目标恰巧能够限制土地流通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那么封建制度和土地保护主义保持他们的力量。到现在，自由贸易论者忘记了农田构成了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以及国家主权的领土特点不仅仅是感情联想的结果，而且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大量因素的结果。“和游牧民族形成对比，耕种者受到不动产的约束，这种不动产是在一块特定地方上固定下来。没有这种不动产，人类生活一定还保持原始状态，几乎不会与动物分离开来。这些不动产在人类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这些不动产，被开垦和耕种的农田，房屋和其它建筑物，交流的工具，生产所需的各种各样的工厂其中包括工业和矿业，所有的永久性和不可移动的不动产把人类社会和其所处的位置联系起来。这些不动产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他们必定经过多代人耐心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来，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的一群人承受不起牺牲这些不动产到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因此，主权国家的领土特点渗透到我们的政治构想中。”⁶一个世纪以来，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受到了嘲讽。

经济上的争论可以轻易地扩展，以便于包括安全的先决条件，再加上国土和资源的完整性——诸如住在某一地区的人的精力和毅力，食品供应的过剩，战略物资的数量和特点，甚至是国家的气候可能受到滥伐森林以及侵蚀土壤和沙尘暴的影响，所有这些，最终取决于土地的因素，所有这些没有对市场的供求机制做出反应。给定的一个体制完全依赖于市场功能来保护它的存在需要，信心将自然而然地依赖于市场体制之外的这些力量，这些力量有能力保护遭

⁶霍特里，R·G，《经济问题》，1933年。

到市场体制损害的公共利益。这样一种观点与我们懂得阶级影响的真正来源是一致的：不是试图解释在（不清楚的）反对阶级的影响下与当代总趋势背道而驰的各种发展，我们更倾向于解释这样一种阶级的影响，即使是顺便提一下，事实是他们代表了各种发展，只从表面上看这种发展是与社会的整体利益背道而驰的。他们自己的利益常常由这样一种政策全部得到了很好的满足，这种情况只是从另一方面解释了这个真理，即各个阶层设法从这些可能给予老百姓帮助的政府部门中不成比例地得到好处。

斯品汉姆兰制提供了一个例子。管理村庄的英国乡绅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即放慢农村工资的上涨速度以及延迟即将来临的村庄生活传统结构的中断。从长远来看，所选择的这个方法必定有一个最糟糕的结果。然而，如果乡绅不帮助整个国家来迎接工业革命的风潮，他们就将不能够维持他们的惯常做法。

这里重复一遍，欧洲大陆上耕地保护是有必要的。但是当代最能够起作用的理性力量在从事一种冒险活动，这种冒险活动恰巧改变了他们的视角以至于使他们看不到耕地境况的真正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代表面临危险的农村利益的组织对他们的成员而言可以获得一种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保护主义的对抗运动实际上在稳定欧洲农村以及减缓向城镇流动方面是成功的，这种向城镇流动是当代苦难的根源。保守者得益于碰巧发挥了对社会有用的作用。他们为耕地税而战的过程中允许英国的保守阶级过分强调传统感情发挥了相同作用，大约半世纪之后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的成功和其它社会进步技术的成功都是由于相同的原因在起作用。使美洲大陆民主政治受益的上述社会需要加强了欧洲的贵族政治的影响力。

反对土地流动是有社会背景的，那个背景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斗争并构成了 19 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历史。在这次斗争中，军方和高级神职人员是土地阶层的支持者，但是他们几乎完全失去了对社会所起的更直接的作用。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

必然后果即立宪政府有导致这一僵局

的倾向，因为从传统和意识形态看，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并不一定是公众自由权和议会统治，而这些土地阶层现在随时支持任何保守的对这一僵局的解决方案。

简而言之，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政体联姻，而土地利益集团并不与自由主义政体结合——这是他们欧洲大陆永久政治重要性的来源，土地利益集团产生了对在俾斯麦统治下普鲁士政治的反对意见，刺激了法国的牧师和军国主义者的复仇，在哈布斯堡王朝确保对封建贵族的宫廷影响力，使教会和军队成为碎裂王座的护卫者。因为这种联姻经历了重要的两代人依然存在，这种联姻曾经被约翰·梅纳尔·凯恩斯主观断言为永远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土地和地产现在被认为天生对保守主义有一种偏好。18世纪包括有保守党党员的英国，自由贸易论者和耕地拓荒者如同都铎王朝的垄断者和他们从土地中赚钱的革命方法一样都被人遗忘了；对农村持续落后状态的现代偏见抹去了在公众的头脑中的法国和德国的重农的地主对自由贸易的热情的记忆。赫伯特·斯宾塞简单地把军国主义与保守主义等同起来，斯宾塞满足了一代人作为永久样本的要求。日本、俄罗斯或者纳粹军队近来显示出来的社会和技术的适应性对当时那个年代的赫伯特·斯宾塞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一种思想狭隘地受到了时间的约束。市场经济在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是以对社会安宁造成巨大损害为代价的。通过集中倡导土地和土地耕种者的价值，封建阶层从中发现了一个机会来恢复他们曾经失掉的某些声誉。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自然”与“过去”结成联盟；19世纪耕地运动中，封建主义试图通过把自己打扮成人类自然生活环境和土地的守护人来恢复它的过去，但是没有成功。如果这种危险是不真实的，那么这种计谋就不会起作用。

但是军队和教会也是通过一贯有效支持“法律和秩序的保护”来获得声誉的，不过现在这种“法律和秩序的保护”变得非常脆弱，而主导的中产阶级不适合担保这个新经济的要求。与我们所知道的

任何其它经济体系相比，市场体制对暴动更敏感。都铎政府依靠暴动注意到当地人的不满；一些暴动的元凶可能被绞死，其它人则一切平安无事。金融市场的崛起意味着完全抛弃这样一种态度；1797年之后暴乱不再是伦敦生活场景的一种普遍特点，暴乱的地位逐渐被会议所取代，这种会议至少在原则上以举手表决，如果反之不进行举手表决就会经历沉重的打击。⁷宣布维持和平是国民首要职责的普鲁士国王就是因为这个矛盾的论调出了名；然而不久这个论调成了陈词滥调。19世纪的和平如果是被武装的一伙人打破，那么这种对和平的破坏被认为是一种初期的反抗以及认为是对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危险；股票崩盘并且没有底价。在大都市街道上射击闹事可能破坏名义上是国家首都的实质性部分。然而中产阶级不是军人；受到大众欢迎的民主由于使广大群众发表意见而感到得意；在欧洲大陆，当资产阶级在有激烈争论的主题上使自己面对残暴的贵族统治时，他们仍然念念不忘革命精神。被自由病毒侵蚀最少的农民最终被认为是唯一的阶层站在他们之中“支持法律和秩序”。保守派的作用之一被认为是维持了工人阶级的现状，以便市场免于陷入恐慌之中。尽管不是经常需要这种效用，但是在农民作为财产权的保护者方面的可利用性对耕地阵营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在其它方面是不可思议的。在中欧，当社会结构在战争和战败的压力下瓦解的时候，单单工人阶级就能够胜任使社会继续运转下去的任务。各国的权力被强加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匈牙利甚至是德国被宣布为共和国，尽管以前人们从来都不知道在这几个国家中有积极的共和党。但是混乱的严重危险几乎没有过去，与中产阶级试图排除工人阶级对公众生活的全部影响力相比，工会的效用变得多余。这被称为战后时期的反革命

⁷特里维廉，G·M，《英国历史》，1926年，第533页。“沃波尔领导下的英国仍然是贵族统治，并由暴动调和。”汉纳·莫尔的“博物馆”歌，“暴动”写于“1795年，这一年是萧条和恐慌年”，这一年也是斯品汉姆兰制度年。参见《博物馆小册子》，第1卷，纽约，1835年。参见《图书馆》，1940年，第4系列，第20卷，第295页，有关“廉价的博物馆小册子（1795~1798年）。”

阶段。实际上，自从工人被组建为政党和工会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以来，从来没有对共产主义政权构成任何严重的危险。（匈牙利有一个布尔什维克事件几乎是强加于该国的，当时抵御法国进攻而使该国没有选择机会。）在非常时期，危险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就工会和工人阶级而言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则。在市场经济下，公共秩序和贸易习惯的其它方面的没有损害的中断可能构成了一个致命威胁⁸，因为这些中断可能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而社会日常生活需要就是依赖于经济体系。这解释了一些国家中从猜测即将由产业工人统治国家到实际由农民统治国家的重大变化。在整个 20 世纪，许多国家的农民决定经济政策，一般说来，农民在这些国家中只起了适度的作用。现在他们恰巧是唯一一个阶层能够有效维护非常敏感的现代时期的法律和秩序。

战后欧洲激烈的田地均分法从侧面说明了由于政治原因对农民阶层的优先待遇。从芬兰的“拉普阿运动^{*}”到奥地利的保安团^{*}，农民被证明为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使农民变得在政治上不可或缺。战后第一年的食物短缺有时被认为是农民优势所在的原因，但是食物短缺几乎与此没有关系。例如奥地利为了使农民在财政上得到好处，尽管奥地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来满足本国的食品要求，但是该国不得不通过维持谷物税降低本国的食物水平。尽管耕地保护主义对城镇的居住者而言可能意味着不幸以及对出口产业而言不合理的生产高成本可能意味着不幸，但是，农民利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保护。以前没有影响力的农民阶层以这种方式得到优势，这与他们的经济重要性很不成比例。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农民的政治地位牢不可破。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

⁸ 海斯，C·A，《物质主义的一代人》，1870~1890 年，评论道“至少在西欧和中欧，大多数的各个国家现在表面上拥有最好的内部稳定。”

^{*} 芬兰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它鼓吹反共，仇视苏联。英语原文为Lappo，现在按照Lapua翻译，Lapua是芬兰的一个教区名——译者注。

^{*} 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地方组织。由保守农民组成，代表右翼势力——译者注。

种恐惧并不是害怕工人阶级统治国家——完全没有与此有关的一点点类似的恐惧——但是很惧怕市场经济的停顿，如果所有的力量不从政治圈中消除，在这种恐惧的胁迫下可能会把市场游戏规则放在一边。只要农民是唯一一个阶层能够消除这些力量，他们的声誉就会很高并且农民能够摆布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一旦巩固国家的权力——甚至以前是那样——法西斯主义者把城市中产阶级的下层编成纳粹党突击队，使中产阶级摆脱依赖农民，农民的声誉就迅速下降。一旦城镇和工厂的“内部敌人”被压制和征服，农民在工业社会中又降到农民以前的适度位置。

大地主的影响力并没有受到削弱。一个更加不变的因素对他们起了有利的作用——增加了农业自给自足的军事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公众充分明白了基本的战略事实，恐慌性地储备食品生产能力取代了欠考虑的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由布尔什维克恐慌发动的中欧的“重新均分土地”是在自给自足的迹象中完成的。除了“内部敌人”的论点外，现在还有“外部敌人”的论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通常只看到由不健全的经济学说引起的夸大的偏差，实际上其中激烈的政治事件正在唤醒甚至是头脑最简单人，明白了在面对处理国际体制的混乱时有关经济因素的不相关性。日内瓦继续无效地尝试使人们确信他们的储备是为了对付想象中的危险，以及使人们确信如果只要所有人一致性地行动，自由贸易才能够被恢复并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在这个时代极其容易轻信的氛围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问题（不管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的解决方案不仅减缓了战争的危险，而且实际上永远避免了那种危险。百年和平建立起了一堵掩盖事实真相的牢不可破的幻想之墙。那个时期的作家以脱离现实见长。单一民族国家被 A·J·汤因比视为一种狭隘的偏见，主权国家被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视为一种荒谬的幻想，战争被诺曼·安吉尔视为商业上的计算错误。对政治问题的本质特点的认识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

自由贸易在 1846 年受到了挑战并在“谷物法”上取得了胜利，

而在 80 年之后自由贸易再次受到了挑战，但是这次在同样问题上遭到了失败。自给自足问题从一开始就经常出现在市场经济中。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赶走了战争的恐惧并把他们的例子天真地建立在牢不可破市场经济的假想上。被人们遗漏的是他们的论点只是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危险有多大，该民族的安全依赖于一种像自我调节市场一样脆弱的制度。20 世纪自给自足运动本质上是先兆：它显示了需要适应于秩序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了这种危险，人类相应地行动；但是因为他们 10 年后行动，因果之间的联系被低估为不合理。许多同时代的人都这么说：“为什么保护自己以免遭受危险？”。这个错误的逻辑不仅误解了自给自足，而且更重要的是误解了法西斯主义。实际上这两者可以由这个事实解释清楚，即只要它们的根源没有被清除掉，那么普通人一旦有了危险的印象，潜藏的恐惧就会依然存在。

我们坚持认为欧洲各国从来没有克服过战争经历的冲击，这种经历意想不到地使他们面临相互依赖的危险。贸易没有被成功地恢复，成群的国际会议并没有成功地显示出田园诗般的和平，数十个政府宣布支持自由贸易原则——没有人会忘记如果他们自己不拥有他们的食物和原材料资源或者不能确信军事上得到他们，健全的货币或者不容置疑的信用都将不能把他们从无助中救起。这种一致性是最有逻辑的，这个基本的因素用这种一致性构成了社会政策。这种危险根源没有被消除。那么为什么希望恐惧平息下来去呢？

类似的谬论捉弄了那些法西斯主义的评论家——他们形成了大多数——这些评论家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缺乏所有政治比例的一种奇想。据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统计数据证明了“罗马游行示威”的一年多之前，罢工的浪潮已经平息。人们承认 1921 年武装起来的工人占领了工厂。但是那就是 1923 年解除那些工人武装的理由？当时这些武装起来的工人从他们站岗放哨的墙上再次爬下来。希特勒声称他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拯救了德国。难道不能够看出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失业的狂潮是在希特勒

担任总理之职之前已经退去？正如所指出的，声称希特勒阻止了他掌权时已经不再存在的失业狂潮是与因果定律恰恰相反的，这一定也会约束政治。

实际上，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战后的不远一段时期的情况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丝毫都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这种情况最终也说明了在紧急状态中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工会和党派可能忽视市场经济规律的绝对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了订约自由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性——一种可能性一定对社会是最有害的影响，他们使投资失去信心，妨碍资本的积累，使工资维持在无报酬的水准上，危及货币，破坏外国贷款，削弱信心和使企业处于瘫痪状态。潜在的恐惧根源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幻影式的危险而是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工人阶级会强制推行可能是破坏性的干预，在紧要关头会在法西斯的恐慌中爆发。

不能把人类面对的危险和自然面对的危险巧妙地分开。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市场经济做出的反应都导致了保护主义，前者主要是以社会立法和工厂法的形式存在，而后者主要以耕地税和土地法的形式存在。然而，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要的不同：在紧急状态下，欧洲的农场主和农民捍卫着市场体制，而工人阶级的政策却是危及市场体制的。尽管保护主义运动的双翼引发了天生具有不稳定性的市场体制的危机，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阶层倾向于向市场体制妥协，但是，广大的工人阶层却毫不犹豫地打破市场体制的规则，并公开地向市场体制发出挑战。

第十六章

市场和生产组织

甚至资本主义商业本身也不得不寻求保护，以免遭受市场机制毫无节制的运作的伤害。这应该会消除“人”与“自然”这两个术语有时候在那些老于世故的人当中所激起的怀疑，因为他们往往会公开指责有关保护劳动力和土地的言论，他们认为这种言论即使不全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掩饰之词，至少也是陈旧思想的产物。

实际上，如同人和自然的情形一样，就生产型企业而言，这种危险是真实而又客观的。由于货币供应是根据市场体制方式组织的，这就出现了保护的需要。现代中央银行业实际上就是出于提供保护的目的地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工具；如果没有中央银行业，市场就会摧毁其自身所产生的所有各种各样的商业企业。然而，最终正是由于这种保护形式最直接地导致了国际体制的崩溃。

尽管市场大动乱威胁着土地和劳动的危险是相当明显的，但是货币制度固有的对商业的各种危险就不那么容易被理解了。如果利润依赖于价格，那么对受利润所驱使的任何体制发挥作用而言，价格所依赖的货币安排一定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从长远看，销售价格的变化并不影响利润，因为各种成本会相应地上升和回落；但是从短期看，销售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利润，因为在合同固定价格变化之前必定存在一种时间滞后性。在它们当中是劳动力的价格和许多其它价格自然而然地由合同固定下来。因此，如果价格水准由于货币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下降，企业会随着生产组织的分解和资本的大破坏而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麻烦不在于低价而是在于价格在下降。休谟成了货币数量理论的创始人，他发现了如果货币总额减半，企业仍然未受影响，这是因为价格会完全调整到他们先前一半的水准。休谟忽略了企业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解体。

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商品货币*体制和工业生产不能溶合成一体的原因，例如市场机制没有外部干预往往也会成形。商品货币只是一种商品，它凑巧起了货币的作用，因此在原则上，除了减少不会起货币作用的商品总数外，商品货币的总数完全不会增加。实际上，商品货币通常是金或者银，商品货币的总数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但是增加值不会太大。货币总数的增加并不伴随生产和贸易的增加，那么这种情况必定会导致价格水准的下降——精确地讲，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具有破坏性质的通货紧缩。17世纪商人社会中，货币短缺是一种持久和严重的通病。符号货币*在早期就发展起来，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贸易免受强迫的通货紧缩的影响，当贸易量增加时，这种通货紧缩补充使用铸币。如果没有这种人造货币，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

大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随着需要稳定外汇交易和随后的引入金本位制，真正的困难出现了。稳定外汇交易对于英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是基础；由于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伦敦成了金融中心。除了商品货币别的都不能够满足这个目的，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符号货币不管是银行货币还是法定货币都不能够在国外流通。因此，金本位制——用于国际商品货币体制中大家公认的名字——走上了历史舞台。

正如我们所知，要不是国内使用的目的，铸币是一种不充足的货币，正是因为铸币是一种商品，它的总数不能够随意增加。随着可能需要承载突然增加的交易量，可提供的黄金总数每过一年可能会增加几个百分点，但是不可能在几周内增加十多个百分点。在缺少符号货币的情况下，商业不得不缩减或者在非常低的价格上成交，因此，这种情况导致了不景气和产生了失业。

这个问题可以用这种最简单形式来发问：商品货币对于外贸的

* 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指有内在价值的货币；也指作为货币使用的商品，如家畜、珍珠等ŭŭ译者注。

* 符号货币（token money）指很少有或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译者注。

存在是至关重要的；符号货币对于国内贸易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商品货币和符号货币彼此之间的一致性有多大？

根据 19 世纪的情况，外贸和金本位制无可争议地比国内贸易需求重要。每当兑换率受到贬值的危险时，金本位制的运作需要降低国内价格。因为通货紧缩是通过对贷款的限制实现的，这就是说，商品货币的运作干预贷款体制的运作。这对商业而言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危险。完全丢弃符号货币以及把货币限制在商品货币范围内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种治疗法比疾病本身要糟糕得多。

中央银行业务大大减少了信用货币的不足之处。通过把一个国家的贷款供应集中起来，就可能避免与通货紧缩有关的商业和就业的大规模混乱，就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有效控制通货紧缩，从而达到缓减这种冲击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分散这个负担。银行的这种正常功能正在减缓黄金的撤离对货币流通的直接影响以及减缓货币流通的减少对商业的直接影响。

银行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法。短期贷款可能弥补了由短期黄金流失引起的缺口，同时避免了对贷款限制的要求。但是即使当贷款限制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通常情况那样，银行的功效起了一个缓冲作用：提高银行利率和开放市场的运作方式把限制的影响扩展到整个社会，把限制的负担转移到最强壮的肩膀上。

让我们设想一下单方面支付从一国转帐到另一国的重要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需求从国内食物品种向国外食物品种的转变引起的。现在那些已经被用于支付进口食物的黄金反转来被用于国内支付，因此黄金的缺乏一定会导致国内销售的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价格的下降。我们将会把这种类型的通货紧缩称为“交易型的”，因为按照他们幸运的商业交往，它从个体公司扩展到公司。最终，通货紧缩的扩散将会影响到出口公司，因此，实现了外贸顺差，这代表了“真正的”转帐。但是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和损害将会远远大于严格有必要实现这样的外贸顺差。由于总是有各种公司缺少这种出口能力，这就需要一点点诱导来稍微减少成本从而使这些公司到达“超

过限额”，这样一种减少成本最主要在经济上实现，方法是通过稀疏地把通货紧缩分散到整个商业社会。

精确地讲，这是中央银行的功能之一。央行的贴现和开放市场政策的主要压力迫使国内价格或多或少地均匀下降，能够使“接近于出口的”公司恢复出口或者增加出口，而仅仅是最没有效率的公司将不得不破产。因此，“真正的”转帐将以非常小的混乱为代价实现的，而不是需要通过有害的、不合理的方法获得相同的外贸顺差，灾难性的冲击在狭窄的“交易型的通货紧缩”通道里传播。

尽管这些方法是为了减少通货紧缩的影响，但结果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是完全非组织性的企业，随后是大量的失业，所以在对金本位制进行的指责中这是最有力的。

货币的例子显示出跟劳动和土地的例子非常相似。把商品虚构（commodity fiction）运用到他们三者中的每一个导致了把其有效地包含进市场体制，而同时对社会的严重危险也就形成了。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这种威胁是货币，因为任何一种由使用商品货币引起的价格水准的下降使生产型企业的存在受到危险。这里也必须采取保护措施，所以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也就失去作用。

中央银行业务减少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只是一种借口。这样做意味着集中管理货币；即使这种方法总不是永远深思熟虑和有意识的，但是操纵被取代为供应贷款的自我调节机制。越来越来多的人承认只要各个国家放开中央银行业务就能够使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路德维希·冯·米泽斯（Ludwig von Mises）是纯金本位制的一贯支持者，他实际上支持这一孤注一掷的措施；如果他的建议被加以考虑，那么就会使国家经济变成一堆废墟。

存在于货币理论的大多数被混淆的事情是由于把政治和经济分开，这是市场社会的显著特点。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被认为纯经济一类，商品被用作间接交换的目的。如果黄金被提升为商品，那么金本位制就成形。（把属性“国际”与金本位制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经济学家而言，不存在国家；交易不是在国家之间

进行而是在个体之间进行，他们的政治忠诚就像他们的头发一样是不相干的。)李嘉图向 19 世纪的英国灌输了这样一个信念，即术语“货币”意味着交易的媒介，“纸币”只是为了方便，他们的效用在于他们比黄金使用起来更方便，但是他们的价值来自于这样一种确定值——他们的拥有物是用我们任何时候自己拥有商品的手段黄金提供给我们的。这就是说，货币的国家特点*是不重要的，因为他们只是代表着相同商品的不同的符号货币。如果一个政府尽一切努力使自己拥有黄金，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分布正如其它任何东西一样会自我调节），想象着不同国家的符号货币与有关国家的福利和繁荣相联系是更不明智的。

目前，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机构分离从来没有彻底过，精确地讲，这是有关货币的，它必然是不彻底的；国家实际上是符号货币价值的保证人，符号货币的价值在税款和其它支付方面得到承认，国家造币厂似乎是只是证明铸币的重量。这种货币不是交换手段，它是支付手段；它不是商品，它是购买力；它本身没有效用，它只是一种筹码，该筹码包含了要求得到可能已经被购买的东西。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取决于拥有这种购买力符号货币的分布（商品流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的结构。

当然，我们在这里研究现实的各种情况，但是研究用于解释目的概念模式。市场经济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结构支持自大卫·李嘉图以来的经典经济学，除此之外，它的概念和假设是难以理解的。按照这个“设想 (lay-out)”，社会是由实物交易的个人拥有的各种商品（货物、土地、劳动以及他们的混合物）机构组成。货币只是以实物交易为主的商品之中的一种，因此获得了交换使用的目的。这样一个“社会”可能是不真实的；然而它包括了结构的本质，古典经济学家以该结构作为来源。

购买力经济¹提供了一个很不完整的社会情况。然而，我们的现

* 原文是characer，可能系character之误，故按character翻译——译者注。

¹ 新西兰惠灵顿的F·谢弗对这一基本理论作了详细阐述。

实社会与市场经济范例相比，购买力经济的一些特征与我们的现实社会非常相似。让我们来想象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个体被赋予具体数量的购买力，使他能够要求得到各种商品，每一件商品都有价格标签。在这样一种经济中的货币不是商品；货币本身没有实用性；货币的唯一用途是购买贴有价格标签的商品；这些商品与我们现在的商店里的商品非常相似。

商品货币定律可要比 19 世纪与之相比的东西优越得多，各种机构符合市场模式的许多基本要素，自 20 世纪初以来，购买力的概念固定了下来。随着金本位制的瓦解，商品货币基本上消失了，很自然，货币购买力的概念会取代它。

从机制和概念转向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重要的是认识到统治阶级本身支持通过中央银行来管理货币。当然，这样一种管理不被认为是干预金本位制；相反，这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根据这种游戏规则，金本位制应该发挥作用。由于维持金本位制是不言自明的，中央银行业务机制从来没有被允许以这样一种方式行事从而使一个国家放弃金本位制，但是相反，在继续保留金本位制的所有条件下，银行的最高指令始终是无可争议的似乎会发挥作用的原则。但是只要有有关的价格水准波动最高只在 2~3% 之间，就分离所谓的输金点（gold points）。一旦有必要保持兑换率稳定的国内价格水准的波动非常大，例如上蹿至 10% 或者 30%，那么整个形势就会发生变化。价格水准如此地向下运动会使苦难和破坏蔓延开来。货币受到管理的事实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中央银行方法是一个政策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做出决策的一些事情。确实，中央银行业务的机构重大意义在于货币政策因此被涉及到政治领域。这种重要性意义非常深远。

他们有两个方面。在国内方面，货币政策只是干涉主义的另外一种形式，经济阶层的冲突往往会把与金本位制和平衡预算有紧密联系的这个问题具体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30 年代的国内冲突常常会把注意力集中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日益增长的反民主运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外方面，尽管这个事实在当时几乎没有得到承认，但是国家货币的作用非常大。19 世纪统治哲学是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原则上讲”。所有受教育的人是自由商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现在的限制条件表现得有节制，实际上他们仍然这样。当然，这种观点的来源是与经济学有关；来源于实物交易和贸易领域的许多真正理想主义正在通过人类自私欲望的最大矛盾证实理想主义最大慷慨的冲动。但是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尽管相应的支配思想没有中断过，但是情感变化是显著的。尽管这个世界以国家主义和自给自足方式行事，但是这个世界继续相信干涉主义和相互依赖。由于其有关国外的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垄断保护主义的显著的知识，自由的国家主义正在发展为国家自由主义。在货币领域的矛盾是最尖锐的而且也是最没有意识的。对国际金本位制教条式的信仰继续利用人类无限制的忠诚，而在同时建立了符号货币，这是以主权国家不同的中央银行体制为基础的。在国际原则的保护下，新国际主义坚不可摧的堡垒以中央银行发行的形式无意中建立了。

说实在的，**新国家主义是新国际主义的必然结果**。各国不能够对国际金本位制施加金本位制应该服务于各国的压力，除非各国得到确保免于这种危险，即国际金本位制威胁社会坚持这种制度。如果这种冲击不能够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政策的手段得到缓冲，完全货币化的社会就不能够忍受在价格水准上被迫维持稳定兑换率的突然变化而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国家符号货币是这一安全的可靠保护措施，因为该措施允许中央银行在内部和外表经济之间起缓冲作用。如果支付平衡受到无流动资金的威胁，储备和外国贷款会暂时克服这种困难的；如果必须建立一个与国内价格水准密切关联的全新的经济平衡，贷款限制以最合理的方式展开，减少无效率的企业，把负担放到有效率的企业身上。不管从生产、收入还是就业的角度来看，如果不破坏发达国家福利的影响，缺少这样一种机制就不可能

使任何发达国家保留金本位制。

如果商贸阶层是市场经济的支持者，银行家天生就是该阶层的领导者。就业和利润依赖于企业的赢利性，但是企业的赢利性依赖于稳定的兑换率和健全的信用环境，银行家关心的就是稳定的兑换率和健全的信用环境。稳定的兑换率和健全的信用环境是不可分离的，这就是银行家的部分信条。健全的预算和稳定的国内信用环境是稳定的外汇交易的前提；如果国内信用不安全以及国家的金融家族不平衡，兑换率就不会稳定。简而言之，银行家的两个信用由健全的国内金融和国外的货币稳定组成。这就是为什么当健全的国内金融和国外的货币稳定失去意义时，作为一个阶层的银行家最后一个注意到它。20年代国际银行家的影响力是占主导地位的，这确实没有什么惊奇的，30年代国际银行家的影响力的消失也不是出人意料的。在20年代，金本位制仍然被认为回到稳定和繁荣的前提条件，因此只要保护人许诺确保兑换率的稳定，由保护人银行家提出的要求没有被认为是难于负担的；1929年之后，这证明是不可能的，这个迫切的需要是国内货币的稳定，只有银行家较有资格提供稳定的国内货币。

没有一个领域像市场经济崩溃和货币崩溃那样突然。干预国外农产品进口的农业税破坏了自由贸易；劳动力市场的缩小和管制把讨价还价限制在法律允许各方做出决定的范围内。但是不管是在劳动或者土地的例子中，在诸如发生在货币领域的市场机制中都没有突然和完整的表面裂缝。在其它市场中，没有什么可以跟1931年9月21日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相比拟；甚至没有什么可以跟1933年6月美国放弃金本位制的附属事件相比拟。尽管在那时，始于1929年的大萧条冲走了大部分世界贸易，但是这意味着在方法上没有变化，也没有影响到主导思想。但是金本位制最终的失败就是市场经济最终的失败。

起始于100年前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受到保护主义策略的抵制，此时却突然变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后堡垒。一套新的治理理念取

代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世界。令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感到吃惊的是，由魅力超凡的领导艺术和专制的孤立主义所构成的各种势力，不仅突然出现了，而且把社会铸就成了新的形式。

第十七章 自我调节的功能受到削弱

在 1879~1929 年的半个世纪中，西方社会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单位，它们的内部潜藏着各种具有破坏力的紧张关系。这种发展结果的较为直接的来源，就是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受到了削弱。由于社会被迫顺从市场机制的需要，所以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缺陷便在社会肌体中产生了累积性的紧张关系。

受到削弱的自我调节功能是保护主义的结果。当然，有一种观念认为市场总是自我调节的，因为市场往往会产生市场自身所支持的价格；然而，不管这种市场是否是自由的，这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但是，正如我们所显示的，自我调节市场机制暗示了非常不同的方面，即市场所支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由于这样一种市场运作具有破坏社会的潜在危险，社会自我保护行动旨在阻碍他们一度建立起来的机构或者干涉他们自由发挥作用。

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结论性证据以美国为例证明市场经济有能力发挥作用。一个世纪以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在美国可以完全自由地被交换，迄今为止据说不需要社会保护措施，除了关税受到政府的干预外，工业生活继续保持不受阻碍。

当然，这样一种解释是简单的：这就是自由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一直到 19 世纪 90 年代边疆是开放的，自由土地延续着；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低标准的劳动力供应自由流动²；一直到世纪之交，没有承诺保持外汇交易稳定。继续提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供应；因此，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是不存在的。只要这些条件仍然存在，人、自然和商业组织都不需要这种只有政府干预才能

* 生产要素指生产性投入，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的资源，也称“投入”——译者注。

² 彭罗斯，E·F，前面引用的书。马尔萨斯定律只有根据土地供应受限的假设才有效。

提供的保护。

只要这些条件不存在，社会保护就会介入。由于来自于无穷无尽的移民库中的小比例的劳动力很自由地被替换掉，而大比例劳动力不能够在土地上自由地定居；由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变得稀有，因此必须节约；由于为了把货币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以及把国内贸易和世界贸易联系起来而引入金本位制，美国赶上了一个世纪欧洲的发展：土地和土地耕种者的保护、社会通过工会主义和立法保护劳工以及中央银行业务——都在最大范围内——出现。货币保护主义首先出现：联邦储备制建立的目的是协调金本位制的需要和地区之间的需要；有关劳动力和土地的保护随后也出现。20 年代 10 年的繁荣有能力大大改善经济萧条，在这个过程中“新政”*开始在劳动力和土地周围建立起护城河似的保护，这要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宽阔。因此，美国的例子从正反两方面为我们理论提供了鲜明证据，即社会保护被认为是自我调节市场的伴随物。

同时，保护主义正在到处产出社会生活的新标准单位的硬壳。新的实体被铸造成国家的形式，但是与它先前的悠闲国家的过去相比只有一点点相似。新的甲壳类国家通过国家符号货币表达其身份，这种符号货币受到了比我们以前所知道的任何国家更加审慎和完美的一类主权国家所保护。外部世界也注意到了这些符号货币，因为正是这些符号货币，使得国际金本位制（世界经济的主要手段）被建立起来。如果现在资本公然地支配世界，则这种资本就打上了国家的印记。

这种对国家和货币的强调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是不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由主义者的头脑中习惯性地不能够理解他们正在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真正特征。如果国家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与时代不合的，国家货币也就被认为更加不值得关注。自由主义时代的自尊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怀疑这个事实的不相关性，即不同的文件根据政治新领

* 新政（New Deal）指美国罗斯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实施的內政纲领名称，旨在恢复经济、改革社会——译者注。

域的不同方面也会有不同的考虑。把一种货币面额转换成另一种货币面额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交易市场，交易市场一定会发挥作用，因为很幸运，交易市场不受国家或者政治家控制。西欧正在经历一场启蒙运动，国家的“部落制”概念名列在这些棘手的难题中，它所声称的国家主权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是狭隘思想的露头。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入门手册包括了某种信息：货币只是交易的手段，因此货币的定义无关紧要。市场营销思想的盲点对国家现象和货币现象同样缺乏敏感。就国家现象和货币现象而言，自由商人是唯名论者。

这种联系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那时人们忽略了那种联系。自由贸易学说的评论家与有关货币出现的传统学说的评论家之间或多或少也有联系，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承认这两个学说是用不同的术语陈述相同的事情，如果其中一种学说是错误的，那么另一种学说也是错误的。威廉·坎宁安或者阿道弗·瓦格纳揭露了国际自由贸易的谬论，但是没有把这种谬论与货币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麦克劳德和威克塞尔（Wicksell）攻击经典货币理论遵守国家贸易体制。货币在建立作为当代决定性的经济和政治单位的国家过程中的基本的重要性被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作家完全忽略了，这正如历史的存在被在他们之前的 18 世纪作家完全忽略一样。从李嘉图到威泽，从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到马歇尔和威克塞尔，这些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都支持这一立场，而普普通通受过教育的人通过受教育认为国家的经济问题是当务之急或者认为把人打上下等记号的货币的经济问题是当务之急。在荒诞的建议中，即国家货币在我们文明社会的机构机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并这些谬论就会被认为是空洞的悖论，毫无疑义。

实际上，新的国家标准单位和新的国家货币是不可分离的。正是货币给国家和国际体制提供了他们的机制并引入一种景象，该景象的特点是会导致突然中断。信用赖以建立的货币体制已经变成国家和国际经济的生命线。

保护主义是一种三叉驱动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各自发挥着作用，但是当把土地和劳动与明确的甚至是广泛的社会阶层诸如工人或者农民联系起来的时候，货币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因素，常常把不同利益合并成整体利益。即使货币政策也可以分开和合并，但是货币体制在合并成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是最强大的。

劳动力和土地根本上不能够分别解释社会立法和谷物税。农场主会抗议使劳工受益和增加工资所带来的负担，而劳工会反对食品价格的上涨。但是一旦谷物法和劳工法生效——德国自 80 年代初以来——要废除一个法而不废除另一个法变得困难重重。农业税和工业税之间的关系甚至更紧密。自俾斯麦（1879 年）把全面保护的思想变得普及以来，地主的政治联盟和实业家互惠的关税保护措施就是德国政治的特征；为了从关税中获得个人好处，在关税上互投赞成票如同建立政治联盟一样普遍。

国内和国外的保护主义以及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主义往往会融合在一起²。由谷物税引起的生活成本的提高会导致工厂主请求保护性税率，工厂主几乎都能够利用政治联盟的政策作为一种工具。工会自然而然地坚持高工资来补偿提高的生活成本，同时工会竭力反对允许雇主处理（meet）过高工资法案的关税率。但是一旦会计工作的社会立法被建立在受关税制约的工资水准的基础上，雇主就无法如同想象中那样平等地承担这种立法的负担，除非使雇主确信继续受到保护。顺便提一下，指责集体主义者一起对保护主义运动负责，对于这种指责事实依据不是很充分。但是这种指责把结果误解为起因。保护主义运动的起因是自发的并且扩散范围很广，但是这种运动一旦开始，当然它就不能够停止建立类似的利益集团，该集团致力于使保护主义运动继续下去。

比利益集团相似性更重要的是扩散到实际社会环境的一致性，这种社会环境是由这样一种措施的综合结果建立的。如果不同国家

²卡尔，E·H，《20 年危机：1919~1939 年》，1940 年。

的生活不同，事实总是如此，这种不同现在可以追溯到具体的立法和保护目的行政法规，因为生产和劳动的环境现在主要取决于关税、税收和社会的各种法律。甚至在美国和英联邦的自治领限制移民之前，尽管英国有严重的失业，但是从英国移民出去的数量在减少，公认的原因是大大改善了祖国英国的社会环境。

但是如果关税和社会法律营造了人为的气氛，货币政策建立了实际上是真正的人为气候条件，这个气候条件每天不同并且影响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直接利益。到目前为止，货币政策整合力量超过了保护主义其它种类的整合力量，他们缓慢和讨厌的机构，因为货币保护的影响是一直在起作用 and 一直在变化。商人、参加工会的工人和家庭主妇所思考的，为他们庄稼做计划的农场主、为他们子女考虑机会的父母亲、等待结婚的恋人当考虑时代的偏好时，在头脑中所下的决心与其它任何单一因素相比更直接地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甚至在货币稳定时这是真实的，那么当货币不稳定时，这确实变得地更加真实，所以必须做出是通货膨胀或者是通货紧缩的重大决策。在政治方面，国家的身份是由政府建立的；在经济方面，国家的身份是由中央银行授予的。

在国际方面，货币体制如果可能的话发挥了更加大的作用。非常荒谬的是，货币的自由是对贸易限制的结果。由于商品的流通和人员过境的障碍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必须保护自由支付越来越有效率。短期货币在短时间内从全球的一个点到达全球的另一个点；政府之间、私人公司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国际支付形式得到了一致性的调节；拒付外债，或者企图篡改预算保证书，甚至是极其不讲信用的落后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严重违法行为并且要受到规章的惩罚。和世界货币体制相关的各种问题中，在各地建立了类似的制度，例如代表团，成文宪法定义了他们的权力以及管理预算的发布，法律的颁布，条约的批准，承担财务责任的方法，公共会计工作的法规，外国人的权利，法庭的司法权，国内汇票，因此也暗示着，银行发行的地位、国外债券持有人的地位以及形形色色债权人的地位。这

包括了银行货币、银行铸币和邮政法规使用中的一致性以及证券交易所和银行业务的一致性。除了或许有最大权力的政府外，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得起忽视货币的禁忌。从国际用途来看，货币是具有国家性质的，任何时候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体系之外存在。

与人和商品形成对比，货币并非都是阻碍性的措施，同时货币继续发展其遍布全球和全天候的商业交易能力。移动实际物体变得越困难，而传达要求对他们索赔变得越容易。当商品和服务贸易速度放慢以及贸易平衡非常危险地来回摆动的时候，在全球采用的短期贷款的帮助下，国际收支平衡几乎自动保持流动以及只模糊注意到可见贸易的筹资运作几乎也自动保持流动。为反对商品交易而建立起来的不断增高的贸易壁垒（the mounting barriers）仍然没有影响到支付、债务和索赔；国际货币机制快速增长的灵活性和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补偿一直在缩小的世界贸易渠道。在 30 年代早期，当世界贸易量变得非常小的时候，国际短期贷款的流动性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只要国际资本流动机制和短期贷款发挥作用，实际贸易中的不平衡不会太多以至于不能够用记帐的方法加以克服。在贷款流通的帮助下，社会混乱得以避免；金融手段纠正了经济不平衡。

作为最后手段，受到削弱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商业循环不能正常运转以及不能恢复就业时，当进口不能够导致出口时，当银行储备法令恐慌性地威胁商业时，当国外债务人拒绝付款时，政府必须对这种紧张状态做出反应。根据紧急情况，整个社会通过干预的手段坚持自己的权利。

导致国家采取多大程度的干预取决于政治领域的形势以及经济困难的程度。只要投票受到限制以及只有少数人施加影响力，干涉主义还不是一个那么紧急的问题，但是当普选权使国家成为统治普通老百姓的机构时——在经济领域普通老百姓都不得不经常痛苦地承受被统治者的负担，干涉主义就变成了一个紧急问题。只要就业充分，收入得到保障，生产继续，生活标准是可靠的，价格稳定，

干涉主义的压力自然而然地小于当发生持续的暴跌使工业成为无用工具和徒劳努力的废墟时。

在国际方面，政治方法也被用于补充不完善的市场自我调节功能。李嘉图的贸易和货币理论很可惜地忽视了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在地位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于他们不同财富生产能力，出口机构，贸易、运输和银行经验产生的。在自由主义理论中，英国只是在贸易世界中的另一个国家，准确地讲，英国跟丹麦和危地马拉处于同一水准上。实际上，这个世界包含了数量有限的国家，可以分成债权国和债务国，出口国和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国家，出口不同商品的国家和销售像小麦或者咖啡一类单一商品的国家，后者的进口和外国借款都要依赖于销售这些单一商品。这种差别在理论上可以被忽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结果不可能同样地被忽视。海外国家经常发现他们没有能力清偿外债，或者他们的货币遭到贬值而危及他们的偿付能力；有时这些国家决定通过政治手段和干涉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来恢复这种平衡。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不能够依赖于经济自恢复的过程，尽管根据经典学说那些经济自恢复过程总是能够偿还债权国债务、恢复货币和保护外国人免受相同的货币损失。但是，这要求有关各国或多或少同样是世界劳动分配体制的参与国，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认为货币暴跌的国家会自动地增加他们的出口从而恢复这种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是没有根据的，或者认为对国外资本的需求会迫使它补偿外国人和重新开始它的债务服务是没有根据的。例如，咖啡或者硝酸钾组成的化肥销售的增加可能会使整个市场混乱不堪，拒付高利率的外债似乎比贬值一个国家的货币更可取一些。世界市场机制不能够承担冒这样的险。取而代之的是，炮舰被部署到现场，拖欠债务的政府，不管是否是欺诈性的，都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遭受炮轰，要么偿清债务。没有其它办法可以有效强制支付，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可以保持这个体制运转下去。尽管理论上可靠的共同优势论点没有被当地人立即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掌握，但是类似的做法被用于劝导殖民地人民承认

贸易的优势。更多的证据显示需要干涉主义方法，如果被谈及的地区碰巧在原材料方面丰富需要欧洲制造商，就当地人而言，他们天生的渴望原来就有完全不同的倾向，而预先建立起来的和谐不能够确保出现一种对欧洲制造商的渴望。当然，可以说，所有这些困难没有一个是在所谓的自我调节的体制下产生的。但是，更经常发生的是，只有在武装干涉的威胁下债务才会得到偿还，只有在炮舰的帮助下贸易线路才会保持畅通，贸易跟随在旗舰之后，而旗舰则按照入侵国政府的需要行事，**更加发明显的是，为了维持世界经济的平衡，必须使用政治手段。**

第十八章

具有破坏力的紧张关系

从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这种一致性之中，衍生出了 1879~1929 年那半个世纪之中所广泛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模式上的引人注目的相似性。

尽管难以数计的各种人物和背景、思想状况和从前的历史事件使许多国家的兴衰变迁具有当地色彩和时代特征，但是，世界文明的更多部分却具有相同的结构。这种密切关系超越了人们共同的那种文化特性，那种文化特性是指人们使用类似的工具、在类似的娱乐中取得快乐，以及对所付出的努力给予类似的奖励。当然，这种相似性与各个具体事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所起的作用有关，而这种历史背景含有集体生存受时代束缚的成分。对这些典型的压力和困难作分析可以揭示主要是这种机制在这个时期内产生了非常一致的历史模式。

按照主要的制度范畴，可以方便地对这些压力地进行归类。在本文中用失业的典型根源来描述国内经济中大多数各种各样的失衡征兆——如减产、就业率下降和收入减少。在国内政治方面，存在着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和僵持状态，据此我们把各阶级的紧张状态作为典型例子。在国际经济领域中有着各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是国际收支平衡，也包括了出口下降、不利的贸易条款、进口原材料的缺乏，以及外国投资的减少，我们将把特定形式的压力即汇率上的压力指定为一组。最后，在国际政治方面的紧张状态将会被归类于帝国主义的竞争中。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国家处于商业萧条中遭受了失业的打击。人们很容易看到所有经济政策的措施受到稳定兑换率的紧急需要的限制，所有这些经济政策的措施是银行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决定的。如果不请求中央银行，各银行不能够向产业界扩大信贷或进一步提供信贷。在中央银行这方面，由于货币安全需要紧缩信贷，

所以将会拒绝各银行的请求。另一方面，假如这种压力从产业界蔓延到全国——工会也许会促使有关政党在国会提出这个问题——任何救济政策或市政工程的领域将会受到预算平衡需求的制约，预算平衡需求是稳定兑换率的另一个前提。因此，金本位制将会像有效制约银行发行货币一样制约财政部的行动，而且立法机构还会发现自己也同样将面临产业界所遭受的相同的制约。

当然，失业的压力在国家的范围内可能会产生于产业界也可能产生于政府部门。假如在一个特定情况下，被对工资的通货紧缩压力克服了这场危机，那么，也许可以这样说，这种负担主要落在了经济领域中。然而，假如借助遗产税资助市政工程，从而避免了采取那种痛苦的措施，则这种紧张状态的主要负担将会落在政治领域中（假如通过采取一些无视既得权利政府措施将削减工资强加于工会身上，则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中——对工资的通货紧缩压力——这种紧张状态仍然保留在市场领域内，而且以价格变化转换成收入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后面一种情况中——市政工程或工会限制——则会在法律地位或税收方面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影响到有关集团的政治地位。

此外，失业的压力也许会蔓延至国界以外，并且影响到外汇交易。在与失业作斗争中所使用的方法不论是政治性或经济性的，这种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我们始终假定金本位制是有效的情况下——任何引起预算赤字的政府措施均可能会导致货币贬值；另一方面，假如通过扩大银行信贷的方式与失业作斗争，则不断上升的国内价格将会打击出口，这样的话会影响到国际收支平衡。无论是哪种情况，汇率都会暴跌，而且国家会感受到对其货币的压力。

换句话说，**源自于失业的压力也许会引起紧张的对外关系。就弱国而言，这种情况有时会对它的国际地位产生最严重的后果。这种国家的状况在变坏，其权利被忽视，外国控制被强加于自己身上，其民族志向受到挫败。就强国而言，源自于失业的压力也许会被引**

向抢夺国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以及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竞争。

这样，源自于市场的压力在市场和其他主要公共机构之间来回移动。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种压力有时候影响政府部门的运作，有时候还会影响到金本位制的运作或者是力量平衡体系的运作。每个领域均相对地独立于其他领域，且趋向于求得自身的平衡；只要达不到这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就会蔓延到其他领域。正是这种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导致了压力的积聚和紧张状态的产生，最终或多或少以固定的形式爆发。在想象中，19世纪是在从事建造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而实际上，19世纪是在把该办的事移交到一定数量的具体机构手中，这些机构的机制统治着当时的年代。

最接近于实现这种真实境况的方法或许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具有说服力的质询。这位经济学家直至1933年才指责了“压倒性多数的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他责问道，当一项政策被所有的专家都一致谴责为是完全错误的、非常不合理的，以及与所有的经济理论原则相悖的时候，这项政策还会是正确的吗？他的回答是绝对的“不。”¹不过人们还会在大量的文献中寻找对各种明显事实的本质解释，但是他们都一无所获。唯一的答案是各国的政府、政治家，以及政客不停地滥用职权，他们的无知、野心、贪婪，以及目光短浅的偏见恐怕得为在“压倒性多数”的国家里所一贯追随的保护主义政策负责。在这个问题上很少能发现有这么多充分理由的论点。自经院学者蔑视经实践经验得来的科学事实以来，真正的偏见并不是以这么可怕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唯一理性的反应是通过帝国主义狂热的神话来补充保护主义阴谋的神话。

至于自由主义的论点已经变得清晰，这个论点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某个时候，帝国主义热情开始在西方国家中激起，而且凭借他们情绪化地实施种族歧视破坏经济思想家所做的富有成效

¹ 哈伯勒·G(Haberler, G), 《国际贸易》, 1933年, 第6页。

的工作。这些情绪化的政策逐渐积聚起了力量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启蒙运动的力量有另一次机会可恢复理智的统治，但是意想不到爆发的帝国主义打翻了前进的车轮，特别是在新兴的小国，其后又诸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天然资源匮乏的国家（have-not）”。有“狡诈动物”之称的政客击败了这次赛跑的脑指挥中枢——日内瓦、华尔街和伦敦市。

在这篇通俗的政治信仰文章中，帝国主义象征着老亚当*。国家和帝国始终是天生就带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它们会吞灭其邻国而丝毫不会有道德上的悔恨。后半部分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前半部分不一定正确。无论何时和何地，只要帝国主义一出现，它就不会等到有了合理的或道德的正当理由才去扩张，事实是恰恰相反，国家和帝国始终都是扩张主义者。区域性联盟没必要急于去扩充它们的边界；无论是城市，还是国家，或是帝国都不会让自己处于这样的难以抗拒的冲动之中。持反对意见的主张把某些典型的情况错认为普遍性原则。实际上，与流行的成见相反，现代资本主义开始于一个长期的萧条期；只是在它发展过程的后期才会发生向帝国主义的转变。

反对帝国主义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发起的，他不仅预见到了“美国独立战争”，而且还预见到了下个世纪的“小英格兰”运动。期间中断的理由是经济上的：由“七年战争”开始的迅速扩大的市场使得帝国变得过时了。地理大发现，伴随着相当缓慢的运输手段、优惠的海外种植园和快速的通信，这些使得殖民地成了费用浩大的奢侈品。另一个对种植园不利的因素是现在出口显著地超过了进口；买方市场的理想被卖方市场所代替，现在可通过低价出售竞争者的简单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其中包括最终抛售殖民者自身在内。一旦英国丧失了大西洋沿海地区的那些殖民地，加拿大几乎就不会再设法让自己保留在大英帝国之内（1837年）；一个名叫

* 人类始祖——译者注。

迪斯雷利 (Disraeli) 的人甚至还鼓吹清理西非的领地；奥兰治公国 (Orange State) 提出要加入大英帝国，但是没有成功；以及如今被视作为世界战略枢纽的一些太平洋岛屿始终被拒之于大英帝国门外。自由贸易论者和保护主义者，自由党人和热情的保守党党员均普遍深信殖民地是一种消耗性的资产，它们注定要变成政治和财政上的负债。在 1780 年至 1880 年的一个世纪中，凡是谈论殖民地的人都被认作是 *旧制度* 的拥护者。中产阶级公开指责战争和征服是王朝的诡计，他们赞成和平主义 (弗朗索斯·魁奈*成了第一个要求得到 *自由主义* 和平桂冠的人)。法国和德国紧随英国之后。前者稍微放慢了其扩张的速度，甚至它们的帝国主义现在成了更为大陆性的而非殖民性的帝国主义。俾斯麦不屑为巴尔干半岛哪怕付出一条命的代价，而且还在反殖民宣传的背后施加了他所有的影响。当资本主义的公司正在渗进整个大陆时，这就是当时政府的态度；当东印度公司在急切的兰开夏出口商的坚持下被解散时，匿名的布匹商在印度取代了沃伦·黑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 和克莱武 (Clive)* 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各国政府有意避开此事。坎宁嘲笑代表冒险的投资者和海外投机者去进行干涉的想法。现在人们将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做法扩散到了国际事务中。当伊丽莎白女王勉强地把其私人收益和私掠船的收益严格区分开来的时候，格拉德斯通 (Gladstone)* 却将英国外交政策说成是正在为外国投资者服务的说法斥之为诽谤。19 世纪的观念并不是让政权和通商利益融合；恰恰相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政治家把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盛赞为国际行为准则。只有在一些范围狭窄且受限定的事例中才可认为外交代表是在

* 弗朗索斯·魁奈 (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 年，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领袖——译者注。

* 沃伦·黑斯廷斯 (Warren Hastings): 1732~1818 年，英国首任孟加拉总督——译者注。

* 罗伯特·克莱武 (Robert Clive): 1725~1774 年，英国首任孟加拉行政长官——译者注。

* 格拉德斯通 (Gladstone): 1809~1898 年，英国政治家，于 1868~1894 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代表其侨民的私人利益而在积极活动，而且暗中延伸这些事例会被公开予以否定，并一旦被证实，将会受到相应的谴责。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国家不干预私营商业事务的原则得到了维护。国内政府不应该干预私营贸易，但是也不要指望驻外国的办公机构会把海外的私人利益看得比主要的国家方针还要重要。投资压倒性地投放在农业上而且分布在国内；人们仍然认为对外投资是一种冒险，而且把投资者频繁招致的全部的损失看作是对可耻的高利贷贷款条款的充分抵偿。

变化是突然来临的，而且这次变化还同时发生在所有的主要的西方国家中。德国只是在滞后了半个世纪以后才开始重复英国已经历过的国内发展过程，但世界范围的外部事件肯定会同样地影响到所有的贸易国家。这样的一种事件是指国际贸易节奏的加快和数量的增加以及土地的完全流通，这种流通暗示以极小的成本大规模地把谷物和农业初级产品从这个星球的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这场经济上的地震扰乱了欧洲农村数千万人的生活。在几年内自由贸易成了昔日黄花，而在全新情况下市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些情况本身处于“双重运动”的状态下。现在正以加速度铺开的国际贸易模式遭到了所引入的保护主义制度的阻扰，这种制度旨在全面审查市场行为。农业危机和 1873 至 1886 年间的大萧条动摇了人们在经济自行恢复方面的信心。今后，典型的市场经济制度通常只有在保护主义措施的伴随下才有可能被推行，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因为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各国正在建立自己组织部门，这些组织部门往往会承受各种混乱，其中包括任何突然调整到外贸或外汇交易的需要。因此，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媒介——金本位制——通常也是伴随着同时推行现代典型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保护主义政策有社会立法和关税税则等。

在这点上，集体主义协同作用的传统自由主义的形式也与事实不符。自由贸易和金本位体系遭到自私的承运商和仁慈的社会法则的任意破坏；与之相反的是，金本位制的到来其本身加速了这些保

护主义制度的传播，这些制度越受欢迎，固定不变的汇率就越让人难以忍受。从这个时候开始，关税、工厂法和积极的殖民政策都是稳定外在通货*的先决条件（除了英国由于其巨大的工业优势外，其它国家都能够证明这条规则）。只有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人们现在才可能安全地推行市场经济的方法。在缺少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这样的方法强行施加到无助的民众身上，正如在外国的或半殖民地区，这种可怕的灾难将会接踵而至。

在这里，我们要抓住帝国主义表面矛盾的关键——各国拒绝不加任何限制地一起进行贸易，这在经济上难以解释因此这种做法可能是不合理的，他们取而代之的目的却是要获得海外和外国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如此行事的原因只是它们害怕产生一种类似于那些无能为力民众所无法避开的后果。其中的区别只在于当那些可怜的殖民地的热带地区的居民被抛入经常是濒临灭亡的绝对悲惨和恶化的境地时，西方国家的拒绝援助是受这样一种危险的影响，这种危险是较小但仍然足以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回避的。如同那些殖民地的例子，本质上非经济的威胁都是一样的；除了偏见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去寻求经济量级上（economic magnitudes）的使社会混乱的措施。实际上，仅仅是因为经济影响从长远看或许是不重要的缘故，就认为社会仍然可以漠视失业灾难的根源、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变动，以及伴随着这些变动带来精神与心理上的折磨，其实这种认识表现出一种荒谬性。

国家既是压力的主动接受者，常常又是压力的被动的接受者。假如某个外部事件重压于国家身上，国家的内部机制以通常的方式发挥作用，将经济领域的压力转移到政治领域上，反之亦然。战后时期曾发生过一些重大的事件。对一些中欧国家来说，战败创造了很人为的环境，其中包括以赔偿形式出现的非常大的外部压力。在10年多的时间里，德国国内情况主要是在工业和国家之间转移外部

* 指在发行国境外的该国货币——译者注。

的重担——一方面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转移外部的重担，另一方面在社会利益和税收之间转移外部的重担。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赔偿的承受者，其国内形势根据国家（即政府和企业的结合）处理这件事的方式而变化。国家的共同责任就这样固定在金本位制上，而维持该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成了金本位制一项最重要的职责。特意设计了道威斯计划*来保护德国的货币。扬计划*使得相同的条件得到确定。但是为了履行维持德国马克对外价值不受损害的职责，在此期间，德国国内事务的方针变得令人难以理解。对货币的共同职责建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企业和各党派、工业和国家调整到适应这种压力。然而战败的德国不得不忍受一场失败战争的后果，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人都自愿地忍受，也就是说，在固定汇率的压力下忍受对他们国家人为的结合。只有顺从市场的必然规律才能解释那种令人自豪的默认，即对忍受套算汇率（cross）的默认。

这个概述由于是持续的过度简单化的结果，所以也许会遭到反对。市场经济不是在一天之内起动的，三个市场并不像三驾马车那样在竞跑，保护主义也不是对所有的市场都有相同的影响，等等。当然，这种说法是对的；只是它遗漏了争论的要点。

诚然，经济自由主义只是从或多或少的发达市场中创造了新机制；但它统一了已存在的各种类型的市场，且从单一的整体方面来协调它们的各种功能。而且，到那时劳动和土地的分离进展顺利，货币和信贷市场的发展也是如此。在整个过程中现在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而且找不到任何的断点。

然而，制度的变化突然开始运作起来，其本质就是如此。随着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关键阶段已来临，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中，如果工人们不照雇佣劳动的规则行事，他们就会被处于挨饿的威胁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德国战争赔款所作的一项安排——译者注。

* 又译作杨格计划。关于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支付问题的第二次重新协商——译者注。

之中。一旦采取了这种激烈的措施，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马上就适应了这种环境。这种措施对社会的影响是如此的猛烈，以致于舆论先前没有任何变化，市场机制差不多立即就做出了有力的保护性反应。

此外，尽管各类市场的特性和起源各不相同，但是市场所需的各种产业成分目前还是呈现出相同的发展状况。呈现不相同的发展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保护人类、自然和生产性机构就意味着干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以及干预交易媒介*市场和货币市场，因此，此种行为的本身也就削弱了体系的自我调节作用。既然干预的目的是恢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环境，给他们一定的地位安全感，那么干预的目的必定是减少工资弹性和劳动力的流动性、使收入稳定、使生产有连续性、推行对国家资源的公开控制和管理货币，以便避免在价格水平上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

1873 至 1886 年期间的经济萧条和 70 年代的农业困境持久地增加了这种压力。这次经济萧条开始时欧洲还一直处于自由贸易的全盛期。新德意志帝国强迫法国接受两国之间的最惠国条款，承诺德国免除对生铁的关税，并推行金本位制。到这次经济萧条结束时，德国已用各种保护性关税将自己围住，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卡特尔机构，设立了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以及实行高压的殖民政策。显而易见，一直是自由贸易倡导者的普鲁士主义几乎不用为转向保护主义的变化负太多的责任，这就像它不用为推行“集体主义*”负太多的责任一样。美国甚至有着比德意志帝国更高的关税，而且正以自己的方式实施“集体主义”；美国大力资助远程铁路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托拉斯集团。

所有的西方国家，不论其民族精神和历史如何，都遵循着相同

* 指在某一特定地区或某一人群中广泛使用的作为钱的东西，例如一种贵金属、货币，支票等——译者注。

* 指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如国家、民族、种族或者阶级）的社会组织，其形式不一——译者注。

的变化趋势。²有了国际金本位制，所有最具挑战性的市场方案都被付诸实施，这意味着市场完全独立于国家行政机构之外。由于金本位制作为这个庞大市场的自动控制的监护人，世界贸易如今意味着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下这个星球上的生活组织（organization of life），他们由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构成。各国和各民族在这场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的表演中只不过是傀儡。他们凭借中央银行和海关关税，加上移民法的帮助，使他们自身免遭失业和不稳定的伤害。这些策略旨在抵消自由贸易加上固定通货所带来的破坏性作用，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干预那些机制运转。虽然每项单独的限制措施均有其受益者，这些受益者的超额利润或超额工资是征收在其他所有公民身上所得的税收，但是通常只是税收的数额令人感到不合理，而不是保护措施本身。从长远看，价格会全面下降，从而使所有人受益。

无论保护措施是否合理，这些干预的作用还是暴露了世界市场体系的无力的状态。一个国家的进口关税妨碍了另一个国家的出口，从而迫使这个国家去寻找各地区在政治上不受保护的市场。经济帝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在各强国之间为了争夺特权而进行的斗争，他们把贸易延伸至在政治上未受保护的市场。由于狂热生产从而导致抢夺原材料供应，这一切加大了出口压力。各国政府对在落后国家从事贸易的侨民给予支持。贸易和国旗相互竞赛似地抢着接踵而至。各强国倾向于帝国主义和一半是刻意地为经济独立做准备，因为这些强国发现它们自己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严格保持国际金本位制的统一性又是势在必行的。这就是一个在制度上的破坏根源。

这一类似的矛盾在各国国内也起着作用。保护主义帮助把竞争性市场转变成垄断性市场。人们越来越不能把市场描述成具有竞争成分的自主与自动的机制。越来越多的个人被公司所取代，雇员和资本联合成非竞争性的集团。经济调整变得缓慢而困难。市场的自

² G·D·H·科尔（G. D. H. Cole）认为 19 世纪 70 年代是“整个 19 世纪中到目前为止社会立法最活跃的时期。”

我调节作用受到严重的阻碍。最后，未调整的价格和成本结构延长了经济萧条期，未调整的设备阻碍了对无利可图投资的清算，未调整的价格和收入水平导致了社会的紧张状态。无论被讨论的市场怎样——劳动、土地或资本——这种压力将会超越经济领域，同时这种平衡将不得不通过政治手段来恢复。不过，政治领域同经济领域在制度上的分离对市场社会而言是基本的，而且不管有关紧张状态如何，这种分离还不得不保持下去。这是破坏性压力的另一个根源。

我们的叙述正在接近尾声。然而我们论点的相当一部分尚未展开。因为即便我们确实实地证明了变革的核心处存在着市场乌托邦的失败，我们仍然负有责任来展示这个原因是以怎样的方式决定现实事件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既然历史不是由任何单一的因素塑造的，所以这是一件不可能兑现的承诺。然而尽管历史都有其丰富的史实和多样性，但历史的潮流仍有其周而复始的各种情况和选择，这些情况和选择说明了一个时代的各类事件结构中有着广泛的相似性。如果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在特定条件下主宰潮流和逆流的规律性，我们就不必担忧不可预测的逆流的边缘部分。

在 19 世纪自我调节市场机制赋予了这样的条件，而对市场的需求又必须符合国家和国际活动的需要。从那种机制中产生了文明社会的两个特性：其严格的决定论和经济的特征。当代人的观点往往是把这两个特性联结起来并认为决定论源自于经济动机的本质，根据这种动机，人们认为个人会追求其资本利益。实际上在这两个特性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许多细节上很突出的“决定论”只不过是具有可预测的各种选择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其说服力被错误地归因于唯物主义动机的力量。不管众所周知个人动机和经济动机本身对大多数人来说远没有所谓的感情动机来得有效，但供求价格体系仍将会始终保持平衡。

人类并不是在新动机的掌握之中，而是在新机制的掌握之中。简而言之，压力来自市场领域；来自于市场领域的压力再扩散到政

治领域，这样就构成了整个社会。但是只要世界经济继续在起作用，各国国内就仍然会潜伏着紧张状况。只要继续存在的最后一个制度——金本位制——一俟消失，国家内部的重压最终就会被释放出来。尽管这些国家对新情况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这些反应基本上表示了它们对传统的世界经济的消失所作的调整；当传统的世界经济蜕变时，市场文明本身也被吞噬掉。这就解释了这种差不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即文明社会正遭到无情制度的盲目行为的破坏，而其唯一目的是自动地增加物质福利。

但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呢？它是如何转化成历史核心的政治事件的呢？**阶级力量的冲突决定性地进入了市场经济垮台的这一最后阶段。**

第三部分

前进中的改革

第十九章

平民政府和市场经济

当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国际体系瓦解时，几乎被人遗忘的早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这些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就是平民政府的问题。

法西斯主义对平民民主的攻击只是经常出现在市场经济历史中的政治干涉主义问题的复活，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分离的另一种名称而已。

一方面是斯品汉姆兰制度和《新济贫法》，另一方面是议会改革和宪章运动，它们首次使有关劳动的干涉主义问题尖锐化。关于土地和资本方面，即便各种冲突不是很大，但干涉主义的重要性几乎还是较大的。在欧洲大陆上，有关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类似困难滞后了一段时间才产生，这使各种冲突对在工业上较现代化而在社会上却不那么一元化的环境产生了影响。**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完全分离是相同类型发展的产物。英国和欧洲大陆一样，这个起点是建立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和政治的民主化。**

人们把斯品汉姆兰制度恰当地描述为一项干涉主义的阻止性法案，该制度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工业化英国的首次战役打响了，但在斯品汉姆兰制度上暂时性地失败了。在这场战役中，古典经济学者创造了干涉主义的口号，斯品汉姆兰制度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市场秩序所做的人为干预打上了标记。汤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济贫法条件的脆弱的基础上建起了古典经济学的大厦，这个最令人可畏的毁灭性的概念工具曾经针对过旧秩序。然而对另一代人而言，津贴制度保护了农村地区，使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免受城市高工资的诱惑。到了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赫斯基森*和皮尔扩大了对外贸易的途径，容许出口机器，解除羊毛出口禁令，废除海运限制，放松

* 威廉·赫斯基森 (William Huskisson): 1770~1830 年，英国政治家和财政家，鼓吹实行自由贸易的主要人物——译者注。

移民出境，正式废除有关学徒期和工资评估的《技工法》之后又相继废止了《反企业联合法》。但令人沮丧的斯品汉姆兰制度仍然在各郡之间推行，该制度阻止劳动者从事正当的工作，使独立的劳动者这一观念成了不协调的事物。虽然劳动力市场的时机已经来临，但是劳动力市场的诞生却受到了大地主“法令”的阻止。

议会改革派立即开始废除津贴制度。达到津贴制度目的的《新济贫法》一直被称作是下议院曾支持过的最重要的社会立法法案。然而这项法案的核心只是简单地废除斯品汉姆兰制度。证明最具果断性的行动是：**这时候承认完全不干预劳动力市场对未来整个社会结构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紧张状态的经济根源也是如此。**

在政治上，1832年的议会改革完成了一场和平的革命。根据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国家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根据激进的新政策，一些英国生活的基本事实被重新做了诠释。《新济贫法》废除了一般类别的穷人、“真正的穷人”或“困难的穷人”，伯克曾经对这些术语做过猛烈抨击。以前的穷人现在分成了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并且居住在济贫院的贫民和通过劳动挣工资谋生的自给自足的工人。这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穷人类别——失业者，他们出现在社会舞台上。为了仁慈起见贫民应该得到救济，同样为了勤劳起见失业者就不应该得到救济。无辜失业工人的命运却变得无关紧要了。如果失业者只要真正地尝试过，问题的要点就不是失业者是否可能或不可能找到工作，如果他不处于挨饿的危险之中只是选择了呆在令人厌恶的济贫院中，那么工资制度就会垮掉，从而把社会推入悲惨和混乱的境地中。这意味着社会认可了惩罚无辜的人们。这种颠倒的残酷正好存在于解放劳动者中，其公开承认的目的是通过饥饿使破坏的威胁起作用。这一过程使得古典经济学者著作中告诉我们的悲哀的低落情绪变得可以使人理解。但是为了对现在被困在劳动力市场限制范围内的临时雇工安全地锁上大门，政府将自身置于一项无私的法令中，用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话来说其大意是：国家向无辜的受害者提供任何救济是一种“侵犯公民权

利”的行为。

当宪章运动要求国家把失去人权的人们纳入选区之内时，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就不再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而是变成了现存社会制度不容置疑的先决条件。把《新济贫法》的管理连同其精神折磨的科学方法一起移交给与自己是同一种人的代表是一种精神失常的举措，那种待遇本就是为自己同一种人的代表设计的。麦考利勋爵*在上议院以一名伟大的自由党人的身份所做的最有说服力的演讲之一是他要求以财产制度的名义无条件地拒绝宪章运动者的请愿书，因为文明社会都以财产制度为基础。罗伯特·皮尔爵士称宪章是对宪法合法性的怀疑。劳动力市场越恶意地歪曲工人们的生活，宪章主义分子就越迫切地呼喊投票表决。对平民政府的需要是紧张状态的政治根源。

在这些情况下，立宪制度增加了一种全新的含义。直到那时，宪法保护财产权免受非法干预只是针对来自上层的武断行为。洛克*的远见并没有超越土地财产和商业财产的界限，其目的只是在于阻止王权的横暴行为，诸如亨利八世时期的使教育与宗教分开的行为、查理一世时期的掠夺造币厂的行为、或查理二世时期的财政部“止付”行为等。按照约翰·洛克*的看法，1694年颁发给英格兰银行的营业执照以值得仿效的方式完成了政府与商业的分离。商业资本取得了反对王权斗争的胜利。

100年以后要受到保护的不是商业财产而是工业财产，要反对的不是王权而是公民。只有凭借误解才能把17世纪的意图应用到19世纪的情况中。孟德斯鸠*其间（1748年）创造的权力分开原则现在被用于将公民的权力从他们自身的经济生活中分离开来。在农民—工匠的环境中，得到英国工业景象预先警告的领导层创造了美

*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年，英国政治家、演说家、政府官员、政论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哲学家——译者注。

*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译者注。

国宪法，美国宪法将经济领域完全从宪法的权限中分离了出来，从而把私有财产置于最大可能的保护之中，创造了在世界上唯一合法的有基础的市场社会。尽管美国选民有普遍的选举权，但是他们对业主还是无能为力。¹

在英国，必须剥夺工人阶级的选举权成了宪法的不成文法。宪章运动领导人坐了牢；宪章运动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受到代表极少数人的立法机构的嘲弄，而且起码的选举权要求经常被当局视为是一种犯罪行为。据称是英国制度特征的妥协精神——最近的一种发明——却没有任何存在的迹象。工人阶级经历“饥饿的 40 年代”之前和涌现了获取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好处的听话的一代人之前一直没有这种妥协精神；上层技术工人壮大他们的工会以及与大量愚昧无知的赤贫劳工意见相左之前一直没有这种妥协精神；工人们默认为这种制度，即原本强加给他们的《新济贫法》制度允许他们中收入颇丰的阶层参加国家的各个委员会之前一直没有这种妥协精神。宪章运动者始终为了获得停办压榨人们血汗的市场工厂的权力而斗争。但是只有在做了这个艰难的调整之后，人们才获得了这些权力。英国国内和国外，从麦考利到米泽斯（Mises），从斯潘塞到萨姆纳*，富有战斗性的自由党人没有一个不深信平民民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威胁。

劳工问题的经历重现在货币问题上。18 世纪 90 年代的情况也预示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情况。边沁是第一个认为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用财产权进行干预的人；前者是以商业上的税收作干预，后者是用商业作干预。²自那以后劳工和货币，失业和通货膨胀在政治

¹ A·T·哈德利（Hadley, A. T.），《经济学：有关私有财产和公共福利之间关系的一份报道》，1896 年。

* 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1811~1874 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争取人类平等的政治家，废奴运动的战士——译者注。

² J. 边沁的《政治经济学手册》第 44 页称通货膨胀为“强迫的节俭”；第 45 页的脚注上把它称为“间接征税”。另参阅《民法原则》第 15 章。

上一直属于同一个范畴。科贝特*公开谴责了金本位制和《新济贫法》；而李嘉图支持金本位制和《新济贫法》，并且用非常相似的论点认为不仅资本而且劳工都是商品，政府无权对这两者进行干预。像伯明翰的阿特伍德*那样反对推行金本位制的银行家发现他们自己的立场跟像欧文那样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一样。一个世纪后，米泽斯仍然在重申政府把劳工和资本只是当作市场上的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来关切。在 18 世纪，建立联邦前的美国，廉价资本同斯品汉姆兰制度是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政府面对大众的呼吁所做的在经济上引起混乱的让步。法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6 年）发行的纸币表明人民可能会粉碎资本制度，而美国各州的历史也并未有助于驱散这种怀疑。伯克把美国民主同资本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汉密尔顿*不仅担心派系斗争还担心通货膨胀。不过在 19 世纪的美国，当人民党和美背党党员（greenback parties）与华尔街的巨头们的争吵还是地方性的争吵时，而在欧洲，仅 20 世纪 20 年代对通货膨胀的指责就已成了反对民主立法机构的有力的论据，且在政治上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对货币的社会保护和干预不仅是类似的问题而且经常是相同的问题。自金本位制建立以来，不断上升的工资水平和直接的通货膨胀差不多同样地危及到货币——这两者均可能会导致减少出口和最终压低汇率。干预的这两种基本形式之间的简单关系成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政治支点。为了货币的安全，有关党派反对危险的预算赤字同反对廉价货币政策一样起劲，因而反对“国库券膨胀”同反对“信贷膨胀”的程度差不多，换句话说，用更实际的话是谴责社会负担和高工资，谴责工会和工党。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本质，除

*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 年，英格兰 19 世纪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和政治舞台上最勇敢的人物之一——译者注。

* 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wood）：1783~1856 年，英国经济学家——译者注。

*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 年，美国政治家——译者注。

了这点以外谁会怀疑不受限制的失业救济金可能会在扰乱预算平衡方面起到同通货膨胀价格上的过低利率一样有效的作用，而且是对汇率起着同样的可恶影响呢？格莱斯顿*让预算成了英国民族的道德准则。在较少人的支持下，固定货币或许会代替预算。但其结果却是近乎相似。无论是否得削减工资或社会公益服务，不削减它们的结果却是由市场机制所定的。从这个分析角度来看，1931年的英国中央政府以适当的方式起了同美国实行“新政”相同的作用。这两件事都是在大变革中单个国家所采取的调整行动。但是英国的例子有这方面的优势：没有诸如内乱或意识形态转变等复杂因素，因此英国的例子更清晰地显示了这种明确的特征。

自1925年以来，英国货币的地位一直不稳固。回复到金本位制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对价格水平作调整，而英国的价格水平却明显地高于世界同等水平。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政府与银行、党派与工会共同着手发起的这一进程的荒谬性。如果说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话，那么首届（1924年）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斯诺登*就算是一个金本位制的虔诚追随者，他曾经向其工党承诺过要么承担工资下降要么他自己下台，然而他没有实现重建英镑地位的承诺。7年后，正是斯诺登他自己迫使工党做了这两件事。到了1931年的秋季，经济萧条引起的持续不断的财富外流影响到了英镑。1926年，总罢工的失败没有成功地防止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升——它并未防止住社会公益服务的财政负担上升，特别是通过无限制的失业救济金。并不需要银行家进行“敲诈”（虽然存在着敲诈）去把一方面是可靠的货币和可靠的预算而另一方面是改善的社会公益服务和贬值的货币的选择加在国家身上——不管这种贬值是否是由高工资和出口下降引起的还是仅由赤字开支引起的。换句话说，有必要要么削减社会公益

*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年，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译者注。

* 菲利普·斯诺登子爵（Philip Snowden）：1864～1937年，英国社会主义政治家和宣传家——译者注。

服务，要么就是降低汇率。既然工党对这两件事都不能做决定——削减社会公益服务有悖于工会政策，中断金本位制被认为是一种亵渎——所以工党被推下了执政地位，而各传统的政党削减了社会公益服务，*而且*最终中断了金本位制。废弃无限制的失业救济金；推行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情况调查。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传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暂停了两党制，并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恢复这种制度。12年后，它仍处在黯然失色的境地中，所有的迹象均显示反对早日恢复两党制。在没有发生悲剧性的丧失福利或自由的情况下，国家通过中断金本位制的做法在走向变革的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同时还伴随着以自由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变化。然而，以自由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是永久性的，因此这种变化没有使国家离开这个危险地带。

在所有重要的欧洲国家中，类似的机制在起作用，并且有着非常相同的结果。1923年在奥地利、1926年在比利时和法国、1931年在德国，各国工党为了“拯救货币”都不得不下台。像赛佩尔*、弗兰克奎（Francqui）、普恩加来*、或布吕宁*这样的政治家都把工党从政府中赶了出来，他们都减少了社会公益服务，并努力打破工会的阻力对工资进行调整。危险总是针对着货币，而具有相同规律性的是负担都集中在过高的工资和不平衡的预算上。如此简单化几乎不能公正地对待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几乎囊括了经济和金融政策中的每一个问题，其中包括那些外贸、农业以及工业在内的问题。然而我们考虑问题越仔细，这事就必定会变得更清楚，即最终货币和预算的中心问题是在雇主和雇员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 伊格纳兹·赛佩尔（Ignaz Seipel）：1876～1932年，奥地利总理（1922～1924和1926～1929）——译者注。

* 雷蒙德·普恩加来（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年，法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共和国总统——译者注。

* 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年，德国保守政治家，天主教徒——译者注。

上，而国民中的其他人则不是转向支持一个领导集团就是转向支持另一个领导集团。

所谓的布鲁姆*实验（1936年）提供了另一个实例。工党主持政府，但条件是不得强行实施禁止黄金出口。由于法国政府紧密关注着货币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所以“法国新政”从未有过施展的机会。这个实例是结论性的，因为在法国如同在英国一样，一旦劳工问题变得无害时，中产阶级的政党就会干脆痛快地放弃捍卫金本位制。这些例子表明健全通货的基本原则对民众政策是多么的反复曲折。

美国的经验以另一种方式给了我们同样的启示。尽管外汇交易实际上有其重要性，但是重要性不大，如果不中断金本位制就不可能发起“新政”。在金本位制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委托金融市场的负责人维护稳定的汇率和可靠的国内信贷，因为政府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它们。因此银行机构就处在了这样的地位上，即它可在经济领域中阻碍碰巧是它所不喜欢的任何国内的行动，不论其这样做的理由是对还是错。就政治而言，各届政府必须在货币和信贷方面听取银行家的建议，因为只有银行家才会知道任何金融措施是否会危及资本市场和汇率。由于美国及时中断了金本位制，所以这个事例中的社会保护主义没有导致陷入僵局。因为尽管这一举措的技术优势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就像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政府给的各种理由也是十分的不充分），但是华尔街的剥夺政治权力是这个举措的成果。金融市场以经济恐慌为转移。20世纪30年代华尔街的失势拯救了美国免遭欧洲大陆式的一场大灾难。

然而，由于美国独立于世界贸易之外和其十分强势的货币地位，所以金本位制只有在美国才主要是国内政治问题。在其他国家中，中断金本位制涉及的事就远不止只是退出世界经济。也许唯一的例外是英国，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始终能

* 利昂·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年，法国第一个社会党总理，也是第一个任法国总理的犹太人——译者注。

够放弃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据此运转的各种形式，从而把金本位制的负担大部分推给别人去承担。在像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就不存在这些条件。像英国所做的那样，对它们而言破坏货币就意味着摆脱外部世界的束缚，从而牺牲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工业、打乱就业依赖的对外贸易，以及所有这些均没有任何机会去强迫他们的供应者接受相似程度的贬值，从而规避货币的黄金价值下跌的国内后果。

汇率是强加在工资水平上的最有效的杠杆手段。在汇率使事情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之前，工资问题通常在这个表面下使紧张状态升级。但是市场定律经常不能强迫不顺从的工薪阶层接受最有效率的外汇机制。货币指标使干涉主义的工会政策对市场机制的所有不利影响都能被人看得到（包括贸易循环在内的市场机制的固有弱点现在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

实际上，把市场社会的乌托邦本质解释得最妙的莫过于这种谬论，即在市场社会中有关劳工的商品虚构一定会影响到这个社会。劳工行动中通常被用作为讨价还价工具的罢工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感觉到是对社会有用工作的不负责任的干扰，同时它还减少了最终必须从社会红利中产生的工资。同情性罢工受到人们怨恨，总罢工被人们视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威胁。实际上，在至关重要的服务业和公用事业行业的罢工将国民置于受讹诈的境地，使国民卷入了劳动力市场真实功能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之中。劳工应该在市场上发现其价值，而建立的任何其它价格都是不实用的。只要劳工尽到了这份义务，他将会起到商品“劳工”供应中一分子的作用，而且将会拒绝把自身以低于买主仍然付得起的价格出售。这种做法一贯地坚持下去，这就意味着劳工的主要义务就是几乎不断地举行罢工。在绝对的荒唐方面这个主张没有其他东西可左其右，但是它仅仅是劳工商品理论的逻辑推理。理论和实践不调和的根源当然是劳工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假如劳工仅仅被抑制在去确定其确切的价值（正像所有其他商品供应的增加在类似的情况中受到抑制一样），则社会很

快将会因缺乏食物而崩溃。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考虑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有过的话，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罢工问题时谈及的。

回到现实中来：以罢工来确定工资的方法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都是灾难性的，更不要提我们这个社会以功利主义的合理性而感到自豪。实际上，工人的工作在私营企业的制度下没有安全感，一种情况包含了其地位严重恶化。再加上大规模失业的威胁，工会为大多数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作用就变成了在精神和文化上显得至关重要。然而显而易见，任何向工人们提供保护的干涉方法都必定会阻碍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且最终会使供给工人们工资的消费品基金减少。

由于内在的需要，重现了市场社会的根源问题：干涉主义和货币。它们成了 20 世纪 20 年代政治的中心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干涉主义随赋予它们的不同解决方法而定。

经济自由主义非常想通过消除所有的干涉主义政策来恢复（市场）自我调节体系，这些干涉主义政策干涉土地、劳工和货币市场自由。在紧急情况下，经济自由主义从事解决的正是这个长期问题，它涉及到自由贸易、自由劳动力市场和自由发挥作用的金本位制这三个基本原则。它实际上成为了无畏努力的先锋，这种努力旨在恢复世界贸易、排除所有可避免的对劳工流动的障碍，以及重建固定汇率。相对其他目的而言应优先考虑这最后一个目的。因为除非人们恢复了对货币的信心，市场机制才能够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期待政府避免自由地使用所有手段保护其人民的生命是不现实的想法。这些手段理所当然地主要是关税和旨在确保食品和就业的社会法则，就是说，这些手段正好是使自我调节体系无法运行的那种干涉主义。

首先恢复国际货币体系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理由：面对混乱的市场和不固定的汇率，国际信贷正在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资本流动（不同于与长期投资有关联的那些资本流动）仅仅是帮助保持贸易支付差额可兑换成现金，不过甚至在

这个功能上受到经济因素的严格限制。信贷只给予那些在商业上似乎是值得信赖的客户。现在情况颠倒了过来：因政治原因造成了诸如赔偿等债务，贷款的发放一半出于政治原因，其目的是使偿还赔偿成为可能。不过贷款的发放也有经济政策方面的理由，其目的是稳定世界价格或恢复金本位制。不管生产和贸易的情况如何，世界经济相对健全的地区正在运用信贷机制来弥合与世界经济相对混乱地区之间的鸿沟。人们借助被认为是全能的国际信贷机制在许多国家内做到人为地去平衡国际收支、预算和汇率。这种机制本身是建立在期待回复到固定汇率的基础上，同时又是回复到金本位制的同义词。有无比力量的松紧带有助于在消失的经济体系上维持外表的一致；但是这条松紧带是否会承受得住这种压力则取决于金本位制的及时恢复。

日内瓦（国联）的成就以其自身的方式引人注目。如果这个目标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不可能的话，有如此能干、持续不变和全身心投入的外在努力，这个目标就肯定能够实现。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任何在结果上是灾难性的干预可能都不会比日内瓦（国联）的那种干预更糟糕。正是因为它总是看起来差不多要成功了，所以它反而会极大地加重了最终失败所带来的影响。在 1923 年期间，当德国马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分崩瓦解的时候，以及在 1930 年年初，当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货币都使用金本位制的时候，日内瓦（国联）运用了国际信贷机制首先把东欧不完全稳定的经济负担推给西方的胜利国去承担，随之，又从西方胜利国那里甚至把负担更广泛地推给了美国³去承担。在常见的商业周期的过程中，（经济）崩溃降临到了美国身上，但当崩溃来临的时候，日内瓦（国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银行界却把这个星球的经济带进了那可怕的倾覆之中。

但是甚至有更多的事物被卷入其中。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期间，根据日内瓦（国联）的干涉主义，社会组织的问题必须完全服从于

³ 卡尔·波拉尼 (K. Polanyi), 《世界经济危机的必然过程》, “奥地利民谣”, 1933 年 (附录)。

货币恢复的需要。通货紧缩是第一需要；国内机构必须尽它们最大的可能进行调整。甚至是必须暂时推迟恢复自由的国内市场和自由的国家。因为用（国联）金本位制代表团的话来说，通货紧缩不会“影响某些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因而不会造成稳定的新平衡。”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降低垄断商品的价格、减少约定的工资表，以及削减租金。通货紧缩的理想状态最终是“在强有力政府领导下的自由经济”；不过有关政府的这个说法就意味着通货紧缩所认为的政府拥有非常时期的权力和中止民众自由的权力，“自由经济”实际上意味着和通货紧缩的观点相反，即由政府调整价格和工资（尽管进行这种调整时带有恢复汇率自由和自由的国内市场的明显目的）。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两个基石即自由市场和自由政府相比，汇率优先仍然包含着一种牺牲。因此，日内瓦（国联）代表着目标上的一种变化，而不是方法上的变化：遭日内瓦（国联）谴责的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政府把货币的稳定降低到低于收入和就业稳定的地位，而受日内瓦（国联）委托当权的有通货紧缩倾向的政府却运用了许多干预以便把收入和就业的稳定降低到低于货币稳定的地位。1932年国际联盟（国联）金本位制代表团的报告宣称，随着汇率不稳定状态的再现，过去10年在货币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已经丧失殆尽。这份报告没有论及的地方是在这些徒劳的通货紧缩努力的过程中，尽管牺牲了自由政府，却没有恢复自由市场。虽然经济自由主义派在理论上反对干涉主义的同时也反对通货膨胀，但他们还是在两者之间作了选择，且把健全的货币理想置于不干涉主义的理想之上。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遵循了自我调节经济方面的内在逻辑性。然而这样的行动过程往往是把危机扩散，它给财政加上了无法承受的大规模经济混乱的压力，而且它把各种不同国民经济成分的赤字堆积到这样一种地步：破坏国际劳工分配的残余部分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这充满危险的10年里，经济自由主义在服务于通货紧缩政策中顽固地支持独裁的干涉主义，它只会导致确实无疑的削弱民主力量的后果，否则的话这些民主力量有可能可避免法西斯大灾难的发生。英国和美国是

货币的主人而不是奴仆，他们两国及时中断了金本位制从而逃过了此劫。

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文明社会中的一种内在的倾向，它通过自觉地服从民主社会的方式超越自我调节的市场。对产业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自然的解决方案，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对生产直接进行调节和为什么市场在自由社会中的特征应该是有用的而不是附属的。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只不过是那种努力的延续，即使社会成为一个特别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际关系，而在欧洲，这种人际关系始终是和基督教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从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正相反，社会主义激进地背离当代史已到了这种程度，即它结束了试图使私人挣钱成为生产活动的一般刺激因素，以及它不承认私人处理主要生产工具的权力。这就是归根结底为什么由社会主义政党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困难原因所在，即便他们决心不干预财产制度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可能决定这么做的小的可能性是破坏在自由经济中至关重要的那种信心，也就是，破坏在财产权连续性方面的绝对信心。在立法机构可能会对财产权的实际内容重新定义的时候，要发挥市场体系的作用就必需保证形式上的连续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了影响社会主义地位的两个变化。首先，市场体系几乎到了完全崩溃的程度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连批评市场体系的人也从未期盼过会有这种缺陷。其次，在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它象征着一种全新的改变。尽管发生这种冒险的该环境并不适合于西方国家，但真实存在的苏联还是证明了它有着深刻的影响。确实，苏联在缺乏所有这三个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转变成了社会主义，按照西方的观念苏联缺乏的这三个前提条件是工业、有文化的全体人民，以及民主的传统。这些差别使得苏联的方法和解决方案在别处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欧洲大陆各工人阶级的政党都持社会主义的观点，不用说人们怀疑他们希望完成的任何改革都是为实现

社会主义这个目标。在平静的年代里，这样的一种怀疑会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总的来说，各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承担的是改革资本主义，而不是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资本主义。但是在紧急状态下，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假如普通的方法不够用时，就会试图使用非正常的方法，对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来说使用这样的非正常方法也许会包括无视财产权。在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压力下，各工人阶级的政党也许会搞出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或至少看上去同样像是民营企业的好战的追随者那样的措施。正是这种暗示将会足以把市场抛入混乱之中并开始酿造全面的恐慌。

在像这样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工之间惯常的利益冲突就带上了一种不祥的特征。在经济利益的分歧通常会以妥协的方式解决的时候，社会中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分离却往往会给这样的冲突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雇主是工厂和矿山的业主，因而他们直接负责组织社会的生产（与他们个人在利润方面的兴趣几乎无关）。原则上，他们在维持产业运转的努力中将会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另一方面，雇主们代表着社会的一大部分；他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利益相吻合。他们是唯一可用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公民利益的阶层，同样也是保护人类利益的阶层。在普遍享有选举权的情况下，他们的人数会使他们在政治领域中占有优势。不过，像产业界一样，立法机构在社会中履行其正式的功能。把形成的公众意愿、国家政策的方向以及制定国内和国外的长期计划委托给立法机构的成员。如果不使政治类型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运转起来，那么任何复杂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导致产业界机构或政府机构瘫痪的集团利益的冲突对社会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不管这两个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瘫痪或两个机构都瘫痪。

然而这正好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情况。工党凭借其在议会中

的人数优势巩固自身的地位，而资本家则把产业界构筑成可从中统治国家的城堡。民间机构的回答是无情地干预商业，漠视产业界特定形式的需要。产业界的领袖策反民众背弃他们自己自由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而民主机构则继续展开反对产业体制的斗争，然而每个人的生活都依赖该体制。最终，经济和政治体系受完全瘫痪威胁的时刻终会到来。恐惧将会缠绕人们的心头，而那些提出不惜一切代价摆脱困境之有效方法的人将会挤进领导层。法西斯解决方案的时机成熟了。

第二十章

社会变化调整中的历史

假如曾有过一场政治运动，它对客观形势的要求做出反应，而且不是各种偶然因素的产物，那么，这场政治运动就是法西斯主义。但是，法西斯解决方法的退化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提供了人们逃避在许多国家都基本相似的制度上的僵局的方法，然而，一旦人们试用了这种补救办法，它就会在各处造成不治之症。它是那种让文明社会毁灭的方法。

人们可以把从自由资本主义延伸出来的解决僵局的法西斯方法描述成是以毁灭包括产业界和政治领域在内的所有民主制度为代价而完成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改革。因此，处于瓦解危险中的经济体系就被恢复了活力，而人们自身则受到旨在使个人迷失本性的再教育，且让其无法起到作为国民中负责任的个人应起的作用。¹包含否定所有形式的人类兄弟关系观念的政治信仰原则在内的这种再教育，是以科学的折磨方法通过大量强加给反抗者的改变信仰的行为来实现的。

在全球的工业化国家，甚至在许多工业化刚起步的国家中，这样一种运动的出现决不应该像当代人始终是那样做的将其归因于局部原因、民族精神、或历史背景。法西斯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就如同与《凡尔赛和约》一样没有太大关联，它与容克的军国主义关系如同与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没有太大的关联。这个运动出现在像保加利亚这样的战败国和像南斯拉夫这样的战胜国当中，出现在像北方性格的芬兰和挪威以及像南方性格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当中，出现在像英国、爱尔兰或比利时这样的印欧语系民

¹ 卡尔·波拉尼（K. Polanyi）（1886～1964年，匈牙利经济学家，政治领袖。——译者注）1935年的《基督教和社会革命》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族的国家和像日本、匈牙利或巴勒斯坦这样的非印欧语系民族的国家当中，出现在像葡萄牙这样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和像荷兰这样新教的国家当中，出现在像普鲁士这样的军人似的社会中和像奥地利这样的平民社会中，出现在像法国这样的有着古老文化的国家中和像美国以及拉丁美洲这样的有着新文化的国家当中。实际上，一旦法西斯孳生的条件成熟，没有任何种类的背景——宗教的、文化的、或民族传统的——可使一个国家不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此外，在法西斯主义的物质力量、人数与其政治效能之间明显缺乏关联性。“运动”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暗示着大量投入运动的人数或个人的参与。假如法西斯主义还有什么特性的话，那就是它与民众的这种示威无关。尽管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力量旨在有大量的追随他们的党羽，但它的力量并不是靠其追随者的人数而是靠占据高位的那些人的影响力来计算的。而占据高位的那些人的良好意愿受法西斯领导人的摆布，人们依赖那些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从而使他们规避起义失败所引起的后果，因此出于革命的原因去冒险。

接近法西斯阶段的国家表现出各种征兆，在这些征兆中法西斯运动的存在不一定是其特有的征兆之一。至少作为重要迹象存在的是传播非理性哲学、种族主义的美学、反对资本主义的煽动、非正统的货币观点、批评党派体制、普遍蔑视“政体”、或者随便称呼现有的民主组织。在这些极其不同的先驱者中有在奥地利的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的所谓的信普救说哲学、在德国的斯蒂芬·乔治（Stephan George）的诗和路德维格·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天体演化浪漫主义、在英国的D·H·劳伦斯的性爱生机论、在法国的乔治斯·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政治神话的宗派。希特勒最终是被兴登堡总统*身边的封建集团推上台的，正像是墨索

*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元帅，战后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译者注。

里尼和普里莫·德里维拉*被他们各自的君主领上台的情况一样。但是希特勒有强大的运动支持他；墨索里尼有小规模的运动支持他；普里莫·德里维拉没有运动支持他。决不发动反对合法当局的真正的革命；法西斯的策略总是那些伪装叛变的策略，这种伪装叛变是假装已被彻底击败的当局默许安排的。这些是复杂图画中未经渲染的轮廓，在这个图画中还不得不给那些五花八门的人物腾出空位，像在工业化底特律的说话随意的天主教煽动政治家、在落后的路易斯安那州的“首领”、日本军队的阴谋家，以及乌克兰的反苏联的破坏分子等。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一直是一种假定的政治可能性，在每一个工业化社会中差不多都是一种瞬间的情绪化的反作用力。人们可以优先于“运动”而把它称作为“行动”，显示这种危机的客观特点经常是不清楚和不明确的征兆。人们时常无法确定一场政治演讲或演出、一场布道或公众游行、一种玄学或艺术时尚、一首诗或一个政党计划是否是法西斯主义的。不存在公认的法西斯主义的标准，法西斯主义也不具有常规的原则。然而法西斯主义所有有组织的形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们再次出现和消失的突然性，只是在经过不确定的潜伏期后用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而已。所有这些都符合这种情况：即社会力量的增强和减弱是根据客观形势而定的。

我们所简称的“法西斯形势”正是法西斯轻松和全面胜利的典型时机。劳工和宪法自由的其他忠诚支持者的产业组织和政治组织将会突然消失，而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力量将会扫除似乎那时还是民主政府、政党和工会方面的压倒性力量。如果“革命形势”的特征是所有抵抗力量在心理和精神上的瓦解已到了这个程度，即少数缺乏装备的叛乱就能突袭据信是极端保守主义的坚固要塞，那么除了这里民主和宪法自由的壁垒受到了突袭，而他们的防御却没有同样那般壮观以外“法西斯形势”与它完全相似。1932 年 7 月在普鲁士，

* 普里莫·德里维拉 (Primo de Rivera): 1870~1930 年，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1923 年 9 月至 1930 年 1 月的独裁者——译者注。

社会民主党合法政府为了确保合法权力宝座而屈从于赫尔·冯·巴本（Herr von Papen）方面发出的赤裸裸违反宪法的暴力威胁。大约 6 个月以后，希特勒自己以和平方式攫取了最高的权力地位，由此他立刻发动了革命袭击，全面破坏了魏玛共和国制度和拥护宪法的政党。人们想象到正是运动的力量造成了像这样的形势，但人们却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这种形势产生了这个运动，这就不会理解过去几十年中的重要教训。

像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扎根于拒绝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中。因此，法西斯主义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全人类性质的，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些问题超越了经济范畴并引发了一场特殊社会类型的大变革。不论是政治的或经济的，也不论是文化、哲学、艺术的还是宗教的，它几乎辐射到了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而且它还达到了当地倾向与典型倾向结合的程度。如果我们不能把融合在不同国家里的潜在的法西斯行动和短暂的倾向区分开来，就有可能不理解这个阶段的历史。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欧洲有两种这样的倾向显得特别地重要，它们压倒了懦夫却没有压倒非常能被人充分理解的法西斯主义的类型：反革命和民族修正主义。它们直接的起点是各种条约和战后的各种革命。虽然它们有严格的条件并局限于其特殊的目的上，但它们还是很容易与法西斯主义混淆在一起。

反革命通常是政治钟摆的回摆，它回摆到被激烈扰乱的事态中。至少自英联邦成立以来，这样的行动在欧洲一直是典型的，而且和它们时代的社会进程只有有限的联系。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因为在中欧和东欧消灭了一打以上君主的大变革部分得归因于失败的逆流而非进步的民主行动，所以产生了这种类型众多情况。反革命的破坏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且势所必然地对诸如皇室、贵族、教会、重工业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政党等被剥夺权利的阶层和集团造成了打击。在此期间，保守派和法西斯分子的联合与冲突主要涉及到在反革命事业中应该给法西斯分子分享的份额。现在，法西斯主义是一

种革命倾向，它对准保守主义同时也是对准竞争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这不阻止法西斯分子通过向反革命提供其服务的方式在政治领域中寻求权力。正相反，他们要求得到支配地位主要通过保守主义所谓的无能来实现这个目的，如果社会主义将受到禁止，那么实现这个目的是必然的。当然，保守派试图独占反革命的荣誉，但是像在德国，保守派实际上独自实现了这个目的。他们在没有向纳粹分子作让步的情况下剥夺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势力和权力。同样，在奥地利，基督教社会主义党——一个保守的政党——在没有向“来自右翼的革命”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大规模地解除了工人武装。甚至在法西斯不可避免地参与反革命的地方，也还建立了把法西斯主义驱逐到一边的“强大的”政府。这种情况发生在1929年的爱沙尼亚、1932年的芬兰和1934年的拉脱维亚。在1922年的匈牙利和1926年的保加利亚，伪自由政权削弱了那时法西斯主义的权力。只有在意大利，保守派没有给法西斯分子提供获得权力的机会，他们也就没有能够恢复在产业界的工作秩序。

在军事上被击败的各个国家中，而且也在“精神上”被击败的意大利，民族问题沉重地压在它们身上。这里不能否定其紧迫性的一项任务提了出来。永久性解除战败国武装对它们造成的创伤远甚于所有其它问题；在这个世界中只有现存的国际法、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组织建立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许多国家在没有公开宣称将用那种制度取代旧制度的情况下被搞得无能为力。因为现在缺乏普遍扩散权力的先决条件，所以国际联盟充其量只象征了一种经改进的力量平衡制度，但它实际上甚至还没达到以前欧洲协同体的水平。初生的法西斯运动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把自己置身于为民族问题服务之中；如果没有这项“搭便车”的犯罪行为（“pick-up” job），它就几乎幸存下来了。

然而，法西斯运动只是利用这个问题作为跳板；在其它时候，它敲击出的是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音符。在英国和美国，它与缓

和联系在一起；在奥地利保安团*与各式各样的天主教和平主义者合作；而根据原则，天主教法西斯主义是反民族主义者。休伊·朗*不需要任何同密西西比州或得克萨斯州的边界冲突来从巴吞鲁日*发动其法西斯运动。在荷兰和挪威类似的非民族主义的运动达到了叛国罪的程度——吉斯林*也许一直是一个好的法西斯分子的名字，但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爱国者的名字。

在法西斯主义为其政治权力作斗争时，它完全是不受拘束地随意地漠视或利用当地的问题。它的目标超越政治和经济的框架：其目标是社会性的。它将政治信仰置于退步进程的运转中。在其崛起中，它只从它的管弦乐队中排斥了极少数的情感成分；然而，一旦获胜，它就从它的乐队彩车中排斥了所有的动机，只留下了数量非常之少的一些动机，尽管留下的这些动机再一次是极其有特色的动机。如果我们不能精细地区分在通向权力之路上的伪装执迷不悟和掌权时的真正执迷不悟，我们就几乎不能希望理解这两者之间既微妙又是决定性的区别：即在革命期间某些法西斯运动之虚伪的民族主义和在这场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帝国主义性质的非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²

保守派通常在支持国内的反革命方面是成功的，但他们很少能够解决他们国家的民族与国际问题。布吕宁在 1940 年断言在“在兴登堡身边的小集团”决定把他赶下台并把权力交给纳粹分子之前，他已经解决了德国赔偿和解除武装问题。他们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

* 保安团 (Heimwehr)：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地方组织。由保守农民组成，代表右翼势力——译者注。

* 休伊·朗 (Huey Long)：1893~1935 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美国参议员——译者注。

*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译者注。

* 维迪库恩·吉斯林 (Vidkun Quisling)：1887~1945 年，挪威陆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占领挪威期间，他与德国人勾结一起，因而他的名字为“卖国贼”的同义词——译者注。

² H·海曼 (H. Heymann) 1941 年的《永久和平的计划》。参阅布吕宁 (海因里希·布吕宁 (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 年，德国保守政治家、天主教徒——译者注) 1940 年 1 月 8 日的信。

是因为他们不想把荣誉归于他。³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这个问题是否是这样似乎是非实质性的，因为正如布吕宁所暗示的，德国平等地位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技术性的解除武装，而是包括同样至关重要的非军事化问题在内；此外，实际上也不可能无视德国外交从纳粹群众的存在中吸取这种力量，他们发誓要执行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各种事件最后证明了德国的平等地位在不进行革命变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取得的，根据这种见解，把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德国捆绑到罪恶的轨道上的纳粹主义的极端职责就变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在德国和意大利，只是因为法西斯主义能够利用未解决的国家问题作为手段，所以它能够攫取政权。而在法国和英国，法西斯主义因其与爱国主义背道而驰所以其力量明显地被削弱。只有在小国而且是自然独立的国家中，屈从于一个外国强国的潮流可能证明对法西斯主义是一笔财富。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只是无意中与民族倾向和反革命倾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在自主来源的运动之间互依关系的情况，它们相互作补充且造成了基本上相似的印象，而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相干。

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扮演的角色由一个因素所决定：市场体系的情况。

在 1917~1923 年期间，各国政府偶尔寻求法西斯分子帮助恢复治安秩序：没有更多地要求他们安排市场体系运转。法西斯主义仍然处于未发展的境地。

在 1924~1929 年期间，当市场体系的恢复似乎已得到保证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就完全淡出了。

在 1930 年之后，市场经济普遍处于危机之中。在几年以内法西斯主义成了一股世界性的力量。

1917~1923 年的第一个时期里产生的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在许

³ H.·劳希宁 (H. Rauschning), 《毁灭之声》，1940 年。

多国家——诸如在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匈牙利等——发生了农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产业界工人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力。最终反革命恢复了国内力量平衡。在大多数国家里农民转而反对城市工人；在一些国家里法西斯运动是军官们和贵族们发动的，他们控制着农民；在其他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失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了法西斯军队。公共秩序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没有提出过任何激进的改革问题；换句话说，没有任何明显的法西斯革命的迹象。这些运动只是在形式上是法西斯的，也就是说只是在以不负责任的异议分子的民间团伙的范围内出现，他们在当权者的纵容下使用武力和暴力。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已诞生，但还未成为一种政治因素。托洛茨基*于 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就意大利形势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尽管法西斯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但他在报告中甚至都没提到法西斯主义。早就在意大利政府中确立了地位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化了另一个 10 年多的时间进一步发展了具有其特色的社会制度。

1924 年以后，欧洲和美国都沉浸在一片兴高采烈的繁荣景象中，这种繁荣淹没了所有对稳固市场体系的担忧。人们宣布恢复了资本主义。除了一些外围地区外，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被肃清了。共产国际宣告资本主义的巩固是不争的事实；墨索里尼颂扬自由资本主义；除了英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美国享有传奇般的繁荣，而欧洲大陆差不多也干得不错。希特勒的政变被镇压；法国撤出鲁尔地区；德国马克奇迹般地得到了恢复；道威斯计划在赔偿中除去了政治因素；《洛迦诺公约》*即将生效；以及德国正在开始为期 7 年的兴旺年代。在 1926 年年底前，金本位

* 利昂·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1879~1940 年，原名布朗斯坦，俄国十月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 《洛迦诺公约》是法、比、英、意互相保证西欧和平的一系列协定的总称。于 1925 年 10 月 16 日在瑞士洛迦诺草签，12 月 1 日在伦敦正式签字——译者注。

制再次统治了从莫斯科到里斯本的广大地区。

在 1929 年以后的第三个时期里，法西斯主义的真实意义已经明白可见。市场体系的停滞状态成了明显的事实。直到那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独裁政府中只不过是一种特征，意大利的独裁政府虽与那些较传统类型的政府不同，但也只是略有一点不同罢了。现在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工业化社会问题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显现了出来。德国在一场欧洲范围的革命中带了头，而且法西斯的结盟给它争取权力的斗争提供了一种很快就席卷了五大洲的动力。历史正处于社会变化的调整之中。

一次偶然的但决不是意外的事件开始毁坏国际体系。华尔街的股市暴跌变得大范围，紧随其后就是英国决定中断金本位制，而 2 年以后美国方面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同时发生的事还有裁军会议停止进行，以及在 1934 年德国脱离了国际联盟。

这些象征性的事件引来了在世界机构中产生惊人变化的一个新纪元。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个强国反对现状和破坏处于崩溃状态中的和平机构。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真正机构也没能发挥作用。创造金本位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至少暂时让它失了效；以违约为幌子，拒付外债；资本市场和世界贸易减少。这个星球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同时在崩溃。

在这些国家中，他们的内部变化还是彻底的。两党制被一党制的政府所取代，有时候还被民族主义的政府所取代。然而，在独裁国家和保留了民主舆论的国家之间的外部相似性只是用来过分强调自由研讨决策机构的重要性。苏联在独裁的形式下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在像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在作战争准备的国家中，自由资本主义消失了，而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情况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发生了。但是新兴的法西斯政权、社会主义以及“新政”只是在放弃自由放任原则上表现出相似性。

当完全陌生的一个事件开启其历史进程时，每个单独的国家均会根据它们决心走向何方而对这种挑战做出反应。一些国家反对变

化；一些国家在挑战来临时采取主动去对付它；一些国家则漠然处之。此外，它们还在不同的方面寻求解决方案。然而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经常是激进的不同解决方案只是代表了假设的解决办法。

在那些决心利用全面的混乱来促进其自身利益的国家中，有一批不满足的强国。对于不满足的强国而言，力量平衡体系的消亡，甚至是国联的形式变得削弱，似乎还是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德国现在急于加速传统世界经济的崩溃，因为它仍然给国际秩序提供立足点，而且她期待着这种经济崩溃以便于她可以比其对手更占优势。她故意摆脱资本、商品和货币的国际体系，其目的是为了在她认为便于其拒绝接受政治义务时减少外部世界对她的控制。她鼓励经济独立以确保其深远计划所需的自由。她滥用其黄金储备，通过无故地拒绝承认其义务的方式毁坏了她对外的信誉，甚至还一度勾销了对其有利的外贸收支平衡。她无疑在设法掩饰其真实的意图，因为无论是华尔街还是伦敦金融界或是日内瓦均没有觉察到纳粹分子实际上是在指望 19 世纪经济的最终崩溃。约翰·西蒙爵士*和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坚信最终沙赫特*将会在德国恢复传统经济，目前德国只是在被迫采取行动，只要她得到金融上的资助她就会浪子回头。从唐宁街直到慕尼黑事件的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人们一直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幻想。当德国凭借其适应传统体系混乱的能力，德国阴谋计划就这样得到极大支持的时候，英国却发现其自身因坚持传统体系而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尽管英国暂时中断了金本位制，但她的经济和金融继续建立在固定汇率和健全货币的原则基础上。因此，她发现自身处于与重整军备有关的局限性之中。正如德国的经济独立是源自于其阻止全面

* 约翰·奥尔斯布鲁克·西蒙子爵（第一）（John Allsebrook Simon, 1st Viscount）：1873～1954 年，英国内政大臣（1915～1916，1935～1937）、外交大臣（1931～1935）、财政大臣（1937～1940）和上院议长（1940～1945）——译者注。

* 杰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 年，德国财政专家——译者注。

变革意图的军事和政治考虑的结果一样，英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受其保守的金融观念束缚。有限战争的战略反映了岛国市场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只要英国的海军强大得足够能确保其健全的货币能够在全世界购买到储备物资，英国就是安全的。在希特勒已上台的时候，顽固的达夫·库珀（Duff Cooper）在1933年还在为1932年的削减军队预算作辩护，称削减预算是因为“面临着国家无偿付能力，因而这种状况被认为是甚至比一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有更大的危险。”三年多以后，哈利法克斯勋爵*主张和平可以通过经济调整来获得，还主张不应该干涉贸易，因为这会使得作调整更为困难。就在慕尼黑事件的那年，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仍然根据“银弹”和给德国的美国传统贷款来制定英国的政策。实际上，甚至在希特勒已越过了边境线并占领了布拉格之后，西蒙勋爵还在下议院站在蒙塔古·诺曼一边赞成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黄金储备移交给希特勒。西蒙深信金本位制的完整性比所有其它的考虑更为重要，为此他把他的政治才能贡献给了恢复金本位制。西蒙同时代人认为西蒙的行为是既定绥靖政策的结果。实际上，他的行为是对金本位制精神的尊重，这种尊重继续主宰着伦敦金融界领导人的观点，无论在战略事务还是在政治事务中都是如此。就在战争爆发的那个星期，作为对希特勒给张伯伦的口信的答复，（英国）外交部根据美国给德国的传统贷款来制定英国的政策。⁴英国在军事上未作好准备主要是因其坚持金本位制经济而导致的后果。

德国最初获得了那些优势，即毁灭注定要灭亡的东西。只要对19世纪过时体系的清除允许德国保持优势，那么她一开始获得的那些优势就可以保持下去。自由资本主义、金本位制和绝对主权的毁

*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哈利法克斯伯爵（第一）（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Halifax, 1st earl of）：1881～1959年，英国驻印度总督（1925～1931）、外交大臣（1938～1940）和驻美大使（1941～1946）——译者注。

* （阿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Neville Chamberlain）：英国首相（1937～1940）——译者注。

⁴ 1939年《英国蓝皮书》第74期6106栏目。

灭是她抢劫掠夺所带来的附带结果。在她适应其自身所寻求的孤立状态的过程中，以及随后在她奴隶贩子式的远征过程中，针对变革中一些问题，她形成了试探性的解决方法。

然而，德国最大的政治资本在于她有能力迫使世界各国结成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联盟。她通过在市场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上起带头作用的方式让自己成了变革的主要受益者，而这种解决方法看来在长时间里获得了有产阶级无条件的效忠，而且实际上还不单单只获得这些阶级的效忠。在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经济利益优先原则的假设下，希特勒注定会赢。但是**与阶级的经济单位相比，国家的社会单位最后被证明其意义甚至更为重大。**

苏联的崛起也与她在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联系在一起。从 1917 年到 1929 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担心只不过是担心出现混乱，这种混乱可能会致命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恢复，而市场经济只有在绝对信任的氛围中才能运转。在随后的 10 年里，社会主义在苏联变成了现实。集体农庄意味着有关决定性的土地因素通过合作的方式取代市场经济。苏联一直只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一个煽动革命的场所，现在成了能取代市场经济的新体系的样本。

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他们自身就是热诚的社会主义分子，但人们通常却不会意识到他们会顽固地拒绝“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只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会阻止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但是除了 1920 年所谓的“战地共产主义”的完全意外的事件外，他们的领导人坚持这个立场，即世界革命必须在工业化的西欧开始。在一个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将会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所以当这种情况变成现实时，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所有人都抵制它。然而正是这种变革证明了它本身是一种惊人的成功。

回顾苏联 25 年的历史，似乎我们所称的苏联革命实际上由两次单独的革命组成。第一次革命体现了传统的西欧理想，而第二次革命则构成了 30 年代全新发展的一部分。1917~1924 年的革命实际上是欧洲最后一次政治剧变，它效仿了英联邦和法国大革命的模式；

大约在 1930 年以集体农庄开始的革命是第一次社会大变革，这次社会大变革改变了我们 30 年代的世界。第一次苏联革命完成了消灭专制主义、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种族压迫——它真正继承了 1789 年的理想；第二次苏联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概括而言，第一次革命只是苏联的一个事件——苏联在自己土地上实现了西方式发展的漫长过程——而苏联的第二次革命则是全球同时发生变革的一部分。

从表面上看，苏联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远离欧洲，且在忙于寻找解救自己的解决方法。进一步的分析也许能够证明这种表面现象是不真实的。因为在这二次革命之间的年代里，强迫苏联接受决定的诸多因素中有国际体系的失败。到 1924 年时，“战地共产主义”已是一件被人忘却的事件，同时苏联已重建了国内谷物自由市场，而国家则仍然保持对外贸和基础工业的控制。苏联现在一心想增加其外贸额，外贸额的增加主要取决于谷物、木材、毛皮以及其他一些有机原料的出口，但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农业萧条过程中下跌得很厉害，而且这发生在贸易全面中断之前。苏联偏重于发展出口贸易的能力从而限制了其机械产品的进口，因此也束缚了其建立民族工业；这再一次对城乡之间——所谓的“剪刀差”——实物交易的条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增加了农民对城市工人阶级统治的对抗。世界经济的瓦解就这样给苏联在农业问题上采取的权宜之计的解决方案增施了压力，而且加速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来临。提供安全和保障的欧洲传统政治体系的失败在同一方向上起着作用，因为它导致了军备的需要，从而增加了坚持推行工业化的负担。缺少 19 世纪的力量平衡体系，加上世界市场无法承担苏联的农产品，这些迫使苏联不情愿地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市场经济没有能力在所有国家之间提供一种联系，所以这导致了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看来苏联的经济独立所显示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际性的消逝。

国际体系的失败释放了历史的能量——市场社会内在的各种倾向校准着（历史的）轨道。

第二十一章 复杂社会中的自由

19 世纪的文明社会并不是毁于野蛮人的外部或者内部的攻击。其生命力的逐渐衰竭既不是因为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也不是因为受到信仰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者信仰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的下层的叛乱所致。它的失败并不是一些诸如利润率下降或者消费不足或者生产过剩的所谓经济规律的结果。它的瓦解是缘于一组完全不同的原因：出于自身目的，社会为了不被市场自我调节的行为湮灭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除了在诸如北美开拓疆域时代所存在的例外情况外，市场和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之间的冲突给这个世纪提供了动力，也产生了最终破坏那个社会的特有的张力和压力。外部战争只不过加速了它的毁灭。

经过一个世纪的盲目“改进”后，人类正在恢复其“生活环境”。如果工业化不打算消灭竞争，那么它就必须服从人性的要求。对市场社会的正确批评并不是批评市场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以此为基础——而是批评其经济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这样一种经济生活的组织完全是非自然的，从严格的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讲是不寻常的。19 世纪的思想家认为，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人类为利润而奋斗，并认为人类唯物的倾向将会促使其选择做出较少而不是较多的努力和期望为其付出的劳动得到报酬；简而言之，这些思想家认为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人类往往会遵守他们所描述的经济合理性，还认为所有的相反行为都是外部干涉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市场是自然机制，只要人类不受干扰，市场也会自发形成。因此，一个由市场组成并且只受市场价格控制的经济体系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从而，作为所有进程的目标的以这样的市场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不管是否令人满意，其切实可行性建立在具有不可改变性质的竞争基础上，这点是不言自明的。

实际上，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人类处于原始状态以及其后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的行为几乎与这一观点所暗示的行为截然相反。弗兰克·H·奈特*的“特别是人类的动机无不是出于经济原因的”的说法不仅一般来说适用于社会生活，而且甚至还适用于经济生活本身。亚当·史密斯在其对原始人的描述中如此自信地相信的实物交易倾向并不是人类在其经济活动中共同的倾向，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倾向。现代人类学的证据不仅揭穿了这些纯理论概念的虚伪性，而且贸易和市场的历史也完全不同于19世纪社会学家悦耳的教诲中所设想的那种情况。经济史揭示了国家市场的出现决不是经济领域从政府控制中逐渐和自发解放出来的结果。相反，市场一直是政府方面有意识地经常进行粗暴干涉的结果，政府出于非经济目的把市场体制强加给社会。进一步的调查发现，**19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原来甚至是完全不同于前面所提及的市场，因为它是依赖经济的利己主义来进行调节的。19世纪社会的先天性不足不是在于它是工业社会而是在于它是市场社会。**尽管不切实际的自我调节市场的试验将只是一种回忆，但是工业化的文明社会将会继续存在。

诚然，工业化文明社会向新型的非市场营销基础的转变对那么多的任务而言似乎是太危险而不能加以考虑。他们害怕制度上的真空，或者说，甚至最糟糕的是害怕失去自由。有必要让这些危险散布开吗？

许多与过渡期形影不离的深重苦难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的混乱中，在萧条、货币波动、普遍失业、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对历史状态的惊人破坏的悲剧性变迁兴衰中，我们曾经历过最糟糕的局面。我们在无意中一直在为这种变化付出代价。尽管人类还远没有使自己适应使用机器，尽管即将到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是恢复到过去就如同把我们的麻烦转移到另外一个星球那样是不可能的。非但未能消灭侵略和征服的恶魔似的力

* 弗兰克·海尼曼·奈特 (Frank Hyneman Knight): 1885~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译者注。

量，这种徒劳的企图反而实际上会确保那些力量甚至在它们遭到彻底的军事失败之后还能幸存下来。邪恶的事业将会变得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政治上的果断，且代表着这种可能性，即与不管其意图是多么的美好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相反的可能性。

传统制度的崩溃并没有使我们处于真空中。权宜之计可能包含重要而永久性的制度的雏形在内，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非首次。

我们目睹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在这一发展中，经济制度没有向社会发号施令，而是确保了社会胜于经济制度。这种情况可能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民主政体和贵族政治，护宪论者和专制主义者，也许甚至还会以一种迄今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出现。一些国家的未来可能是其它国家已有的现在，而另一些国家可能仍然在体现着其它国家的过去。但是结果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共同的：市场体制将不再是自我调节的，甚至在理论上都是如此，因为它将不再由劳动、土地和货币组成。

把劳工从市场中抽离出来意味着一种变革，这种变革就像当年建立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一样激进。除了次要的和附加的细节外，工资合同不再是一种个人合同。不仅工厂条件、劳动时间、合同的样式而且连基本工资本身都是在市场之外决定的；因此，工会、国家和其它公共团体所起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这些机构的特点，而且也取决于现行的管理生产的组织。尽管工资差别理所当然地必须（和应该）继续在经济体系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除了与货币收入有直接联系的那些动力以外的其它各种动力可能会远比劳工的财务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

把土地从市场中抽离出来和把土地与诸如宅地、合作社、工厂、城镇、学校、教会、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的明确制度结合起来具有同样的意义。然而，被广泛接受的农场个人所有权将会继续存在。因为有关土地使用期限的合约的要点已从市场管辖权中去除，所以在处理这些合约时只需处理一些附件就行。鉴于有关主粮和有机原料的定价并非由市场决定，所以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主食和有

机原料。对于大量不同品种的产品，竞争性的市场继续发挥着作用。它干预社会制度的程度并不大于在市场外为劳动、土地和货币的定价干预有关不同产品价格的成本核算功能的程度。当然，由于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的缘故，财产的性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必要允许来自于财产所有权的收入无限制地增多，以达到仅仅是为了确保就业、生产和使用社会资源的目的。

把货币控制从市场中抽离出来，这在当今的所有国家中已经实现。存款的设立无意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控制，但是 20 世纪金本位制危机证明了商品货币与代用货币之间的联系决不会断开。因为在所有的主要国家中均推行了“职能财政”，所以指导投资和调节储蓄率已经变成了政府的任务。

仅从市场角度看，把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从市场中抽离出来是这样一种一致的行为，即把这些生产要素当作好像是商品一样处理。从人类现实的角度来看，将商品虚构分离所恢复的东西存在于社会范围的所有方面。实际上，统一市场经济的解体已经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新社会。而且，市场社会的结束决不意味着缺少各种市场。各种市场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确保消费者的自由，显示需求的变化，影响生产者的收入，以及起到财务手段的作用，同时它们已完全不再是经济自我调节的机构了。

19 世纪的社会，在其国际系统中，如同在其国内系统中一样，受到经济的束缚。固定的外汇交易领域是和文明社会一致的。只要金本位制和几乎成为其必然结果的法治政权在运转中，力量平衡就成了和平的媒介。这种体制通过首先是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国的那些大国的手段来发挥作用，而且它还迫切要求在欠发达国家中建立代议制政府。这就需要用随之而发生的对预算作控制的要求的手段来对债务国的金融和货币情况进行检查，而这样的预算控制只有可靠的团体能提供。照例，尽管在政治家的头脑中并不会去有意识地考虑这些问题，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是因为金本位制的要求则是不言自明的。货币和代议制机制的世界统一模式是那个时期的严格

节约的产物。

19世纪国际活动的两个原则的关联性源自于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的主权国家和对别国事务的“合理”干涉。尽管这两个原则明显地自相矛盾，但它们却是相互关联的。当然，主权国家纯粹是一个政治术语，因为在未经调整的外贸和金本位制下，各国政府并不拥有相关的国际经济的权力。它们既不能够也不想把它们的国家约束于有关的货币问题上——这是合法的立场。实际上，只有那些拥有受控于央行的货币体制的国家才被认为是主权国家。就强大的西方国家而言，这种未受限制和约束的国家货币主权和与其完全相反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即和将市场经济组织和市场社会的结构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结合在一起。因此，到了19世纪末世界各民族在机制上的标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鉴于这种体制的精确性和普遍性的缘故，它正受到牵制。正如“国际联盟”的历史所明显证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的主权国家对国际合作所有的方式是一种阻碍；以及强制实施的国内体制的一致性就如同盘旋于国家发展自由之上的一种永久性的威胁，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有时甚至是在发达的但是金融疲软的国家中。经济合作就像自由贸易那样杂乱和无效地局限于各种私人机构，而在各民族之间，也就是在各国政府之间进行实际的合作甚至是从不可能予以想象的事。

这一形势很可能对外交政策提出二个明显矛盾的要求：在友好国家中甚至不能根据19世纪的主权国家来考虑问题，而是需要更紧密的合作，然而同时，受管制市场的存在将会使各国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警惕外部的干涉。然而，随着金本位制自动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将会发现有可能放弃绝对国家主权中的最起阻碍作用的特点，即放弃拒绝在国际经济中进行合作的做法。同时，各国政府将会有可能变得可心甘情愿地容忍别国按照它们的意愿来设计其国内机制，从而超越了19世纪有害的教义，即在世界经济的轨道内国内政权必要的统一性。在旧大陆的废墟上，人们可以见到新大陆

的奠基石的出现：各国政府在经济上的合作和随意组织国家活动的自由。在自由贸易的约束性体制下，这两个可能性没有一个可能会被考虑到，从而就排斥了在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许多方法。当在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结盟的思想是中央集权和一致性的一场噩梦时，则市场经济的结束就很可能意味着与国内自由方面的有效的合作。

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出现了自由问题：制度层面和道德或宗教层面。在制度层面上，这是一个自由增加与减少的平衡问题；在这方面没有遇到全新的问题。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正是这种自由的可能性令人不犹豫不决。看来维护自由的手段自身在换假和破坏自由。在我们这个年代，自由问题的关键必须在后一个层面上去寻找。各种制度是人类意图和目的的具体化。除非我们理解在复杂社会中自由的真正的重要意义，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获得我们所寻找的自由。

在制度层面上，规章制度既扩大了自由也限制了自由；只有在失去自由和获得自由之间做到平衡才是重要的。这对于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来说都同样是正确的。收入多而生活舒适的阶层享受着由安逸安全地提供的自由；与缺少收入而很可能满足于最低限度自由的那些人相比，他们当然不那么担忧扩大社会上的自由。一旦人们提出旨在更公平地扩大收入、安逸和安全的克制不住的欲望时，这种情况就变得显而易见。尽管约束适用于所有的人，但享有特权的人们往往会对这点产生反感，好像约束只是单单针对他们的。他们谈论有关奴隶制度的事，而实际上只是想要向其他人提供他们自己享有的既得自由。最初，可能会不得不减少他们自己的安逸和安全，也减少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而结果将会提高全国的自由层面。但是这样一种自由的转变、重塑和扩大不管怎样不应该为断言新情况必然会比老情况自由更少的说法提供理由。

然而维护各种自由才是最重要的。自由像和平一样是 19 世纪经济的副产品，而且为了自由自身的好处我们已学会了珍惜它们。政治和经济在制度上的分开证明了对社会本体而言是一个致命的危

险，这种分开几乎自动产生了以公平和安全为代价的自由。公民自由、私有企业和工资系统合并成了一种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有利于精神自由和独立思想。这里再重述一遍，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合并成了一种共同基金，其中的各种要素不可能被巧妙地分开。一些要素就像失业和投机者的利润那样是不幸的必然结果；而另一些要素则属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最宝贵的传统。我们必须努力用我们的力量千方百计地来维护从市场经济的崩溃中继承下来的高价值的东西。这确定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任务。因为这种经济制度的目的是创造利润和财富，而不是创造和平和自由，所以在那种经济制度下，无论是自由还是和平都不可能制度化。如果我们竟然想要同时拥有和平和自由，我们将必须有意识地为争取和平和自由而奋斗；和平和自由必须成为我们正在向其迈进的各种社会所选择的目标。这很可能是当今世界努力确保和平和自由的真正目的。一旦源自于 19 世纪经济的已停止运作的和平方面的利害关系将取决于我们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的成功时，和平的愿望自身又能够宣称可走多远呢。至于个人自由，它将会存在于这样的范围内，即在我们将会为了维护且实际上是扩大它而有意创建的新安全措施的范围之内。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不墨守成规的权利必须在制度上加以保护。个人必须可自由地凭其良心做事，而不必害怕正好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中被委以行政管理任务的那些有权势的人。科学和艺术应该始终在文学界的保护之下。强制不应该是永远不受限制的；应该给“反对者”提供一个他能够隐退的合适的环境，让他有可谋生的“次优”的选择的合适的环境。这样将可确保作为自由社会标志的不墨守成规的权利。

有助于社会整合的每一个步骤应该相应伴随着自由程度的提高；有助于规划的步骤应该包含加强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在内。个人不可取消的权利必须按照法律得到实施，即便在实施时抵触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匿名的最高权势人物也要施行。面对作为滥用权力之源的官僚机构的威胁，真正的答案是建立起受牢不可破规则保护

的独立自由的空间。然而，因为大量实施授权会形成中央权力的加强，因此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甚至涉及到民主社团组织本身以及专业工会和同业工会时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这些组织的职能是保护每一位个体会员的权利的。即使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可怀疑这些组织方面有敌意，但正是它们的弱点可能会使个人感到无助。如果个人的观点或者行为伤害了那些行使权力者的感情，这种情况就更甚。单单对权利做声明是不够的：需要制度来使权利生效。人身保护权不必是以法律来固定个人自由的最后的宪法手段。迄今为止还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必须加进“人权法案”中。必须使公民权利高于所有的当局，不管是国家一级、市一级或者专业一级。在序列上应把个人权利作为认可条件下的一件事情列在首位，而不管男人或者女人的政治或者宗教观点，也不管他们的肤色和种族如何。这意味着保证公民权利不受到哪怕是轻微的损害。众所周知产业法庭一直在保护公众中的个体成员免遭诸如以早期铁路公司等为代表的那些企业集团的专横力量的侵害。法庭直接遇到的可能滥用权力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英国的“工厂基本法则”，或者是美国的“劳工冻结法”，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几乎不受约束地利用各种机会实施歧视。凡是在公众舆论全体一致地支持公民自由的地方，人们总是能够发现法庭或者法院能够维护个人自由。支持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付出生产率的代价、消费经济的代价或者管理合理性的代价。工业化社会能够承受得起自由。

市场经济的逝去可能会变成一个史无前例的自由时代的开始。可以使法律上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范围更广和更具普遍性；规章制度和管理不仅使少数人而且使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自由。自由不是作为在源头处就有缺陷的一种特权的从属权利，而是作为一种规定的权利，它已经远远地突破政治范围的刻板的限制扩展到了社会本身的直接的机构中。因此，老的自由和公民权利将会被加进新自由的储备之中，而工业化社会可提供给所有人的安逸和安全产生了这种新自由的储备。这样一种社会能够同时承担得

起公正和自由。

但是我们发现这条途径受阻于道德的障碍。人们批评计划和管理是对自由的否定。人们宣称自由企业和私有制是自由的要素。据说建立在其它基础上的社会都不应该被称作是自由的社会。规章制度创建的那种自由被公开指责为无自由；规章制度所提供的公平、自由和福利被公开谴责为奴隶制度的伪装。由于手段决定目的，社会主义者徒劳地允诺了自由的范围：把计划、规章制度和控制作为其手段的苏联迄今为止并没有把其宪法中所承诺的自由付诸于实践，而且评论家补充说，这种所承诺的自由很可能将永远不会实现……。但是转而反对规章制度就意味着变成和改革敌对。自由主义者就这样把自由的思想退化成了纯粹地提倡自由企业——如今这种提倡被庞大的托拉斯和君主似的垄断集团的严峻现实化成了杜撰的谎言。对于那些收入、安逸和安全不需要得到提高的人而言，这意味着完全的自由，但是对于那些徒劳地试图利用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财产所有人的势力中得到保护的人而言，这意味着只是那么一丁点的自由。事情还没完。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在重建自由企业方面根本没有成功，其注定要失败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正是由于他们努力的结果，在几个欧洲国家中建立了大垄断企业，而且顺带地就像在奥地利那样建立了各种不同牌号的法西斯主义。他们想要看到计划、规章制度和管理被视作对自由的威胁而遭禁止的事，却随后被公认的自由的敌人用来去彻底地破坏自由。然而，由于自由主义者阻挠任何涉及计划、规章制度或者管理的改革，从而使得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实际上变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实际上，自由在法西斯主义方面的彻底受挫是自由主义哲学不可避免的结果。自由主义哲学主张权力和强迫是邪恶的，主张自由要求在人类社会排除权力和强迫。实现这种主张是不可能的；在复杂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就变得更加明显。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要么仍然忠诚于对自由的幻想和否定社会的现实，要么接受这种现实和拒绝自由的思想。前者是自由主义者的结论；后者是法

西斯分子的结论。似乎不可能有其他的结论。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自由的真正可能性值得怀疑这样的结论。如果规章制度在复杂社会中是扩大和增强自由的唯一的手段，而且利用这一手段是与自由本身相悖的，那么这样一种社会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显而易见，在困境的实质部分中有着自由本身的含义。自由经济将我们的理想引向了错误的方向。这似乎接近去实现本质上是乌托邦式的期望。没有权力和强迫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暴力在发挥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认为社会仅是由人类的意志和愿望形成的想法是一种幻想。然而，这是社会的市场观的结果，这种市场观把经济和合约关系等同起来以及把合约关系和自由等同起来。人们抱有这样的激进的幻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来源于个人的意志力，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不可能再次被个人的意志力除掉。意志力受市场的限制，市场把（产品的）使用期限“破裂成”生产者部分和消费者部分，生产者部分结束于其产品到达市场时，而消费者部分是指所有来自于市场的商品到达消费者处。前者是指它的收入“自由地”取自于市场，后者是指把它的收入“自由地”消费在市场中。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无形的。国家的影响力并不重要，因为其影响力越小，市场机制就越能顺利地发挥作用。既不是选民也不是业主，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能够对如此无情地限制自由负责，而这种限制涉及到失业和贫困现象的出现。任何道德上正直的人都可能会认为自己对本国否定的国家方面所采取的强迫行为完全不用负有责任；或者说他对他本人并未从中得到好处的社会的经济困苦不用负有责任。他“勉强维持生活”，他“没有负债”，他没有卷入权力和经济价值的不幸之中。他对这些事不用负责的事实似乎是如此的明显以致于他以自由的名义否定了它们的现实性。

但是权力和经济价值是社会现实的一个范例。它们并非来自于人类的意志力；**不与它们合作是不可能的。权力的作用是确保团体**

生存所需要的一致性的方法；其最终的来源是信念——而且谁能够不支持这种或那种的信念呢？经济价值确保所生产出的商品具有实用性；它必须早于决定生产这些商品前就存在；它是由劳动分工所确定的。其根源是人类的消费欲和（商品）匮乏——而且怎么可能不期待着人们在有了一样东西后不再渴望拥有另外一样东西呢？任何信念或者愿望将会使我们在创立权力和建立经济价值中成为参与者。难以想象还会有用其他方式行事的自由。

我们的论证到了最后的阶段。

放弃市场乌托邦使我们面对面地面对社会现实。这是一条自由主义为一方和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尽管它们承认经济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它们不仅有区别，而且实际上体现了相反的原则。将它们分开的基本原则还是自由。法西斯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都接受社会现实，但他们接受的现实是对死亡的理解锻造了人类意识的现实。权力和强迫是那种现实的一部分；禁止在社会上有权力和强迫存在的理想肯定是错误的。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在于：按照这种理解，人们能否支持自由的思想；自由是旨在毁掉人类和人类成果的一个意义空洞的词汇、一种诱惑，还是人类可以面对这种理解重申自由和在不陷入道德的幻想说的情况下努力在社会中去实现自由呢？

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问题总结了人类的状况。这种研究的意识和内容应该可显示出一种答案。

我们援引一下我们认为是西方人意识中的三个基本事实：对死亡的理解、对自由的理解和对社会的理解。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旧约全书》中的故事揭示了对死亡的理解。如《新约全书》中所记载的耶稣教义中关于人的独特性的发现揭示了对自由的理解。由于我们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我们得到了对社会的理解。没有一个伟大人物与此有关；也许罗伯特·欧文最接近于成为其媒介。这是现代人类意识中基本的元素。

法西斯分子对承认社会现实的回答是拒绝自由的基本条件。法西斯主义否定基督教对个人的独特性和人类的唯一性的发现。这里存在着法西斯主义退化倾向的根源。

罗伯特·欧文是第一个承认《福音书》忽视了社会现实的人。他把此现象称之为在基督教中人类的“个性化”，而且他似乎认为只有在合作的全体国民中“基督教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可能会停止脱离人类。欧文承认我们从耶稣教义中获得的自由不适用于复杂的社会。欧文的社会主义支持人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对自由的主张。西方文明社会的后基督教时代已经开始，在这个后基督教时代中《福音书》再也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过它仍然是我们文明社会的基础。

因此，**社会发现不是自由的结束就是自由的再生**。法西斯分子听任自己放弃自由和赞美权力是社会的现实，而社会主义者不管这一切地听任于这一现实并支持对自由的主张。人类变得成熟起来并且能够作为人在复杂社会中生存。再引用一下罗伯特·欧文这些有启迪意义的话：“如果人类准备得到的新权力不能够消灭任何邪恶的起因，他们将会知道它们是必然的而且是无法避免的邪恶；人类将不会再有幼稚而无用的抱怨。”

顺从永远是人类力量和新希望的源泉。人类接受了死亡的现实，并把其物质生活的意义建立在这上面。人类听从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有一个迷失的灵魂，有着比死亡更糟糕的东西，且发现了这个事实上面的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听从于意味着这种自由结束的社会现实。不过生活再次来源于最终的顺从。毫无怨言地接受社会现实赋予了人类不屈不挠的勇气和力量来消灭一切可以被消灭的不公正和不自由。**只要人类确实是把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作为己任，人类就不必害怕权力或者计划会对人类不利以及破坏人类靠自己的手段建立起来的自由。这就是在复杂社会中自由的含义；它给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确定性。**

1

作为政策、历史规律、原则和体制的力量平衡

1. *力量平衡政策*。力量平衡政策是英国的国家行为方式。力量平衡政策完全是务实和实际的，我们不应该把力量平衡政策与力量平衡原则或者力量平衡体制混淆起来。这个政策是英国岛国位置的产物，这个岛国远离被有组织的政治共同体所占领的欧洲大陆沿海地区。特里威廉*说道：“英国外交学派的崛起，从沃尔西*到塞西尔*，他们都奉行力量平衡。面对正在形成的强大的大陆国家，他们把力量平衡视作为英国安全的唯一机会。”确切地说，这项政策由都铎王朝所确立，但实施该项政策的却是威廉·坦普尔爵士*、坎宁*、帕默斯顿*以及爱德华·格雷爵士*。力量平衡政策比欧洲大陆上出现的力量平衡体制大约早2个世纪，力量平衡政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完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学说的源头，而大陆的力量平衡学说的原则是由费奈隆*或瓦泰勒*提出的。然而，这样一个力量平衡

* 乔治·麦考利·特里威廉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1876~1962年，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译者注。

* 托马斯·卡迪纳尔·沃尔西 (Thomas Cardinal Wolsey): 1475~1530年，英格兰枢机主教、政治家——译者注。

* 威廉·塞西尔，伯利男爵 (William Cecil, Lord Burghley): 1520~1598年，英格兰政治家——译者注。

* 威廉·坦普尔爵士 (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年，英格兰政治家和外交家——译者注。

* 乔治·坎宁 (George Canning): 1770~1827年，英国政治家，1827年一度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 帕默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 1784~1865年，英国外交大臣 (1830~1841和1846~1851) 和首相 (1855~1865)。全名亨利·约翰·坦普尔——译者注。

* 爱德华·格雷爵士，准男爵 (第一) (Sir Edward Grey, 1st Baronet): 1862~1933年，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11年 (1905-1916) ——译者注。

* 费奈隆 (Fénelon): 1651~1715年，法国天主教大主教、神秘主义神学家、文学家——译者注。

* 埃默里赫·德·瓦泰勒 (Emmerich de Vattel): 1714~1767年，瑞士法学家——译者注。

体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英国的国家政策，因为这最终使英国更容易组织起联盟来反对任何在欧洲大陆上领头的强国。因此，英国的政治家往往会抱有这种想法，即英国的力量平衡政策实际上表达了力量平衡原则，以及奉行这样一种政策的英国只有在以那个原则为基础的体制中才可发挥其作用。然而，英国的政治家无意之中遮掩了英国自卫政策与任何有助于其进步的原则之间的分歧。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他所著的《25年》一书中做了如下的表述：“理论上讲，当欧洲强大集团的优势似乎有利于稳定与和平的时候，英国始终不会反对这种优势。支持这样一种联合体一般总是英国的首选。只有当这种占优势的力量变得有侵略性以及英国感到其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英国才会即使不是出于谨慎的政策也是出于其自卫本能地趋向采取可被清楚地描述为**力量平衡**的任何行动。”

因此，正是出于英国自身的合法利益考虑，英国才支持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体制的发展以及力量平衡的原则。英国这么做也是其政策的一部分。以下这些引证表明了由力量平衡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含义的结合所引发的观念混乱：福克斯*在1787年愤愤不平地问政府：“英国的立场是否是不再支持欧洲的力量平衡以及不再被人尊重为其自由的保护者呢？”福克斯主张英国应该接受其作为欧洲力量平衡体制保证人的观念。4年之后，伯克把力量平衡体制描述为据信已生效了两个世纪的“欧洲的公法”。这样在言辞上把英国国家政策和欧洲的力量平衡体制视为一致的做法使得美国人更难以区分这两个概念，而这两个概念本来就同样地引起美国人的反感。

2. *作为历史规律的力量平衡*。力量平衡的另一层含义是直接以执行机构的性质为基础。在近代的思潮中休谟*首先提及了这点。在工业革命以后政治思潮几乎整体衰退的期间，休谟的研究成果再次

*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 (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年，英国政治家——译者注。

* 戴维·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年，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译者注。

不为人所知。休谟承认现象的政治特性并且强调其在心理和道德事实上的独立性。不管参与者的动机如何，只要他们起到了体现力量的作用，这种情况就会生效。休谟写道，经验证明，不管“嫉妒的竞争或者谨慎的政治”是否是他们的动机，“其效果是一样的。” F·舒曼（F. Schuman）说道：“如果人们假定一个国家体制由A、B、C 3个机构组成，那么很明显3个机构中任何一个机构力量的上升会引起另外两个机构力量的下降。” F·舒曼推测力量平衡“其基本形式旨在用来维持国家体制中各个机构的独立性。” 他很可能已对这个假定做了归纳以便于使之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权力机构，而不管它们是否是有组织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力量平衡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历史的社会学中的。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是处在压力最大的权力集团的中心的权力机构，而是处于权力集团外围的权力机构易于扩张。甚至在西欧和中欧实际上已不可能发生较小的领土变化的时候，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英联邦的自治领还是有着惊人的扩张活动。皮雷纳举出了相同类型的一条历史规律。他特别提到在相对无组织的社会中抵制外部压力的核心通常在离强大邻国最远的地区形成。这样的例子有：在遥远的北欧由赫理士脱族（Heristal）的皮平（Pipin）建立的法兰克王国，或者作为日耳曼民族组织中心的东普鲁士的出现。在比利时德·格里夫（De Greef）的缓冲国规律中可见到这一类型的另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似乎影响了弗雷德里克·特纳*学派，并导致形成了美国西部如同是“一个漂泊的比利时”的这样的概念。这些力量平衡与不平衡的概念与道德、法律或者心理的概念无关。他们只与力量有关。这揭示了它们的政治特性。

3. 作为原则和体制的力量平衡。一旦人类利益被承认为是合法

*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年，美国著名教师和学者——译者注。

的，那么行为原则就来源于人类利益。自 1648 年以来，各国承认了《芒斯特与威斯特法利条约》所确定的维持欧洲国家现状的利益，而且在这方面还带来了各签字国的团结。欧洲所有的强国几乎都签署了 1648 年的这个条约；它们宣布它们自身是该条约的保证国。从该条约的签订日期起荷兰和瑞士取得了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自此以后，各国有权认为任何对现状大的改变将会对所有的其它国家都有着利害关系。这作为国际团体的一条原则是力量平衡的基本形式。由于这个缘由，对于按照这个原则被正确或错误地怀疑为有改变现状企图的一个强国，任何国家可根据此原则对它所采取的行动将不会被认为是以敌对方式行事。当然，这样的一种状况将会极大地促进形成反对这种改变的联盟。然而，只是过了 75 年，当“根据维持欧洲平衡原则”的西班牙领地被波旁皇室和哈普斯堡皇室分割时，《乌得勒支条约》才明确地承认了这个原则。由于正式承认了这一力量平衡的原则，欧洲才逐渐形成了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体制。由于较大的国家吞并（或统治）小国将会打乱力量平衡，所以这个体制间接地保护了那些小国的独立。尽管在 1648 年甚至是 1713 年之后，这个欧洲组织还是模糊的，但是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维持了约 200 年时间的现状还是必须得归功于这个力量平衡体制。无数的战争都是以这个名义开战的，尽管人们认为这些战争必定是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力量因素的启发，但在许多情况下结果都是一样的，就好像各国都是按照集体保证原则来行事反对无缘无故的入侵行为。其它的任何解释都将不足以解释清楚尽管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始终威胁着它们的边疆，但像丹麦、荷兰、比利时和瑞士这样弱小的政治实体却能够持续生存这么长一段时间。从逻辑上讲，原则和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组织（即体制）的区别似乎是明确的。但是即便原则处于准组织状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它们还没有达到制度的阶段，只是对传统的习惯或习俗提供指示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原则的有效性。即使没有常设的中心、定期的会议、共有的公职人员或者强制性的行为准则，只通过各国大使馆和许多外交团之间

持续的密切接触的方式，也已经在欧洲形成了一种体制。控制调查，外交新方针、外交备忘录的严格的传统——在意见一致或不一致的谈判中联合和分头发表公告——在不用使他们摊牌的情况下有着如此多的可表达力量状况的手段，同时他们还打开了妥协的新道路，或者最终是联合行动的新道路，以防谈判破裂。实际上，如果强国的合法利益受到威胁时，共同干预小国事务的权利就意味着在准组织形式中存在着一个欧洲的执政团。

或许，这一非正式体制的最大支柱是许许多多的国际性的私有企业，他们经常处理一些贸易协定或者是使用通过风俗和传统而生效的其它国际手段。政府和他们有权势的公民以数不清的方式陷入了由这样的国际交易引起的在不同类型的金融、经济 and 司法方面的困境。局部战争只意味着有些交易的短时间的中断，而在仍然持久或临时受到影响的其他交易中所具有的各种利害关系却形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种力量用以反对那些已决心通过战争的机会使敌人不利的人。这种渗透到文明社会整个生活中以及超越国界的私人利益的无声压力是国际互惠的无形支柱，即使这种无声压力并未采取“欧洲协同体”或者“国际联盟”的有组织的形式，但它还是给力量平衡原则提供了有效的约束力。

（参考书目）

作为历史规律的力量平衡：

D·休谟：《著作》，第3卷（1854年），第364页，“论力量平衡”。F·舒曼：《国际政治》（1933年），第55页。A·J·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卷，第302页。H·皮雷纳：《从罗马帝国灭亡到1600年的欧洲历史概况》（英文版，1939年）。巴恩斯—贝克尔—贝克尔：第2卷，第871页，论《德·格里夫》。A·霍夫曼：《德国和德国历史》（1920年）。另见奥斯豪佛的《地缘政治学派》。完全相反的意见见B·罗素的《权力》。拉斯韦尔的《精神病理学与政

治》、《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以及其它著作。另参阅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第4章第一部分。

作为原则和体制的权力平衡：

J·P·梅耶：《政治思想》（1939年），第464页。瓦泰勒：《万国法》（1758年）。A·S·赫尔希：《国际公法和组织纲要》（1927年），第567~569页。L·奥本海姆：《国际法》。D·P·希特利：《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1919年）。

百年和平：

利斯：《剑桥现代历史》，第7卷，第1章“现代欧洲”。A·J·汤因比：《历史研究》，第4（C）卷，第142~153页。F·舒曼：《国际政治》第1卷，第2章。J·H·克拉彭：《1815~1914年间的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3页。L·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第1页。W·李普曼：《好社会》。W·坎宁安：《英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L·C·A·诺尔斯：《英国19世纪工商业革命》（1927年）。E·H·卡尔：《1919~1939年的20年危机》（1940）。R·H·S·克罗斯曼：《政府与被统治者》（1939年），第225页。R·G·霍特里：《经济问题》（1925年），第265页。

巴格达铁路：

人们认为1914年6月15日的英德协议解决了这个冲突：R·L·比尔：《国际关系》（1929年）。R·G·赫特里：《经济问题》（1925年）。R·B·莫厄特：《欧洲协同体》（1930年），第313页。G·斯托尔普：《这个传说中的时代》（1942年）。相反的观点：S·B·费伊：《世界大战的根源》，第312页。H·费斯：《欧洲，世界的银行家，1870~1914年》（1930年），第335页（换页）。

欧洲协同体：

W·L·兰格：《欧洲联盟与联合》（1871~1890年）（1931年）。
R·J·商塔格：《欧洲外交史》（1871~1932年）（1933年）。H·翁肯：《剑桥现代史》，第12卷，“德意志帝国”。J·P·梅耶：《政治思想》（1939年），第464页。R·B·莫厄特：《欧洲协约国》（1930年），第23页。W·A·菲利普：《1914年的欧洲联盟》（1920年，第2版）。H·D·拉斯韦尔：《政治》，第53页。R·缪尔：《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1917年），第176页。R·L·比尔：《国际关系》（1929年），第512页。

属于第1章

2

百年和平

1. 各种事实。在1815年至1914年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强国之间彼此开战只发生在3个短的期间内：1859年持续了6个月，1866年持续了6周，1870~1871年间持续了9个月。持续了整整2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周边地区的一场半殖民地性质的战争，包括克拉彭、特里威廉、汤因比和宾克利在内的历史学家对此都持相同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英国持有者手中的俄罗斯公债在伦敦可兑付。在19世纪和18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偶发的全面战争和完全没有全面战争之间的区别。富勒少将*的19世纪不存在没有战争的年份的论断看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未考虑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昆西·莱特*对不同国家的许多战争年代作了比较，这种比较似乎回避了要

*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英、法、土等与俄国之战——译者注。

*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年，英国陆军军官，军事理论家，战争史学家，近代装甲战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 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1890~1970年，美国政治学家和国际法权威，

点。

2. 问题。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作为全面战争的一个丰富源泉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几乎持续不断的贸易战停止的现象。它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两个事实有联系：（1）老的殖民帝国的结束，（2）自由贸易的时代进入到国际金本位制的时代。随着贸易新形式的到来，战争利益迅速消退，与此同时由于与金本位制有关的新国际货币和信用结构的缘故，积极的和平利益出现了。整个国民经济利益现在涉及到维持货币稳定和发挥世界市场的作用，而收入和就业则依赖于世界市场。直到 1880 年为止在强国身上几乎普遍存在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取代了传统的扩张主义。（有关这点我们在第 18 章中予以论述。）

然而，在贸易战期间似乎有着半个多世纪的间歇期（1815~1880 年），在这个间歇期内外交政策被自然而然地认为与促进有利可图的贸易和以后的期间有关，在以后的期间内国外的债券持有人和直接投资者的利益被认为是外交大臣应予以考虑的合法的事情。正是在这半个世纪里，建立了消除私有企业利益对对外事务行为方面的影响的学说；也只是在这期间结束之时，考虑到公众舆论的新趋势，大臣们再次认为可以在有严格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接受这些主张。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由于贸易的性质而定的，根据 19 世纪的情况贸易的范围和成功已不再取决于直接的力量政策；逐渐转向商业影响外交政策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国际货币和信用体制已经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跨越国界的商业利益。但是只要这种商业利益仅仅是外国债券持有人所拥有的利益，各国政府就会极其不愿意允许他们有任何的决定权；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向海外贷款纯粹是投机性质的；国内政府债券的法定收入是定期的；如果国民做最具风险的事情把资金贷给信誉可疑的外国政府，没有一个政府会认为这种行为值得支持。那些投资者期望政府能关心他们在国外的投资损失，但坎宁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胡搅蛮缠的要求，而且坎

因对战争和国际关系的杰出研究工作而闻名——译者注。

宁也明确地拒绝承认拉丁美洲各个共和国取决于这些国家对其外债认可的做法。帕默斯顿 1948 年著名的公告首次正式宣告了他态度的改变，不过这种改变从未走得太远；由于贸易团体的商业利益散布得如此广泛，以致于政府几乎不能够经受得起让任何较少的既得利益把一个世界帝国事务的运行变得复杂化。在海外企业方面恢复对外政策利益主要是自由贸易结束和随之发生的回复到 18 世纪的做法的结果。但是由于贸易现在已经变得与非投机性的但完全是正常性质的海外投资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对外政策回复到了其传统的为社会贸易利益服务的方针上。我们不但需要解释这后一个事实，而且还需要解释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间歇期内中止这些利益的现象。

属于第 2 章

3

金线的突然折断

强制性的固定货币政策加速了金本位制的崩溃。固定货币运动的先锋城市是日内瓦，在伦敦金融界和华尔街施加的压力下，这个运动传播到了金融较弱的国家。

固定货币的 *第一组* 国家是其货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崩溃的战败国。 *第二组* 国家由欧洲战胜国组成，这些国家固定其自身货币的时间大体上要晚于第一批国家。 *第三组* 国家由金本位制利益的主要收益国美国组成。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战败国	欧洲的战胜国	世界性的债权国
固定年份	固定年份	金本位制 取消年份
俄罗斯 ……1923	英国……1925	1931 美国……………1933
奥地利 ……1923	法国……1926	1936
匈牙利 ……1924	比利时…1926	1936

德国 ……1924 意大利…1926 1933
 保加利亚 …1925
 芬兰 ……1925
 爱沙尼亚 …1926
 希腊 ……1926
 波兰 ……1926

第一组国家的不平衡状态由第二组国家支撑了一段时间。一旦第二组国家也同样固定了其货币，他们也就需要由第三组国家提供支持。最终，由美国组成的第三组国家遭受了累计的欧洲固定货币不平衡状态的最沉重打击。

属于第2章

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钟摆的摆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钟摆的摆动普遍而快速，但是其摆动幅度较小。在1918~1923年期间紧随着结果是失败的民主（或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在绝大多数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中都恢复了保守派统治；若干年后差不多又普遍建立了一党制政府。这次运动再一次是相当普遍的。

国家名称	革命	反革命	一党制政府
奥地利	1918年10月, 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1920年,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34年
保加利亚	1918年10月, 彻底的土地改革	1923年, 法西斯反革命	1934年
爱沙尼亚	1917年,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年,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26年
芬兰	1917年,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年, 中产阶级共和国	——
德国	1918年, 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1920年,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33年
匈牙利	1918年10月—1919年3月, 苏维埃民主共和国	1919年, 反革命	——
南斯拉夫	1918年, 民主联邦	1926年, 独裁的军事国家	1929年
拉脱维亚	1917年,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年,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34年
立陶宛	1917年, 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8年, 中产阶级共和国	1926年
波兰	1919年, 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	1926年, 独裁国家	——
罗马尼亚	1918年, 土地改革	1926年, 独裁政权	——

金融与和平

关于上半个世纪国际金融的政治作用方面我几乎找不到任何资料。科尔蒂*所撰写的一本有关罗斯恰尔兹贴现（Rothschilds）公司的书只涉及到“欧洲协同体”之前的一个时期。书中没有包括“欧洲协同体”参与苏伊士股份交易、由布莱施罗德（Bleichroeder）公司通过发行国际贷款的方式来供给 1871 年法国战争赔款的经费和东方铁路（Oriental Railway）公司期间的大量交易。像兰格（Langer）和松塔（Sontag）所撰写的历史著作中鲜有对国际金融问题的关注（松塔在列举和平因素时未提及过金融）；利斯（Leathes）在《剑桥现代历史》一书中对金融的评论几乎可说是一个例外。正如法国作家吕西斯（Lysis）或者英国作家 J·A·霍布森（J. A. Hobson）所做的那样，无偏见的自由作家的批评不是直接揭露金融家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就是直接揭露他们倾向于支持损害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倾向。像希法亭*或列宁的论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强调来自于国家银行界的帝国主义力量以及它们与重工业的有机联系。除了主要限于德国以外，这样一种论点肯定不能够应对国际银行界的利害关系。

对于客观的研究而言，华尔街对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的影响好像就在眼前。总的来说，几乎没有人会有任何怀疑，在国际缓和与国际仲裁方面，华尔街的影响波及范围从和平条约的时代到道威斯

* 卢吉·康特·科尔蒂（Luigi Conte Corti）：1823~1888 年，意大利外交家——译者注。

*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 年，维也纳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计划*、扬格计划*和在洛桑会议以及洛桑会议之后的清偿战败国赔款。最近的一些著作往往把私人投资问题分开，如斯特利的著作就特意排除了贷款给政府，不管这种贷款是由其他政府提供还是由私人投资者提供，在其令人感兴趣的研究中这种限制实际上排除了任何对国际金融的一般性的评价。我们引用得极多的费斯的极好的报告几乎涵盖了整个的主题，但这份报告也遭受了不可避免的缺乏权威资料之苦，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得不到有关*高级金融*的档案资料。厄尔（Earle）、雷默（Remer）和瓦伊纳（Viner）所完成的有价值的著作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同的局限性。

属于第4章

6

“社会与经济体系”的精选参考文献

出于个人获利的动机，人们在 19 世纪曾试图建立起一个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我们认为这样一种冒险行为确实在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我们只需关注一下这样一种方法所意味着的扭曲的生活观和社会观。例如，19 世纪的思想家认为人类在市场中像商人一样行事是“自然的”行为，而任何其它的行为模式都是非自然的经济行为，是干预人类本能的结果；认为只要人类听其自然，市场就会自发形成；认为不管人类对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这样一个社会的渴望如何，但至少其可行性是建立在竞争这一不可改变的特性基础上的，等等。与这些主张几乎完全相反的论断出现在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现代研究的证据中，它们涉及诸如社会人类学、原始经

* 道威斯计划：1924 年被协约国和德国同时接受的有关德国战争赔款假定数字的报告——译者注。

* 扬格计划：1929 年关于德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赔款的支付问题的第二次重新协商——译者注。

济、早期文明社会史以及一般经济史等领域。确实，几乎没有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假设——不管是明的或者是暗的——被包括在至今还没有被驳倒过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中。下面是一些引证。

(1) 对于人类而言个人获利不是“自然的”行为。

“原始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缺乏任何从生产或者交换中获利的愿望”（图恩瓦尔德*，《原始社会经济学》，1932年，第13页）。“另一个必须彻底被推翻的概念是目前一些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的‘原始经济人’的概念”（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冒险者》，1930年，第60页）。“我们必须拒绝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理想型，因为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从历史观点上说都在误导人”（布林克曼（Brinkmann）：“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社会经济学概论》，第4卷，第2页）。

(2) 对于人类而言期望为付出劳动而得到报酬不是“自然的”行为。

“在较文明的社会中获利经常是劳动的刺激因素，但是在原始的天然状态中劳动，获利从来就没有起到过刺激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在上面所引用的著作中，第156页）。“在未受外界影响的原始社会中我们根本找不到劳动与得到报酬的想法有任何联系的地方”（洛伊*，“社会组织”，《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14卷，第14页。）“没有任何地方出租或出售劳动”（图恩瓦尔德：《人类社会》第3册，1932年，第169页）。“把劳动视作为一种义务，而不需要补偿的思想……”很普遍（弗思*，《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1929

* 理查德·图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1869～1954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对各种社会制度的广泛比较研究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年，波兰社会人类学家——译者注。

* 罗伯特（哈里）·洛伊（Robert（Harry）Lowie）：1883～1957年，美国人类学家，对北美平原的印第安人曾作广泛研究，其中对克劳族印第安人的研究堪称典范——译者注。

* 雷蒙德（威廉）·弗思爵士（Sir Raymond（William）Firth）：1901年生，新西兰社会人类学家，以研究毛利人及其他太平洋和东南亚民族著称——译者注。

年)。“甚至在中世纪向陌生人给付工资都是闻所未闻的事。”“陌生人与职责没有个人的联系,因此他应该为荣誉和认同而劳动。”明斯特莱尔斯(Minstrels)说道,而作为陌生人,“接受报酬,则会因此而被人鄙视”(洛伊,见上面所引用的著作)。

(3) *对于人类而言,把劳动限制在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不是“自然的”行为。*

“我们不能不看到劳动量从来不局限于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而是始终超过绝对必要的数量,这得归因于它是一种自然而已成习惯的功能性的要求活动的强烈欲望”(图恩瓦尔德:《经济学》,第209页)。“劳动量总是超过严格需要的数量”(图恩瓦尔德:《人类社会》,第163页)。

(4) *劳动中常见的激励因素不是获利,而是互惠、竞争、劳动的乐趣以及社会的认可。*

互惠:“人们发现即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部分的经济行为属于互惠赠品和回赠赠品的某根链条,它最后取得平衡,使双方同等受益……。在其经济行为中固执地不服从司法裁决的人将会很快发现自己处于社会和经济秩序之外——而且他对这点非常清楚。”(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中的犯罪和风俗》,1926年,第40~41页)。

竞争:“竞争是激烈的,尽管目标一致,但竞争的表现却极其所能地变化多端……。在再生产模式中力争优秀”(戈登魏泽*,“有关原始社会中个人、模式和退化方面理论上的零星材料。”《人类学论文集》,1936年,第99页。)“在把大木柱搬至庭园中或者搬走收割好的山药时,人们在速度、十足的干劲以及他们能举起的重量方面相互之间竞争,”(马林诺夫斯基:《冒险者》,第61页)。

劳动的乐趣:“为劳动自身而劳动是毛利人勤奋的不变的特点”(弗思:“原始社会中勤奋的一些特征”,EF,第1卷,第17页)。“把大部分的时间和劳动花在以审美为目的的事情上,把庭园打扫

* 亚历山大·戈登魏泽(Alexander Godenweiser): 1880~1940年,俄国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译者注。

整洁，清除其中所有的垃圾；筑起锋利又牢固的栅栏，准备特别结实和粗大的山药杆子。所有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种植庄稼所需做的事情；不过人们可以不用怀疑土著人的责任心已经远远超越了纯粹生产必需品的限度”（马林诺夫斯基：在上面所引用的著作中，第 59 页）

社会认可：“把庭园收拾得尽善尽美是对一个人社会价值的综合指数”（马林诺夫斯基：《珊瑚庭园和它们的魅力》，第 2 卷，1935 年，第 124 页）。“期待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正常展示其勤奋”（弗思：《玻利尼西亚原始经济》，1939 年，第 161 页）。“安达曼岛人认为懒惰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拉特克利夫—布朗（Ratcliffe-Brown）：《安达曼岛人》）。“把一个人的劳动置于另一个人的指挥之下是一种社会性质的服务，而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服务”（弗思：在上面所引用的著作中，第 303 页）。

（5）从古至今人类具有相同性。

林顿*在他的《人类研究》一书中针对性格测定的心理学理论提出告诫，他主张“全面的观察结果得出了这些类型的整个范围在所有社会中大致相同的结论……。换句话说，他（观察者）一旦透过文化差异的屏障进行观察，他就会发现这些人基本上和我们相同”（第 484 页）。图恩瓦尔德强调人类在他们发展的所有阶段上具有相似性：“只要与人际关系有关，且根据社会生活相同的普遍原则，则如在前面几页中所研究的原始经济学就与其它形式的经济学没有区别”（《经济学》），第 288 页。“所有人类在天生特性的一些共同情绪方面基本相同，这就解释了在人类的社会存在中相似结构重现的想象”（“在人类生活方面的社会心理过程”，《人类学论文集》，第 383 页）。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最终以相似的假设为基础：

* 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 年，美国人类学家，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译者注。

*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 年，美国女人类学家——译者注。

“我已经说过，好像人类性格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变的，好像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在潜在地提供大致相似的分配，以及根据文化的各种传统模式，好像选自这些分配中的文化已把绝大多数的个人都铸造成了一模一样的人。例如，按照这种解释，精神恍惚的体验也是任何人口聚居处中一定数量的个人所经历过的一种可能性。当这种体验得到尊重和奖赏时，相当比例的人将会去完成或者效仿它……”（第 233 页）。马林诺夫斯基始终如一地在他的著作中坚持相同的立场。

（6）通常经济体系植根在社会关系中；非经济动机确保物质商品的分配。

原始经济是“是一种社会事件，涉及作为相互联系整体中各部分的许多人在内”（图恩瓦尔德：《经济学》，第 12 页）。这点同样适用于财富、劳动和实物交易。“原始财富不具有经济特性而是具有社会特性”（同上）。劳动具有“进行有效工作”的能力，因为它“被社会力量整合为一种有条理的努力”（马林诺夫斯基：《冒险者》，第 157 页）。“商品和服务的实物交易大多数在固定的伙伴关系中进行，或者与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关，或者在非经济事务中把相互依存关系连接在一起”（马林诺夫斯基：《犯罪和风俗》，第 39 页）。

支配经济行为的 2 个主要原则似乎是互惠和贮藏与再分配：

“整个部落生活渗透着不变的平等交换”（马林诺夫斯基：《冒险者》，第 167 页）。“今天的给予将以明天的取得作为补偿。这就是互惠原则的结果，它遍及原始生活的每一层关系中……”（图恩瓦尔德：《经济学》，第 106 页）。为了使这种互惠成为可能，“在每一个原始社会中我们将会发现体制的某种‘两重性’或者结构的均衡，它们是互惠义务不可缺少的基础”（马林诺夫斯基，《犯罪和风俗》，第 25 页）。“在巴纳罗人（Banaro）那里均衡分割灵魂的神龛是以他们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同样也是均衡的”（图恩瓦尔德：《巴纳罗人的村落》，1921 年，第 378 页）。

图恩瓦尔德发现，除了这种互惠行为以外，有时还和互惠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套贮藏和再分配的做法最具普遍适用性，它适用于

从原始狩猎部落一直到最大的帝国。商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集中收集起来然后再分配至社会的成员手中。例如，在密克罗尼西亚人和玻利尼西亚人中，“国王作为第一部落的诸多代表人物，接受部落的收入，随后在该部落人口中以赏赐的形式再分配这种收入”（图恩瓦尔德：《经济学》，第 12 页）。这种分配功能是中央机构政治权力的主要源头（同上，第 107 页）。

（7）为他自己和家人使用的个人食物的储藏并没有成为人类早期生活的一部分。

经典著作认为前经济人类不得不照料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卡尔·比彻（Carl Buecher）于本世纪之交在其开拓性的著作中重提了这个假设而且让这个假设开始了广泛的传播。最近的研究无疑纠正了比彻的这个观点。（弗思：《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第 12 页，第 206 页，第 350 页；图恩瓦尔德：《经济学》，第 170 页，第 268 页以及《人类社会》，第 3 卷，第 146 页；赫斯科维茨*：《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1940 年，第 34 页；马林诺夫斯基：《冒险者》，第 167 页，脚注）。

（8）互惠与再分配是经济行为原则，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小型的原始社会，而且适用于大而富有的帝国。

“分配有其自己特有的历史，它起始于狩猎部落最原始的生活。”“……这种情况不同于有着较近和较明确的阶层的社会……”

“牧人与农民的接触提供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例子。”“……这些社会各自的情况相当不同。但是随着一些家庭政治权力的日益发展以及专制君主的崛起，分配的功能在增大。酋长收受现在已经变成‘税收’的农民的赠品，并在他的官员中分配这些赠品，特别是分配给那些隶属于其宫廷的人。”

“这种发展涉及更加复杂的分配体制……。” 所有的古国——

* 梅尔维尔（琼）·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ean) Herskovits）：1895～1963 年，美国人类学家，曾开创对新大陆黑人的研究工作，使之成为新的研究领域，因而著名——译者注。

古代中国、印加帝国、印度王国、埃及、巴比伦王国——利用金属货币作为税款和工资，但是它们主要还是依赖于存储在谷仓和仓库中的实物以货代款地作为支付手段……来分配给官员、士兵、有闲阶级，也就是说，分配给人口中未从事生产的那部分人。在这个例子中分配实现了基本的经济功能（图恩瓦尔德，《经济学》，第 106～108 页）。

“当我们谈到封建主义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中世纪的欧洲……。然而，这是一种体制，正是这种体制很快使社会呈现不同的阶层。大多数交易是以货代款以及上层阶级声称拥有所有的土地或者家畜的事实是封建主义的经济起因……”（同上，第 195 页）。

属于第 5 章

7

“市场模式的演变”的精选参考文选

经济自由主义受这样一种错觉所支配：即它们的实践和方法是事物发展普遍法则的自然产物。为了使支撑自我调节市场的原则符合这个模式，这些原则被回溯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里。因此，贸易、市场以及货币、城镇生活和民族国家的本性和起源被歪曲得几乎面目全非。

1. 在原始社会“交易、以物易物和贸易”（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的个别行动只是罕见的现象。

“以物易物的起源是完全未知的。原始社会的人非但不具有对以物易物的渴望，反而讨厌它”〔布伟奇（Buesher），《国民经济的产生》（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1904 年，第 109 页〕。

“比如说，按照食物的数量来表达一个狐鲣鱼钩（bonito-hook）的价值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交换，而且会被提柯皮亚

人(Tikopia)认为是荒谬的……每一种对象适合于特定的社会情态”
(弗斯, 前面引用的书, 第 340 页)。

2. 贸易并不是在一个群落里出现的; 它是与不同群落有关的外部事务。

“在它的初期阶段, 商业是种族群体之间的交易; 它不会发生在同一种族和同一群落的成员之间, 而是在最古老的社会群落里的一种外部现象, 直接面向的仅仅是外族”(M·韦伯, 《经济通史》, 第 195 页), “虽然看上去它可能是奇怪的, 但是中世纪的商业一开始并不是受本地贸易、而是受出口贸易的影响发展起来的”(皮雷纳皮雷纳(Pirenne), 《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史》, 第 142 页)。“由于远程贸易, 中世纪的经济才得以复苏”(皮雷纳, 《中世纪的城市》, 第 125 页)。

3. 贸易并不依靠市场; 它起源于无论是以和平的还是以其它的方式的单方面运送(carrying)。

特恩华德确立了 this 论据, 即最早的贸易模式只是由从远距离采购和运送物品而组成的。本质上它是一次狩猎的远征。远征是否具有战争危险, 就像在奴隶买卖或海盗行为中的情形, 主要取决于遭遇到的抵抗(前面引用的书, 第 145、146 页)。“在荷马时代, 希腊人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初是由海盗行为促成的, 正如挪威海盗之间的情形一样; 在长时间里两种行业并行发展”(皮雷纳, 《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历史》, 第 109 页)。

4. 市场的存在或缺乏不是基本的特征; 本地的市场并没有增长的趋势。

“没有市场的经济体系并不需要因此拥有其它共同的特征,”
(特恩华德, 《人类社会》(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第 3 卷, 第 137 页)。在初期的市场“只有明确数量的确定物品才能相互进行以物易物”(同前, 第 137 页)。“特恩华德是值得特别称赞的, 因为他注意到原始货币和贸易在本质上与其说具有经济意义不如说具有社会意义。”(勒布(Loeb), “早期社会中货币的分配和功能”, 载

于《人类学随笔》，第 153 页）。本地市场并不是因对外贸易的“武装贸易”（armed trade）或“悄悄进行的以物易物”（silent barter）或其它形式而发展起来的，它是因为在某个聚会地点维护的“和平”而发展起来的；维护是出于与附近地区进行交易的有限目的。“本地市场的目的是给居住在那些地区的人口提供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就说明了本地市场每周举行、吸引的圈子非常有限以及他们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小规模零售业务的原因。（皮雷纳，前面引用的书，第四章，“直至 20 世纪末的商业”，第 97 页）。即使后来的本地市场，与市集（fair）相比较，没有显示出增长的趋势：“这种市场提供本地居民所需要的物品，只有邻近地区的居民参与；它的商品都是乡村产品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器皿”（李普森（Lipson），《英格兰的经济史》）。本地贸易“通常在发展的初期是农民和从事家庭工业的人的副业，一般来讲是季节性的……”（韦伯（Weber），前面引用的书，第 195 页）。“乍看起来，这种想法应该是自然的：商人阶层是一点一点地从农业人口中成长起来的。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理论”（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第 111 页）。

5. 劳动分工并不是从贸易和交易中，而是从地理、血缘和其它非经济因素中产生的。

“劳动分工决不是复杂经济情况的结果，尽管理性主义的理论会有那种观点。劳动分工主要应归因于生理学上性别和年龄的差异。”（特恩华德，《经济学》，第 212 页）。“几乎所有的劳动分工只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前面引用的书，第 13 页）。另一种劳动力分工的方式可能起源于血缘因素的情况，这是由于不同民族群体相互依赖所造成的。“民族群体而被转变成为社会上专业人士的一员”形成“一种上流阶层”进入社会。“这从而创造了一个组织基础，一方面来说，这形成了收益和服务的独立阶层，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领导阶层的家族头领分配和占有这些权力”（特恩华德，《经济学》，第 86 页）。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这是成立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起源（特恩华德，《社会心理学过程》，

第 387 页)。

6. 货币不是决定性的发明；它的存在或不存在对经济的类型没有构成本质上的区别。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个纯粹的事实是，使用金钱的部落很难区分于其它不使用金钱的部落”（勒布，前面引用的书，第 154 页）。“如果全都使用货币，那时货币所起的作用与我们文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货币一直是具体的东西，它从来就没有完全抽象地代表过价值”（特恩华德，《经济学》，第 107 页）。在“发明”货币中，艰苦的以物易物没有起过任何作用，“传统经济学家这种陈旧的观点与人种学研究背道而驰”（勒布，前面引用的书，第 167 页，脚注 6）。商品既有金钱的功能又有权力属性的象征意义，由于这特殊功效，我们不可能“单方面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待它的经济占有”（特恩华德，《经济学》）。例如，货币可能只用于支付工资和税款（同前，第 108 页）或者说货币可以用来补偿妻子，支付抚恤金或支付罚款。“因此，我们可以从前面陈述情况的这些例子中看出，对价值物的评估来源习惯捐款的数量，领导人所把持的位置以及他们所坚持的与几个团体平民的具体关系”（特恩华德，《经济学》，第 263 页）。

总的来说，货币像市场一样是一种客观现象，它对团体的重要性主要是由贸易关系决定的。“货币的观念通常是从外部引进的”（勒布，前面引用的书，第 156 页）。“货币被当作交易的一般媒介所发挥的作用起源于对外贸易”。（韦伯，前面引用的书，第 238 页）。

7. 对外贸易最初不是在个体之间而是在集团之间进行的。

贸易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它涉及到“集体所获得的各种商品”。贸易的起源存在于“集体的贸易旅途”。“在为这些通常具有外贸性质的远征队做出安排的时候，集体原则显现了出来”（特恩华德，《经济学》，第 145 页）。“总之，最古老的商业是不同部落之间的一种交换关系”（韦伯，前面引用的书，第 195 页）。中世纪贸易所强调的是交易不在个体之间进行。中世纪贸易是在“一些城镇之间，公社

相互之间（inter-communal）或者地方性内部（inter-municipal）的贸易活动”（阿什利，《英国经济史和理论的介绍》，第一部分，“中世纪”，第 102 页）。

8. 在中世纪，乡村的贸易被切断。

“一直到 15 世纪以及在 15 世纪期间，城镇已经是商业和工业的唯一中心，以致当中一个也没有被允许进入开放的地区”（皮雷纳，《经济史和社会史》，第 169 页）。“与农村贸易和农村手工业的斗争至少持续了 700 年或者是 800 年”（海克斯切（Heckcher），《重商主义》，1935 年，第 1 卷，第 129 页）。“这些严厉的措施加速了“民主政府”的发展……”“在整个 14 世纪，定期派出正规的武装远征军来对付附近的乡村，并且把织布机和染缸破坏或运走”（皮雷纳，前面引用的书，第 211 页）。

9. 在中世纪，城镇和城镇之间不加选择的贸易并没有实行。

地方性内部贸易包含着特定城镇或城镇群之间的特惠关系，例如像伦敦的汉萨同盟（Hanse）和日耳曼汉斯（Teutonic Hans）。在这样的城镇之间，互惠和报复是调节这些城镇之间关系的法则。例如，在债务不支付的情况下，债权人的城镇地方官员可以对那些债务人采取行动，要求进行的审判以他们的民族方式来进行处理，包括进行恐吓。如果债务不偿还的话，将会对那个城镇的人实施报复。

10. 不被人知的地方保护主义。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 13 世纪几乎不需要区分相互不同的国家，因为在基督教界范围内对社会交流的障碍要比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阻碍要少得多”（坎宁安，《西方文明的经济学方面》，第 1 卷，第 3 页）。直到 15 世纪，在政治边界上才出现关税。“在 15 世纪之前，没有证据显示出有一丁点这种期望，即通过保护本国与外国竞争来支持本国贸易”（皮雷纳，《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第 92 页）。“国际”贸易在所有贸易中是自由的（鲍尔和伯斯坦（Pstan），《15 世纪的英国贸易研究》）。

11. 重商主义促进了在国家疆界内城镇和省市的自由贸易

海克斯切所著的《重商主义》（1935年）第1卷中有这样一个标题：《重商主义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同样的，重商主义“反对把所有的经济生活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以及在这个国家的国境内阻碍贸易的进行”（海克斯切，前面引用的书，第2卷，第273页）。

“地方性政策的两个方面，即对乡村的压制和与国外城市竞争的斗争这两个方面都跟国家的经济目标存在着冲突”（同前，第1卷，第131页）。“重商主义‘国有化的’国家通过商业行为把本地的一贯做法推广至整个国家的每个角落”（派特勒（Pantlen），“买卖”，《社会科学简明辞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6卷，第281页）。“竞争通常是由重商主义人为培养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供求的自动调节来组织市场”（海克斯切）。认识到商业系统自由化趋向的第一个近代作家是斯考麦勒（Schmoller）（1884年）。

12. 中世纪的调节主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旧的世界衰落以后，中世纪城镇政策很可能首先在西欧试图根据一致性的原则在经济方面调节社会。这种尝试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功……。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在它无可挑战的鼎盛时期也许是这样一种情形，但是从整个时间段来看，与城镇政策的持续强韧性相比，自由主义是一个小的、逐渐消失的插曲”（海克斯切，前面引用的书，第139页）。“它们通过调节系统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此奇妙的适应了它的目标，所以它可能被认为该类中的一个杰作……。城市经济配得上同一时期的歌德式建筑”（皮雷纳，《中世纪城市》，第217页）。

13. 重商主义把地方性的实践扩展到国家每一个角落。

“这个结果将是扩展到更广泛地区的一个城市政策，这是一种地方性政策，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海克斯切，前面引用的书，第1卷，第131页）。

14. 重商主义是一个最成功的政策。

“重商主义创造了一个复杂精美的想让人满意的专业系统”（布伟奇，前面引用的书，第159页）。科尔伯特所著《规章》的成就是

“惊人的”，它把生产中的高质量视作为它的一个目标（海克斯切，前面引用的书，第1卷，第166页）。“国家规模的经济生活是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主要结果”（布伟奇，前面引用的书，第157页）。人们认为重商主义的调节系统一定“建立了劳动法规和劳动纪律，比中世纪城镇政府狭隘的排他主义能够提出他们道德和科技上限制的任何事要严格得多”（布林科曼），“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经济概论》，第4卷）。

属于第7章

8

斯品汉姆兰制文献

只有在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和结束时期，我们才意识到斯品汉姆兰制的重要性是决定性的。当然，在1834年前后，通常借鉴的是“津贴制”和“济贫法弊政”，然而，它们通常不是开始于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制，而是开始于1782年的《吉尔伯特法》，当时公众的头脑中还没有清楚地理解斯品汉姆兰制的真实特点。

甚至是现在，人们也没有清楚地理解斯品汉姆兰制的真实特点。人们仍然普遍地认为，斯品汉姆兰制只是意味着不加选择地对穷人发放救济。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也就是说，**这是系统性的补助性工资**。当代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做法与都铎时期的法律原则发生了正面碰撞，人们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与正在形成的工资体系完全不相容。至于实际效果，直到1799~1800年制定《反合并法》（Anti-Combination Laws）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它有压低工资的倾向以及变成一种对雇主的补助**。

正如古典经济学家对租金和货币的研究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研究“津贴制”的细节。他们把津贴和济贫院外救济的所有形

式跟《济贫法》结合了起来，并且迫切要求他们彻底清除掉。汤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没有倡导对《济贫法》进行改革；他们要求废止《济贫法》。单单是边沁已经对这个主题进行了研究，他在这个问题上比起别人少了些教条。伯克和他理解皮特所没有看到的，即补助性工资是一个真正过分严厉的原则。

恩格斯和马克思没有研究过《济贫法》。人们可以想象得出，揭露一种制度（即被认为是迎合穷人奇想的一种制度）的伪人道主义将会使他们更满意，而实际上把他们的工资降低到生活水平以下，（特别的反工会法在这方面也推波助澜）以及为了帮助穷人赚更多的钱来摆脱贫穷，把公款交给了富人。但是在当时，《新济贫法》是众矢之的，科贝特和宪章运动分子（Chartists）往往把老的《济贫法》理想化。而且，恩格斯和马克思十分坚信，如果资本主义即将到来，那么《济贫法》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不仅漏掉了一些一流争论点，而且还漏掉斯品汉姆兰制用来强化他们理论体系的论点，即如果没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就不会发挥作用。

哈丽雅特·马蒂诺对斯品汉姆兰制效果的描述让人眼睛一亮，因为她大量利用了《济贫法报告》（1834年）的经典段落。古尔德家族（Goulds）和巴林家族（Barings）向哈丽雅特·马蒂诺提供了出版这本精美小册子的经费，因为他们不可能再找到一位更真诚以及总的来说更博学的人来倡导他们的信条。在这本小册子中，哈丽雅特·马蒂诺担负起就有关穷人悲惨境遇的必然性对穷人进行了开导，因为她深信这是无法避免的以及她深信单单是这些政治经济的各种法律知识能够使他们的命运承受这些不幸（《政治经济学实例》，1831年，第3卷；以及《教区》和《济贫法和贫民的小村庄》，1834年）。她的著作《30年和平：1816——1846》采用缓和的语气写成的，与对她的恩师边沁的回忆相比，该书对人民宪章运动分子表现了更多的同情（第3卷，第489页，第4卷，第453页）。她是用这样有意义的段落结束她编年史般的著作的：“我们现在让最有智慧的

人专心于劳工权力这个巨大问题，来自国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呈现在我们面前，即在一个较小的不利结果相比于全部毁灭的情况下，这个巨大的问题不能被忽视。这个解决方案是否可能被发现？这个解决方案可能也许是英国历史下一时期主要的实际情况；并且在那时比现在可能看上去好，在准备这个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包含着前面讲到的《30年和平》的主要利害关系。”这是延迟行为（delayed-action）的预兆。在英国历史的下一个时期劳工问题不再继续存在；但是这个问题在70年代又卷土重来，再过半个世纪后，这个问题导致“把一切都毁了”。显而易见，在18世纪40年代比19世纪40年代更容易看清劳工问题的起源存在于管理《济贫法改革法案》的各种原则中。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期以及维多利亚时期之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没有仔细研究过一丁点斯品汉姆兰制的经济学。功利主义的三个历史学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没有煞费苦心地去探究斯品汉姆兰制的细节；伊利·阿莱维（Elie·Halevy）是第一个认识到《济贫法》在哲学激进主义历史中的关键作用，他在这个主题上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第三位是德西（Dicey），他的遗漏更是惊人。他对法律和公众舆论两者之间关系的出色分析使他把“自由”和“集体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织物中的纬线和经线。他认为，这种模式的本身来源于工业和商业趋势，也就是说来源于制度塑造经济生活。德西最强烈地强调在公众舆论中贫困所起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功利主义者整个立法系统中《济贫法改革》的重要性。然而他不理解功利主义者在他们立法计划中提出的《济贫法改革》真正重要意义，实际上，他认为工业地方税的负担是问题的关键。拥有像熊彼特（Schumpeter）*或者米切尔（Mitchell）一样经济学思想的历史学家们在分析古典经济学概念时就没有提到斯品汉姆兰制的情况。

* 熊彼特（Schumpeter）：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其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周期而闻名。

在汤因比（A·Toynbee）的文献中，工业革命变成了一个经济学历史的主题；汤因比认为斯品汉姆兰制及其“由富人保护穷人的原则”是由“托利社会主义”引起的。在这个时期，威廉·坎宁安对这个同一主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奇迹，但是他的研究成就只是荒野中的一个声音。尽管曼托克斯（Mantoux）（1907年）得益于坎宁安的杰作（1881年），但是他把斯品汉姆兰制仅仅称之为“另一场改革”，最奇怪的是“把穷人赶进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归因于斯品汉姆兰制（《18世纪的工业革命》，第438页）。比尔的著作是早期英国社会主义的一块纪念碑，但是他几乎没有提及《济贫法》。

直到哈蒙德（Hammonds）（1911）设想了一种由工业革命引领的新文明景象后，斯品汉姆兰制才被重新发现。它们不是构成经济历史的一部分而是构成了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韦伯（1927年）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提出了斯品汉姆兰制的政治和经济先决条件的问题，以及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正在处理我们自己时代的社会问题的起因。

J·H·克拉彭（J.H.Clapham）花了很大的力气建立了一个案例来反对那些可能被称之为经济历史的制度方法，这种制度方法例如由恩格斯、马克思、坎宁安、曼托克斯以及最近的哈蒙德提出。克拉彭拒绝把斯品汉姆兰制作为一种制度来考虑，并且把它仅仅作为在这个国家的“农业组织”中的一个特征来讨论（第1卷，第4章）。这样做几乎是不恰当的，因为正是把斯品汉姆兰制扩展到城镇而导致了斯品汉姆兰制的崩溃。此外，克拉彭还把斯品汉姆兰制对地方税的影响和工资问题分开来考虑，并根据“国家经济活动”来讨论斯品汉姆兰制对地方税的影响。这样做再一次说是不恰当的，因为从雇主阶层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忽略了斯品汉姆兰制经济效果，即雇主在低工资中得到的好处等同于或者超过了在地方税方面的损失。但是克拉彭有原则地考虑了各种事实，从而弥补了他对斯品汉姆兰制处理不当带来的后果。克拉彭不仅首次揭示了斯品汉姆兰制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真实程度，而且也首次揭示了“暴力圈地”（war

enclosures) 对推行斯品汉姆兰制的地区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认为斯品汉姆兰制和工资体系是完全对立的，这只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永久回忆。只有他们认识到，在广义上来讲，劳动力保护的每一种形式意味着某些有关干涉主义的斯品汉姆兰制原则。斯宾塞愤怒地指控“工资津贴”(make-wages)制度(在他的家乡是这样称呼这种津贴制度的)反对任何“集体主义者”的做法，他认为这个制度可以毫无困难地扩大到公共教育、住房供应以及娱乐场所的供应等方面。德西在1913年概括了对《老年人养老金法案》(1908年)的批评意见：“《老年人养老金法案》没有实质性内容，只是对那些不居住在贫民院的贫民进行救济的一种新形式。”同时他怀疑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否曾经有过一个相当公平的机会使他们的政策获得成功。“他们的一些提议从来没有实行过；例如，济贫院外的救济从来没有废除过。”如果德西持这样的观点，那么米泽斯(Mises)很自然地会断言“只要支付失业救济金，那么失业就肯定会存在”是最合乎自然规则的(《自由主义》，1927年，第74页)；米泽斯还会断言“帮助失业者被证明是消灭失业最有效的武器”(《社会主义》，1927年，第484页；《国民经济》(Nationalökonomie)，1940年，第720页)。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福利社会》(1937年)里试图把他自己从斯宾塞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不过他只是引用了米泽斯的理论。米泽斯和李普曼真实反映了自由主义者对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新保护主义的反应。毫无疑问，现在形势的许多特征回忆起斯品汉姆兰制。在奥地利，失业者的救济金是由“主管破产的财政部”来资助的，在大英帝国，“补充的失业救济金(extended unemployment benefit)”和“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金(dole)”没有什么区分；在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和公共工程署(PWA)已经创办；“帝国化学工业”的总裁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实际上在1926年曾经倡导，为了“补贴”工资以及能够帮助增加就业，英国的雇主们应该收到来自于失业者基金的补助金，但是他的倡导没有成功。失业问题与货币问题一样，自由资本主义在死亡般地痛苦中

面临着在开始时就带给它的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

贫困问题的当代文献和旧济贫法

阿克兰 (Acland), 《强制补偿计划》(1786 年)

无名氏, 《最近几个有助于穷人较好谋生的建议之考虑》, 一个附录, (第 2 版, 1752 年)

无名氏, 《英格兰的一个较好地维持穷人生活的新计划》(1784 年)

慈善机构的《对公众的一次演讲》, 该机构创立于 1788 年, 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和犯罪穷人的感化 (1788 年)

阿普尔加思, 罗布 (Applegarth, Rob), 《穷人的呼吁》(1790 年)。

贝尔沙姆, 威尔 (Belsham, Will), 《对穷人援助和维持生计议案的评论》。

边沁, J (Bentham, J), 《穷人管理得到改善》(1802 年)

边沁, J (Bentham, J), 《对限制和禁止的商业系统之观察》(1821 年)

边沁, J (Bentham, J), 《济贫议案的观察》, 由正直的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 阁下来介绍, 写于 1797 年 2 月。

伯克, E (Burke, E), 《观念和细节的不足之处》(1795 年)。

卡欧, 詹姆士 (Cowe, James), 《信奉宗教和慈善事业的义务》(1797 年)。

克伦泊, 塞缪尔, M·D (Crumple, Samue, M.D.), 《向人民提供最好的就业计划之尝试》(1793 年)。

笛福, 丹尼尔 (Defoe, Daniel), 《发放救济决不是慈善, 利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1704 年)

笛福, 丹尼尔 (Defoe, Daniel), 《英格兰穷人的抱怨》(1792 年)。

戴尔, 乔治 (Dyer, George), 《有关慈善的理论与实践的一篇

专题论文》(1795年)

伊顿 (Eden), 《论穷人》(1797年), 第3卷。

吉尔伯特, 托马斯 (Gilbert, Thomas), 《穷人的救济和就业的改良计划》(1781年)

戈德温, 威廉 (Godwin, William), 《帕尔博士精神上布道的研讨之思想领域》, 于1800年4月15日在耶稣教堂布道(伦敦, 1801年)。

汉普郡 (Hampshire), 《郡济贫法》(1795年)。

汉普郡的地方官员 (E. 波尔特) (E.Poulter), 《对济贫法的评论》(1797年)。

尊敬的 J·豪利特, 《皮特阁下演讲的研究》(1796年)。

詹姆士, 艾萨克 (James, Isaac), 《神旨显现》(伦敦, 1800年) 第20页。

琼斯, 爱德华 (Jones, Edw) 《贫困的预防》(1796年)。

罗森, 海林 (Luson, Hewling) 《劣等的政见: 穷人极度浪费和不幸之考虑》(1786年)

穆法雷恩, 约翰., D.D (M'Farlane, John D.D), 《关于穷人的咨询》(1782年)。

马蒂诺, H (Martineau, H), 《教区》(1833年)

马蒂诺, H (Martineau, H), 《小村庄》(1833年)

马蒂诺, H (Martineau, H), 《30年和平的历史》(1849年), 第3卷

马蒂诺, H (Martineau, H), 《政治经济学实例》(1832~1834年), 第9卷

马西, J (Massie.J), 《一个计划……悔罪的娼妓, 育婴堂, 穷人和济贫法》(1758年)。

内史密斯, 詹姆士, D.D (Nasmith, James, D.D.), 《一个指控, 伊利小岛》(1799年)。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制造业和劳务的贫困减少协

会的委员会报告》(1818年)

佩因, Th (Paine, Th), 《有关农业的司法实施和程序》(1797年)

皮尤, 里奇 (Pew, Rich), 《观察》

皮特, 威廉·莫顿 (Pitt, Wm Morton), 《对有土地利益的人演讲, 用于穷人的住所和燃料缺乏》

《公共慈善机构的一个计划》(1790年), “论饥饿”,

《第一报告》的纲要, 改善穷人的生活环境和增加对穷人帮助的社会。

《第二报告》, 改善穷人生活环境的社会 (1797年)。

拉格尔, 寿 (Ruggle, Tho), 《穷人的历史》(1793年) 第2卷。

沙巴特, 威廉 (Sbatier, Wm) 先生, 《对贫穷的论述》(1797年)。

森达·罗伯特 (Sunders, Robert), 《观察》。

谢勒, 尊敬的 JG (Sherer, Rev. JG), 《穷人的现状》(1796年)。

贫民医院领域的协会, 《好肉汤》(1799年)。

在菲尔德 (Field) 的盖尔斯 (Giles) 街, 联合教区的小礼拜室, 《评论对穷人较好地支持和维持生计的议案》(1797年)。

萨克福 (Suffolk) 绅士, 《关于穷人的地方税和供应品高价的一封信函》(1795年)。

汤森, 威廉 (Townsend, Wm), 《1786年由对人类寄予美好祝愿之人制定济贫法的学术演讲》。

温哥华, 约翰 (Vancouver, John), 《贫穷的原因和产生》(1796年)。

威尔逊 (Wilson), 尊敬的爱德华 (Rev.Edw), 《对穷人现状的观察》(1795年)。

伍德, J (Wood, J), 《给威廉·帕特尼的信》(有关皮特的议案)(1797年)。

杨·W 爵士 (Young.Sir W), 《贫穷家庭和职业家庭》(1796年)

一些现代著作

阿什利, W.J. (Ashley, W.J.) 爵士, 《英国经济学历史和理论的介绍》(1931年)。

贝莱斯科, Ph.S. (Belasco.Ph.S.), “约翰·贝勒斯, 1654~1725年”, 《经济学》, 1925年6月。

贝莱斯科, Ph.S. (Belasco.Ph.S.), 《17世纪劳动交换的观念》, 经济财政 (Ec.F.), 第1卷, 第275页。

布莱克莫尔, J.S. (Blackmore, J.S.) 和墨劳尼, F.C. (Mellonie, F.C.), 《在19世纪早期的家庭养老金和出生率》, 第1卷。

克拉彭, J.H. (Clapham, JH), 《英国现代经济史》, 第1卷, 1926年。

马歇尔·多萝西 (Marshall.Dorothy), “旧济贫法, 1662~1795年”, 《经济历史评论》(The Ec. Hist. Rev.), 第8卷, 1937~1938年, 第38页。

帕尔格雷夫 (Palgrave) 的《政治经济词典》, 插图解说性的材料, 《济贫法》, 1925年。

韦布夫妇 (Webb, S and B), 《英国地方政府》, 第7~9卷, 《济贫法历史》, 1927~1929年。

韦布, 悉尼 (Webb, Sidney), 《社会趋势》, C.H.M., 第12卷, 第730~765页。

属于第7章

9

斯品汉姆兰和维也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发展, 其发人深思的社会和经济形势第一次吸引了本文作者去研究斯品汉姆兰制度以及它对古典经济

学家的影响。

在奥地利，在一个完全是资本主义的环境中，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市政当局建立了一个受到经济自由主义者猛烈攻击的政权。市政当局施行的一些干预政策毫无疑问与市场经济机制不能和谐共存。不过，纯经济论点并不能够详细阐述一个主要是社会的而不是经济的问题。

有关维也纳当局的主要事实有如下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后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地利的失业保险金由公共资金大量地进行补贴，从而在长时间内扩大到了院外救助*上；维也纳市政当局将房租水平确定在只有以前水平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价格上，还以非盈利为基础建造了大量经济公寓住宅，通过征税来筹集所需的资金。尽管没有发放补助性的工资，然而多方面地提供社会服务，虽然这些服务的量还是适度的，但它们实际上还是可能会让工资过多地下降，不过对发达的工会运动而言，它当然会发现在扩大失业救济方面它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从经济学角度上讲，这样一种体制当然是不正常的。限于完全无利可图的水准上的租金与私人企业现存体制不能和谐共存，特别是在建筑行业上。另外，在早些年里，在贫穷国家中的社会保护干预了货币的稳定——通货膨胀政策和干预政策密不可分。

最终，维也纳和斯品汉姆兰一样在得到纯经济论点的强有力支持的政治势力的抨击下屈服。1832年英格兰的政治变革以及1934年奥地利的政治变革都旨在把劳动力市场从保护主义的干涉中解放出来。无论是大地主的村庄还是工人阶级的维也纳都不可能长时间地把其自身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

然而，显而易见，在这两个干涉期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在1795年，英国农村必须躲避因城市工业巨大的增长引发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混乱；而在1918年，维也纳的产业界工人阶级则必须保护

* 院外救助：对不住在贫民院的贫民的施舍——译者注。

自己免受由战争、战败和工业的混乱引起的经济后退的影响。最后，斯品汉姆兰导致了劳工组织的一场危机，然而这场危机却开拓了通向繁荣的新纪元之路；但是奥地利保安团的胜利反而构成了国家和社会体制整个灾难中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两种类型的干预在文化和道德影响上的巨大差别：斯品汉姆兰试图阻止市场经济的到来，而维也纳的实践则尝试完全超越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斯品汉姆兰给平民带来了一场真正的灾难，而维也纳却实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轰动一时的一场文化胜利。1795年导致了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空前的下降，阻止了产业工人取得新的社会地位；1918年则开始在道德和知识方面提升高度发达的产业界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受到维也纳制度保护的产业界工人阶级经受住了严重经济混乱的负面影响，并且在提升自身方面达到了任何工业化社会中广大民众从未超越过的程度。

很明显，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同，这得归因于社会方面的原因。但是正统的经济学家是否正确理解干涉主义的经济学呢？实际上，经济学自由主义者认为维也纳政权是另一个“济贫法暴政”，是另一种“津贴制度”，它需要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铁扫帚。但是这些思想家自身难道没有被斯品汉姆兰创立的相对持久的环境所误导吗？他们对未来的思考常常是正确的，他们深邃的洞察力有助于形成对未来正确的思考，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所处那个时代的思考却完全是错误的。现代研究已经证明他们凭可靠而实用的判断所赢得的声誉是名不副实的。马尔萨斯完全误解了他那个时代的要求；T·H·马歇尔（T. H. Marshall）说过，如果马尔萨斯把带有倾向性的人口过剩的警告亲自告诉新娘们且使其生效，则这种警告“也许会把经济进步当场射杀”。李嘉图错误地陈述了货币论争的事实以及英格兰银行的作用，他没有抓住货币贬值的真正原因。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货币贬值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政治性支付和转帐的困难。如果李

嘉图有关“金块报告”（Bullion Report）*的建议被采纳了，英国将会失去拿破仑战争，而“大英帝国今天也将不会存在。”

因此，让一些人退回到古典经济学者观点的维也纳经验以及其类似于斯品汉姆兰的一些经验使得其他人转而对这些经验持怀疑态度。

属于第8章

10

为什么不用“惠特布雷德法案”？

斯品汉姆兰政策的唯一的比较方案似乎应该是 1795 年冬提出的“惠特布雷德法案”。“惠特布雷德法案”要求对 1563 年的《技工法》（the Statute of Artificers）进行扩充，以便于将年度评估的固定最低工资包括在内。“惠特布雷德法案”提出者认为这样一种措施将可维持伊丽莎白工资评估法规，把它从最高工资延伸到最低工资，从而预防农村出现饥饿现象。毫无疑问，这将会满足紧急状态的需要，而值得注意的是，例如，萨福克郡的议员支持“惠特布雷德法案”，但是萨福克郡的地方官员却照样在阿瑟·扬*（Arthur Young: 1741-1820 年，农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英国著述家——译者注。）亲自出席的一次会议上赞同斯品汉姆兰原则；在外行人看来，这两种措施之间的差别不可能非常非常大。这种看法不令人奇怪。过了 130 年，当蒙德计划（Mond Plan）（1926 年）提议使用失业基金来增加行业中的工资时，公众仍然很难理解在补助失业者和给就业者在工资上进行补助之间明确的经济上的区别。

然而，在 1795 年发生了在最低工资和在工资上进行补助之间

* “金块报告”（Bullion Report）：指李嘉图《金块的高价》一书——译者注。

* 阿瑟·扬（Arthur Young）：1741~1820 年，农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英国著述家——译者注。

作选择的事。通过把这两项政策与同时废止的 1662 年的“嗣位法”联系起来就可以辨别这两项政策之间的区别。这个“嗣位法”的废止为建立国家劳动力市场创造了可能性，而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目的就是允许工资“找到它们自身的标准。”“惠特布雷德最低工资法案”的意图与取消“嗣位法”的意图相反，而“斯品汉姆兰法”的意图却不是这样。通过扩大应用 1601 年的“济贫法”而不是 1563 年的《技工法》的方式（如惠特布雷德法案所建议的），大地主们主要仅在乡村方面以及最低限度地干预市场运作的这些形式方面恢复了家长式统治，而这样做实际上就使得固定工资的机制无法生效。这种所谓的“济贫法”的应用实际上完全推翻了强制性劳动的伊丽莎白原则，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这点。

对于“斯品汉姆兰法”的发起人来说，注重实效的考虑才是最重要的。尊敬的身为温莎的教士和伯克郡的治安官的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他可能一直是该法的支持者，在一本他明确赞成自由放任的小册子中提出了他的观点，“像任何进入市场的其他要素一样，劳动从古至今均在没有法律的干预下找到自身的标准”。而对于英国的一位地方官员而言，正相反，可能说得更合适一点的应是在没有法律的干预下劳动从古至今都没有找到过自身的标准。不过，威尔逊教士继续说道，由于数字显示工资增长得没有像谷物价格一样快，因此他恭敬地提请地方行政官员考虑“同意给予穷人救济定量的一项措施。”对于一个由丈夫、妻子和小孩组成的家庭每周的救济总数为 5 先令。在他的小册子中的一则“启事”是这么说的：“下述小册子的内容是去年 5 月 6 日在纽伯里举行的郡会议中提出的。”就我们所知，这位地方行政官员比威尔逊教士走得更远：郡会议一致同意给予救济的数值为 5 先令 6 便士。

属于第 13 章

迪斯累里*的“两个国家”和有色人种问题

有几位作者一直坚持殖民地的问题与早期资本主义那些殖民地的问题之间的相似性。但是，他们未能用其它方法继续进行类推，也就是说，他们未能通过描述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最贫困的那些阶级的实际状况来阐明当时那些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那个时代被剥离社会成员资格和被贬低的那些土著人。

为什么未觉察这种明显的相似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主义的这种偏见，这种偏见不恰当地重视了基本上是非经济过程的经济方面。因为无论是当今发生在一些殖民地地区的种族分裂现象，还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工人阶级受到的类似的非人性化待遇本质上都不是经济方面的。

(1) 破坏性的文化接触不是主要的经济现象。

L·P·梅尔(L. P. Mair)说，现在大多数土著人社会都正在经历着一个快速而强有力的变革过程，这个变革过程的情况只有一场革命的暴力改变可与其相比。尽管入侵者的动机无疑是经济性质的，但是原始社会的崩溃必定常常是由其经济体系的破坏所造成的，明显的事实是土著文化不能够同化新的经济体系，因此在不能被任何其它有条理的价值体制所取代的情况下土著文化分崩离析了。

在西方体制所固有的破坏性的趋势中首先要维持“一个广袤地区的和平”，这种和平打破了“部族的生活、族长统治的权威以及年轻人的军事训练；基本上禁止部族或者部落的迁徙”（图恩瓦尔德：《东非的黑人与白人》；《一个新的文明社会的结构》，1935年，第394页）。“战争一定会赋予土著人生活一种敏锐性，但遗憾的是在这些和平年代中这种敏锐性丧失了……。”鉴于战争导致的人员伤亡

*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年，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两度任首相——译者注。

非常少，所以废除战斗使人口减少，与此同时没有战争意味着富有生机的风俗和礼节的丧失，由此产生不利于健康的迟钝和对乡村生活的冷漠（F·E·威廉斯：《苏恩（Suan）地区人口减少》，1933年，“‘人类学’报告”，第13期，第43页）。与这种情况相比较的是在土著人传统文化环境中的“充满活力、生气勃勃和使人兴奋的生存环境”（戈登威泽：《零星材料》，第99页）。

用戈登威泽的话说，真正的危险是“介于文化中间的”危险（戈登威泽，《人类学》，1937年，第429页）。在这点上大家实际上有着一致的意见。“老的障碍正在逐渐减少，但却没有提供任何类型的新的指导方针”（图恩瓦尔德，《黑人与白人》，第111页）。“维持一个积累商品被视作为反社会行为的社会，以及把这个相同的社会与当代的白人文化结合起来，同时做这两件事就是试图协调两个互不相容的制度体制”（威瑟尔（Wissel）为M·米德作的序：《一个印第安部落正在变化的文化》，1932年）。“携有移民文化的人们也许可以成功地消灭土著文化，然而他们既无法消灭也无法同化携有土著文化的人们”（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与欧洲文明社会的接触给土著人带来的影响”，《人类》第27卷，1927年）。或者用莱塞（Lesser）尖刻的话来说，是工业化文明社会的另一个牺牲者：“从波尼族印第安人成熟的文化降格为白人的不成熟的文化”（《波尼族印第安人的鬼神舞技艺比赛》，第44页）。

在人们公认的意义上来讲，虽生犹死的生活状况不是由于经济上剥削的缘故。这种观点认为，尽管剥削肯定与土地的使用期、战争、婚姻等有关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的每一种情况又影响着众多的社会习惯、风俗和各种类型的传统，但剥削只意味着一方在经济方面的得益是以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当在人口稀少的西非强行推行货币经济时，造成这样一种实情的并不是因为工资不适当，即当地人“不能够买到食品可替代他们以往没有种植过的食物，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人种植了多余的食物可卖给他们”

（梅尔：《20世纪的一个非洲民族》，1934年，第5页）。他们的体

制蕴含着另一种不同的价值量表；他们既节俭同时又没有市场头脑。“当市场到处都供过于求的时候，他们仍会索要同样的价格，而当市场发生严重短缺时，为了只是节省一点小钱，他们却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跑很远的路去购买他们所需的東西”（玛丽·H·金斯利（Mary H. Kingsley）：《西非研究》，第 339 页）。工资上涨常常会引起旷工。据说特旺特佩克地峡的萨巴特克印第安人在日工资 50 分的情况下工作半天与日工资 25 分的情况下工作一天一模一样。在英格兰工业革命早期的日子里，这种矛盾的现象相当普遍。

人口比率的经济指数并不见得比工资更能使我们满意。戈登威泽证实了里弗斯在美拉尼西亚所做的著名的调查报告，即文化上匮乏的土著人可能会“死于无聊。”身为在那个地区工作的传教士的 F·E·威廉斯写道，人们容易理解“有关死亡率方面的心理因素影响”。“许多观察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可能是导致土著人死亡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安逸和不费心思上。”“约束土著人以前的兴趣和活动似乎对于他的情绪是致命的打击。结果是土著人的身体抵抗力受到了伤害，他很容易死于各种疾病”（在上面所引用的书中，第 43 页）。这与经济欲望的压力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极其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可能不是一种文化活力就是一种文化退化的症状”（弗兰克·洛里默（Frank Lorimer）：《有关美国印第安人人口趋势的调查报告》，第 11 页）。

只有通过不可与生活的经济标准作比较的那些社会措施才能阻止文化退化，诸如恢复部落土地所有制或者将部落社会隔离开来使其免受资本主义市场手段的影响。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于 1942 年写道：“把印第安人与他所属的土地分离开来是对他的一个致命的打击。”1887 年的《全面分配法》（the General Allotment Act）“个别地加以考虑”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对印第安文化的分解导致印第安人丢失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土地，即 9000 万英亩的土地。1934 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the 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通过使印第安文化获得新生的方法使部落拥有的财产重新得以完整并挽救了

印第安社会。

非洲也有同样的情况。因为社会组织大多数直接依赖于各种土地所有制，所以土地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占据了利害关系的中心地位。看来像高税收和租金、低工资等经济冲突几乎是唯一的隐蔽的施加压力的形式，这些压力可诱使土著人放弃他们的传统文化，从而迫使他们去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也就是说，为了工资而工作和到市场上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像卡菲尔人*那样的土著部落以及那些移民到城镇的人丧失了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美德而变成了一群无生活能力的人、“半驯化的动物”，在他们中间有流浪者、小偷和妓女。一个他们中间以前无人熟悉的收容所——只不过是像极了大约在 1795~1834 年期间曾收容过大量接受救济的英国人的收容所而已。

(2) 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人性的退化是不能够用经济学术语来衡量的一场社会灾难的结果。

罗伯特·欧文早在 1816 年就认为本国的工人“不管他们挣到了什么样的工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定是不幸的……。”（《致英国工厂主的信》，第 146 页）。我们还记得亚当·史密斯认为失去土地的工人对受教育不感兴趣。穆法雷恩（M'Farlane）认为“普通民众中间掌握写作和计算知识的人日趋减少”（《对穷人的调查》，1782 年，第 249~250 页）。隔了一代人之后的欧文将工人的退化归因于“未成年时的忽视（教育）”和“过度工作”，致使他们“当他们可以得到高工资时，也因出于愚昧而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工资。”欧文自己付给工人低工资，同时通过人为地为他们创建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来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多数人养成的恶习大体上与因文化接触瓦解而退化的有特性的有色人种的恶习一样：浪费、卖淫、盗窃、缺少节俭和节约的品德、邋遢、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自尊和毅力。市场经济的扩散正在破坏农村社会、乡村社团、家庭、原有

* 卡菲尔人：南非班图人的一支部落——译者注。

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在文化框架之内支撑生活的风俗和标准等传统结构。斯品汉姆兰提供的保护只是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普通民众所受的社会灾难完全与今天的卡菲尔人所受的社会灾难一样。唯一一位杰出的黑人社会学家查尔斯·S·约翰逊 (Charles S. Johnson) 推翻了种族退化和阶层退化之间的类比,这次他把他的观点运用到阶层退化上:“顺便提一下,在英国工业革命比欧洲其它国家更超前,激烈的经济重组之后的社会混乱把贫穷的儿童变成与过去的非洲奴隶一样的‘作业量’,后来,又变成了……。对儿童农奴制的道歉与对奴隶贸易的道歉几乎是如出一辙。(“种族关系与社会变迁。”E·汤普森,《种族关系与种族问题》,1939 年,第 274 页”)。

补充说明

12

《济贫法》与劳工组织

迄今为止没有人调查过斯品汉姆兰制度的更广泛的含义、其起源、其影响以及斯品汉姆兰制度突然停止的原因。以下是有关这方面的几个观点。

1. 到什么程度斯品汉姆兰制度才是衡量战争的一种尺度?

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正如经常有人这么断言的那样,斯品汉姆兰制度不能够真正被说成是一种衡量战争的尺度。同时代的人几乎很难把工资的状况与战争的紧急状态联系起来。只要工资有明显的上涨,则表明战前的调遣已经开始。旨在查明农作物歉收对谷物价格的影响的阿瑟·扬 1795 年的《通函》中第 4 点有这样一个问题:“与前段时期相比,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如果有的话)上涨了多少?”阿瑟·扬的记者们并没有从特性上对这个短语“前段时期”

加上任何明确的意思。参考资料的时间范围从 3 年到 50 年。它们包括了下列时间跨度：

3 年	…	…	J·伯伊斯 (Boys), 第 97 页
3~4 年	…	…	J·伯伊斯, 第 90 页
10 年	…	…	来自什罗普郡、米德尔塞克斯郡和剑桥郡的报告
10~15 年	…	…	苏塞克斯和汉普郡
10~15 年	…	…	E·哈里斯 (Harris)
20 年	…	…	J·伯伊斯, 第 86 页
30~40 年	…	…	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
50 年	…	…	尊敬的 J·豪利特 (Howlett)

没有人把时间跨度设置为 2 年, 即爆发于 1793 年 2 月的法国战争的那个时间段。实际上, 几乎没有一个记者提及过那次战争。

顺便提一下, 通常应付由歉收以及恶劣天气条件导致失业所造成的有被救济资格的贫民人数增加的方法有: (1) 包括失业救济金、免费或降价分发食物和供应燃料在内的本地捐款; (2) 提供就业机会。工资通常不会受到影响; 在类似的紧急状态期间, 即 1788~1789 年期间, 本地所提供的新增就业数实际上低于正常的比率。(参阅 J·哈维 (Harvey): “伍斯特郡”, 《农业年鉴》, V, XII, 第 132 页, 1789 年。另参阅 E·霍姆斯 (Holmes): “克拉克敦 (Cruckton)”, 在上述引文中, 第 196 页。)

然而,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场战争至少与采用斯品汉姆兰紧急手段有间接关系。实际上, 那场战争加剧了快速铺开市场体制的两个弱点, 同时这也得归因于引发斯品汉姆兰的那种形势: (1) 谷物价格波动趋势, (2) 骚乱对这些波动的影响是最有害的。人们几乎很难指望只是最近才放开的谷物市场可以经受得住战争的压力和封锁的威胁。谷物市场也无法抵抗得住由现在已呈现出不祥意义的习惯性骚乱行为所引起的恐慌。在这种所谓的调节系统下, 中央当局一直认为“和平的骚乱”或多或少是本地供应不足的指示器, 应该温和地解决这种供应不足的情况; 现在人们普遍指责“和平的

骚乱”是供应不足的起因和对社会的经济威胁，同时对穷人本身也是相当重大的威胁。阿瑟·扬对“因食品高价而引发骚乱的结果”提出了警告，汉纳·莫尔（Hannah More）在她一首说教式的诗中帮助宣传了类似的观点，诗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要骚乱，还是要半条面包，有半条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强”（用“有个补鞋匠”的调子唱出）。她只是把扬在一种假想的对话中已这样表达出来的意思用做诗的形式回答了家庭主妇：“‘我们打算在挨饿前一直不出声吗？’最有把握的是你不会这样——你应该抱怨；不过要以不会使现在所感受到的不幸更恶化的方式来抱怨或者行动。”他强调，“只要没有骚乱，”就根本不会有饥荒的危险。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谷物供应极易受恐慌的影响。另外，法国大革命甚至给了和平的骚乱以一种威胁性的含义。尽管害怕工资上涨无疑是斯品汉姆兰的经济原因，但是可以这么说，就战争而言，这种情况的社会和政治上所蕴涵的意义远比经济上的意义要大得多。

2. 威廉·扬爵士（Sir William Young）和放宽《居住权法》。

两项透彻的《济贫法》措施起始于 1795 年：斯品汉姆兰制度和放宽“教区农奴制”。这很难令人相信只是一种巧合。它们在劳动力流动性方面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对徘徊着寻找就业机会的工人来说后者对他们更有吸引力，而前者则进一步减少了强迫工人去这样做的情况。在移民研究上有时使用两个合宜的词“推”和“拉”，当目的地的“拉”字用得更多时，家乡的“推”字就会用得少。这样斯品汉姆兰制度肯定减轻了作为修订“1662 年法案”所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大范围的未确定行动的后果的危险性。从《济贫法》管理的角度来看，坦率地讲这两项措施是互补性的。因为放宽“1662 年法案”涉及到该法案旨在回避的那种危险，即穷人大量涌入“较好的”教区的危险。要是没有斯品汉姆兰制度，这种危险也许真的会发生。同时代的人很少提及这种关系，因此当人们回忆起甚至在没有经过公开讨论的情况下“1662 年法案”就被付诸实施时，人们几乎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然而，因为威廉·扬爵士曾两次与他人共同发起

了这两项措施，所以他的头脑中一定会有这种信心。在 1795 年，他倡导修改了《居住权法》，同时他又是“1796 年法案”的提议者，正是通过这个法案斯品汉姆兰原则被写进了法律。在 1788 年，他曾经有一次倡议了同样的这两项措施，但未获成功。他几乎以与 1795 年相同的措辞提议废止《居住权法》，同时他又倡议一项救济穷人的措施，即建议设立最低生活工资，该工资的三分之二将由雇主支付，三分之一由地方税支付（尼科尔森（Nicholson）：《济贫法历史》，第 2 卷）。然而，这需要另一次严重的歉收再加上法国大革命才能使这些原则奏效。

3. 城市高工资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城镇的“拉”导致了农村工资的上涨，同时这也往往会导致农村劳动力储备的流失。在这两个密切相连的灾难之中，后者的影响更为重大。拥有足够的劳动力储备对于农业生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与冬季的农闲季节相比春秋两季的农活需要更多的人手。现在，在一个传统的组织结构的社会中，这样一种劳动力储备的实用性不是简单的工资水平问题，而是决定人口中较贫困的一部分人的社会地位的制度上的环境问题。在所知道的差不多所有的社会中，我们发现正当或者通常的安排是维持农村劳动力由地主支配的做法，以应农忙时节雇佣劳动力之需。

一旦社会地位让位于契约，这里就出现了由于城市工资上涨而在农村社会中所造成的情况的难题。在工业革命之前，在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储备：男人在冬季忙于手工业生产或者家庭手工业，而在春、秋两季男人和他的妻子则忙于田间农活。《居住权法》实际上使穷人处于教区的农奴地位，从而使穷人依赖于当地的农场主。有着诸如劳动率、雇佣职位或者巡夜人制度等其它各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济贫法》把常驻的劳工变成顺从的工人。在各种不同的产业机构的规章中，穷人不仅随意地遭到残酷的惩罚，而且实际上是秘密地遭到惩罚；如果有权白天强行进入穷人住所的政府当局发现穷人“处在贫困中并且应该受到救济”时，有时寻求

救济的人会遭到逮捕并被带至工业大楼（31 Geo. III. C. 78）。在这些工业大楼（Houses of Industry）中（穷人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补充说一下北部的雇农或者边境居民的境遇，他们的工资用实物支付，且被强迫随时到田间干活，还有与契约屋相配在一起的多种附属物和穷人方面的不稳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人们可以估量到的潜在的温顺的劳动力后备大军所达到的程度。因此，除了工资问题外，还存在着维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储备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所不同。推行斯品汉姆兰制度与农场主害怕工资上涨有密切关系，而在农业萧条期间的后期（1815 年之后）津贴制度的快速普及可能也是由同样原因所决定的，在 30 年代早期，农业界几乎一致坚持有必要保留津贴制度，这么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工资上涨，而是因为他们担心现成的可用的劳动力是否有充足的供应。然而，在任何时候他们头脑中从来就没有不考虑后面的这个因素，特别是在这一段长期的异常繁荣期间（1792~1813 年），这期间内谷物的平均价格剧增并远超过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斯品汉姆兰制度背后，不是工资而是劳动力供应才是人们潜在的持久关注的事。

因为人们将期待着工资的上涨会吸引较多的劳动力的供应，所以试图区分这两种动机的做法就可能似乎是有点人为的意思了。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有着确实的证据可表明在农场主的头脑中这两件需关注的事中到底哪一个是他们最主要担心的事。

首先，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即便发生了常驻穷人的情况农场主还是对任何形式的外出就业持敌对态度，因为外出就业会造成临时性的雇佣农业劳动力紧缺的状况。1834 年“报告”中的一份证词指责常驻穷人去“捕捉鲱鱼和鲭鱼，每周挣的收入多达 1 英镑，却把他们的家人留给教区来照顾。他们一回家就被送进监狱，但他们并不在乎，只要他们能再次外出干报酬丰厚的工作就行……”（第 33 页）。更确切地说，这同一份证词抱怨道，为什么“农场主在春、秋两季的农忙季节常常不能够寻找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亨利·斯图

尔特（Henry Stuart）的报告：附录 A，第 1 部分，第 334 页 A）。

其次，存在着副业生产地分配的关键性问题。农场主一致认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肯定使一个男人和他的家庭避开地方税，就像他肯定不会避开他自有的一小块土地一样。然而，甚至连地方税的负担也不会诱使他们同意任何形式的副业生产地的分配，因为这种分配也许会使常驻穷人更少地依赖于临时性的农活。

这点值得注意。直到 1833 年，农业界一直不动声色地支持保留斯品汉姆兰制度。下面从《济贫法专员报告》中引用几段话：津贴制度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迅速完成的收割”（鲍尔（Power））。“没有津贴制度，农场主可能就不能继续耕作土地”（考埃尔（Cowell））。“农场主希望他们雇佣劳工的工资由济贫法来支付”（J·曼（Mann））。“我不认为特别是大的农场主会希望减少它们（地方税）。当地方税没有改变时，他们总是能够得到他们另外想要的更多的人手，而且天一下雨，他们就可以把这些人手全部都重新赶回教区……”（一个农场主的证词）。教区代表“反对任何会使劳工不依靠教区援助的措施，因为通过限制劳工活动范围的方式，当有紧急工作需要时，教区援助能使劳工始终处于可自由使用的状态。”教区代表断言“高工资和自由的工人们将会击垮他们”（普林格尔（Pringle））。他们不动声色地反对会使穷人自给自足的所有赋予穷人副业生产地的建议。会使穷人免于贫穷以及使穷人体面和自尊的小块土地也会使穷人自给自足，且使他们离开了农业产业所需的（劳动力）后备大军的行列。副业生产地的倡导者马金迪（Majendie）建议小块地面积为 0.25 英亩，他认为任何高于这个面积的要求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土地）占有者担心使劳工们自给自足”。副业生产地的另一个支持者鲍尔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农场主们十分普遍地反对推行副业生产地。他们唯恐他们的财产这样会缩水；他们施肥不得不走更多的路；以及他们反对增加其劳工们的自给自足性。”奥基登（Okeden）建议副业生产地面积为 $\frac{1}{16}$ 英亩，他说道，因为从事家庭手工业的每个家庭在满负荷运转时，“他们在纺车和手工纺纱

杆、梭子和针织用针上所花的时间正好把他们的业余时间全部消耗掉！”

从农业界的角度看，几乎不用怀疑津贴制度的真实功能，因为这确保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常驻穷人的农业（劳动力）储备。顺便提一下，斯品汉姆兰制度用这种方式制造出农村过剩人口的表象，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表象。

4. 工业化城镇的津贴制度。

设计斯品汉姆兰制度主要是作为减轻农村贫困的一项措施。因为集镇也属于农村，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对乡村的限制。直到 30 年代早期，在典型的斯品汉姆兰地区大多数城镇都彻底地推行了津贴制度。例如，从过剩人口的角度看，被划分为“好”的赫里福德郡显示出调查了坦率地承认使用斯品汉姆兰方法的 6 个城镇中的 6 个（其中有 4 个是“肯定的”，4 个是“可能的”），而被划分为“差”的苏塞克斯郡，从严格意义上讲，显示出调查了 12 个申报城镇中有 3 个没有使用斯品汉姆兰方法，9 个使用了斯品汉姆兰方法。

当然，北部和西北部的工业城镇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直到 1834 年，工业城镇中的依赖性穷人的数量比农村地区要少得多，甚至在 1795 年之前靠近工厂的地区往往会大幅度增加穷人的数量。1789 年，尊敬的约翰·豪利特（John Howlett）令人信服地反驳了这一观点，即“普遍的错误看法是，在大城市和人口众多的制造业城镇中穷人的比例要比纯教区中的穷人比例高，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农业年鉴》，第 6 卷，第 6 页，1789 年）。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新型工业城镇的情况了解得不是很清楚。济贫法专员看来不安于据说是即将来临的把斯品汉姆兰方法扩展到制造业城镇的危险。人们公认“北部各郡受这种危险的影响最小，”然而人们仍然声称“甚至在城镇，这种危险也以可怕的程度存在着。”事实几乎很难证实这点。确实，在曼彻斯特或者奥海姆，救济金偶尔也会发到健康良好并得到充分就业的人的手中。亨德森（Henderson）这样写道，在普雷斯頓的纳税人会议上，一个穷人发

言道：“他让自己依赖于教区，结果周薪从 1 英镑一直降到了 18 先令”。索尔福德镇区、潘德汉（Padiham）镇区和欧文斯顿（Ulverston）镇区也被归于“定期”实施补助性工资方法的地区；就织布工和纺纱工而言，威根的情况也相类似。在诺丁汉，长袜以成本价出售，给工厂主“带来的利润”很明显得归功于地方税中支出的工资补贴。亨德森在普雷斯顿作报告时，他在脑海中总是想到这可恶的制度“逐渐产生并在保护自身的过程中获得私人的利益”。根据《济贫法专员报告》，这种制度在城镇中较少流行，只是“因为制造业资本家在地方税纳税人中所占的比例小，因此他们对教区的影响要比农场主对教区的影响小。”

然而，从短期看可能是这样，从长期看似乎有可能存在着对产业界雇主普遍接受津贴制度产生不利影响的几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低效的穷人劳动力。按人们的叫法，棉花行业的运作主要以计件工作或任务工作来进行。现在，甚至在农业方面“教区丢脸和效率差的养老金”是如此的糟糕，以致于“领养老金中的 4 个或者 5 个人的效率等同于计件工作的一个人的效率”（“有关工人工资的特别委员会”，H. of C.4, VI, 1824 年，第 4 页。）《济贫法专员报告》注意到，在不破坏“制造业工人的生产效率”的情况下，计件工作或许允许使用斯品汉姆兰方法；这样工厂主也许会“真正地得到廉价的劳动力。”这暗示着农业工人的低工资不一定就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因为这些工人的低效率可能会在价值上超过雇主支付给其工人的低工资。

往往会使企业主转而反对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竞争者的危险。鉴于补助性工资的结果，这些竞争者可能会以可观的较低的工资成本进行生产。这种威胁对在不受限制的市场上出售产品的农场主没有影响，但是这种威胁可能会使城市的工厂厂主感到极大的不安。《济贫法专员报告》认为，“由于埃塞克斯郡滥用《济贫法》，麦克莱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的工厂主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人廉价出售并导致破产。”威廉·坎宁安领会了“1834 年法案”

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国有化”对管理《济贫法》的影响，从而消除了全国市场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的障碍。

反对斯品汉姆兰制度的第三个理由，可能也是对资本家集团影响最大的一个理由是，斯品汉姆兰制度往往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留住了“大量懒惰的剩余劳动力”（雷德福（Redford））。到了 20 年代后期，城市工厂主对劳工的需求很大；多尔蒂工会引起了大范围的动荡；这是欧文主义运动的开始，这次运动导致英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人罢工和雇主停工。

因此，从雇主的角度和从长远来看，三个强有力的论据对斯品汉姆兰制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它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它造成如在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成本差异的趋势；它促成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像一潭死水”（韦布），从而支持了城市工人垄断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情况都不会对个体雇主造成太多的影响，或者甚至不会对本地的雇主集团造成太多的影响。雇主们可能会轻易地受到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影响，不仅在确保利润方面，而且还在帮助他们与其它城镇工厂主竞争的方面。然而，作为一个阶层的企业家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看来原本对个体雇主或者雇主集团有利的事情却对他们全体构成了威胁。实际上，即使津贴制度在形式上有所精简，但是正是这种津贴制度在 30 年代早期向北部工业城镇的扩展巩固了反对斯品汉姆兰制度的观念，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对其施行了改革。

这个证据表明城市政策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指向在城镇中逐步建立工业（劳动力）储备大军，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应付经济活动的剧烈波动。在这方面，城镇和农村之间没有多大区别。正如乡村当局宁可选择高地方税而不是高工资一样，城市当局也不愿意把非常驻穷人移入城镇的地方定居。在共同享有（劳动力）储备大军方面，在农村和城市雇主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只是在 40 年代中期严重和长时间的萧条期间，以地方税为代价来支持储备劳动力这事变得不可行。尽管那样，农村和城市的雇主还是以相同的方式行事：城市

的雇主开始并持续地把农民大规模地从工业城镇中撵出来，与之相呼应的做法是农村的地主则“清扫村庄”，这两种做法的目的都是减少常驻穷人的数量。（参阅雷德福，第 111 页）。

5. 城镇优先于农村。

根据我们的设想，斯品汉姆兰制度是在面对以日益上涨的城市工资水平为代表的威胁时所采取的保护农村社会的一项措施。就贸易界而论这涉及了城镇优先于农村的问题。至少在一个例子中——1837~1845 年萧条的例子——这个例子可以显示出情况一直是如此。1847 年所作的细致的统计调查显示萧条开始于西北部的工业城镇，然后蔓延到农业郡县，但农业郡县的经济复苏却明显地迟于工业城镇。数据显示“首先降临到制造业地区的压力却从农业地区才最后消失。”制造业地区的调查以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西区为代表，它们拥有人口 201,000 人（根据济贫法工会 584 的调查）；而农业地区的调查由诺森伯兰、诺福克、索福克、剑桥郡、巴克斯（Bucks）、赫特福德郡、波克夏、威尔特郡和德文郡组成，它们拥有人口 208,000 人（同样根据济贫法工会 584 的调查）。制造业地区的情况改善始于 1842 年，贫困人数的增加从 29.37% 下降到 16.72%，随后几年又有确实的减少，1843 年再减少 29.80%，1844 年继续减少 15.26%，1845 年又进一步减少 12.24%。与这种情况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地区的情况改善仅始于 1845 年，那年贫困人数减少了 9.08%。在所有的情况下“济贫法”的支出均按总人口的人头比例分摊进行计算，末尾还分别按每个县和每一年作计算（J·T·丹森（Danson）：“1839~1847 年英国百姓的状况”，《统计社会学杂志》，第 6 卷，第 101 页，1848 年）。

6. 农村的人口不足和人口过剩。

英国是欧洲唯一对城镇和农村的劳动力进行统一管理的国家。像 1563 年或者 1662 年的那些法令在农村和城市的教区以相同的方式予以实施，治安官们则在全国公平地执行法律。这种情况得归因于早期的农村工业化和后来的城市基地的工业化。因此，不像欧洲

大陆那样英国在城镇和农村的劳工组织之间不存在管理上的断层。这再次解释了劳动力似乎从乡村流向城镇又从城镇流回乡村的这种特殊的不受拘束的现象。从而避开了欧洲大陆人口统计学上最不幸的两个特征——即，由于从乡村向城镇移民而导致突然发生的农村人口不足，以及因而涉及到把那些已在城镇开始工作的人连根拔除的这种移民过程的不可逆性。*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是农村这种巨变枯竭的现象的名称，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它一直是中欧农村社会的使人恐怖的事。然而我们在英国发现的状态却像是在城市和农村就业之间人口的上下波动。这种状态几乎像是大部分人口一直处于一种悬而不决的状态，是一种否则不可能使国内移民趋向很难以继续下去的环境。另外，记住这个国家有着到处存在的港口的地表形态，这种地表形态可以说是使得长距离的移民没有必要，因而轻松地对《济贫法》的管理作调节就可满足全国劳工组织的要求这事也就变得令人容易理解了。农村的教区经常把院外救助发放给已经在不太远的城镇就业的非常驻穷人，把可观的救济金发放到他们的住处；另一方面，制造业城镇也经常向并没有定居在城镇的常驻穷人发放贫困救济金。只有在1841~1843年期间，作为例外情况，城市当局实施了大规模的迁移。按照雷德福的说法，在那次迁移中，有12,628名穷人从北部的19个制造业城镇迁移出来，但其中只有1%的人定居在9个农业区内。（如果丹森在1848年挑选出来的9个“典型农业区”被替代成雷德福挑选的郡，结果会有所变化，但是变化幅度不大，从1%到1.3%。）如雷德福所显示的，几乎不存在长距离的移民，而且通过在乡村和制造业城镇进行大量救济的方法维持大部分的劳动力后备大军供雇主使用。难怪在城镇和乡村会同时出现“人口过剩”现象，而实际上在需求高峰期，兰开夏郡的工厂主还不得不从爱尔兰引进大量的工人，农场主则强调如果村庄的穷人都受了诱惑而移民，那么在庄稼收割期间他们将可能会无法支撑下去。